陳毅資料選

上海師範學院
上海師範分院圖書
所主義教研室

目　录

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1972.1.10.（1）
悼陈毅同志　1972.1.……朱　德（3）
挽陈毅同志　1972.1.……董必武（3）

陈毅同志传记　1953.……（4）
给罗生特同志的信　1943.3.8.……陈　毅（6）
陈毅将军略传　1939.4.……（11）

八一起义……陈　毅（14）
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摘要)1929.9.1.……陈　毅（28）
第一号《布告》　1934.11.7.……陈　毅（36）
寻淮州同志略历（碑文）　1938.5.15.……陈　毅（38）
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　1939.2.……陈　毅（39）

关于学习 ——四月十一日在干部晚会的报告
1939.4.11.……陈 毅（49）
茅山一年 ——江南游击区 1939.6.21.……陈 毅（60）
江南游击区域工作经验片谈 1939.7.……陈 毅（90）
永不忘，学习他，我们的死者 1939.7.……陈 毅（98）
井冈山的斗争 1940.……陈 毅（103）
在皖南事变前致兰溪的一封信 1940.6.11.……陈 毅（108）
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 1941.1.15.……陈 毅（111）
就职（代军长）演讲词 1941.1.……陈 毅（121）
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 1941.8.……陈 毅（128）
附：新四军东进抗日记略 1937.7.7.—1941.1.20.…（137）
在"七一"纪念晚会上的报告（节选） 1942.……陈 毅（141）
伟大的二十一年（节选） 1942.7.……陈 毅（143）
论军事建设 （华中局扩大会军事建设报告的一部分）
1942.12.10.……陈 毅（149）
应付时局与整风 （整风笔记之二） 1943.2.…陈 毅（163）
新四军在华中 1943.7.……陈 毅（173）
纪念邹韬奋先生 1944.9.29.……陈 毅（185）
追忆彭雪枫同志 1945.1.24.……陈 毅（187）
痛悼与奋勉 1946.……陈 毅（190）

纪念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　1946.6.29.……陈　毅（192）
关于知识分子参加解放区学习与工作问题……陈　毅（195）

新四军苏北陈总指挥官毅对时局发表谈话 1944.12.28.（201）
陈毅将军谈话　1946.6.……（205）
陈将军对郝鹏举的谈话　1947.3.……（207）
就是这样我们过了江
——记陈毅将军讲渡江准备　1949.6.……杨　刚（212）
江西革命斗争中的几个问题（根据访问陈毅同志的
记录整理）……（219）

室中旅行法　1925.3.18.……曲　秋（228）
报　仇（小说）　1925.4.1.……曲　秋（239）
十年的升沉（小说）　1925.4.3.……曲　秋（243）
译米塞诗两首　1925.4.20.……曲　秋（250）
文学家你走那一条路？　——劳动文艺的重要观点
1925.5.2.……曲　秋（253）
西山埋葬（小说）　1925.5.27.……曲　秋（257）
失掉了的孩子(圣诞节的故事)译后记 1925.9.6.曲　秋（266）
生　日（小说）　1925.9.……曲　秋（269）
归来的儿子（小说）　1926.10.19.……曲　秋（277）

江南抗战之春（战地杂讯） 1939.4.……陈　毅（296）

关于陈毅和新四军(节选)　1946.……福尔曼（313）
陈毅将军印象记 ——山东纪行之一 1946.3.…李　普（317）
访陈毅将军　1947.2.……白蒂·葛兰恒（322）
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　1949.5.26.……秋　羊（324）
《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一文辨正　1973.……陈昊苏（342）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关于我们的父亲陈老总的回忆片断
1978.12.20.……昊苏　丹淮　小鲁（345）

附　录：
一、建国后陈毅同志部分著作、文章、报告目录……（358）
二、回忆陈毅同志文章目录……（359）

编后记……（370）

注："曲秋"是陈毅同志二十年代曾用过的笔名。

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
周恩来同志的悼词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级阶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悼陈毅同志

朱　德

一九七二年一月

一生为革命，　　盖棺方论定。
重道又亲师，　　路线根端正。

挽陈毅同志

董必武

一九七二年一月于广州

久被病魔折，　　元良竟丧生。
立功丰不伐，　　求艺广多成。
皓月无幽意，　　清风有激情。
井冈山上树，　　瞻仰总心倾。
闻君病重久，　　欲探未成行。
忆昔比邻住，　　曾为倒屣迎。
闾闾谈国事，　　了了述边情。
栋折我将压，　　伊谁继直言。

陈毅同志传记

陈毅（生于一九〇一年），中国的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京作青年运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在四川的旧军队中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中共党委书记。是年秋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朱德领导下，整编保留下来的部队，继续坚持斗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初基础的一部分。在一九二八年，这一支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部队会合，组成红军第四军后，陈毅在红军第四军中担任师长和中国共产党第四军委员会书记等职。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任红军第二十二军军长、中国共产党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赣南特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红军主力离开中央根据地以后，他和邓子恢、项英、张鼎丞等奉党的命令留守原地，以极小的兵力和数十倍的蒋介石匪军进行了极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副书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指挥新四军击败了华东的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巩固和扩大了华东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他担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他和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共同指挥第三野战军粉碎了蒋介石匪军在苏北和山东地区的重点进攻，转入对蒋介石匪军的胜利的进攻，并协同刘伯承、邓小平所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取得了对整个战争带有决定性的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进而解放了包括上海和南京在内的华东地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原载：《党史资料》1953年第6期）

给罗生特同志的信

陈　毅

罗生特同志：

你以反法西斯盟友的资格，远渡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同时更深入敌后参加新四军工作。新四军的艰苦斗争为你所亲见，所身受。新四军的一切，你永远是一个证明人。

你计划写一本关于新四军的书。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谢你对新四军的帮助，更愿以同志的身份帮助你完成这本有意义的著作。现在我来答复你的要求，将我自己的历史简单叙述如下。

一九〇一年，我出生于四川中部的乐至县，当时我的家庭是一个小地主。我五岁开始在家乡的私塾里识字读书。七岁时，我的外祖父在湖北做一个小官，这是他花二百两银子买来的一个官职。我的父亲到他的衙门中去帮办文书事务，带了我到外祖父的任上去就学。我在那里过着衙门的生活。那时候留下一个至今难忘的印象，就是他衙门里经常毒打犯人，使我在旁边看了非常难受。我很同情那些被打的人，在我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怒不平的种子。

在那里过了两年多时间，满清王朝官府中腐败黑暗的情况，引起我极端的厌恶，我也不愿意再过那寄人檐下的生活，坚决要求离开外祖父的任所。我随父亲到了成都，因为我们老家的

田产已经卖掉了，全家搬到成都近郊，住的房屋和耕种的土地，都是向地主租来的。

一九一一年我十岁的时候，辛亥革命起来了。这个革命在我们四川地方是由资产阶级改良派掌握着上层领导，他随时企图与满清政府妥协。在下层则有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群众的行动表现得异常坚决和英勇。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

我在成都上过几个小学，后来跨进了一所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工科。但那时我实在的兴趣是集中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连续不断的军阀内战，引起我对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注意。而我少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我在成都遇见的几个精通中国文学的老师，以及成都四围富于文学艺术史迹的自然环境，又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这运动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使我在思想上起着大的变化。同时，我的家庭因为田租的纠纷，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化了许多钱，这时候已经临到破产的地位。家庭已不能担负我求学的费用，我只得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恰在这时，我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经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生的资格，得到四川省政府补助的一笔旅费，赴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

我一九一九年十月到马赛，同年底到巴黎，一直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回国。在这两年中，我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注意当时俄国革命的情形，同时广泛地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卢梭和雨果的著作。我在巴黎的一个工厂中做了八个月的工。我之所以回国是因为在一九二一年夏秋参加留法学生的

爱国运动，被中法政府联合行动用武装押送回来的。当时在巴黎和里昂宣布的“罪名”，是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

一九二二年初，我回到四川，曾在重庆《新蜀报》当过一年编辑。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冬，我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同时仍保持在中法大学学习的名义，直至一九二五年底通过了毕业考试。

这时期，我仍然没有放弃对于文学的爱好。我从事翻译法国的文学作品，也另用笔名写了许多诗歌和小说。我企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影响中国的文学。我曾经发表过下面几篇文章：（一）《论劳动文艺》；（二）《对罗曼·罗兰及其英雄主义的批评》；（三）《对法朗士的批评》；（四）《对巴尔比士著作的介绍》；（五）《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与徐志摩的争论》。这些文章都是在党影响之下写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我主要地是从事党分配给我的工作，从此停止了我的文学生活，变成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

一九二六年，北京爆发了“三一八”惨案，我在北京已不能公开活动，乃回四川做协助北伐军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又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任政治工作。不久，武汉国民党继“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之后也宣布反共。我从武汉到江西，赶上了“八一”起义的部队，并随军南征，从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一直到今天没有间断过。

我随南昌暴动的一部分队伍，在朱德同志率领下，辗转作战，到达湘南。一九二八年，这支部队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组成红四军，我在其中担任过师长、

军委书记等工作。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的五年中，我参加中央苏区的建设工作，担任过军长、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多半是在前线作战。我曾经两次负伤，据医生诊断说我是一个半残废。苏维埃中央政府曾经两次给我红星奖章。全国苏维埃两次代表大会上，我都当选为苏维埃中央委员。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出发长征，那时我身负重伤，被留在江西担负军事指挥，并主持政府工作。一九三五年春，我们在敌人重兵围攻下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到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坚持了将近三个年头。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

整年整月的时间，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房子住，在野外露宿。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我们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是我们生活的常规。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依靠群众的支持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术达到了最精采的阶段。南方的三年游击战争，也同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可战胜的伟大革命力量。

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了。南方的红色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我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一九三八年春，我们的部队深入敌后作战，我在南京上海一线担任游击战争任务。一九四〇年在与日寇和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中，我们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我先后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华中总指挥部担任指挥任务。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我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四年抗战的经

验，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凶狠的敌人，也更证明新四军是一支不可克服的军队。因为新四军起初很弱小，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把自己的力量壮大起来了。

亲爱的罗生特同志，上面所说，是我四十一年来全部生涯的概括。你如果问我有些什么经验体会，我总的答复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当他在党的领导之下，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时，他就具备了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坚定地与国内外的敌人斗争到底，去完成他担负的革命事业。

亲爱的罗生特同志，我的历史已经讲完。请你指教。

敬礼！

陈　毅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于苏北盐阜区亭子港

（原载：《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陈毅将军略传

陈毅将军是中国工农红军有名将领之一，也是工农红军创造者之一。他与中国工农红军领导者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创造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他是四川乐至人，现年三十八岁。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地主，因此他曾受过高等的教育。欧战后他往法国为勤工俭学生，在这时，他思想上渐渐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逐渐倾向共产党。一九二三年回到祖国的北京，就投身到文化运动，一九二三年便正式加入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北京市委的工作。

北伐时派回四川，往返在四川高级将领如杨森刘湘间进行联络，响应北伐。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重庆事变，四川军阀屠杀革命分子时，他回到汉口，改任中央军校党委书记。武汉国共分裂，他就到南昌参加了有名的南昌暴动。叶贺军队回师广东，他就被委为叶挺将军下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政治指导员，后来叶贺在潮汕失败，二十五师的师长政委皆离开队伍，那时在三河坝，由他和朱德领导，转入江西，折向湖南。这些部队，便是以后十年来震动全世界的中国红军的最初基础。他那时担任朱德的政治委员。后来湘南暴动，便组织了革命委员会。以后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另一部分部队会合，便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兼十师师长，毛任政委兼十一师师长，他便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的根据地。一九二九年红

军在井冈山突围，转入赣南闽西，便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土地革命。到江西后，他与黄公略组织第六军，后来改为第三军。黄公略任军长，他任政委。一九三〇年，彭德怀占领长沙，朱毛红军北上会合，再行围攻长沙时，他又在赣南集中游击队，成立二十二军，他自己任军长。一九三一年一月，他率领二十二军与朱毛会合，打破了当时的第一次围剿。后来在建立中央苏区时，他任江西省党的书记，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朱毛红军，打破了当时二次和三次的围剿。一九三一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被选举为苏维埃中央委员，改任江西军区的司令员，领导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和地方部队，打破了当时的四次围剿。五次战斗中，他经常被军委派到西方战线任西方军司令，领导少数部队，在第一线上牵制庞大的进攻部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因此，他曾得了二次红军奖章。

在主力军突围前，一九三四年八月间，在高兴圩作战负伤，这伤直到现在没有好。以后主力红军突围，他被派留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党中央分区的委员，和项英将军一起领导中央苏区的武装，来保卫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进攻部队的碉堡政策，侵入了中央苏区的所有地区。他便和项英将军一路出来游击，在于都（被）敌切断，他仍和项英将军同转入赣南。在这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从此和其他的部队失去了联络，只好在这地区内艰苦奋斗。这时进攻方面用了超过二三十倍的兵力，几年来不断的进攻，想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要剿尽他们。但因他们能倚靠这地区内广大的民众，运用很灵活的小部队的行动和战术，过着最艰苦的生活，最顽强的战斗，终于保持了他们的力量和地区。七七芦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抗战发生，这才取得了和平的成功。但这以后，他又到各游击

区去联络和集中部队。后来决定成立新四军，他又到各游击区去集中和改编，使分散在七个省区的游击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集中在一起。同时他就被任为支队司令，直至现在。

（原载：《译报周刊》第2卷第2期　1939年4月27日）

八 一 起 义

陈 毅

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一道界牌。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是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以汪精卫、张发奎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捣毁农民协会，一样的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进讨蒋的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发表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保持一定的欺骗。事实上，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在党中央尚未清算，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也没有撤换。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一重大决定关键，不能不是软弱的，无力的。对于八一起义，既无布置，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继续

合作下去，显然不可能，人家已经动刀杀我们头了，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又没有这种勇气，而陈独秀正大放其取消革命的言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巩固了，今后只有议会斗争了，只有办杂志宣传斗争了等等。八一起义粉碎了陈独秀的谰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彻底清算了。

东进部队中，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为首，主张起义，中央对起义不反对，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于是就在南昌行动起来了。起义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贺龙的二十军人数虽多，但因党的领导不强，基本还是旧式军队，所以战斗力也比较弱。在三十号起义开始，到八一全部占领了南昌，顺利解决了城内敌人。

起义以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团，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张部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在周士第起义时已拉出一些，又加上俘虏，逃难到南昌的革命同志，工人和农民群众等扩充起来的。当时全能跟上就跟上的。

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导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布置之乱，可以想见了。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

746490

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至广州，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是选了一条偏辟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会昌，瑞金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了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没有懂得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广大人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主要的革命斗争形式。方志敏同志以极少数的武装，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能够坚持十年，主要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托。贺龙同志在潮汕失败后，单人匹马回到洪湖地区，能拉出那样大的一个局面，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也主要是发动群众的结果。人民的武装必需以广大人民为依托。

人民对贺叶部队的起义是支持的，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是欢迎的，对国民党的叛变是愤怒的，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是非常英勇的。

我当时在“武汉军校”负党的责任。军校学生有七八千人，有七百多个党团员，很多同情分子。我们八月二号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八月四号到九江。七八千学生坐了几十条船，一个小火轮拖三四条木船，每一条船上坐几十人，浩浩荡荡，风涌直下。军委的命令叫我们东进讨蒋，归张发奎指导。军委并没有告诉我们八一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有变化，要我们有应变的准备。但因为不知道八一起义的事，所以准备是很不够的，几乎是没有准备的。学生们大部是徒手，小部

有枪，枪是烂枪，很多没有子弹，船坐得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满长江都是船，那个人坐在那个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易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到了。八月四号船到九江，船不准靠岸，事情严重起来了。张发奎的兵立刻到船上来说："同志们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了"，七八千学生就这样在船上缴了械。下午，船才准靠岸。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一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他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的喊那边这边。但那边当然没有人敢去站，一喊都站在一边了。

当晚，我们在党内布置了一下，指出了几条路。一条可以回家，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一条连夜出发到南昌去和叶贺会合。一条，要是还没有暴露的，可以留下。大约有两百多人愿意留下，这两百多人组织了支部。我们估计叶贺可能到广州方面去，张部也一定向广州，到广州后，再跟自己部队会合，以后，这两百多人，果然成了广州的基干。缴械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学生对汪张的反动，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下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到了井冈山。

我是著名的红色分子，埋伏在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连长肖劲同志是党员，一二三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说："你是cp分子，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理。对于汪张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是普遍愤慨的。但我和肖劲同志因为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去找叶

贺。

我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老百姓很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乱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当兵的，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说回家，不干了。快天亮了，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睡，住家不用说，旅店伙铺都大门关的紧紧的，打门不开，说是当兵的更不敢收留。只好到山上树林子里休息一下。天亮以后，又走，走出了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才没有了。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我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可以在姑塘赶船，姑塘有船开南昌。

就我看，一路上可疑的人很多，都个人埋头赶个人的路，谁也不招呼谁。我有意和一个人攀谈了一下，那个人是安徽人，他说：你老百姓不懂，现在汪张也杀自己人了。背叛革命，背叛工农，骂苏联有什么不好。他说汪张是假革命，我们青年人受了他的骗，决定不干了。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我不够资格，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收。我现在回家去，反正不干反革命。这是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情绪。

我们到姑塘赶上船，飘鄱阳湖赴南昌。船上有几个广东人，看我一看，一定也是部队里的。船上的人纷纷议论，有的说张发奎的兵开到了九江，有的说贺龙在南昌暴动了。一个有点流氓气的老头子怪论最多，他说：蒋介石是乌龟下凡，他妈偷和尚，他是和尚的儿子。又说孙中山这个人不错，就是老婆娶坏了，不该跟乌龟作连襟。原来大伙听着他的怪论，很高兴，但他一糟踏孙夫人，那个广东佬忍不住了，忽然生气要揍

他，喊了一声，蒋介石是坏蛋，孙夫人有什么关系，孙夫人是革命的，再胡说，揍你！那老家伙没想到会有这么一着，立刻哑口无声了。这以后，大伙讲话就有了顾虑，都闭口不谈国事了。我到了贺叶部队以后，这广东人也到了，恰巧他派在我一个连里，我说："你在船上的威风，我已经领略够了。"

我们六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才知道张发奎已经进了南昌，贺叶已经退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骂共产党，又开始捉共产党，杀共产党了。从九江动身的时候，本来规定了几个接头的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贺叶究竟那儿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往临川、抚州去了。我们当时很奇怪，没有估计到是走这条路往潮汕，以为这消息一定不确实。这时城里很紧张，我们没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危险，还是决定出城去追部队。

出南昌十多里，到了一个渡江渡口上有一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都不肯渡人到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服裤，不象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那儿去了，他说经临川方向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去吉安，我们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跟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学生联合会，他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说：不是，不是！

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目后，就让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应承，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州岸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

过去李家渡以后，沿路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

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的十二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探，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原来八一起义时，叶挺扣留了蔡廷锴，想争取他的十二师一齐起义，蔡被扣以后，队伍也带过来了，十二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二师的领导，但叶挺因为和蔡廷锴是老朋友，很犹疑，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靳县去了，到了靳县，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靳县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个十二师后来虽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二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队伍，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布置。

赣东有一般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广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边，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不愿去，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广，由他介绍了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带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没等到什么邓司令，连傅大广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部队等来了。朱部杨汝营的兵开进了临川，就在街上戒

严，抓共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出城，就被步哨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部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一听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

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广，这位先生也正是惶惶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找，你们自己到山里找去。”我们没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家不知是他的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面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没有办法，只好再赶队伍，连夜赶了五十里，赶到宜黄，赶上了队伍，这次到了队伍，就把我分在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最早的武装，从1923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最有功绩的部队。1924年，叶挺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就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党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象××、陈赓、周士第等，都在这个团工作过，党对这个团的领导是坚强的。1924年成立以后，这个团从没打过败仗，第一仗是在衡县以南的攸县，就把北洋军阀打的落花流水，打垮了北洋军阀六个团。蒋介石当时以叶挺为先锋，命这个团孤军深入，本来是阴谋使这个团复灭在北洋军阀手里的。只是因为这个团的英勇善战，蒋的借刀杀人阴谋才没有成功。第二次打汀泗桥的胜利，第三次攻克武昌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决定作用。以后在河南打郑州，打开封，威名远著。这

个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扩编为师，抗日战争时，改编为一一五师的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新四军第七旅，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传统的部队之一。

我到这个团工作后，下到连队看看，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抛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因为有为民众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信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

我们到宁都以后，国民党已有准备。桂系军阀集中了很大力量，广东军阀也以钱大钧所率的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另两个团到瑞金会昌一线来堵，而朱培德就紧紧跟着屁股后面。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二十军八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六个团，朱德第九军只有一个教导团。朱德同志当时是先遣司令，但却是没有部队的司令。

部队推进至壬田市，贺龙就和钱大钧相迁了，在壬田市一个遭迁战，把钱大钧打垮了，钱退至会昌。我们当即决定叶贺分兵两路合击会昌，在会昌城外的南山岭，战斗打响了。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上午，解决战斗，获得了辉煌的胜利。计全歼钱大钧四个团，钱大钧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第二天休息了一天，第三天桂系黄绍竑的部队就从我们的侧背赶到了。他从赣州赶到会昌，恰巧跟我们翻了一个个，即从我们的攻击原路，攻击已在我手的南山岭，打了一天，我们消灭

他们的两个营，他才晓得钱已垮，便狼狈逃跑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乘胜追击钱大钧，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钱大钧垮了以后，广东仅仅剩下陈济棠，只有很少的部队。桂系虽实力雄厚，但又不能不防张发奎，因张发奎和桂系有矛盾，他也正扬言要下广东，假若当时采用这个决定，虽未必能拿下广州，但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局面会是不同的。

但当时我们经验少：追钱，又怕迫我之后，且南山岭一仗有大约上千的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很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的精光了。军中缺粮，饭吃不上，找不到人抬担架，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决定去瑞金，至长汀，在长汀下船到汕头。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了，这个决定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的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而我们到了大埔，又作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这个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因叶挺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十五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十七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复灭

了。

××战败以后，贺部余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我们会合外，大部由一姓董的团长率领，会合了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和广州暴动撤出来的武装们三千多人，就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但政策和军事的错误，死打硬拼，后来也在东江被打垮了，传布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击队的革命种子。

我们和反革命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是还想接应贺叶，和贺叶会合，一直到和叶部少数残兵败将在饶平会合后，才知道贺叶已经垮了。

这时候我们约有两千多人，以七十三团作基础，编为第一营，算是个大营，共四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导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个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但人民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涣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象七十三团那样坚强，这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肠打仗。到了大庾，两千多人只剩下九百多人，但这九百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庾

以后就没人逃了。

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1927年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可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会不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我们到了大庾，反革命不追了，蒋桂混战打起来了。人们听了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的说，是会垮光的。个别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还在的，××同志、粟裕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到大庾以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休整了。我们于是便开会，讲道理，传达朱总司令的道理。部队看到了光明，情绪稳定了。正在这时候，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在党内很有影响。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

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

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很宝贵的。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敌强我弱的时候，战略上的分兵是错误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有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依靠人民，由人民自己来建立。反动的旧军队不可能成为坚决的革命力量，因为他不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一定反水。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强大。人民是力量的泉源，党是领导。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裸姆，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朱德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理论化、提高、扩大、提到马

列主义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但不是偶然的。是由革命斗争中考验出来的。

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知道搞武装斗争，并不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土匪山大王的搞法是一种，太平天国的搞法又是一种，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又是一种，只有这后一种成功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原载：《八一南昌起义参考资料》1977年9月）

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摘要）

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

陈　毅

（一）四军的历史

1．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　四军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叶贺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潮汕一带失败，三河坝一战，二十五师及九军失利，向闽赣边界撤退，由朱德率领转入广东北江。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合作，得范石生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大兰、白崇禧等部，实力增加了两倍。是年四月湘南暴动失败，不战而安全撤退至江西宁冈与毛部会合；同行有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民，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耒阳第四师、永兴、资兴各一个独立团。毛部基础为卢德铭团。卢在八一暴动之后，二日由武昌率领去九江，见张发奎业已反革命，乃中途起义。初拟沿赣边去广东与叶贺会合，继因通途险阻乃留在湘东、赣北一带。一九二七年与平浏农军会合，并由毛泽

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动至宁冈，获得当时绿林（洪会）袁文才，王佐之帮助，乃留在井岗山附近各县打游击，这是一九二七年底至次年三月间的事。到了四月，有朱部两千余人，湘南农民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领导指挥训练的必要，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编为三个师，因枪械及人数不足，乃编为28、29、30、31、32、33六个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而枪仅两千余。

2．四军成立以后的经过。　四军成立后与反革命斗争经过极艰苦的历史，可分五阶段叙述：

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这一个时期，四军刚刚成立，内部成份复杂，训练的程序各异，加以湘赣边界贫瘠，以致庞大红军的给养非常困难；同时边界各县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单独军事行动无可避免，只是在茶陵、酃县、桂东、隧川、永新、莲花、宁冈七县内，皆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最险要，周围五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即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政策，非常正确，但当时农民皆有归思，不十分注意执行，至五月底因给养困难，三十二团、三十三团转回湘南，结果分散到农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损失；留在边界之四个团非常努力于对外游击及内部整顿的工作。敌赣军三次进攻皆被击溃，敌军团长陈宣，师长杨池生，杨如轩受伤，尤以六月二十八日（抄者注：系二十三日）龙源口战，敌以两倍于我之兵力被我击溃为有名。当时边界群众有两句联语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最能表示群众的欢迎。赣军此次失

败后，乃联合湘军大规模会剿。敌吴尚八军全部于七月初入驻宁冈，我军适在永新回师迎敌，湘军在宁冈一星期，不敢住民房，通通露营，日夜被农民群众包围袭击，恐慌万状，不得不引退。我军回师，敌已连夜逃走。在此时期，红军迭获胜利，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田地，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边界临时苏维埃政府业已成立，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群众武装，各县成立了赤卫队，由六十名至二百名，红军武装大大扩充，有一倍以上增加，同时在井冈山成立了红军医院和红军学校，训练工农干部，按此时期为边界斗争的全盛时期。

第二个时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在七月初敌吴尚部（湖南第八军）进攻宁冈，我军由×××间回师应敌，吴逃入永新，我军恐其与赣军联合，乃以廿八、廿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根据地之后方；以卅一团应付赣军；卅二团守后方。攻酃、茶之廿八，廿九团迭获胜利，使吴尚部不得不连夜赶回老巢。廿九团全部为湘南宜章之农民，到酃县全体要求回湖南，廿八团则主张去遂川钳制江西敌军，两团行山道两日，非常疲劳，卒择道而入湖南。从七月十五日由酃县、宁冈交界之十都出发，二十二日占领资兴，二十七日进攻郴州（抄者注：系二十四日）击溃范石生两个团。是日黄昏，范部反攻，我军不及应付，黄昏撤退。廿九团大部去宜章散入农村，有一个营在乐昌受了损失，廿八团及廿九团之小部取道资兴，桂东到汝城游击，中间发生第二营长袁崇全之叛变。袁率所部四连及机枪连、迫击炮连作前锋，-袁逆假传命令，日夜急行，意在脱离大队往江西作土匪，或投降反军。该团各连官兵不受欺骗、威迫，忠于革命，自动脱离袁之羁绊归回大队。袁只威迫了第五连、迫击炮连逃

窜至江西崇义界。其后十日大队取道崇义回井冈山复与袁遇，第五连迫击炮连均全部回来，袁逆只身逃去，不幸廿八团团长王尔琢同志于是役不慎惨遭毒手，为红军干部极大损失。计袁逆叛变至各部回来，前后经过两周之转折，卒乃恢复旧观，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主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

在军部率领廿八团、廿九团去湘南之后，赣敌杨池生残部八团及第六军一师联合向宁冈进攻。我卅一团以一团兵力在广大群众合力之下与敌鏖战一月久，渐次引退，复于八月初湘赣敌军联合以五团兵力进攻宁冈，黄洋界。我卅一团以两连兵力利用要隘鏖战一日，敌知不可犯而慌忙引退。毛在失败后率一营至桂东与军部取得联络，于九月间至宁冈。计由七月至九月，出发湖南，部队及留边界部队同遭失败，边界群众组织亦遭到不少的摧残，割据区域逐渐缩小至井冈山下，是为四军之八月失败。

第三时期，从一九二八年九月至一九二九年十月，四军回至宁冈，廿八团、卅一团损失并不很大，但素质均不如前，不过在一个失败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种组织有极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也有逐渐恢复，同时又三次击溃周浑元旅，三次击溃刘××，宁冈及永兴、遂川、莲花之群众赤色割据，又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我们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成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恢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山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

敌人这次进攻从十一月至次年一月，准备了两个月，四军

也从十一月起积极整顿。同时，彭德怀部红军第五军于十一月初由平江游击至宁冈附近与四军会合，这时红军声势更加浩大。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于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之敌。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军乃动摇撤退，彭、袁、王应付湘军自有余力，以为战前之计划。再着，在九月至一月，四个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冬季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被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至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物质条件如此困难，但官兵精神并不减低。四军的基础，确可以它建立时，在事实上有了考验与证明，此时为红军复兴与整顿时期。

第四个时期，部队出发赣南游击之经过。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四军部率廿八、卅一团及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十八日与敌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向我进攻，以至仓促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迭于一线，致失利引退折回粤边南雄，取闽粤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崇×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天左右的急行军而属难支，但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叛变逃跑事，这足从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至次年二月中旬（阴历正月初一）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至次日下（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

其团长肖致平、钟恒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计共得枪械八百余支，俘敌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终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荣誉之战争。以后红军由宁都至兴国、吉安、永丰交界处，得红军二团、四团之掩护，有一周以上之休息整顿，是时知井冈山业已失败，乃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

彭德怀、王佐留守井冈山，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廿八日敌兵三路兵力各三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只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五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会合；王部则埋伏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是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自行撤退，边界区域仍在赤色群众掌握中。彭部于赣南于三月初与四军会合于江西酃都。在此大的斗争之后，四军共存有两千余人，彭部只存八百余人，两部共枪为两千支。

第五个时期，从蒋桂战争到现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一日桂系袭击于长沙，酿成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敌人因为自己要打架，不能再向红军进攻。红军是时入闽西击溃郭凤鸣旅，郭于是(役)阵亡。我方于三月中旬入长汀(汀州)工作两个星期，红军大大补充，衣装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项亦有五万元，决定蒋桂混战中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割据。红军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底由闽西入赣南，游击区域乃至兴国，宁都，瑞金，酃都，广昌五县。五月初蒋桂在武汉混战告一段落，敌赣军又向我进攻，红军乃于五月中旬第二次入闽西，正值张贞入粤讨桂，红军决定汀州、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游击计划，至七月初复扩大至享平、宁萍一带，至现在计二次入

闽，两次击溃陈国辉部，陈部实力丧失三分之二，两次击溃卢兴铭部，得械约两营左右。彭德怀部在退出井冈山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底与朱毛会合于于都，受了使命回边界恢复群众割据，经过北江、赣南、湘南一带，最近在赣北、湘东一带游击，在城口得商团械二百左右，在南雄得商团械三百左右，在遂川得赣东军六十八团一营械，在安福击溃敌军一次，该部(彭部)实力已经增加四倍左右。

（二）四军的军纪

四军军纪分为如下数项

1．战时纪律：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等可由军官就地枪决。

2．一般纪律：通敌叛反、拐款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敲诈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另用钱；嫖妓则处以夜不归宿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处死刑，罚勤务、打屁股或打手心；其余比较细小之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

3．红军三大纪律：(一)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三）四军的近况

1．目前的游击区域：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左右红军击溃陈国辉一部两营，占领福建龙岩，五月底进占永定，陈国辉全部由粤撤回，红军往连城游击，复于六月十九日进攻龙岩、陈部五营，三营全部缴械，陈仅以身免，其余两营因未在龙岩幸而得免。红军因此而决定闽西龙岩、永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游击计划。龙岩由六月起迄今在红军手里，至近日始放弃。上杭全县均有群众暴动，汀州、武平有一部份公开

斗争，连城南部全为赤色区域，宁萍、障平红军派部队前往游击。在目前之闽西游击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敌三省会合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转入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南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上面三个方案，视敌逼近之情况大明时才决定。

2．红军实力：四军现分一、二、三纵队，此项为基本部队。每纵队分两个支队，外加直属机炮连及一特务队。一个纵队相当敌军一个团战斗力还强，人数在一千六百左右，枪八百至九百，手枪排长以上军官均有一支，每纵队有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合组机炮连。四军子弹不甚充足，因经常没有接济。另属四军所指挥彭德怀部、江西红军二、四团当另有报告说明。

3．四军官兵夫的成份：（1）历史：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占全军十分之二；湘南农民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占十分之二。（2）籍贯：湖南人十分之五；闽赣人十分之二，其他各省十分之三。（3）年龄：十八至廿五岁十分之六；廿五岁至四十岁十分之三；老幼（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十分之一。（4）战斗兵十分之六，余为官佐夫役等。

第 一 号《布 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

陈 毅

白军士兵兄弟　　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　　开来进攻红军
长年离乡背井　　永别儿女双亲
残害自己兄弟　　究竟为谁牺牲
建筑马路碉堡　　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　　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　　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　　当做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　　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州华北　　半片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　　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　　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　　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　　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　　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　　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　　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兄弟　　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　　你我本无仇冤
协同群众游击　　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　　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　　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　　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　　胜利就在眼前

（原载：《弥天烽火举红旗》　　陈丕显
《文汇报》1978年12月18日）

寻淮州同志略历（碑文）

寻淮州同志湖南浏阳人，农家子。参加民十五年到十七年中国大革命，由农民自卫军追随毛泽东同志转入红军第四军，任战斗员、排、连、营长之职，屡功晋升至红四军军团长。民廿三年冬，随方志敏同志率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谭家桥之役负伤，至茂林镇伤重不救身死。寻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犹著，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实在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民廿七年夏，新四军出发东线杀敌，道经茂林，为修治墓道之碑，以示不忘，且为完成其遗志而奋斗。目前抗日斗争已成为全国人民之神圣事业，国共两党由过去之对立，变为亲密合作，一致对外，前线战局日益开展，全部胜利可期，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之基础已奠，谨以此告慰寻同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当更进一步，以东线胜利驱逐日寇回答先烈，庶几无愧。

陈　毅谨志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
新四军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敬立

（原载：《革命文物》1978年第3期）

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

陈　毅

一、坚持江南抗战的意义

估量江南抗战的意义，不应从江南地方的观点出发，应从配合整个中日战局的作用上出发，特别在整个抗战，已经开始进到第二阶段的今天，坚持江南抗战，普遍而深入的开展江南的游击战争，使敌人一刻不能安宁，一刻不能放松的来兼顾其后方的战局，对于停止敌人的前进，争取敌我相持局面的迅速到来，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江南某些士绅，以保卫江南某一地方，某些角落为满足，不敢向敌寇挑战，甚至唱保境安民的苟安政策，不仅不适合于全国抗战利益，而且不利于坚持江南的持久战。每个同胞，必须清楚认识的是：日寇之不烧杀某些地区，不攻打某些市镇，并不是日寇有爱于这些地区，而是因战线延长，兵力不够分配，特别是因为我军在京芜一带，到处袭击敌人，困扰敌人，消耗敌人，使敌人不能不用主力来对付我们的游击区，企图进攻以至消灭我们，使他能够整个吞没江南；到那时候，他便可一意孤行，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在他的手中了。因此，在江南抗战，不仅要从全国的战局，来决定自己的任务，而且还要从整个江南持久抗战的观点，来担负起我们所当担负的光荣任务，来完成我们的光荣使命！

江南是全国最富庶丰饶的区域，日寇企图以江南的经济来担负他侵略中国的经费；江南是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而且又是最便捷的地方，日寇企图以此来作为进攻华中华西以至整个中国的重要根据地；尤其是江南包括着世界著名的商业都市的上海。因此，江南的持久抗战是与全世界反日援华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息息相关。江南抗战的光荣战绩，不仅要提高国际人士对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确信，而且要推动他们鼓舞他们来开展最广大的反日援华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江南坚持抗战，开展最广大而深入的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进展到大规模的运动战，不仅将给予日寇前进以一个致命的打击，来更迅速的过渡到反攻阶段；而且将大大的提高全国抗战的信心，扩大国际援助中国的运动，使最后胜利的降临，更迅速的出现。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实现这个使命，特提出江南抗战的各个重要问题，作为解决江南抗战所遇到的各个问题的初步建议。

二、日寇统治江南政策的分析

不明白日寇的政策，无从决定自己的方针。日寇盘踞江南，首先表现着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的全部残暴，抢劫焚烧奸淫敲诈，极尽野蛮无人道的能事，超过中国历史上一切外寇侵入的表演，此其一。第二，就是挑拨中国的内部团结，如国民党赤化，苏联赤化中国，共产党代替国民党，新四军是土匪，号召剿共，建立反共统一战线，蒋政权没落，蒋介石下野，国府地方政权化。但有一个明显的分别，在六月新四军未到以前，日寇中心宣传口号是呼吁和平，反对游击区，如说，游击队要抗战，请到赣鄂前线，不要来后方捣乱。现在完全以防共反蒋为中心，于此我们知道：无论日寇如何巧妙鼓弄是非，掩盖不了

他对于蒋委员长坚强领导抗战的畏惧，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团结的畏惧，对于国共合作的畏惧，对于苏联协助中国抗战的畏惧，以及对新四军到江南后游击运动开展的畏惧。第三，日寇正在收买北洋军阀，封建余孽，成立伪政权。各县自治会，维持会，完全改为县知事公署，积极的委出区董乡董镇董，建立绥靖团汉奸部队，建立伪保甲制度，积极的准备抽收田亩捐，夺取人民秋收的黄金果实。第四，日寇尽量用大批金钱收买游击队，动员大批青年妇女混到游击队附近，进行间谍腐化工作，用重价收买民枪，勒缴民枪。第五，贩卖鸦片烟，廉价推销日货，扩大其市场，就地收集各种军用资材。第六，烧毁民国十三年以后的教科书，焚毁各游击区，屠杀整个农村市镇，这是日寇的“皇道”，新的焚书坑儒的工作。第七，强迫壮丁入伍，加入绥靖团，补助其兵力不足，施行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毒计。以上诸点的中心，集中在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寻找汉奸的基础，和利用抗战中的弱点，来进行其欺骗的武断的宣传。奴化、火化、分化和血洗，便是日寇万恶毒狠的手段！

三、日寇的弱点及其在江南战略战术上的演出

我们还需说明日寇对于江南的战略战术的表现，依我们三个月来局部的经验看来，日寇整个战略是集中全力西进武汉，在江南是采取防守形势，其进攻扫荡，限于对某一点游击队最活跃的地区，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包括十县以上的扫荡，更不能进行持久长期的扫荡。这正是日寇兵力不足，不可能战胜游击队的第一个弱点。日寇在城市及据点内，经常枕席难安，汉奸常受狙击，防线时受攻袭，居民中广泛传说国军的大队来临，所以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当日寇下乡之际，完全如入暗室，

断绝了一切便利，等于暗中摸索；这种挨打的形势，非日寇坚甲利兵武断宣传可以克服的，这是侵略者在侵略他民族时必然碰见的悲惨命运。这是日寇的第二个弱点。第三，就是日寇进行战争，是依靠牺牲日本广大的劳苦群众的利益，而这一集团，早在饥饿死亡线上不断挣扎，日寇进一步驱遣其葬身异国。因此日寇是以包括两个日益矛盾对立的阶级，来镇压日益团结的一个伟大的民族。持久的长期抗战，必然增长日寇内部的离心作用，加强我们中国的向心作用。这种形势具体表现在日寇士气不旺，攻击力薄弱，敌军动摇程度的增加。这是日寇的第三个弱点。我们不知道日寇是否慎重考虑了这些问题，但我们一看他在江南的战略战术上的表演，就可知道日寇是很焦急的，它（一）日益增加各地的守备。（二）据点之间增加新据点。（三）日寇厉行烧杀政策，事实证明无效，而且更激起大的游击战争。现已兼用欺骗的怀柔政策。（四）不轻易脱离据点和交通线。（五）铁道公路运输，完全采取集团运动，配置重兵掩护，而且全部严密伪装。（六）放弃了许多次要的公路和水运，任中国人去破坏和阻塞，仅仅保持交通干线。（七）少数部队下乡扫荡的次数减少。（八）许多被破坏的桥梁，无力修复，过时用木板搭过。这些具体事实，是被包围的日寇面目的素描，也就是我们游击战的很大收获。根据此点，可以粉碎新四军不游不击的谣言。但这并不是说日寇一切的长处和优势，已完全降低到零，不是的。日寇还有他的长处，第一，他在战术上是惯于抓住游击队的弱点，比如游击队，警戒不注意，小数日寇的每次袭击，均走小路；游击队的侦查，注意白天，日寇常常夜间运动部队，进行拂晓猛袭；游击队常常注意晴天，日寇曾利用大雨天进行袭击；游击队常忽视水道，日寇

曾三次利用水道进攻。这些证明日寇仍然是一个不平常的敌人，而且这些能被日寇抓住的条件，均由于我们工作的薄弱，及人民武装动员不够而来的。我们纠正这些弱点，便根本剥夺了日寇上面的机会。第二，便是日寇军官指挥部队，掌握部队，远非我们指挥员所能企及。敌军一般战斗动作，如利用地形、地物，射击准确性，前进后退的队形姿势，均一般具备着较高的战术性。第三，就是由于日寇长期的欺骗奴化教育，使敌军士兵养成一种攻击力薄弱，防御顽强，死不缴枪的顽固性；这又要从不疲倦的瓦解敌军宣传工作，及正确的俘虏政策来决定；最后，日寇在战略上，虽屡次计划调遣几个师团，单独担任扫荡江南的计划，均不能实行。目前仅能从各守备队抽调，作临时编组，这使日寇感受到对江南游击区，穷于应付的痛苦。其次，日寇想利用中国壮丁，以补救其弱点，但这些苦心经营的部队，不能如意听其驱使，一遇国军进攻，即不抵抗而转到国军方面（如最近本支队在镇江高资消灭绥靖团队）。不消说，上面各点，均尚在日益发展的形势中，一天一天要变得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日寇。

四、江南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江南战略总任务，是在以游击战歼灭日寇部队，破坏日寇西进的大后方。为执行此任务，须估计下列条件：（一）日寇兵力守备薄弱，小城市仅一连到一营兵力，城市之间，据点守兵仅数十名（一分队）到百余（中队）。除镇江南京武进控制较大兵力外，余均薄弱，仅依靠临时抽调和增援。日寇在城市及据点的工事，并不坚固，仅因近来游击队活动，有增加守备并调伪军二万余增防的布置。（二）江南具有一个特殊条件，

即南京失陷后，国军遗弃了不少武器，无须政府武装人民，重要的是加以组织和扶助。（三）江南人民普遍燃烧着消灭敌寇的热情，欢迎国军东来，这是游击队抗战最好的时候。（四）江南现有的游击队，名目繁多，系统纷纭，缺乏固定给养与政治工作及统一指挥。总括一句，游击队是一个需要领导的问题。这里存在着扩大成为新的兵团的基础，江南人民武装及游击队不加组织和领导，以及组织和领导不得法，就有受日寇利用的危险。对游击队的吞并政策，限制政策，取消政策，以及乱委名义的放任政策，均只能造成损害抗战利益的恶果。我们在此可以提议下列可能而必要的部署：（1）需要一个国军主力（两万人上下），组成挺进兵团，配备相当的重武器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进到江南广大地区，进行大踏步前进后退的有力机动，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方式（新四军如加以补充武器及兵员，亦可以担负这个任务）。（2）划分几个游击分区，每分区可以包括四县到六县，依据铁道湖泊山脉公路线来决定，每一游击区可配置三个团的两种师，作为游击兵团（现在旅的编制，不甚适用。如为不致减弱主要战线上的兵团，此种游击兵团，可就现有游击队中集中编成之）。如游击区一切事权，应集中在师的首长指挥之下，省可派地方民政人员协助之。（3）各游击区兵团，自己选择根据地，游击司令部及游击队自己选择基点（或数个基点），这些根据地和基地，应替挺进兵团收容伤病员，担任后方工作，以便利挺进兵团能无顾虑进行移动。（4）每一县设游击司令，统率全县游击队及人民武装，不宜限制其兵员数量，扶助其尽量发展，并应分期采取集中三分之一到挺进兵团与游击兵团，或建立新的兵团。（5）在江南行动的挺进兵团与游击兵团的供养，均可取给当地，弹药

初期则须后方接济，而后尽量发展到取给于敌军，以上均可归在战略部署中。在战术战斗的特点上，我们所见如下：（1）在原则上，不能完全拒绝攻占城市，必要时进行强袭。攻破城市及据点，必须付与必要的牺牲，这仍然是游击战斗的一种（特别挺进兵团大游击兵团应如此）。（2）战术以奇袭伏袭夜袭为主。（3）选定攻击点，敌顽抗时，最好用火攻，给敌以全部火烧（新四军一个支队，数用这个办法，颇有效，敌痛恨我们新四军，称为最恶毒）。（4）敌分数路下乡扫荡时，可采取击破一路或数路的反扫荡计划，或侧击或横扫，或从四路敌人之间穿插，转到敌后方活动，或集中主力转到新地区，留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四面进攻，进行混战。进攻部队的战术，最好是伏击，不可一味向后引退。一是此种处置，反不易脱离敌人和跳出其包围；二是此种处置，会引起居民的失望。同时在与外敌进行战争的条件下，采取上面反扫荡的方式，是完全可能的，不宜过分估计汉奸在居民中的作用。（5）游击队最忌讳停滞和笨拙，必须神出鬼没，时东时西，夜间运动，拂晓作战，充分利用人民屋场、森林、堤岸、湖泊等，作为自己的依托。（6）阻塞基本上不妨碍商业的运河。（7）破坏交通工作，应与战斗联系起来，不消灭和打击敌人的守备队，单纯破坏工作，就易于修复，也就减少破坏工作的作用。（8）发挥地雷爆破战术，动员广大人民去进行。（9）在战斗动作上，应提高白刃肉搏的战斗精神，部队中练习和讲究劈刺术。必须纠正把游击动作完全看成不付血的代价的观点。敌愈趋向于防备，愈趋向新集团运输，必然使游击战的战术和战斗动作，向更高阶段发展。自然对于强攻顽打的蠢笨办法，同样要立加纠正。

五、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

地方武装，应规定三种形式：（一）游击队分基干队与普通队两种，基干队完全快枪，待遇略同于正规军，完全用在前线。（二）普通队及常备自卫队，担任保护政府，抗日团体及重要市场，担任地方秩序防匪等，并有计划的与游击队轮流替换整理。（三）人民抗敌自卫团后备队，完全不脱离生产，有事集中，无事归田，担任除奸防匪守哨侦查救护运输封锁消息等。(四)正规军使用地方武装，应估量其战斗力量，不宜以之担任主要方向。(五)地方武装必须从战斗中巩固扩大，反对招兵买马的扩充办法。(六)游击队应以打汉奸伪军为主要目的，逐渐学习打小日寇。（七）国民抗敌自卫队，作为游击队的羽翼，游击队作为挺进兵团及游击师旅的羽翼，一切服从主力和整个作战计划，反对地方主义。（八）纠正某些游击队的土匪倾向，指定其给养的正当来源，纠正其扰民现象。同时反对那种拥兵自卫，不听调动，不上前线的恶现象。顽固不改正的，应以武力解决之。（九）不应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来限制游击队的发展，更不应取消一切游击队。如每县限定一定数目，这只能适应于后方和太平环境。在江南是日寇包围环境地区，在日寇据点附近，无游击队掩护，抗日运动是不能开展的。游击队数目，尽量扩大，于抗战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恰恰是在沦陷区扩大国军的一种优良方式；另一面，在沦陷区仅用武力和命令取消游击队是做不通的，且有为渊逐鱼，便利于日寇的危险，是不能不加考虑的。游击队的给养，常是一个大问题，但在游击队真能抗击日寇，保护地方的条件下，人民是甘愿以粮食金钱培植他们的。（十）在江南有不少人，志愿作游击队工

作，即应予以发展机会，每县限定游击队数目，无异乎使抗敌力量缩小，和弃之于无用之地，是最可惜的。（十一）游击队是地方性的，总不会远引他去，一切给养，可采取发米发菜钱的办法，则大量游击队给养，也易于解决的。（十二）游击队给养来源，可定为（1）夺取敌方资材；（2）没收汉奸财产；（3）追究被吞没的公款；（4）人民乐捐；（5）正当的税收，均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办法。

六、土匪问题

初到江南的人，没有一个不感觉江南"闹匪"问题的严重，抢案日夕数起，"炕山芋"（即绑票）威胁着江南人民；某些地区，黑夜当土匪，成为当地人的一种付业；某些游击队，也有黑夜出发，干其"炕山芋"的勾当。我们研究土匪问题，要认识他具有深刻社会原因，不是仅仅用旧式道德，无良心、坏种等咒语，所能解决的；同时也不是武力搜剿的办法能够解决的。江南土匪如毛，是江南农村经济命脉受着帝国主义侵略总崩溃后的强有力的证据，特别因为国家政权撤退，日寇侵入，而乘机窃发，而特别活跃。这个问题不适当解决，有充分受日寇利用的危险。目前问题（一）积极作抗战动员，吸收失业人民加入抗战军队，效命前线，得附带解决其生活，发挥其活动力。（二）严厉镇压养尊处优坐地分赃的土匪头子，这些家伙，出租枪枝，包庇匪群，有计划捣乱后方，日寇一来，摇身一变，即为汉奸。（三）失业人民，仅以生活而迫于抢劫，不应屠杀之，应加以宣传释放。比如在句容，有一次竟有抗战阵亡军人家属，参加抢劫，这如何能作为匪案办呢？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四）建立农村合作互助事业，协助一切无饭吃的人，解决其生

活问题。吸引广大农民加入抗战，这是巩固农村统一战线的主要办法。（五）所有农村，建立农民抗战团体，这些抗日团体，即须在不违反抗战条件下，解决人民生活；军队政府及高级人民团体，应经常给以指导和各种协助。我们相信这样可以根本消灭土匪现象；我们希望江南士绅，要专力防洋匪（日寇），那才是应该用武力去解决的，才无妥协余地的；对土匪现象，不是用武力可以解决的；解决抗战中的民生问题，才是防匪的万应良药！

附注：陈毅同志这篇文章，本来是非常整齐的一篇长文，因为写的时间，距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所以，有些地方已经失了时效，经编委商量后，删去了很大部分，所以弄得不很完整，但仍保持着原来的基本内容。因交通关系，未经陈同志同意，先行发表，特此附注，并向陈毅同志表示歉忱！

编　　委

（原载：《抗敌》创刊号1939年2月
新四军《抗敌》编委会编辑发行）

关 于 学 习

——四月十一日在干部晚会的报告

陈 毅

一 我们干部中缺乏的是学习的精神

这次回后方去，看到军直属队很快的走向正规化，设备周全，生活整齐，工作紧张，——新四军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建军，目下有这样成就，是一种新的进步的气象。前次上海参观团到皖南来，曾经给了他们很好的印象。××日报社记者黄源先生对我们发表他在新四军考察以后，他自己增进不少的知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在她的文章中称赞我们的医院，说已经可以比得上上海的医院了。当然，这些称赞，都使我们愧不敢当。但我们的军队在一年多的建设中由简单到复杂，由散漫到有组织，由低到高，这是的确的事实，从总的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给以这样的估价。不过这不是说，我们军直属队已经完全没有缺点了；他们的缺点还多得很。

这里我简单的指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缺乏学习的精神。在军直属队中，一切都能够给予我们很好的印象，我们军直属队中的同志们埋头苦干，努力迈进的精神是可敬的。但他们学习的精神怎样呢？学习的空气，在我们军直属队中一点也感觉不到。教导队的学生，把每天的功课都接受，但他们的课外活动怎样，

他们会不会去翻参考书，找材料，却是一个问题。我住在图书馆考查，凡到图书馆的人，只看画报，新的画报一来，就挤成一团抢着看。其他的书籍就少人过问。我们出版的杂志上报纸上，除了我们首长应时的报告之外，那一位同志能够抓住一个题目作深刻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这样的文章就看不到一篇。还有更严重的情形：我们的图书馆是没有军事书的，我们的同志都不喜欢研究军事，参加新四军已一年多，依然是一个老百姓，一点不像军人的样子，实在令人吃惊！无论如何，这样现象不应该继续。在我们团结支队，在各团，在前方就更差了，能够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的看完它，这样的同志很少有，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同志拿着书本在看。这个风气如果不严格的加以改正，对我们的实际工作实在有很大的妨害。我们的知识，技能水准的向上，是我们的工作资本。现在我们的同志，一般的都是依靠着上级的命令，首长的报告、号召和运动来进行工作，否则动不起来。常常我们在斗争中碰到新的问题，我们不能先机的解决，现实环境中经过流血或不流血的一切重大变动，都让他平平过去，我们少有能把它抓住去自动处理，我们已经陷落在可怜的事务主义的泥坑里。这是可悲的现象。现在我们不但要用手，用腿，而且要用脑。我们对新的看不见的问题，能够提早发现，用不着等负责人员发警报，我们从下面可以提出问题，提出警报，能这样，一切意外的损害、打击，都不能侵入到我们的部队中来。许多事情已经在书本上记载着了，已经有不少人做过了，我们现在不过类似的重复一遍。只要我们多研究，用工作和书本上的理论作对比，就能前进一步。我不是叫每个人都进学校，提倡学校式的研究，并不是这。我所要求的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工作中拿书本上

前人的经验来参考，把书本上的应用到工作中来，从这一点找到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少犯错误，少做冤枉事，少走歪曲路。比如我愈多读书愈发现过去斗争中是如何幼稚，心里常常想到："假使早读此书我不会那样做，或者做得更好啊！"

二　学习的条件

学习有三个必具的条件：一、要有师父，有好的师父，才有好的生徒，所谓强将之下无弱兵，在黑暗中摸索是不行的。二、需要工具，如书籍纸笔，参考材料。三、要有好的环境，可以安心学习。这三个条件不易具备，也有具备了条件而不愿学习的。学习的方向错了，或者所学的不适用，也是徒然。许多大学生书读得很多，可是越多越糊涂，越读越和实际脱离关系。在我们部队中，上面提出的三个条件都具备了。一、有好的教员，军事、政治、哲学，都有好教员，至少达到相当水平的。他们不拿薪水，不是雇佣得来的，是同志的关系，而且正迫切的要求着我们学习，我们的指挥员只要求下面的同志学习，比任何人甚至比他们自己都要迫切些。因为不学习的结果，工作要打折扣；工作不能由他自己一人去做，要分给所有的同志去做，要做得好，所以要求所有的同志都学习。大学教授可以对自己学生不负责，但我们的教授却不能不负责，许多工农出身的同志，在我们的部队中学习了几年，比大学生的造就还要多，其中的秘密正在这里。领导者希望同志学习的热情是无限度的，他愿意从各方面来帮助同志，甚至希望同志能赶得上他自己，他决不留下几分，不完全教给同志，怕回过头来打他个翻天印。这个优越的条件，只有在我们革命的部队中才有。二、为了同志们的学习，我们公家决不吝啬必要的帮助，甚至拿出一笔钱买书籍都可以。记得在南昌时参谋处有位同志在书

店里看到一本关于德法战争的书，但不能买，因为要五元钱的高价。我拿给他五元，对他说："马上买来吧。只要愿意学习，拿出十元都没有关系"。以前学校里没钱买书，会向同学借书，现在书堆着却不看了。苏东坡说他自己青年时和隔壁的朋友借书来看，一晚把它读完，现在做了大官，书堆着，却又不看了。七八百年前就有同样的情形。外面的人，和我们接触，总是要求我们送给他几本书，我们自己有书，却毫不相干。我们确实辜负了这个好条件。三、我们部队有饭吃，而且发了零用，决不要学生自己拿出钱来。我们所学的又是实际的课题，与斗争联成一片，我们的学习不怕走错路，我们的学习有准确的方向。有的同志参加了长期的斗争，自觉太疲劳了，可以休息了，用不着学习了，有的同志自作聪明，旧的已经看过，新的平淡无奇。油印的不看，看铅印的《抗敌》，《群众》不看，看《解放》。看作者的名字，不看文章的内容。我们部队中书籍多，会议多，师父多，同事多，专家也有些，这是最好的学习环境，可惜我们自己辜负了它。在我们部队住了几年，可以听一千个报告，参加几千次会议，阅读几百种书籍，参加几十百把次大小斗争，真是稍稍留心肯学习的人，一定能进步的，如其不然，只有怪你自己！

三　学什么？

学习有多种，学习的兴趣也就各有不同。但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共同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不管学问的种类多，都必须在一个共同点上统一起来。这就是民族革命，抗日救国。我们在一个政治的目的下行动，任何人都必须确定这政治的方向，确定革命的人生观。自然科学、文学、哲学、一切的学问都是好的，只要他对人类没有害，只要他不反动。比如军事，学的

是杀人，刺刀要刺中要害，刺的深，一个炸弹最好炸死一百人，这本是坏事。但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杀我们的敌人杀得更多就更好，不会杀，反是坏事。如果一个军事家，其方向是反革命的，与其本领高强，倒不如差一点好，可以少杀几个人，多立一些功德。毛泽东同志说，学习千万要把握到正确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但对着我们的新四军，而且要对着全国全世界，因为我们的行动不但对着新四军自己，而且对着全民族以至全人类的权利负责的。我们希望所有的同志都抓住自己愿意学习的部门，希望所有的同志在学习中创造自己，成为专家，但我们要求所有的专家都在一个伟大的政治目标之下——为全民族全人类的福利而服务。大家应该学习政治，确定自己的政治方向，不走上旁门邪道，这就是我所提出的学习的共同点。

四　依靠自己不断的学习

学习的方向正确了，学习的情绪很高涨了，但有些同志提出一定要进教导队，一定要进抗大。我们不否认学校的作用，但我们决不依靠学校，我们依靠自己不断的学习。而主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实际经验是最能够教育自己的。学军事的离不了打仗，打得仗自然成为军事家；学政治的离不了做革命的实际工作，革命工作做得多，自然可能使自己成为政治家。另一面我遇见一个青年，要求进学校，我对他说，进教导队好了。他说，不，要进抗大！我不客气的说，有五百元的路费是好的，否则转回去吧！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好高骛远，目的不在学习，而在文凭、资格，根本和学习的原则离开了。抗大是好的，教导队也不错，但如果不依靠自己，三个月，六个月的功课会叫你得到什么？

五　学习的方法

（一）要少要精要约，不要样样都来，结果什么都不好。看书要把它消化，要咬得烂，不要打游击，这一本未读完又读那一本。自己愿意学习那一门，就必须对那一门作基本的研究，如学政治，起码要把马克思列宁的主要著作三民主义等书，在一个时间内作详细的研究。如学军事，起码对所谓典、范、令、战史、战略学、战术学其他重要著作，加以研究，真做到能了解。学习要有傻子的精神，世界上成功的科学家，都具备着傻子的精神，至少经过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的艰苦研究。我们千万不要自作聪明，人家不懂，自己先懂。诸葛亮观书但观大意，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恐怕指他学问已有根底，着重博阅厚积常识而言，我敢断定他们还有另一面的细心研究的历史被人淹没了，我们不要被历史家欺朦了！

（二）光读不行。要用思想，读了书，听了报告，脑子里想！这段说的什么？内容在那里？都必须确实的把握到。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这是一句好格言。每一本著作的完成都是作者经过了一番苦心才把它写成的。读者必须依据作者的思路在这著作里走一遍，达到它的高点，才能了解，否则简单地一过眼就把它丢开，等于不读。我们读了许多革命家的传记，知道他们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忙，总要争取几个钟头来读书，有时要忙里偷闲的散散步，或者发了呆，在思考许多的问题。英国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也在用脑子，一个不留神给汽车碰死了。他这种死是可惜的，但他这种用脑子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现在就要提倡这一点，读书要用脑子，执行命令要用脑子，工作要用脑子。革命家就要依靠这努力。现在我们同志只有体力没有脑力，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三）要多问。在英、法、俄，许多国家的文字，学习字

义大都是靠努力，是把一件事重复的做，只有中国把“学”“问”连在一起，倒是中国式的优良的作风，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学”是照样的做，做不通的时候提出疑问，可以得到一个纠正，所以“问”是最讨便宜的，但是，有的同志认为问人家要伤面子丢丑，不知道问的益处，某些问题曾令人家栽过斛斗的，现在我问一问人家，就可以不栽斛斗。对高明的人发问，他回答的很高深，不一定听得懂，但也有益处，可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向同等的人发问，容易了解，可以得到许多帮助，甚至争论而加深了解，向比自己差的人发问，听听他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到一个参照。就是最幼稚的意见，也有帮助。孔子说“不耻下问”。同样是中国做学问最好的经验，是中国的优良传统。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外交家叫白里安，曾经用他的手腕为法国建立了许多功绩，几年前他死了，现在看到希特勒这样猖狂，人们都要为法国惋惜，说如果有白里安在，德国一定爬不起来。有人问白里安：“你的外交是从那里学来的呢？”白里安回答：“我是向农民学的，你如果能够和八十个农民办交涉，什么外交都会了。”农民是那样落伍奇怪，对于许多问题都是罗嗦，藕断丝连，缠夹不清，如果能弄得清楚抓住他的中心，把他们安插妥贴，实在是天大的本领。列宁提出向群众学习也正是白里安向农民学习，中国孔夫子不耻下问的意思。现在许多同志是把“学”与“问”分开了，很少人对于一个问题提出疑问。我们首长作一个报告，发出一个号召，同志们无灵魂的依照着做，提出疑问的人很少有。我们要提倡多学，同时我们要提倡多问。

（四）精是重要的，但也不能不博。要使常识丰富，各种书都要看，广于浏览，留心一切的问题，学问的各部门都有他们的连系性。我们的同志只懂得一部份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别

的都不懂，听到南昌陷落的消息，有一个同志问："南昌在那里？在西班牙吗？"当天花盛行的时候，叫同志们种牛痘，死也不种，好像叫他种牛痘是得罪了他。虽然我们要有专长，但也得样样懂些，不然也不会有专长。譬如学军事，如果不懂数理化，不懂得天文地理就不行。我们新四军是一个有特长的部队，通过封锁线，打据点，突围，一二人在敌后独立活动，在距离敌人二三里的地方宿营，都是特长，因为这把戏已玩了十多年。但一般的水平却很差，新兵器知识，新战术知识，战史眼光等等，有的根本就搅不清楚。前月打败了敌人，得了两个掷弹筒，却称它为小钢炮，一点常识也没有。我们谈到恩格斯关于批判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文章，我们便知道恩格斯是很留心当时文坛状况，对文学是很有研究。比如他说："我在老巴尔扎克著作中得到的政治经济知识比在同时代历史的著作中所得的，还要丰富"。(我记得大意，恕无法引原文)这句话使我吃惊，又比如我们常常读斯大林的东西，每每发现他举出许多文学名著中的故事作例子，可见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仅有高深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博学多闻的精神，我们同志中那种抱残守缺的精神，应该立即丢掉。最好办法我们研究一门具备专长后，再留心一般常识的增加，我们如主张样样都懂得精深，这是痴心妄想！

（五）要动手。读书，听报告，发现新问题，都得动手记下来，写摘要，写笔记，写精粹的句子，脑子里死记是记不了的。真正读书的人，要象秀才念八股一样，有上批，有下批，有旁批，有浓圈密点，把书本子弄得越糟越好，如看《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都非这样看不可。现在有些同志把书籍保存得很好，因为太珍惜了它，把它藏在箱子里，两年后就变成老古董。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他看报的秘诀是："每字看，每

事看”。常常被人忽略的地方得到解决问题的宝贵材料，这是重要的经验啊！

（六）要耐心复习。论语上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一段指示，我记不清全文，这句话又是特出于世界的。我想用复习来解释他或用论语“温故知新”来解释他则更好。记得明朝王阳明相信格物致知的道理，知道研究东西，可以增加知识。他于是研究竹，为什么竹有节而中空，为什么竹要发青，看竹看了三天，看出病来，结果是一无所得，这虽是王阳明的方法不好，但如果不因为病而中辍，再研究下去，也许可能有进境。我的经验凡遇想不通的应再想，再不懂的就记下来，到处问人，求得解释，还是不懂，就暂时丢开，因为再苦思，就要损害脑子，只好暂时放下，又去看别的书，经过相当时候偶而回到以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忽然会遇着“一旦豁然贯通焉”的快乐。这是实情，因为知识是由积累得来，积累到每一程度，才能了解到更高深的问题，躐等是没有好处。我平生住学校，××是吃躐等的亏，小学未毕业就进中学，中学住了两年，跑进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又住不终局，变成一个学校贩子。生平认为最苦之事，记得在三年游击战争时代。在山中仅有几本书大家反复阅读，项英同志最有耐心，一本书可以读上十几遍，我向他说：“你这本书读熟了，连纸都读得像猪油渣那样熟透了！”他回答特别好，他说：“现在是仅有读书的时机，如果局面开展，我们走入实际工作，要有余时专门读书是不会的了。”这话是真动人的，果然到现在忙身于实际工作，要专门研究就困难了！

（七）忙里偷闲来学习，一个实际工作人员的学习法就是忙里偷闲，抽功夫来学习。法国有一故事，一个人在吃中饭之前

十分钟在饭厅外面等饭吃，他就利用这点时间，在那里留下一个簿子，一枝笔，一瓶墨水，天天趁这十分钟去写几行，久而久之，成就一本有名的书。这个故事最好，我们最忙也可学他这样做。我现在也开始在临睡前看几页书，写几页日记，弄成习惯，坚持下去，一定有益。假如我在过去十年战争中能写下一本日记，现在拿出来看，恐怕可成为重要史料，然而过去我没有毅力，不会趁空作事，于今想来，只是徒然！

（八）教人家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所谓教学相长，教人也是学。比如我们学习排的进攻，已经学会了，再去当一当排长，用所学的去教一排人，就可以更达到彻底的理解。遇到学生发问，不要急躁，不要生厌，不要乱答，回答不了，可以向学生预先声明，可以和学生进行讨论。

（九）保持中国的艰苦学习的优良传统，我们在上面指出我们中国把学问相印证，把博约相联系，又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又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都是中国关于做学问方面，最特色的作风，同时我还要指出，除这些道理而外，中国还有艰苦的实际学习精神，比如在《三字经》后半截就举了许多，例如“头悬梁”、“锥刺股”、“如负薪”、“如挂角”，如凿壁偷光、如映雪读书，我们想到古圣先贤这种学习的艰苦作风，真令我们青年人愧死！我们一定要保持这种民族的优良作风，世世代代享受无穷。

（十）青年更要学习，列宁对青年的指示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又说“青年的任务乃是学习社会主义”。我们现在青年的任务，应该一面参加抗战，一面学习抗战建国。青年人不可能置身于抗战之外，应该在抗战中学习，我想没有人能反对这个道理。我们部队中青年最多，就在干部中也是三十岁

以下的占多数，这正是好学习，做学问的时候。青年不学习，老大徒伤悲。我常向同志提及这两句话，我随时也用来警醒自己，我害怕自己落伍，时代进步最快，每天的新事物新问题多得很，常常使我自己耽忧。我又有一个经验，我几个月不看书，几天不看报，别人谈话的内容，我就有些地方茫然，甚至不能完全懂得，要自己进步，只有学习自修一条路！我们不要想赶过一切，但我们至少要跟得上伴，否则由跑前而落伍，而落到最后，这是使人红脸的事！我们都是青年人，常有浅尝辄止和自作聪明的毛病。闻一知十，提头便知尾，这是形容词，不一定是真话。我也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天才，把天才解释成为所谓"长期的努力"是比较合理的，甚至我们可以承认天才家的禀赋比较我们不同，但绝没有不经过学习，生而为圣为贤的大天才。

以上所说，并不高深，平淡无奇，更丝毫没有宣传赤化的嫌疑，我所说的是自己一点浅薄的经验，我自己于革命的基本理论毫无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却碰过不少的钉子，栽过不少的斛斗，我自己常说打胜仗，十回九回没有我，打败仗就常常有我在。打败仗也是一种必具的经验，但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经验，不去学习综合一切经验的革命理论，这仅能表示自己的愚蠢，另一面有人企图自己从实际工作去作天才创造，这种倾向也不好，不知道任何创造工作，是从前人的成就上去加以发挥开辟，绝没有凭空创造的事情，如果有，那只有神话中的记载。我自己深深感觉自己学识太不够，所以常常考虑学习问题。今天在欢迎教导队毕业同志的晚会上说出自己的感想，是想给同志们一个帮助，如果你们听了这些话，约略打动你们学习的心情，开始去研究讨论学习，那末，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东平记）

（原载：《抗敌》第一卷第4号　1939年）

茅山一年

——江南游击区

陈　毅

这一篇文章，是陈毅同志总括去年五月底至今年六月这一年间在江南作战经验的报告。脱稿时间是今年六月下旬，但因交通不便，最近才寄到我们手里。发表与脱稿的时间虽隔几个月，但文章价值绝未因此而有所损失。因为它不但告诉我们以这一年新四军苦战的经过，而且指示发展平原区游击战的经验与教训。现在，相持阶段已经到来，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任务，更迫切的摆在我们肩上。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陈同志这篇文章，是每一个关心于抗战，从事于游击战的同胞所应当熟读的。

编　者

一　前　言

去年五月中由皖南奉命东进，六月一日离开南陵，三号夜间通过芜湖宣城铁道，踏入苏境，六月十二日到溧阳之竹篑桥，十三日北进，十四日部队到达茅山。以前盘旋脑际，久思快游的茅山，一旦摆入眼帘，心中惊喜交集，喜的是部队安全

挺进到达指定地区，吃惊的是茅山完全是一个童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地图与实地情形不能十分符合又得一次证明。十五日继续前进到宝堰，我们部队就积极布置战斗，十七日粟司令的先遣队以卫冈的处女战斗之胜利迎接主力，我们收得许多战斗俘获品。就在宿营地聚集了几百个居民来围观，我当时口占一首七绝诗：

“抗战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当时斩获敌军土井中佐以下数十人，获敌日币伪票万余元，枪械数十枝，这首歪诗，聊志一时欣快之感。接着竹子冈，于孔家边、东西榭、新塘、新丰、东昌街、句容城诸地连战连捷，此皆六、七、八三个月中间第一期作战经过。现在回想起来，往事成尘，余味仍在。今当六月东征一周年之际，觉得一年来我军抗战，获有成绩，遇过困难，存在缺点，有总结一次之必要，作用在勉励同人，努力第二年战斗之开展。

二　南陵出动时期的局势估计

领导战争和组织革命斗争，情形差不多。首先在于正确的了解具体形势，有了正确的形势估计，才能定出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才能定出革命的正确的策略和口号。形势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必然定出错误的方针，必要遭受失败。这是古今中外历经试验的真理。我们在皖南时期特别注意到这一个中心问题，我们部队出发前的战斗动员的主要军政内容，都不曾离开过全国敌情了介，友军抗战经验，本身优缺点以及江南的特殊情形诸方面。我们试引证叶、项军长去年五月的指示，作一个有力的证明：

“我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们活动的地区是交通发达广大平原而多川河湖泊的地带，其中茅山山脉虽蜿蜒境内，但仅属许多小山。

江南地带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民间抗日意识相当高；但缺乏组织和领导，对我军认识当然不十分高，因我军从未到那一地带活动过。

我们活动地区是处在日寇战略主要交通线（京沪线）之侧面，南京上海更是敌寇进攻我国的策源地，因此敌人的兵力分配集结于交通重要点上，加以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但敌人兵力不够，空隙地区甚多，这一点是便于我们进行游击战的。

本军素质以山地游击见长，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这是我们的弱点，以及目前困难的地方。但我军另一面素能团结群众，在这些地区如能迅速争取群众，团结人民在我军周围，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就是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发游击战争。因为地形是死物，如能正确利用地形，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和战术，就是地形不利绝不能障碍我们，只有失掉群众扶助，地形虽好也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不要忘记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根据以上的情况和条件，对于本军执行任务，应采取作战的方针和主要原则如下：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执行。依照目前地形和敌我状况，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在集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

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上面的指示是抓紧了自己的任务，估计了当面的敌情，估计了新四军本身的特点以及江南战场的轮廓，可说完全是正确的。我恐怕这样简单的指示，不能使指战员清楚了介，还在东进途中作了不厌详细的解释。记得五月二十八日在南陵的干部会上，我们作了一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此地不妨引用如下：

“一、日军进攻游击队的政策及战术特点之分析

……

（丙）根据北线西线的经验，敌人对游击队扫荡计划，通常组织四路以上的支队配合飞机及机械化部队分路对我军目标和活动地区围攻，求得齐头并进，分进合击，使我军无处躲闪，逼迫我军与之硬打，消灭我之实力，也就是根本上减弱和消灭我军的游击力量。

（丁）敌人扫荡计划变成绝望时，必然迁怒于群众，必采用过去中国内战的经验，用移民移居封渡封河焚烧船舶平毁村庄屠杀人民等办法，来镇压反抗，陷我军于孤立无助的地位。

（戊）敌人惯用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来对付我国，这个政策运用在沦陷区域上，便是组织若干汉奸伪军作为进攻的助手，收买土匪作为捣乱我军的别动队，派遣侦探间谍娼妓混入我方进行破坏刺杀引诱等办法。……

……特别要抓住我军前身是工农红军这一特点来进行欺骗鼓动，……建立反共阵线来对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己）敌军虽有他的长处，但他的弱点也很多，我们全

体军人要信赖自己手中的武器，虽仅有步枪手榴弹，善于使用它，仍然可以战胜强寇。

二、对日军战斗的着眼点

（甲）在战斗上最好方式是打敌人的埋伏，在极接近敌人地区隐蔽起来，趁敌人行军纵队时冷不防而猛扑之，使敌首尾难顾，陷于混乱，可获全胜。

（乙）袭敌战斗是对驻止敌人，主要是夜间秘密接近，拂晓前突然袭击，使敌人人不及甲，马不及鞍，车难开动而解决之。

（丙）我们与日军作战最好是手榴弹和刺刀，最好方式是白刃战夜战，切忌进行火力比赛，切忌构成宽广的战斗正面，不要陷入敌人的火网，不进行持久恋战，一到敌人火器展开，火网构成，便立即转移到侧面，甚至放弃突击。

（丁）动员广大群众配合军事行动，集中分散灵活自如，是目前组织战斗的基本方略……大小破坏和骚扰是战胜敌军的主要手段之一，许多战术家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不顾主客观条件，就幻想第二平型关的战斗，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集合若干小胜来造成江南第二平型关的胜利，来附全国抗战友军的骥尾，……如古语所说：‘我能往，寇亦能往’。这是指于我有利弊，于敌人也有利弊，只要加上抗日人民的条件，加上自己灵活指挥，这个平地游击和湖泊游击的课题，必然顺利解决。……固然我们不否认地形是游击队有利的重要条件，但切不可变成人不去利用地形地物，反转来被地形地物所利用，人失掉主动而依靠死物，这未免与古昔的拜物教相似！

……

（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寇分化阴谋毒计的基本路线，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日军抗战，使日寇汉奸卖国贼陷于孤立，……本军的模范纪律，政治宣传鼓动和战斗胜利，是争取人民帮助军队的三大条件，……游击战区民运工作是以提高人民抗日斗争到武装游击的最高阶段为中心，要扶助和培养并改造地方人民武装势力，……反对限制政策，反对吞并政策，尤其要反对游击队间的小内战，……抗日的纪律最主要的原则，是部分利益服从总的利益，阶级利益服从总的民族利益，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抗日的胜利，就是救自己救国家的胜利，我党的基本路线在此，本军的基本纪律也就在此，这是战胜日寇的革命动力的泉源。”

我不厌重复来咀嚼旧文章，一面说明南陵出动之前，我们作了相当的准备工作，一面说明我们纠正了当时部队中少数同志那种不顾及主客观力量的急性病。他们的错误在于轻视敌人，夸大自己，马上幻想几个大的歼灭战，同时也证明某些人指责新四军保存实力不打大仗的说法，不是由于战略战术的错觉，即是含着恶意的中伤。最后就是我们这种估计和判断的正确，为一年来的战斗所证明，一年来的工作都是遵循上面的方针，好象火车头沿着铁道行进一样，我们是很顺利的前进着。又如当时我们认为人员缺乏，武器拙劣，地区生疏的三个大困难，也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一般的解决。

三　初到江南一般局势的了解和工作部署的概要

上面所说是南陵的方针，但仅属于一般性的决定，我们并

不只凭主观的判断来行事，所以在沿途就尽量设法了解民情、风俗、生产、消费、地方历史、文化状况，特别着重调查抗战以来江南所引起的变化，这是新的事实。这一点把握得牢，才更能使自己的方针能正确实施。我们在南陵出动的训令即说："所有干部应动员起来问路线，问敌情，问地形，搜集和了解一般社会情况……。"沿途我们开了许多次的座谈会，拜访许多地方人士，动员工作人员作了许多访问和调查工作。粟裕同志率先遣队与我们会面，他作了五小时的江南行动报告，帮助我们十分大。在六月十二日军次溧阳竹箦桥召集一次干部会议，我的报告提纲中包括下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业已达到指定地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战斗，我们的部队贯穿苏南九个县区，大体上了解一般情形，因此我们不迟疑来决定我们行动的策略口号标语，我以为我们应抓紧下面四方面来执行任务：

第一，我们在部署战斗解决问题时，首先要照顾日寇方面在江南的现行侵略政策，同志们常喜欢用烧杀掳抢奸淫六个大字来说日寇的政策，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固定看下去，不免流为公式主义的估计，要知道日本强盗是现代的，所谓文明强国帝国主义国家，他不会这样简单。他四十年的准备工作，他最会玩阴谋，弄新花样，更会寻找我们中国的弱点。我们对于日寇的这些小行动都要以高度警觉性毫不放松从各方面予以回答，我们的策略切忌为渊驱鱼，就是弄得不妥当会在客观上助长敌寇的发展。

第二，我们还要根据国民政府的法令切实宣传和奉行，我们不能够标新立异，虽然在下层许多实际问题，政府法令并未具体规定，但我们解决这一些问题总不能离开政府的抗战国策

和抗战建国纲领，本军是国军的组织部分之一，此次东征就是为了推行政府国策，造成本军是奉行国策的模范，这是同志们长期斗争的艰苦工作。

第三，我们还要顾及民众的情形，细心去了解民众的痛苦，洗耳静听民众的呼声，仅就十天行军的材料，一面看见江南同胞所受敌寇的压迫与战争的痛苦是十分沉重了；另一面又看见江南地区地方上小派别的斗争是异常紧张。许多游击队即因此而发生内战，民众对游击队的厌恶恐慌心理，达到异常程度。抗日游击队本是光荣的头衔，但确被一部分不法的游击队造成信誉扫地了！我们要收揽人心，调停内争，帮助地方武装的改造、说服、劝导、调停，我们不惜垂涕而道，切忌用武，切忌命令行事。人民望国军东来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如使他们失望，那就是罪恶，谁也不能宽恕。现在许多民众不愿意我们贴标语，我们就多用口头宣传，不能说扯标语的个个都是汉奸；民众不愿意我们久住他的村庄，我们宁肯多搬几次宿营地，千万不要说，抗日烧了房子不要紧。因为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我们要用政治宣传鼓动，实际的战斗胜利，来提高他们的情绪，目前应该十分耐心，不能急躁。

第四，我们还要顾及本军本身的状况，这一点我们讲得很多，不下几十次，今天特别指出一点，即是以本身的兵种和力量和政治面目又担任游击战，这是长期艰苦的斗争。我们不能马上攻城略地，我们只能给予敌人许多打击和骚扰，民众中已发现对我们要求过高。比如说国军到了几千，马上可以打开南京，现在的过分热忱，必然引起将来的失望，另一面这些游击战经过的地区，敌人必然采取严重报复，人民受着敌人的报

复，必然有落后阶层不去抱怨敌人，会转而抱怨我们，这中间就要求我们有极艰苦的宣传解释，过高或过低宣传游击战的作用，结果都会不好。我们做给江南人看，只要我们吃亏少，敌人吃亏多，经常保持这一比重，最后水落石出，江南民情，必然奋发起来。……

把上面竹篙桥会议的解释拿来与南陵会议比较，事隔十天确乎我们更详细具体的规定了各方面。这就得力于虚心体会和各方面的调查工作。可以说在竹篙桥以后我们的工作方针和工作尺度就决定的握在掌中了！

四　一年来敌我间的军事纠缠

从六月到十月中旬，这是第一个作战时期，敌人肆意西进，在江南采取守势，不料到江南游击运动会有新的发展，在卫冈、新丰、句容、珥陵、高淳、仓头诸次战斗，敌人大小被歼灭后，完全采取疯狂无人性的烧杀报复，同时极力加强守备。这个时候敌人对我军的批评是："新四军太恶毒，常常把我们烧死。"（见去年八月，一个丹阳汉奸自新的报告。）又谓："新四军是共产军，很灵活，他容易生根。"（见去年十月敌人进占宝堰后公开的欺骗讲演。）南京汉奸维新报及上海汉奸新申报亦谓："在京镇间行动的新四军属于共产系统，最为恶贯满盈。"我军便衣队于去年十月在宝堰击杀敌之中队长一名，迭次击杀日军不少，敌人恼羞成怒说："新四军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个仗，不要用这卑鄙手段。"这里我们看见强盗的日本军阀在挨打之后，也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道德了，一何可笑！从十月后到今年二月，敌人采取攻守并用之姿势，密布梅花阵来填满空隙，企图聚歼我军或拥挤我们退出京镇地区，

但我们仍然能穿插盘旋自如，并进行许多次乘虚袭击，一面战线逐渐向南转移，京沪铁道上的活动减少，我军常遭受敌人的分进合击，这已经于我们战略上的不利，但我们仍然坚持原地活动。一般居民担心我们不能支持危局，一面怕我们走开，居民失其保障。几个月坚持大大增强了人民抗战的信心，一般人民才将“苦战坚持”的评语赠给我们。特别隆冬风雪衣被不全，更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京、镇江、句容间三角窄狭地区，敌人动员千余兵力进行二十三次的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人民清楚知道敌寇伎俩，会在国军面前屈服，呈现智穷力拙的状态，所以在去冬以来才开始了居民盛大的慰劳我军的运动，这是艰苦斗争的代价，绝不是偶然的凑合，更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从今年三月初我们开始争取主动来打破敌人分区扫荡的计划，我们在战略上首先应该扫荡敌人的梅花桩，重新转到敌人深远后方，从二月七日东湾战斗，二月十四日延陵战斗，三月二十日后淳化高资等地的袭击，均完全胜利。敌人才知道小据点容易被我消灭，才改变计划，放弃小据点增强大据点。在三月间敌人放弃延陵、茅麓、丁庄、导墅桥、上党诸据点，一切守备兵力完全集结公路铁道线上，敌人为执行其新阶段之扫荡敌后的方针，又增加新的兵力，计划作更大规模的扫荡，这个时候国军主力攻击兵团配合四月攻击计划进入江南，予敌人以正面的有力回答，本军在苦战中，得到友军援助，就开始了目前新的战斗时期。

总结起来应该指出几个主要倾向：第一日寇的悲哀正在他冒险进入中国内地与我中华民族进行战斗，处处都在我们民族

力量的重重包围之中。敌寇在开战之初的主动性进攻性逐渐转为防守，在不知不觉间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比如敌人的据点伸入江南农村市镇，无论其四面扫清射界，密布铁丝网，引水灌成沟渠，作为外壕障碍进攻，同时昼夜轮班展望，机炮放在固定位置，预先测量好距离，日间标定目标，以便夜间用枝(机)枪的水平射击，以火力封锁巩固自己的安全。但敌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走路，不能不与中国人接触，俗语说："二十八碰不到还有二十九"，又说："月大等三十，月小等二十九"，这必然有松懈，必然会失足跌倒。我军的优处就在善于选择这个时机，这是敌人无法解除的困难，也就是一切侵略者的悲哀。了解这一倾向可增强我们抗战的更大的信心。第二日寇是一个富于模仿性的民族，记得某外国的著作家，曾有这种批评，他讥刺日寇民族缺乏创造天才，我认为这是近于真理的说法。在江南我们也感觉这一点，不仅日寇灵活善变，一遇挨打即通报各方，马上反映，马上转变。因此使我们一种新办法，用了之后，就应该马上掉换，守株待兔的办法，一定吃亏。尤其重要的，日寇在后半年对游击战的学习和夜战，也有了显著的进步，这就是他们的模仿天才的成就。比如来去走不同的路线，宿营地经常变换，专走小路避开大道，黑夜包围住居民直至天亮，鸡犬不惊，敌寇也伪装我军，也用便衣队四出滋扰，这种转变是在上半年前敌人所不屑采用的，以后也居然学会了。我惭愧在使本军正规化和纠正游击习气上成就甚少，敌人军事技术的长处，我们也学得不多。第三一年来战斗的倾向显著的是偏于肉搏纠缠，火力战斗和比赛，十回难有一回，这是由于日寇深沟固垒，我们没重高兵器的条件来决定的，这一点外界颇不了解，比如居民中常说："你们为什么不打丹阳！不打

镇江啊！”又如外间曾有人说：“新四军保存实力！”我在未歼灭延陵据点之前，遇着延陵绅士也曾请立即打开延陵，我当时干脆拒绝了。但我没有使他失望，我说等将来。我认为不顾主客观力量，不选择时机要人家去无代价送死，这是罪恶，这是拿生命作儿戏，这是敌寇的期望，绝不是我们底要求！这里用不着说这一倾向于部队的编制补充，整训士气，都有极大的影响！第四就是得指出江南抗战诸兵团间的配合，大江南北的配合，还没有收着如指使臂的效果，人民武装与主力兵团的配合更缺乏，所以不能收到全线游击，四面袭扰的伟大效果。我认为这是今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地区的限制是各方面配合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值得考虑的。敌人能以统一指挥对我，而我则各方不能配合齐一，显然不利的。第五是一年来的教训，本军应着重提高干部的战术素养，要是不改进和提高战术水平，记着老办法是解决不了新问题，尤其部队经常分散作战，没有集中整训时间，新战士的战斗动作，更不熟练，这些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虽然抓紧一面作战，一面教育的原则，作了许多的努力，但所收效果仅能维持战局，站在开展战局的观点，我们必须更进一层！

五　一年来敌我间的政治争夺

在第一时期敌人进入南京已安闲了半年时间，敌人只感觉游击队的滋扰，此时敌人便抓住游击队纪律不良，来进行政治上的欺骗工作。敌人用复兴江南委员会及江南难民救济会的名义，以汉奸口吻发出消灭游击队的呼声，他底传单上说：“几十万正式军队都失败了，小小游击队怎能抵挡皇军，不过徒苦居民”，“游击队要抗战请到湘鄂前线去送死，不要在江南捣

乱，现在皇军正在恢复江南秩序，又枪声四起，完全是游击队打家劫舍的结果”。又号召江南人快起来帮助皇军消灭土匪游击队。是的，在我军未进入江南之前，敌人眼中只有一个游击队，满以为一加扫荡，即可绥靖江南，实现“王道”，此时敌人中心政策是消灭游击队，同时定出收买游击队办法，只要游击队不破坏交通，可以让其安居乡村抽收捐税，甚至国军来，皇军可予游击队以保护。

在第二时期我军进入江南，仅一个月来的战斗，敌人知道来的是正规军，敌人由反对游击队转到反对新四军身上。此时敌人抄袭以前的滥调，说新四军杀人放火，共产党公妻，说蒋委员长勾结共匪捣乱江南，号召建立反共阵线，划京沪线为五个防共区，每区指定指挥官，进行扫荡工作。同时变更烧杀政策，改用怀柔政策，到处开和平会，中日联欢，专力防共。这个时期从去年八月起直到去年十一月，敌人进行了许多工作。从武汉沦陷后，敌人的政治欺骗更显明精巧，在政治上组织反共青年团，开反蒋示威大会，勒令乡保甲长担任地方事务，招待军队，保护交通。他说：“你们是地方上的人，应办地方的事，应保卫地方，不要与闻外事，否则用烧杀手段。”在经济上着重吸收江南物力财力补充自己，秋收后大批收买谷物，恢复京沪芜苏的工厂，今春又大批收买鲜茧，大批推销日货。在文化上利用中国古旧传说进行欺骗。

我们在第一时期初到之际，特别着重整理地方游击队，我们自己把游击队弄好，使人民满意，敌寇阴谋不攻自破。我们对无可救药的游击队，曾奉命解决过，如朱永祥陈得功等。我们知道本身是一个游击兵团，特别以自己的纪律，来回答敌人的欺骗，事实出来宣告了敌寇宣传的破产。

在第二时期着重解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抗战中中国的伟大进步，政府国策的正确，和蒋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安危的重要性，这里可以总结有以下教训：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敌人唯一伎俩在用屠杀手段来征服人民，江南人民除了保障身家性命财产而外，没有一个人是甘心附敌的，因此在与敌人政治争夺中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我们设想一个人民对抗战前途没有正确认识，对敌人到来没有应付方法，对受摧残后无任何救济，这就只有走上不得已的与敌人妥协的道路。如果拿我们军队中人的决心认识和他们比较，自然我们得无条件视之为汉奸，但是这是江南广大居民中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极审慎的态度。当时对一般亲近过日军的人们不谓之为汉奸而谓之为两面派，决定了争取其转变走向积极抗战的道路。我们初来，任何地方普遍是维持会，普遍布挂良民证，普遍挂太阳旗，我们军队到一个地方，居民每每误会为日军，当着“皇军”来欢迎，后来知道是国军，才把欢迎“皇军”那一套收起来，改成另一套。我们解说抗战形势，提高人民抗战信心，提出具体的武装斗争的办法，表示日寇到了有方法应付，同时组织人民间救济难民运动，表示抗战中受敌人打击时，也得到同情援助。在许多次战斗胜利后，才转移了妥协风气，争取两面派转到积极抗战的道路。第二个教训在指出江南的地方战斗游击队的小内战中间存着敌寇汉奸的组织作用，就是没有敌寇背景，他们客观作用也在削弱中国帮助日本。首先我们以驻军的有力量的资格不偏袒任何方面，我们无数次用杯酒言欢化仇为友的办法团结内部，调停各方。我们公开宣称不愿受人利用来替某一派别某一集团作私仇的报复，我们公开号召认识民族大义，我们公开号召学习国共两党十年血战能一致抗战的优秀

模范例子，我们公开号召一切以中国人为本位，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日本，这种理论和态度感动了不少的士绅居民，取得人民无上的信赖。第三个教训，我们要认识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在我们中国是有着传统的力量，历史上中国的党派予人民以强固的厌恶的心理。如历史上东汉之党锢，宋朝新旧党，洛党（欧阳修的“朋党论”吐露厌恶党派的消息），明朝的东林党等，这些党派斗争大都在国家破碎时含着有原则性的斗争，所谓一正一邪的斗争，但仍然不能推翻群而不党的传统精神，不过这种厌恶党派的心理是带着盲目性的，而且这些党派与近代党派大不相同，但是人民中间这种心理，都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我们一面解释国共合作的意义，一面解释各党派在抗战中的作用，现存的党派是抗战的必要工具，人民应该严格要求各党派的组织严密党员自重。我们更负起责任使本军服务的共产党员，认识自己的岗位，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争取人民，团结人民。同时我们更严格宣传和主张党派利益服从民族利益，绝不能不顾抗日民族利益，甚至牺牲民族利益来制造磨擦，便利私图。以我们行动来证实我们的宣传，无疑已获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大的成功。日寇的反共计划，固然遭着了决定的击破，就是有些磨擦专家向人民提及“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要剿共的”，也在人民冷视面前讨许多没趣，自己丢丑。第四个教训，我们应认识游击区是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游击是处在敌人势力大于我们的情况下，游击是处在敌我相持下，敌我势力错综的复杂环境里，一切问题的解决应争取时间空间，一切问题均贯穿了军事性质，所谓争胜负于俄倾，这句话可以说明许多方面，因此游击工作应要求事权统一，要求独断专行，更应该反对限制、磨擦，反对互相怀疑，和互不信任。三战区游击工作会议

指出各兵团不得互相作恶意宣传（大意如此），我们完全赞同这种态度，并努力奉行。我们认为最好方式是用委员会的方式，把党政军民代表集合一堂，以集思广益的精神来决定统一行动，游击区的中心问题恐怕就在这里了。

六　一年来的地方武装工作

研究江南地方武装，其人员组织来源，一是当地人民抗日起义的，一是国军西退遗留下的官兵，一是帮会分子转化的，一是旧日地方保安团民团改装的，可以说成份复杂得很，因此其种类可分为十大类：一，国军派遣的游击兵团；二，地方拥兵自卫土皇帝式的武装；三，抗日分子如文化人前进青年集合成的；四，帮会首领号召成立的徒子徒孙一大堆，加上绿林成份；五，地方县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六，两面派武装；七，反正的部队；八，含封建迷信的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九，含党派性，或党派领导的军队；十，散在民间未成军的武装。这类部队可谓花目繁多，不及备载。除游击兵团外，抗日招牌是要挂的；武装乡曲，争夺税收是要来的；打日本要先跑的，当然这里面有不少的贤者，在抗战中也起了不少作用，如反对组织维持会反对日寇抽壮丁反对修马路以及破坏工作等等，这不能一概抹杀。

地方武装的领袖常常感觉：（一）缺乏子弹，（二）缺乏固定经费，（三）缺乏军事干部。但他们不知道最缺乏的是政治领导和正确的抗日政策。子弹不知取给自敌人，坐着消耗一空，经费加诸人民，引起矛盾怀恨。雇用军事干部，不了解民兵性格，简单照军队规模来改造自己，结果徒得皮毛，遗其精华，甚至染着坏习气，这都是不从政治上加强所得的结果，地方武

装有一种优点，都是来自田间，大多数脱离生产不久，全是天真的农民，能抓住这一优良的素质加以整训，自然可以有光明的前途。有些地方部队从民众中出来转而压迫民众，结果反被民众解决，真可浩叹！江南地方部队，一年来走过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整理纪律，积极作战，转化为正规军，这是光明大道；第二条路腐化堕落，受敌人收买，终于被敌解决；第三条路素行不法，脱离民众，不被国军剿灭即被民众解决。在我们行动地区一般游击队都转化为正规军，这是经过长期协作改造工作的成果。我们的办法：第一，是予以有力扶助，特别是政治工作，决定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扶助其发展；第二，领导其从战斗中锻炼，只派他担任次要的工作，和辅助任务，绝不要令其打硬仗置之于危地，引起其对主力兵团的疑惧；第三，整理纪律，洗刷坏分子；第四，配合主力兵团行动，供给他好榜样学习，如带徒弟一样，把他带大；第五，着重对干部的训练并予以全部整训时期，但不要撤换其原来干部。一年来许多地方部队的逐渐进步能单独作战，能单独进行民运工作，军民关系改善，都证明上述办法是正确的。此外应补述的，地方武装工作还应注意：（甲）宜就其成份来源进行改造，不应用笼统办法如无条件改编，或完全解散取消，或勒令调后方训练；（乙）地方武装的首长愈进步，其全队转变也愈快；（丙）当地民运工作普遍，很能影响地方部队之进步，相反亦然，两者互相影响；（丁）不仅要注意地方武装工作，还应该加上注意到武装地方的工作，我们以为政府及主力兵团应有计划发枪弹给民众，把许多民众武装起来，才能使许多地方抗战工作猛烈开展，江南地方武装已是黄熟之瓜，不堪再折，目前应注意到武装地方这一方面。我们在江南曾经拨了几十条枪给镇江县

府，这是一个开始，可惜我们力量薄弱，不足以言此；（戊）游击区实行征兵抽壮丁是不妥当的办法，要动员人力武装上前线最好方式是扩充地方武装，用逐渐抽调方式加入主力或组成主力兵团，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广大征兵工作，地方工农人民都充分有地方保守观念，都喜欢当地方兵，而不愿当国军兵，此一点宜迁就，使其逐步提高，逐步转化。

七　一年来的敌伪军工作

在去年冬天为止，我们的敌伪军工作都限于火线喊话和散发传单，在今年开春后有几次伪军反正，一是金坛王部，一是镇江姜部，一是最近的镇江杜部，三部合计反正的人枪约三百余。这是一个小数目，但开始这一工作，也有他的政治意义，我们来研究初步的经验吧。伪军的组成：一部分是在地方武装被敌改编的，因靠近城市迫于威势，他们自己愚蠢以保卫地方名义向敌寇输诚的，一是由土匪被敌改编目的在于金钱，一是收集失业的粮差警察，由伪官组成的。上面是普通的形式，他如抽壮丁，崭新组织伪军，日寇不发给伪军以武器，日寇对汉奸以其为中国人并不那样推心置腹的。

在江南游击战展开日寇势力削弱的条件下面，特别几次汉奸伪军被我军干脆解决的教训下，一面日寇更不相信伪军，增强对伪军的压迫，一面全国战争转变的影响，终于打动伪军的心，造成其民族觉悟，就是伪军反正的政治基础。我们试想伪军的心理，本想托庇日寇，结果不能保险而又终日含羞忍垢，必然激起其反正的热忱来。因此我们以为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进攻的争取，是伪军工作第一个经验。伪军生为中国人，不脱离乡土，绝不会与中国社会隔绝，因此有很好的民运工作，通过

居民关系来争取伪军反正，是第二个重要的经验。伪军的官兵愿受敌军压迫，但因做贼心虚，始终存着观望心理，一面怕国军不能容纳，一面又怕抗战会失败，因此军队愈有鲜明的抗战政治主张，光明的政治态度，愈获得人民的拥护，愈可以吸引伪军反正，这是第三个经验。江南听说两面派公开的或暗藏的与日寇通声气，特别与伪军正是同病相怜，莫逆于心，我们能运用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两面派。两面派之争取，正是争取伪军反正的桥梁，这是第四个经验。伪军工作在宣传鼓动方面应该是公开的，动员广大人民造成民众运动，但如何组织反正应绝对秘密的，事机不密，反陷起义者于死地，这是民族的损失，这是第五个经验。伪军反正工作其作用在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崩溃，并不是着眼在扩充几多人枪，因此切忌各方面的抢夺，你来争，我也来争，于是脱离正确的对敌伪的统一立场，甚至走向用金钱收买的道路，于是使敌伪待价而沽，甚至泄露秘密，这是极危险的，结果不但不能瓦解敌伪，反使敌伪巩固起来，应避免这种偏狭倾向，这是第六个经验。最后伪军工作既然是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不应该贪图小利，因此凡有觉悟的伪军，应使其尽可能留在敌方，以伪军工作进行伪军工作，争取较大的反正，造成反正潮流，在适当时机配合国军进攻，以巷战迎接国军，聚歼日寇，只有在事机泄漏不能再留下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这就是伪军工作值得研究的领导艺术，这是第七个经验。

此外因民族的隔离，语言的不同，自然使瓦解敌军工作难于伪军反正工作，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江南人中有根本否认敌军工作的原则的。目前我只限于喊话，而喊话上只限于几句简单口号，就是传单尚缺乏良好技术，这是应该改进的方面，也

就是我们工作薄弱的一方面。

八　一年来的民运工作

一年来的民运工作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军初到，针对南京沦陷国军西移后人民中间失望心理，进行了各方面的宣传鼓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军民代表会，各县动员会，话剧宣传，街头演讲，是此时期的组织形式。工作内容是调停内争，防匪自卫，破坏交通，侦察敌情，协助军队等。宣传内容以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中共对时局宣言，蒋委员长对时局谈话作为基本原则，经过初步宣传动员及我军不断战斗胜利，人民失望心理逐渐克服，抗战热情业已增高，此时期的工作进行到第二阶段（约在去年九月以后），宣传内容是保卫大武汉，坚持抗战，准备打破敌之下乡扫荡，武装民众，保卫秋收运动，动员参战工作，打破敌人梅花桩，揭破敌人反共欺骗等。组织形式是各界抗战协会，各县抗敌总动员会，租息调解委员会，冬防队，国民抗敌自卫团队等。宣传和组织原则根据蒋委员长告沦陷区同胞书，蒋委员长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中共六中全会时局宣言，江苏省府国民抗敌自卫队计划书，三战区整理游击区军政工作方案，具体工作在整理游击队建立国民自卫队，慰劳军队，优待抗属，反对敌人修马路，抽田赋，抽壮丁，调解地主佃农的纠纷，击杀汉奸头子，争取附从者反正，努力冬防剿匪工作；今年春间工作进到第三阶段，诸游击队已能单独作战，人民已开始自动捉汉奸，打日寇，普遍农村中已掀起了抗日运动，自愿当兵的已加多，慰劳军队及抗属蔚成风气，反对敌探成为绅民日常工作，江南某某农村已逐渐走向抗战根据地的雏形，此时期的工作，集中在武装参战、争取伪军

反正，肃清汉奸敌探，协助军队进行抗战。这时进行抗战第一阶段的总结和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教育。蒋委员长南岳会议训词和国民公约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教材，政治重于军事，宣传重于作战，游击重于正规，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这几个准则，在民众中进行了基本的解释，这是今年春间到夏初的具体的民运工作。

我们的民运工作基本的方针是初步的宣传鼓动进到各阶层的组织，直至武装游击配合军队作战的最高阶段。我们的工作方式，第一是合法，第二是合作，合法与合作这两大原则是项副军长屡次的指示，也是我们在实际民运工作中所体会得到的，要合法必须首先研究体会政府的法令，恰如中共党员应首先了解党的基本政策一样，要合法必须反对滥用不合法这大帽子。我把持地方是合法的，我抽收捐税是合法的，我枪杀人民是合法的，我打骂老百姓也是合法的；但你来就不合法，因为你不能尽如我个人之意志。我敢断定这种合法，实际是违背政府国策，反抗领袖指示，断送抗战生命的最不合法。另一方面来讲合作，“合作”就是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词上不必争执，基本是在于抗日斗争上的联系和互相帮助，特别在战局吃紧之际，能以实际表现，帮助友党友军的才算是真心合作。如果把合作挂在口头上，仅作一块招牌，而暗地进行反对友党友军的活动，这就不能算合作，而是破坏合作。我们与许多友军互相捉拿逃亡，互相交换情报，战斗中互相通讯驰援，甚至不等待命令，我们去岁与十九军及现在与攻击兵团，都彼此曾有过亲密合作的事实。我们帮助他们，他们也帮助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合作。江南战场上洒遍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的鲜血，这血流在一块，谁也难用政党派别军队系统

去辨别他，敌人的枪口对准中国人，我们中国的枪口也对准日本帝国主义，合法合作可作如是观，离了总的民族利益去解释，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团结起来，凡能真诚运用合法合作两大原则的人，他的民运工作必然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反之，不真诚依照合法合作方式的人，必然在广大民众面前失败，这是民运的第一个经验教训。凡能以抗战利益为前提而主张调停内战减少磨擦的人，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反之，不顾民族利益而专事内部磨擦的人，必然遭到人民反对，这是第二个教训。凡一切标语口号一面能不违背合作原则，一面能遵依抗建纲领，则这种标语口号，必然在原则上与南京敌寇的标语口号造成绝对对立，反之，凡不把抗战放在第一位，超出合法合作的范围的，想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他的标语口号必然与南京方面含混不清，这是最苦的，但又是最显著的真理，可作为第三个教训。一年来的民运工作，从这三方面最富于教训；教训了我们，教训了人民，同时也应该教训从事抗战的党派军队机关以及各种团体。

最后在民运方面还补充三点感想：第一个感想，在民运工作中江南人民中的某些急进分子，每每嫌新四军太软弱、太让步，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批评。他们的缺点在于不了解合作是对敌的主要办法；一种让步，一种期待，是为了巩固团结坚持抗战。这是必要的，不算是吃亏，我相信一个抗战革命家，应该坚持抗战原则，同时也应该顾及到事实和环境，我们不要作一个抗战的罗曼蒂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勉为其难，不应该抱幼稚病，和急躁病。第二个感想，我们深感觉我国人民经辛亥革命北伐以及目前抗战三个大革命，三十年来饱经患难，政治觉悟和经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人民的判断常常是最严正的

审判官，所以民运工作不仅在于使各党派去领导人民这一方面，还是有使各党派去受人民的试验的这一方面，这种试验是最无情的，我们应懂得一切武断蒙蔽的的宣传是动员不了民众的。第三个感想，我们不仅集中力量反对敌寇方面，我们还集中力量指出中国各方面的进步，我们尽量宣传政府方面各种进步伟大的实施，我们尽量宣扬各友军在各个战线的战绩，江南某些绅士中以十六年以前的观点来怀疑政府及国民党，我们也尽了许多说服工作，指出政府国策的正确，及国民党对于国家民族伟大的贡献，我们丝毫不曾抹杀某一方面的成就，这是具体的事实，我们这种态度取得人民更多的同情，我们以为坚持合法合作的原则，承认人民的判断力，顾及具体环境和事实，竭诚与友党友军合作，共同领导，共同负责，这是一年来民运工作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最基本的教训。

九　一年来部队本身工作

本支队在茅山一年来的行动，就部队本身方面也积累了许多优缺点和宝贵经验，写出来可成一本书。现在约略指出几点：第一、我们抓紧了一面作战一面教育的方针，有半天时间，即进行会议和操课，得以经常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第二、我们依据实战经验和实际民运工作为主要教材，使学习与实用联系，学习中得到实用的兴趣；第三、估计到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准低，努力向高级阶段方面提升，这个方针是对的，但做得还不充分，尚未达到我们预定的要求，也就使我们的许多特长，不能充分发挥，难免不造成工作的许多弱点，如有逃兵及个别干部堕落和逃跑等；第四、我们努力于维持纪律，提高纪律，这一方面有了最大的成就，我们认为一方面人民常从军队的纪律

来判别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军队纪律好，即可以动员人民参加战争，纪律不好，人民就望望然去之。另一方面认为在游击区军队恰是政府的代表一样，他应该是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纪律就是最初见面礼，这个见面礼弄得不好，以后的话就十分难说。最后纪律之维持应看经常性和自觉性，纪律如若时紧时松，一样败毁军誉，纪律不依靠自觉，专依靠行政手段，必然养成瞒上欺下的恶习，纪律的真髓，在于对人民遇事体贴入微；纪律的维持，在于动员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我们部队纪律的优点在于政治纪律好，弱点在于军事纪律的不整。比如派勤务讲价钱，礼节不讲究，部队内不爱惜武器，部队嘈杂喧哗不肃静等，这由于误解活泼，误解自由平等的原故，这还需要努力纠正；第五、就是我们的部队具备游击战的特长，能单独作战，独当一面，但一般战术水准仍然很低，必须根据操典和实战要求，从基本教育上用功夫；第六、我部队的补充困难，特别是人员方面，我们就地补充完全依照自愿原则，新的补充，恰与伤亡逃亡两两相消，外传新四军扩大到好多万，完全是谣言。这一批逃兵们，你要他回来，他就说“你们军队样样好，只是太苦，天天打仗，免不了伤亡。”这些逃兵的话，是最真切的，我们尚不能解决逃亡的问题。这种伤亡和逃亡削弱部队，使部队难以扩充；另外就是优待抗属的工作没有做起来，这需要政治系统和民运工作的努力。

一年来部队工作经验最丰富，后有专文，不再详细论及，此处只就想到的讲几点。但一年来我们的部队战斗经验增多，民运经验加强，干部指挥能力也有进步，武器也掉换了一部分，地形敌情也熟悉许多，这些方面比较去年六月东进之际，也大不相同了。固然有一部份老的指战员在战斗中光荣殉国，不过

不影响到我们的战斗力，但我们正努力从教育中去得到补偿和解决。

十　总结——今后如何开展新的斗争

过去一年来的工作应放在开展第二年的抗战工作的中心上，过去的一年飞快过去了，成绩和弱点都是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我们问：

第一、今年六月以后，敌人的政策如何？我根据江南当地的材料，可以明白指出敌寇在进行其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总的灭亡中国的阴谋下面，江南有他的特别的花样，归纳起来就是：

（甲）组织反共青年团，挨门造册，发证明书，有证明书在寇区可以通行自由，发行“青年周报”，利用中国古旧文章，进行制造汉奸顺民，消灭民族意识。寇人怕这样不能如意的使青年上当，所以又提出不加入者以参加抗战论罪，最后手段就是捉杀投牢罚款。这样使部分青年决心向国军方面跑，由城市到农村。自然也有一部分青年不得已而暂时屈服，这种反共青年团的阴谋，曾有人去问江南的一位大先生如何办？他回答：“这是日本人反共，不干我们的事”。这种回答太干脆，也太荒谬，如果真以为日寇仅仅是在反共，与灭亡中国无关，我看这有点是南京的新鲜宣传。

（乙）敌寇在京沪线各城市进行反英运动，提出替中国收回租界，从开大会，散标语，发传单以及摄影等，台上人多，台下的人反转少些，台上的日本人较多，台下中国人还更少，我们不能说这与英国无关，这可以教训唐宁街的保守党政客们。

（丙）最近南京敌寇大宣传和平计划中心问题是强调反

共联汪反蒋，无耻的说可以保存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这种盗用三民主义和侮辱国民党，离间国共合作，这是敌人新政策的中心，在这里我们应选择自己如何来回答。

（丁）新的制造汉奸的办法，敌因鉴于江南抗敌运动的开展，知道过去到处强迫组织维持会，傀儡政权，那一套不能推销，敌寇又知道江南的每一个农村，都是抗战的根据地，如侵入农村，乃是其基本的要求，敌寇巧妙的变花样。一、用绑票式捉拿抗战绅士，强迫其写降表，断绝其与国军联系，使国军把他当成汉奸失节的分子，绝其向内。二、利用社会上原始的封建性的迷信组织，来向农村扩充势力，如大刀会，青红邦，同善社，佛教会，表面上宣传与抗战无关，守消极，守中立，实际上给以皇军下乡不向他们会员杀烧的保证，这样轻易毁灭民族抗战的意识，迷惑国军的耳目，以灰色的方法，掩蔽汉奸秘密行动，而深入农村，把军民抗敌合作拆散，以达到日寇安定农村的目的。

（戊）主张中日亲善联欢，日寇宣传“你们老百姓，不要帮忙皇军，也不要帮助新四军，你们安居乐业吧！让我与‘共产军’一拚”。

（己）日寇还进一步发表告新四军战士书，如：“你们不要替蒋政权打下天下，蒋将来会剿灭你们，你们不要把祖国卖给苏联，你们到皇军这边来”。这些无耻的挑拔离间的谰言，值得注意，这种将来剿共的论调，许多不明大体的分子，也用同一口吻宣传过，我们应用巩固民族团结，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对日寇作响亮干脆的回答。

（庚）日寇有组织的使用土匪，使用土匪作为捣乱抗日根据地的前驱，这在丹阳镇江地区屡屡发现，这里需要正确的争

取土匪的政策。

（辛）日寇最后一个新的欺骗，即是宣传捉住国军人员，可以不杀，只要他作苦工，加入苦役队。根据上面几点证明敌人在新阶段中，对江南的阴谋，正在具体化，正在精巧灵活的使用，我们要不断收集新材料，注意强盗们的每一心弦跳动，随时给他们以有力的打击，不消说日寇这些办法，是根据他的总路线建立“东亚新秩序”来的，但是就在日寇决定其新政策时，自己已发出哀呼，呈露其恐慌，我们可以引用几段：

（一）近卫在昭和十三年十一月三日的播音上最后结论说：“……没有以汉口广东之攻略为一转机，怀抱着太平时代即到来之思想者，则如此不理解此次事变之重大意义，天下未有比此更大的危险也。当负起建设东亚之日本，于其国民生活之全分野已进入新的创造时代，由此意义，真正之战争已由今开始……。”

（二）平沼于昭和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议会演说也公开承认着：“……时局的前途，固为多难，不难推察……”，他最着急的是：……又一面对当前受战争影响而休业失业之工商业应迅速措施，农村渔场之维持振兴，以及如何安定国民生活，决排除万难，以求实现……”。

这是敌酋自己承认敌国在中国抗战面前的焦急，在江南前线，我们也看见日兵逃亡现象，有一次有五个日兵下乡投诚，被居民击散，仅获带路的伪军一人。日兵自杀和醉酒痛哭的事件更多，无论如何，敌寇施行其新政策，绝难挽救其颓势，这是可断言的。对于这一点作为我们加速转变工作，改善工作，加强团结，准备反攻的力量的基础则可，若作为速胜的基础，用来动摇团结御侮的政策，则期期以为不可！我们再问：

第二、在江南战线上，我们有什么新的进展呢？从四月以来，全国试行攻击计划，无疑义收着伟大的效果，在江南前线上，攻击兵团的行动，也给全国以配合尤其对苦战中的我们，是一个大大的增援。三个月来，江南战局，正在猛烈开展，几次攻击计划，在数百里战线上开展血战，几度攻击城市进行了巷战，几十次野战军给予敌人外出部队以重的打击，压迫敌人重新退守坚垒，使南京镇江敌人，不能不急调援兵。在攻击兵团诸部队，也显出他本身正规军的作风，他们正建立政治工作，他们正整顿保甲制度，他们正发动地方的抗战文化运动，如办报纸、书店、学校等，他们更正在严格的反对地方某些贪污、堕落、压迫民众等恶现象，某些地方政府不称职的人员已撤换正在改进，我亲自看见他们部队中的生活，也是极为艰苦，我所遇见的几个营部连部，都是饭食简单，与士卒一样的甘苦，他们部队中抗战的情绪很高，我们共同作战，互相帮助，在事实上亲密合作，攻击兵团给予我们的指导，也按着正确的游击战原则，同时对我们的战斗方面还屡次有奖励和鼓午，我们也深刻检查过自己的工作，我们对他们的帮助和配合，虽能做到了某些方面，但仍然未能达到抗战的客观需要，正待我们努力。这些都是说明江南战线上一般的正在进步和加强，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新生的前进现象。我们再问：

第三、今后江南战线，应作如何布置呢？根据上面所指出的日寇的新政策，根据上面所指出的一年来我们中国在各方面进步，固然我们不能过分估计日寇的削弱和困难，但我们很清楚指出整个国际形势，及中日战局已转向有利于我们中国方面，我们应加紧全中国努力来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在江南战线上：

（甲）充分估计敌人正在集结兵力，准备大规模的扫荡京沪线两侧，整个江南战线，应为打破敌人的大扫荡而努力，这是新的斗争任务，不容忽视，不容松懈。

（乙）诸主力兵团，力求战略上的配合，江南江北的配合，京镇间与淞沪苏常间的配合，主力兵团与地方武装的配合，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配合，求得整个战线，盛水不漏，无间可乘，将敌之大举扫荡变成我们对敌的反扫荡。

（丙）地方行政系统，及民运工作系统，民众各级团体，应有充分政治动员，一切为了扶助国军，一切服从战争，军事胜利第一，工作内容集中在参战工作，游击工作，敌伪反正工作，地方、自卫、生产、文化工作，四大部门，以各方协作的动员会议，来统一行动，统一意志。

（丁）本军站在茅山地区江南战线前卫之一角上，应努力担负起自己的神圣光荣的任务，敌人任何大规模的进攻，必须铜打铁铸似地坚持原地，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更大集团使用兵力，部队中进行充分政治工作，巩固和提高战斗的决心，使自己在战斗中向正规建军的伟大前途迈进，肃清游击主义残余和克服逃跑现象的弱点。

（戊）巩固内部团结，励行合法合作的原则，一致对付强敌，这是开展战局的枢纽，一切误会应该解释，一切磨擦应该减少，一切狭隘的小集团利益应该放弃，一切过去旧时代的成见，应该在新的斗争面前消毁，把整个江南的党政军民团结成好象一个人一样，在国军统一指挥领导之下行动起来，必然可获得伟大的胜利。在江南行动的新四军，要争取自己起积极的斗争作用。我在此引用明贤戚继光的话，作为政治的结语：

“诸君以今日共坐之处是何处耶？此非三间房子，乃

是一隻破船，又当风浪之中，若是睡的自睡，坐的自坐，仇人反目，各不同心，将使船被风浪飘冲打碎，彼时无出贤愚，无分恩仇，都是溺死。遭此之际，便是黑心仇人，既在一船，说不得平日不相识，说不得平日仇怨，推此共患共难之心，掌舵的掌舵，掌缭的掌缭，同心同力，将此船撑过江海，今要求漏船过得风浪，却人人不齐心，不共拚一个死力，那个人免得去也！”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于军次

（原载：《群众周刊》第3卷第22期1939年11月30日）

江南游击区域工作经验片谈

陈　毅

新四军进入江南京沪线已届十月，兹叙述下列诸问题，作为国人从事游击工作者之参考。（一）强化游击区行政系统问题；（二）整理地方武装问题；（三）游击区抗战动员问题；（四）游击区民众组织问题；（五）解决游击区域问题之关键。上列五者为游击区工作之中心，本文所谈又为京沪线上京镇地区的实况，较诸其他游击战线实具有特异之点，希阅者留意。

一　强化游击区域行政系统问题

江南地区的行政机关，在首都西迁之际，极形混乱，各地政权未能坚持原地，自行分解，常发生每县几个县长对立，使人真伪难辨。有原来的县长，有军队委任的县长，又有未奉委任而自行由地方绅民推选者，且地方上许多小单位形成拥兵自卫现象，常因抽收捐税，争夺防区诸问题，发生磨擦，甚至武装冲突。纷乱已至无政府状态，痛苦迫使人民消沉。最近江苏省府设立行署于江南，使行政系统的组织人选，始得到合法的解决。从行政专区到县区各级，业已恢复。目前优点，表现在诸公务人员于敌人迭次进攻中仍能坚持原地，不再作背进退却之举，此种进步，于安定人心贡献抗战至大。尤以溧武路以北，句容、镇江、丹阳诸地，在与新四军配合上，表示了同生死共

患难的合作精神。目前缺点，在一切设施拘拘自限于层峰的功令，而不能进行独立创造的工作。游击区域特点，为敌我力量两不相下，造成对立相持局面。不仅与抗战前的情形不同，即与抗战后的后方及主力兵团的作战区亦有不同。一切行政工作的最高要求，在发动并领导人民，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在发动人民武装配合游击兵团进行抗战。为达到此种要求，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民情、敌情、地形诸条件来决定，只要不违反中央政府与省府抗战国策，一切工作应有伸缩性与灵活性。如果墨守成规，如果拘于功令，如果死守旧规，必致缚手束足，贻误事机。如果杂处居民之间，尽其所谓埋伏坚持之能事，则机关等于虚设，斗争难于开展，既不能扼制敌人，必日以敌人之进攻为惧；既不能满足人民要求，是必与民众疏远；既不能动员人民与正规军游击军配合，军政之间连系无力，而整个游击战局必陷于事权分歧，而有走到被敌人支解之危险。为今之计，上层指导似应尽量奖励游击区中下层之机断专行；游击区行政机构，应做到任劳任怨，而富于创造精神，一切工作应进行迅速灵活的独立解决。此外如各游击兵团及地方部队，应与各行政工作密切配合，在武装保护上，军队应负专责，在动员人民配合战争上，地方政府实行领导。政府、军队、人民打成一片，使敌对我方无隙可乘，反而造成对敌之包围与孤立，则游击区工作，可以迎刃而解。综观国内外评论界对于游击区工作，多着重于游击队之改造充实；而强化游击区行政系统一事，则淡然视之，此种偏向，必须转换。须知游击队仅为指挥力量，使用力量，消耗力量之集团，他如组织力量，培养力量，储蓄力量诸事，非行政系统决不能兴办。在京镇线上，尝因此种分工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使战争开展蒙其损失，当事者饱受痛苦，作

者亲身历尽此种苦味，敢望明达者，对于此申述，幸加明察。

二　整理地方武装问题

首都沦陷，国军主力以战略关系而西移，而留在敌后方之军民，纷纷而作游击起义，于是不数月间，游击队普遍繁殖，考其成份，计有三种：第一为地方志士，自动武装者；第二为国军遗留之官兵形成集团者；第三为原地方保卫团，经绅民集议力求自卫者；其中杂入青红帮大刀会诸成份，几乎无地无之。诸种部队并列一地，因无统一指挥，绝难造成政治纪律，军事行动之一致。计其缺点为：第一、多籍口军械补充无着，不能积极对敌行动，竟有长年长月无一战绩者，拥兵自卫，优游卒岁，可为此种队伍之写照。第二、因给养无着，不得不取给于民，而本身又无正确军需制度及正确预决算，遂致捐税繁重，引起人民嗟怨。第三、此种部队多半来自田间，本于人民有血肉相联之关系，但因领导，仅有抗战雄心，而无抗敌办法；仅有领导武装决心，而无建设军队之经验；举凡军队中之优长处，百不得一，而旧习气则如中风走魔，不学而会。凡此诸点，非作者故为谤辞，以抹杀其抗战贡献；良以其中具有纪律战绩者为数甚少。批评目的在善意作进步之期望，不贵以谀词粉饰，以求自慰而慰人。但其中官兵多属爱国志士，动机纯正，热情甚高，此种优点加以发扬，不难立臻强大光辉之城。我们在京丹线上，数月来与诸游击队密切合作，予以扶助，即焕然改观，进步迅速，每出人意料；单独作战之能力即已次第具有，其帮助新四军之处亦至大且多。足证游击队问题在加强其领导而非取消、吞并、限制、分化，诸办法可以收拾也。反观敌寇历来即欲收买游击队为己有，敌之政策并非完全失败，少数败类堕

入壳中，甘心附敌者亦有其人。例如去夏之朱永祥部投敌，若非顾司令长官英断，立令新四军予以解决，则数千之众，早开入南京，列入卖国贼群而登场作戏矣。言念及此，能不深惧！因此我们于整理地方武装方面，提供两个口号：第一为保持地方武装之地方性；第二为保持地方武装组织之独立性。吾人只要求地方武装守纪律，打敌寇，并不希望其并入正规军。因地方武装之被归并无异使人民解除武装，敌寇袭来，居民失其抵抗，正规军本身亦陷于孤立。至于派遣军政人员予以指导，分批调集适当地域勤加训练，均为必要之办法。但其中最良者，莫过于派队协同作战，作战之锻炼胜于一切操课之努力；不过宜注意在分配任务时，须估计其力量，就轻松而能胜任者令其执行，一面使其于初战获胜而增强其今后信心，一面使其了然正规军对之爱护有加，不敢别生误解。他如地方武装之补充，如给养、卫生、后方勤务，亦应尽力兼顾，养成彼此团结，无分畛域之作风；再进而督促其以同样精神对付人民武装，遂使正规军、地方军、人民武装、打成一片，互相依靠，无间生死。假令长期坚持此种路线，使诸地方部队发展而为强大的兵团，再改编为正规军，另由人民武装新组地方武装以代替其作用。在逐步提高逐步扩大的情况下，游击战局之改观，必可预期。我们在江南之努力，皆一体斯旨，外传多属误解，甚或恶意中伤，睹此者可以瞭然矣。

三　游击区域抗战动员与解决民生问题

外传我们在京镇地区，煽动阶级斗争，其指责中心，厥为去年秋间减租减息一事。兹就事实论列，以表现动员工作，与解决民生问题相关联。在去秋秋收之际，居民间发生三个问

题，要求我们解决。第一为居住在敌人据点及城市内之田主及债主（如稻行经理人之类），彼等于春间放债，约定秋收后收回本息，不料届时农民力持异议，以其既甘与敌人相处，甚或为敌军服务，在政治上为汉奸，坚持不纳租息；另一面此辈田主与债主，就中亦有仅寄足×市，并无帮助敌寇之举，则认不交纳租息为违反成约。第二为南京沦陷，戎马仓皇之际，许多田主跑往后方，当年秋季租谷并未实行收用，第二年田主归家，要求两年租息一并照收；而农民则以沦陷区即灾区为辞，要求两年延付。第三我们宣传蒋委员长告沦陷区同胞书，内中有豁免沦陷区人民赋税之提示，此种德意，在全体人民固无异议，且亦感奋；而农民更认为蒋委员长为全国民族领袖，其昭示豁免赋税，亦即有顾及农民减轻租息之厚意。以上之种种争执，言之成理，我们熟虑深思之后，乃以驻军资格进行调解，其办法大要如下：第一，凡甘心附敌，卖国求荣之汉奸，一律不准其收租息，甚至有进一步封查其财产之必要。第二，凡非甘心附逆能觉悟反日者，不得以汉奸视之，努力争取其回到抗战方面，租息问题，双方本合作互让之旨，共同协商解决。第三，顾及沦陷区受灾程度，顾及田主与农民，债主与债户双方利益，顾及整个民族的抗战团结，应一本互救互让之旨，实行酌量让租让息。凡抗租抗息者，凡不顾及对方利益，一味自私自利，不顾及大局者，凡强迫交纳两年租息或两年一概不付者，均为我军所反对。我们在实行上列办法，首先经过地方政府的同意，采用联衔通知的方式，一面经过双方的协商，求得适当的两方同意的解决。事实上，此举博得各方同情，田主债主自动让租息者有之，农民迅速交纳租息者有之，阶级合作共赴国难之声，洋溢四外。只以各方配合不周，执行范围太小，

加以宣传鼓动不够，方式缺欠妥善，以致成效未能显著。若谓此为厉行阶级斗争，破坏居民团结，则事理俱在，非任何雄辩家所能抹杀。即令明达远见之士处此境地，想亦当同意于此。如果对于此种关联抗战动员之实际民生问题，不研究妥善办法，甚或缄默不言，则收租息者可能用武，或假借外力，而对方亦必武力回答，内争既开，危险孰甚。我们于此坚决建议：抗战动员应与解决民生问题相联系，抗战动员为主题，解决民生为其附属，解决民生问题即所以加强抗战动员，即所以促成阶级合作，即所以粉碎敌寇之利用离间，即所以增强下层人民对抗战之深切认识。此种解决民生之方式，于抗战有百益而无一害。若夫不顾及抗战利害，强调某一阶级的狭隘利益，此乃为内战方针，而为我们所反对。

以上例证，颇足供国人之研究，举凡租息、税收、工资、典当诸纠纷，皆可借镜，作为原则的与实际的解决。作者对此不敢自诩为绝对正确，但此一途径实有可取之处，不宜多所误解也。

四　游击区域民众组训问题

去夏，我们初到京镇线上，人民重视国军，深为庆幸，间或有疑惧者，一经接触，旋即融和打成一片。于尔后，各次与敌战斗中，得其助力，至为巨大。但此时仅属同情之表示，尚不能言直接以武装助战也。七八阅月后，经过艰苦的组织训练工作，人民认识更高，积极性更强，从同情地位进到武装参加的阶段，举凡侦探敌情，捕杀汉奸，救护伤兵，慰劳伤病诸事，可以一呼百应。至于带枪入伍，赠械杀敌，带路救险，随军作战之光荣事迹，难以言宣。即在我军作战不得手而后撤之际，

一切伤病人员落伍人员及枪械，居民均能迅速为之改换便装，以欺骗敌人之搜查。我军获利则群相庆贺、偶传失利，数十里外远道慰问及策划救护者，旋踵相接。人民于军队依之若保姆，军队于人民视之若弟兄。此种成就，一由人民抗敌热情与爱国心之流露；一由民众各级抗敌协会之组织具有初步领导；再由我军之纪律严明及不断斗争胜利，此三种因素构成坚持江南抗战之基础。良以江南之地形，厥为全国最标本式之交通网，水运纵横之区，同时敌人盘踞京沪，坚城森立，据点密布，敌采用中国过去内战经验，欲以堡垒政策，封锁政策扼制我军，我军对策仅唯民力是赖。我军以窳败之武器，弱小之人力，而能立足江南，其得力于政治，较诸得力于军事为多，绝非夸言也。

依据居民工作的经验，我们对民众组训工作认为：第一、宜充分采取民主方式，避免包办限制及不信任的办法。第二、宜就职业分别进行各业组织，一面使其讨论抗战责任，同时顾及其本身利益。第三、宜大胆培养民运工作干部，最好取材于当地。第四、各抗战党派不仅应注意该党派党员干部之培养，尤须注意非党员干部之培养，对党员干部宜求严格，对非党干部则应多加诱导或扶助其能独立自主报效抗战。第五、宜调整一切小派别的无原则的斗争，诱导其归于抗战之一致。江南有客籍与土籍之争，与夫政治党派成见上之分歧，对此不宜火上加油，专听一方，宜站稳民族立场，调停各方，以专力对付日寇。以上各点，偶一疏忽，即于实际战争生绝大妨碍，不可不深察也。

五　解决游击区域问题之中心关键

以上四者为游击区域之主要问题，业已一一简单论列，但

尚有一点，厥为军政党民之领导统一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局部之改变影响全局甚少。八月来我们于局部努力，自信甚多，但全局之改观尚有待于将来。目前在新阶段中，敌寇已改变办法，由军事进攻转而为全面的侵略。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凡能为力者，敌寇均取攻势，我们如果事权不统一，而一仍各自为战的旧态，必不能打破敌之新攻势。近闻中枢有党政委员会之创设，又闻国民参政会下亦决定创设各级参政会，此举至为贤明，迅速实施于各游击区，必能统一事权，加强团结。此为吾人之深切希望，亦吾人八月来日夜所悬悬于心，期指日实现者也。

（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
第七期1939年7月25日）

永不忘，学习他，我们的死者！

陈　毅

去年六月一号，我们离开南陵，二号晚上，通过铁道，向敌人侧背进军。记得那一夜，我们分三个纵队行动，夜行军发生混乱，有一部分弄错方向走到敌人据点外面，敌人误会我们去攻他，我们误认为敌人在打我们的埋伏。有一部分失联络，留在森林田丘里，找不着本队，直到天明才弄明白，重整部队，向东直进。当天色欲明之际，我同几个同志留在铁道上收容部队，望着无垠的大地，长着葱葱的农产物，祖国啊！你的子孙，决不愿你留给我们的美丽的河山，让敌人强占！山国战士们夜间的纷扰和天明后的疲劳颜色，使我心里暗暗在盘算、在耽忧，我绝没有动摇我的胜利的信心，但我心中的兢兢业业不敢疏忽，不敢妄自胆大，确是实在的！一个同志带着一排人来找我，在树林中发现了我，满心欢喜，“呀！你老人家，不怕！走后头，全军都集合了！只等你呀！”我放下了沉重的心，要大家回队，到宿营地，房东为欢迎我们，就请吃饭，因为那天恰恰是端午节，粽子和雄黄酒的味道，虽隔一年，还有余味！

恰恰是一周年了！部队起了大的变化，一部分同志，英勇殉国，新战士不断加入，战斗经验，工作作风，民情融洽，地形熟悉，都与初到江南不同，有了大大的进步，特别我们已深刻认识日本强盗这个有长处也有弱点的敌人，也才知道当初的

耽忧是一种过虑，但是这种过虑确实是不可少的。

一年来的成就，主要依靠着英勇牺牲的同志们的奋斗，他们的血肉，是江南抗战的代价，本军荣誉的标帜，今当抗战两周年纪念的来临，本军一年战斗纪念的来到，我以后死之身，应该首先纪念我们的死者，永远不忘记他们，永远学习他们！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第一点是，本军先烈们的牺牲，大多经过肉搏的最后阶段。用火力压倒敌人，与敌人进行火力比赛，我们真是无福消受的，我们尚没有具备这个资格。因此一切战斗依靠首先缩短敌我的距离，距离愈近，胜利愈大，一下就投入白刃冲锋，这是先烈们以血肉传给我们的战斗精神，这是一年来本军战斗的特性。在新丰战斗，鬼子一把长枪连砍我们几个同志，最后六个人才把他扭下来，还归功一个小同志抱着敌人的腿，紧拉着敌人的下部，才把该敌杀死。在延陵一个伙伕同志紧抱着敌寇小队长扭成一团，最后一个同志，加上一刺刀穿过心腹，敌人大叫而亡。在延陵另一次一个排长同志同日本鬼扭缠，三番四复滚到东，滚到西，虽未敌我同死，也就是两者俱伤。在先遣队第一次无名的战斗中，解决敌酋土井中佐，也是从马路纠缠，滚到水田内，夺过敌人手中的军刀，才将敌酋刺死，水田为赤，这是三支队的温参谋开辟了这个光荣的先例。温参谋不被水淹死，不被刀刺死，不能不说是一种侥幸，在京镇间地区的无数次战斗，每每敌我拥挤一团，来一个满堂红，这个时候敌人不能开枪，我们的枪也来不及使用，真是力与力对比，来决最后雌雄。这不仅二团和先遣队，我六团在白兔战斗，一个营长带二十几个便衣队混进敌人露营地两方先开火，最终也以满堂红结束战斗，萧国生同志牺牲在白兔战斗，那次更有许多肉搏的场面，我们的指战员在弹尽援绝之际，最后以

肉搏殉国。我们应该永远保持这个战斗的优良传统！我相信不管世界的火器如何发达，两军交战无论如何逃不出这个公式，以火战开始以肉搏终结！现在是如此，过去是如此，将来克服上海、收复南京，谁能说不经过浴血肉搏的阶段！没有这种勇气，你就不要上战场！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的第二点就是先烈的陷敌不屈的就义殉国的精神，一年来数百次战斗，我们无一次不占上风。仅上下会这次战斗，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大多数战士冲出重围了，没有冲出来的，陷在敌人手中是怎样情景？王团长的特务员同志负伤了，他们一起接连有几个同志负伤，他们大叫部队赶快突围，不要因救护他们而使全队受危险，他们要求补一枪，但是谁愿意下这个手！敌人四面合围上来，敌人面上狞笑，表示今番总要活捉你几个新四军，但是我们这几个同志，负伤了没有肉搏的资格，没有使用武器的资格，敌人到了面前，他们一齐投水而死！敌人的活捉计划，归于泡影。又有六个战士埋伏在窑洞中，敌人四面包围着，首先冲上去，以为他们可以俯首就擒，岂知窑洞中出来一个手榴弹，敌人就倒地几个。敌人愤怒又进行第二次冲锋，回敬他们的是排枪和手榴弹，敌人又倒了五六个。敌人聪明了才远远用火力猛压，我们六个同志弹尽援绝，与这国土，与这窑洞，共存共亡，赴义千秋！敌人经过这些教训，才相戒不要接近新四军的伤兵，敌人才得下一个真理：中国兵是不会投降的啊！所以在上下会战斗中敌人才不敢打扫战场，我们伤员也就救了一部分，最光荣的是二团一营一连政指陈吉生同志，负伤不能行走，虽先逃脱敌人的搜索，他扒进了民家，民众替他换了便衣，不期敌人即到该地集中，于是发现了他，陷在敌手，敌人先用欺骗手段要查明我军兵种、部

署，和首长姓名，陈吉生一字也不吐露，敌人用白刃威吓，陈吉生仍然不动摇，敌人最后一枪，毙了他，他临死大叫“政治工作人员不怕死，死也要打倒日本强盗！”人民感动得落泪，敌人对居民说“这个人，不错，坚决的很！”一个军人的坚持斗争的英勇牺牲精神，使敌人也不得不低头，我们要保持和学习这种临危不屈的精神，这就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第三点不应该忘记的，就是我们的死者平昔的吃苦耐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每天吃三餐青菜饭，三天或者可以轮到吃一回肉，一年仅仅发两套衣服，冬天没有棉大衣，两人共一床被子，一年轮不到发一件衬衣，身上免不了生蚤婆，所以人家说我们是叫化子军队。另用费从一元五角，顶多到四元。十年独居生活是常事，简直近乎一种禁欲主义，虽然我们并不是清教徒，忘记了家庭父母妻儿，一心一意为革命事业而奋斗，没有怨尤，抗战到底，享受低廉，牺牲巨大，我们死者在生前的享受，所吃、所穿、所用，真算得没有浪费国家人民一丝一缕、一颗一粒，这种艰苦生活的锻炼，是一切革命者的试金石，古人所谓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则我们的死者可以当之而无愧，这是人类最高的美德，这是与贪污腐化堕落所不能并存的！我们死者的铁的意志，压碎了财货，揭破了虚荣，扫荡了自私，白的肉、赤的血、硬的心，无代价交给人民，献与国家！

第四点我们的死者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工农出身的分子。不仅战士中如此，即干部中从旅团干部到连排干部都是如此，人们尝轻视所谓下层阶级谓之为下流社会，或者视为蠢才粗人，这一批脚大手粗的人们居然能指挥军队进行胜利战斗，居然能作政治工作动员民众，繁杂艰巨的抗战运动，居然处理得顺手，这事实推翻了社会上庸俗的偏见，这其中存在

着革命的创造力，发扬着革命的天才。江南士绅们与我们的干部接触过的，听他们的讲演，和他们作会谈，看他们作战，说他们出身工农没有进过大学，起初都不相信，继而清楚了都为之惊异。比如胡发坚、萧国生、龙树林、尹清、王赤、李文杰等，那个不是工农子弟，这些人都是革命运动中所长成的人物，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工农的优秀子弟，也是中共的优秀党员。末了着重指出我们的死者中间也有十分之三四的非党同志，也有十分之一不到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非党的布尔塞维克，我们已经看不出任何界限，这是我们最好的模范，革命的鲜花，抗战建国的大旗。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先烈们共同的精神，论江南抗战的必须记着这一点，论新四军的必须留意这一点，新加入本军的要重视这一点，加入较久的同志们更应该为这些而黾勉而奋发，这不是简单的一时冲动和热情所能做得到的，其来源只有两个：第一是高度政治觉悟，第二是实际斗争的锻炼，保持这个，发扬这个，扩大这个，就等于先烈们亿万化身，先烈不死，精神长存！

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

（原载：《时论丛刊》第6辑）

井冈山的斗争

陈　毅

原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现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一九四〇年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的干部纪念会上，报告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发展。本篇即系节录其第二章第二段从井冈山斗争到游击战争的一节。　　编　者

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以后，便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组织秋收暴动。失败以后，带一千多农民会合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冲出了反革命的包围，到了井冈山上，并建立根据地。

朱、毛两领导同志会合以后，便着手改变部队，将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打下了工农红军的坚固基础。在井冈山上迂到三次围剿：第一次朱培德（国民党军官）单独围剿；第二次朱培德、何健联合来围剿，都被打垮；第三次朱培德、何健和广东军队三省围剿，当时领导机关决定井冈山作为牵制，部队转入敌人后方，扩大到全国进行游击战争，于是采取了战略上的转移。正在出发以前，彭德怀同志从湖南军队暴动出来，加入这个队伍里面来。于是以彭德怀同志守山，朱、毛第一次长征。那次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十二月落大雪的一天出发的，经过赣南进到赣东建立根据地，到了大庾受到敌人意外的袭击，一仗后，完全失败了。当时出发时有二千五百人，两个主力团，一个次要团，一仗以后，只能跑路不能打仗了。

但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强，领导强，所以能团结起来不分散。当时一天一晚要走一百四十里路，三十天强行军，每天晚上十二点钟起床，从十二点钟走到第二天天黑方休息。每天照例如此，也不下命令，起床之后宣布路线就走，可是没有人掉队，许多伤兵都跟上了队伍。但是部队跑了三十多天，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你跑得快，敌人也追得紧，而且越追越紧，于是决定来一个反攻。这次决战把反革命的三个团完全打垮，缴了一千多条枪，俘虏了二千人。当时枪都不要，把枪柄摔了，接着又走，这时候就好点了，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顺带休息。那时候大家的头发都很长，很像长毛的样子，但是反革命终未能把我们消灭，而且把革命种子散布到了福建、广东、湖南、江西这四省。以后各地都起了游击队，四川、浙江、湖北、河南……连江苏泰兴、如皋这些地方也有了红军——红十四军。以后发展为苏维埃运动，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了大规模的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都起了骨干作用。当时很多人都不了解到这个要求。比如那时候我们在山上打游击，取消派分子，自动退却逃跑，打埋伏，动摇了。而他们还讥笑我们说："你们毛泽东住在井冈山顶，特委住在山腰，区委住在山角，刮风下雨首先知道，晓得什么世界形势，谈甚么革命。"以为我们是没有革命前途的，不了解当革命部队垮下来时，能有一个堡垒支持着就可使全国有秩序的收容，有秩序的组织反攻。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就没有以后的苏维埃运动，没有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就从这里为开宗明义第一章。当第三次三省会剿到井冈山的时候，山上有医院、学校、兵工厂及部队五、六千人，自己搭棚子，自己砍柴，自己烧饭，从山底下运粮到山上来，准备堆积

三个月的食粮。因为那时领导机关看到三个月以后，全国政治上一定要变化，蒋、桂之间的战争一定会爆发。等他们之间的战争爆发以后，广东军、湖南军就会撤回，剩下江西朱培德，我们可以单独打垮，那么粉碎第三次围剿的胜利无论如何是有把握了，问题就是在于能不能坚持三个月。当时全体指战员主张坚持三个月，那山有的是丛山峻岭，茂林修竹，有很清的涧水，所以柴水都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粮食、油、盐。于是决定要准备好三个月的粮。那时队伍早上下山背粮，晚上回来，天天上山下山，情形很有趣，山是弯弯曲曲重重迭迭的，每天只看到一个一个接连着爬上爬下，象蛇一样。当时朱德同志是总指挥，而且已经四十岁了也亲自到树林里砍了一条扁担，上面写了个："朱德记"，亲自来挑，官兵平等到了这步，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当时部队里面金子比较多，反革命为欺骗他们的士兵说："打开井冈山，金子用担挑"。到落大雪了没有办法，拿金子调棉花，可是都不能每人有寒衣穿，有的还只穿单衣，没有布鞋打赤脚。那个山很高，南方各省的山以井冈山为冠，因为一般的山有三千米达高，那儿则有四千米达高，飞机在那里作用也减少，山上经常下雾。给养非常困难，最初反革命还隔得远，附近几百里路是我们的范围，到以后厉害起来了，我们在山头，他们在山下，讲话唱歌都听到，可以谈天儿。封的紧的时候，没有菜吃就吃南瓜，因为我们曾搬了几万个大南瓜到山上来。有人说我们部队没有毯子，盖的是丝棉被。什么丝棉被？就是卧草，每人发一捆禾草，晚上把禾草盖起来，外面遮一个板门。门打开满屋都是卧草，不知有人，一走进去，睡觉的就会叫起来，因为踏到头上了。没有一个人没有虱婆，当时说没有虱婆的是反革命。所以当时是用尽一切力量

来保持这个武装，保持着基干部队。当时部队存在着一种拼命主义情绪，认为这样苦干什么，拼完了就算了；另一种逃跑主义。我们坚决反对了这两种倾向！指出逃跑是明白的对中国革命绝望，拼命也同样是对革命绝望。当时领导机关的主张是对的，这是最大的经验教训：要进行一个革命运动，就要能忍受物质的痛苦，用精神来战胜物质。善于使自己力量选择时机来突击，养成能吃苦耐劳，能坚持长期抗战，保持革命的光荣传统；把革命的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主义去掉，以无产阶级最大的忍耐应付最困难的环境，才能使革命得到成功。

今天我们部队中还有同志以生活苦不满足的，如果以井冈山时代和现在相比，那我们大家应该惭愧，我们还应该用更大的忍耐来忍受困难。要知道一个革命军队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发展，就看他能不能保持这种精神。

在主力部队退出井冈山的时候，那时候有许多伤病员和干部不能同走，当然有可能遭受摧残。我们领导机关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解释：现在我们的主力部队如再在这里是绝对不利的，我们要保持主力，应该出动到敌人后方去。可是，这里要受摧残了，不过无论如何，保持主力是更重要的。当时彭德怀同志勇敢的负起这个责任说："主力部队出动，我带队伍守山，与山共存亡"。在领导机关解释以后及彭德怀同志这样勇敢英勇不顾一切的感动下，当地民众及伤病员同志都完全能了解到主力部队更重要，主力部队失败就使革命受重大的削弱；而我们的伤病员则可能掩护。当时有一个师长张子清同志带了伤，人家要用担架抬他走，他说："我去没有好处，为顾及我就会影响整个部队，大多数伤兵都留在这里，我为什么走！假使山被攻破了，我会由群众掩护自己，保持革命力量；假使不能掩护，

我自己会处理自己的。”伤病员都很感动。以后山被攻破，他在山里六、七个月未被反革命发现，又被农民找到了。但两年以后人就病死了。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纪念。

所以，一个革命者一定要有英勇牺牲的精神，不仅在战场上冲锋肉搏，最困难的是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能牺牲自己顾全革命。在战场上牺牲是可贵的，没有这就不能有胜利，这是需要有的；但另外有人不能拿武器还能保持牺牲精神，比如大军撤退留在后方的工作人员及伤病人员的坚持，许多革命烈士在班房（监狱看守所之类）里十几年的坚持而不变节，不自首，绑赴杀场死不动摇，这个精神又为可贵，现在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

（原载：《人民解放军历史与传统》单行本）

在皖南事变前致兰溪的一封信

陈　毅

兰溪我兄道鉴：

兹乘吴参谋南来之便，奉赠照片两张，此间相社於驾去后初创，技术幼稚。小照为弟手摄，更为粗劣之作。但彼此忠于谋国，共挽颓局之精神，固跃然纸上。弟置诸几屏间，常举以示人。两年来江南局面之维持，殊非易易也。近者大军云集，驻地侧近左右，几无隙地，扣留敝军人员加以辱骂毒打，日必数起。其他举措，由蕴藏而外露者正多。弟部群情激动，居民奔向骇告，弟坚持合作，不变初衷。已令各部转入敌后活动，避生事端。水西一带，仅留医院及少数后方人员。弟亦躬亲北移，使两军相距稍远。不目睹一切，则意气宁贴，可从容筹商。谅於国家、地方、人民更有裨益也。近敝部从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七日止，不断发生反扫荡。战斗规模皆较前为宏大，部属伤亡，亦较重多。六团段团长负伤，营连排干部伤亡计九十余人。武进、江孝、句容、江宁居民可历历言之。江宁县政府被日寇包围，有科员等被俘，二支队闻讯增援得以脱险。雍仲兄来信致谢慰。弟自信於抗敌任务，未敢稍事消极。於协助友党，未敢辞劳。顷间冷先生复电切责，谓不约束所部，再逾越规范，将以抗战军律论罪。弟殊惶惑，意者另有情故，入我以罪？除谓派员查明而外，弟何说之辞。路东局面混乱，为当地游击领袖

主持，非弟权力所及。梅何等来信，谓武进张少华、王超一、徐文郁等，残杀其工作人员十余人，弟从旁劝慰，未敢直呈上奉。去秋“江抗”问题，延迟不决，弟早请政府处置。“江抗”东移部队，均编入弟部，迄今伤亡所存无几，并无一兵一卒，遄返原地。复按事实，非歪词可以掩饰也。於路东现存诸部，究应如何处置，权衡属诸战区省府，非弟部属，未敢干预。今者能明宣办法，给以任务，划定地区，未始不可收抗敌合作之效。若张少华、王超一及忠救诸人，则所见甚狭，反共甚急，不能示人以广，且另有作用，殊背中山先生集中力量从事革命之宏旨。弟愚见如此，自信所持甚平，惟明者能纳善言。兄以为如何？弟部在京钲地区，仅於夏初敌进占延陵、访仙、丁庄诸地后，乃乘隙转进敌后，仅限于武进地区，从无越轨之事。战区统帅曾明定敝部担任京钲五县游击，地区狭窄，且多湖海河川，弟部且与敌伪扭打，未敢后退一步，仅於敌我追逃之际，向东转移。而必以此为不合军律行为，弟只求相谅；夫复何言。至于四、五支队南移及军部东移事，前者军令部已再事电催，后者战区尚未明令发表，军部令弟维持苏北交通，并谓叶军长周恩来先生在渝正要求委座得适当解决，此又关系范围至广，负责自有其人，弟为尽忠职守，不能不派队出入扬中、钲江、丹阳间，日夜惟盼适当解决，此固事势之必然。至于部队待遇，友军情感，限制异军诸事，可不具论。弟甚愿秉国钧者平情处理，上中级干部双方能以大局为重，则造福国家人民，当无可限量。弟於江南战局极愿遵重上奉旨意，所见如何，能一一明告，弟当遵办。走笔不觉累幅，惟尚未尽鄙怀于万一能择要转呈冷先生前。我兄能令驾具体指示筹商办法更所感祷！

肃此敬请

政安！

弟 陈 毅

六月十一日

（原载：《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面观》编译出版社编
世界出版社发行 1941年3月初版）

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

陈　毅

一月十四日重庆当局挑使顾祝同等造成皖南事变，叶军长负伤被擒，项副军长以下官佐士兵万余人同殉。当举国抗战之际，日寇势蹙力疲之余，抗战内部忽演此空前未有之奇变，举国军民，莫不惊心动魄、悲愤交集。群思伸张公理保持正义，深恐国共分裂使抗战大业坏于一旦。重庆当局事变后之处置则变本加厉，将叶军长交军法裁判，且以取消新四军番号闻。重庆当局蓄意破坏抗战，破坏国共合作之决心，已昭然大白于天下。日寇在南京则大事鼓励其反共行为，而重庆当局又以三十万大军进攻本军为更大规模之动员，该军运动于接敌区域，通过敌之封锁线安然无阻，且泰然保持其与敌寇互不侵犯之局面，反共投降之罪行不仅重庆当局自身难以粉饰，即敌寇亦称心得意早为之广播四外，足知皖变之前因后果，盖不仅为国共间之摩擦，所指出者厥为重庆当局实施投降敌寇，实行中日联合剿共之冒险开端，已无疑义矣。

惟皖南事变伏根甚深，内容复杂綦甚，国人或有不及细察者，笔者试以历史事实详细叙明，以便国人之观觉而思所以挽救之道，对于抗战救国前途多所裨益。今请就下列各点陈述之：

（一）本军成立，一贯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及反共派一贯的阴谋摧残，违反信义之经过。本军原为散布在湘、赣、粤、

浙、皖、鄂、豫八省边区红军游击队。抗战以前，遭受大军围攻，经本军坚持，其围攻计划均告失败。抗战爆发后，本军顾全民族大义，放弃乘危报复手段，接受政府改编，成立新四军，毅然出让八省边区根据地，开赴苏皖前线敌后作战，此种顾全大局，见义勇为之民族精神，早驰誉中外，即反共派亦中心折服，无可中伤。忆在民国二十八年初东开，进入苏皖敌后作战，三年来所受待遇如下：

1、本军东开，顽方即违反保障八省边区人民的诺言，以各种毒辣手段，摧残本军家属，使本军原驻地八省边区人民，遭受蹂躏，家破人亡，民不聊生，其间之七里坪惨案、竹沟惨案、平江惨案为最显著；

2、本军待遇，全军经费仅八万元，以后屡经要求，仅增加每月十三万五千元，全国抗战军队，所受虐待无如本军者。今视全国抗战友军，每军不过万余人，其人数较本军为少，而每月经费常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不等。本军以十万之众，月仅十三万五千元，每人每月不过仅得一元三角而已。其欲置本军于冻馁死地，盖昭然若揭矣；

3、本军进入江南敌后。第一次仅划天王寺秣陵关附近数十里为作战区，经本军抗战，始划定芜湖、铜陵、繁昌、南京、镇江，及皖北津浦路两侧为作战地区。三年来本军奉命坚持，遵守不渝，与敌寇大小余战，牵制敌寇四个师团以上，敌寇苦于奔命，本军迄未退后一步，以血战的结果夺获敌伪枪械，充实抗战实力，以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良好，加入者前后接踵，因是本军在大江南北声威远著，即国际间亦知新四军为中国抗战优良军队，而海外华侨及上海人士之捐助扶掖尤多。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

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反视顾祝同上官云相等，统帅大军畏葸不前，每年应战，不过数次，每次必败绩，其中赖本军策应援救，始得免于复没者难以数计。顾等相形见绌，转羞成怒，以忌功害能之心，反为挟嫌陷害之计，日与本军摩擦，重庆当局进而鼓励之扩大之，遂使反共军遍鄂豫苏皖四省。本军鄂省李先念部、豫省彭雪枫部、苏北管文蔚部、皖北张云逸罗炳辉诸部、苏南陈毅粟裕受压迫驱逐之事日有所闻，本军退让容忍由来久矣；

4、本军担任敌后任务，经济待遇不能自存，不能不借重敌后资财民力，以效命抗战。一切设施，皆本诸三民主义，以实施抗战建国纲领为原则，于是敌后抗战，在本军号召人民协助之下，乃得助然兴起。人民免敌寇之骚扰，有新生安居之欣乐，凡涉足本军之地区者，类能历历言之，若与顾祝同韩德勤统治地区相较，盖判然有别。顾韩等不仅对抗战怠之，且残民以逞。至于特工遍地，贪污横行，资敌聚敛之辈，更充斥顾韩等之左右，使苏皖人民，敢怒而不敢言者久矣。本军日与亲处，既不愿同流合污，复不能远让走避，因而使顾等之忌恨愈甚，转以本军保持独特风气，破坏系统为罪。国人试思之，若迫使本军放弃民族革命大业，竟与顾等角逐利禄，不恤民情，为事之难，固无逾于此者。

综上四端，言经费本军待遇最薄，言任务则本军负荷最重，言纪律则本军严明为苏皖各军之冠，言赏罚则本军独受忌刻，为特工人员破坏捣乱之标的，言战功本军虽然不愿自矜，但以顾等领导之三战区而论，谁能否认本军之抗战殊勋，言损伤则本军三年伤亡官兵万余人，国家医院从不予以收容，战士后方家属且横遭摧残，固不遑言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矣。皖南

事变打击本军至重，出诸于顾祝同等之毒手，其事非出偶然可得而言也。窃本军与顾等之间，盖存在有理论实际之歧异，使忠奸邪正，难以并立，应请国人深思熟虑，而明究其故。本军主张发动民兵，提倡民权，改善民生，推行民主政治。顾等则主张一党专政，限制民权，摧残民众，剥削民脂民膏，趁国难以升官发财。本军主张废除苛捐杂税，顾等则纵容贪官污吏，日以加重人民担负为事。本军主张革命民族主义的文化教育，顾等则以愚民教育为能事，本军主张培养青年，启发青年革命精神及其自动性，视青年为抗战骨干，社会珍宝，顾等则视青年为暴烈分子，不时用收买腐化政策，囚牢政策和高压手段，摧残之惟恐不及。本军主张官兵团结，政治、经济地位由共甘苦患难而降于平等。顾等则自视为特权贵族，鞭打士兵为牛马，不承认其独立人格，务期变国军为家丁家将，以得逞其私欲，资为巩固禄位、残民以逞之工具。总之，本军对抗战主张自力更生，依靠全国民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立场，以折冲于世界午台。顾等对抗战因循苟且，日谋举外敌妥协，以巩固自己之专政为原则，一切自力更生之进步现象，皆所不喜，且不惜以高压政策而摧毁之。本军之抗战主张，适合抗战环境及人民之需要，故人民之拥护愈多，使本军之进展日速。顾等之主张违背天理人情违反抗战需要，故与人民相去愈远，屡于抗战前方遭受败绩。顾等不加反省退而自修，反而放弃敌寇，日与本军为仇对，凡此理论实际之歧异，皆顾等进攻本军之真正根源。本军之主张胜利实施，将见全民奋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计日而持。顾等之主张能长期继续，则中国将保持古旧面目，日向倒退黑暗之途，日寇且借此生根立脚，尚何抗战必胜之可言。皖南事变，实即两种抗战主张，两种抗战政策冲突之

激烈表现，固其事理之必然者也。日寇一日盘踞中国不去，则两种主张，必日益冲撞接触，以决定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命运。皖南事变仅其表明化之一端，行将开展扩大，为民族所取决。顾等所恃者为武力、为金钱、为阴谋榨诈、为地位特权。本军所依赖者为事实与真理，为广大人民之同情，谁胜谁负，不取决于皖南事变，将取决民族革命之战场可断言矣。抗战三年，国人以浴血代价深信抗战必胜之真理，必更进一步深知本军主张为抗战致胜之不二原则。顾等于皖南事变之反噬，要为回光之反照，亦终将烟消云散，固不待本军之预言也。

（二）皖南事变爆发，叶项军长被歼，及重庆当局非法荒谬的处置经过。查本军十万之众，坚持华南华中数省地区，经过日寇无数次扫荡，皆不能动摇本军阵地。本军为日寇眼中之钉，盖已成为抗战常识，不料竟遭亲日派反共派之忌刻，务必驱逐而后快。两年来反共派派遣大军由制造局部摩擦，进而武装进攻。本军站在自卫立场，初则不惜垂涕而道，陈情上书，继则派人集议，力求妥协，三则极度容忍，挥泪撤兵。在万不得已无可退之时，始进行严正的自卫，于是使反共派之进攻，不断被粉碎，而反共之阴谋遂不理于众口。反共派在理屈智穷之际，始以各种情报，包围重庆当局，竟下令新四军北移冀察。无论北移之事实困难甚多，下令者应有慎密之考虑，即在今十万国军让出敌后阵地，拱手交给敌寇一师，已属荒谬悖理，除日寇相庆外，人民则不胜其愁苦尤怨者矣。叶项军长于奉命之日，考虑者再，远察困难日亟，近观摩擦辅重，宁容忍以顾大局，乃不畏艰难险阻，决心北移，以息事端。查重庆当局，限令本军一月底北移，叶项军长于去年十二月初即分批启行。第一批行李辎重于十二月，支日先行，第二批工作人员及部队一部于

十二月无日继进，叶项军长就率军部及所属部队于一月四日最后启行。所选定路线均为叶军长及顾祝同上官云相面定者，顾等并决定开抵宁国时补发人饷及弹药，此为叶项军长奉命北移之铁证一。叶项军长临行前，告别皖南父老，将本军不能移动之修械所、医院、存粮二万余担，赠交皖南专署及红十字会使用，此为叶项军长奉命北移之铁证二。项军长、袁主任、周参谋长等夫人及军部各部处长先行出发之两批，均安抵苏北，此为本军决心遵命北移之铁证三。反共派让先头部队北行，布置陷阱，以待第三批而全力袭击之，其阴谋蓄意已久，欲得叶项军长而甘心，固彰彰明甚。

叶项军长率军部一月四日北移，取道苏南渡江，六日经茂林转泾县之南东开，七日即在鹿角山东流山凤里溪被围，顾祝同上官云相等指挥七万之众，重重包围，叶项军长事前毫无预备。故轻易即陷重围于穷山大壑中不能突出，叶项军长九日将被围情形电告重庆当局。经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抗议，重庆当局一面诡称电顾等解围，一面密令聚歼生擒叶项，叶项军长率部抵抗历八昼夜弹尽粮绝，始于十四日被歼灭，叶军长负重伤就擒，项副军长以下万余人同作壮烈牺牲。皖南事变于以造成。事变后，群情愤激，人心鼎沸，惟望重庆当局，平情处理，安定天下，岂料重庆当局，竟于十七日取消新四军番号，诬新四军叛变，自称整饬纲纪、贯彻命令云云，其鼓励罪恶，摧残正义之荒谬处置，直类疯狂行为。国法军纪已由重庆当局自行摧残遗弃，上无道揆，下无法令，国将不国，可恶孰甚！夫违令者顾等辈，遵令者叶项也。破坏纲纪者，重庆当局自身，而非本军也。蓄意倒行逆施，至于此极。则此辈心目中早无国家民族公理正义存乎其间，可断定矣。本军十万之众，在敌寇后方

坚持抗战，迄今巍然屹立，不可动摇。重庆当局意欲制造皖变以消灭之。重庆当局于皖变后，意欲以一纸非法令取消之，其弄巧反拙之伎俩，仅足供天下后世之笑谈，直无驳斥之价值。

夫日寇为中华民族之死敌，今不进攻日寇而以造成皖变闻；皖变后不引咎责躬，而以取消新四军番号闻；取消新四军番号后不稍自敛迹，略存悔愧于其间，而又以三十万大军东进剿共闻。其无意抗战救国，决心发动内战，公开宣布国共分裂，置国家民族不顾，任日寇逍遥于国境中心腹地，谓之出卖抗战断送国运也可，谓之破坏大局为敌作伥也亦可，直谓之祸国殃民，实行投敌联日剿共亦无不可，此诚抗战以来未有之奇变，国人于此可尽观反共重庆当局之心腹，作一正确之诸证断，本军无用其赘言矣！

夫国家法律军令顾等违抗之，当局又躬自毁弃之，夫国家纲纪顾等破坏之，当局又躬自破坏且加甚焉。如斯而欲本军之服从，则本军绝无服从之义务。本军不仅不再考虑北移冀察，则所谓纲纪法令，实便利反共派御用之工具，全国人民亦当思所取择。本军绝不因皖变而放弃本身之抗战责任，绝不因非法取消新四军而放下本军之抗战武器，且转将团结愈紧，而抵抗愈力，绝不因三十万大军进攻，而且隳其民族革命华中守土之神圣责任，势必与广大人民作共同努力之抵抗。一息尚存，奋斗不懈，敢为反共诸公告，且为全国同胞作决死之誓言也。

皖南事变乃重庆当局反共派断送抗战镇压抗战势力之冒险尝试，乃反共派镇压本军取消本军之粗笨尝试。此种非法的镇压与取消可由反共派任情尽性不分地域而重复以作为之，但在本军之反抗与继续奋斗必立即组成，且将发扬光大于宇内，则皖南事变之打击，固无损于本军日月之明。当抗战炮火之展

开，反共派将尝试沉痛而有力之反击，全国军民将称心快意于反共派之崩溃。而项副军长及其同志之民族革命殉难精神，可永垂不朽矣。

（三）本军今后之应变方针：一月二十五日新四军部恢复于江北盐城，全军领导建立，阵容更新。今进而宣布本军今应变之方针：孙中山先生遗言，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其努力垂四十年不懈，尝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垂训后人，则知中国革命事业，故须历尽艰难，终克有济，非可一跻而届也。当今之抗战，为中国革命之新进程，其攻击目标，厥为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固狡黠阴险之尤，其以华制华之阴谋，故未一日而惑志。三年来在其军事征服受阻之际，转而为政治诱降，政治进攻，吾党同人揭露斯旨，昭告国人盖历有年所矣。日本之诱降阴谋，不能诱惑抗战营垒之坚定者，特其中动摇之辈，则不营如斯响应，中国之反共派继汪精卫周佛海之后，先后辉映，乃为事实之不斯然而然者。皖变之主持者及重庆当局无论其主观见解愿望为如何，其决心摧毁自力更生，绝灭真正抗战人民势力，借反共以实施投降乃为其铁案如山，不可辩解之罪证。物理家恒言，镇压力愈大，反抗力必愈大。吾人除积极抵抗而外，固无所用其悲观消极者也。重庆当局欲以此消灭新四军，新四军必以更加壮大回答之，重庆当局欲以此杀灭叶项军长，叶项之精神必永存不朽，历万劫而不坏，重庆当局欲以此镇压革命新势力，保全其黑暗腐朽之统治，必适得其反，专横野蛮统治之结束，即恐在不远之将来。重庆当局欲以此投降敌寇断送抗战，必就遭受全国人民反对，而中国抗战必继续以趋最后胜利之前途。新四军同人于此应当奋勉鼓午，作更大努力之抗战。重庆当局所得者厥为万余

烈士之形骸，所失者为举世之同情心理。此举世之同情心理，行将集于新四军，则本军所获已多，敢不勉哉！

本军今正告全国同胞及国际革命人士，本军以新的阵容力行下列各端：

1、本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决心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共派奋斗到底。皖南事变，更鼓励吾人之决心与革命意志。

2、本军坚持与一切抗日党派长期合作，但对亲日派阴谋家及进攻我军之反共派必坚决粉碎之。皖南事变且更加强吾人力求团结抗战反对投降之决心。

3、本军不愿内战，不愿分裂，同时对内战分裂无可挽救之际，本军绝不退避，比任何方面更有大无畏精神，来消灭反共派之进攻。

4、本军坚持革命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之政治纲领，本军誓为革命三民主义之真正实行而奋斗。皖南事变的阴谋，绝不能阻碍吾人改革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之决心。

5、本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皖南事变不能阻碍此方针之执行，愿与全国抗战军队，各阶级，各党派合作到底抗战到底。

6、皖南事变乃亲日派反共投降派所主持，其头目则为何应钦顾祝同等败类，亲日内奸不除则抗战建国必无成功之理。宋明非亡于外寇，实亡于内奸，以古防今，发人深省，皖南事变之教训即在于此。全国军民应与本军团结一起，为肃清亲日派、反共投降派共同行动。

最后，吾人之参加抗战事业，原系尽国民天职及革命本分，故抗战革命为吾人分内之事，且为吾人之神圣权利。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处置，绝不能动摇吾人抗战革命之决心。吾人绝对

相信，最后胜利必属诸全国人民。为争取全国人民之胜利，本军当奋勇直前，不容稍懈。重庆当局已自丧失领导抗战之风度，已自暴露其反共投降之真相，则本军今后当独荷抗战巨艰以底于成。重庆当局之处置如何，可视为笑谈置之可也！

（原载：《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大学编　1957年）

就职（代军长）演讲词

陈　毅

江淮社二十八日专电：新四军苏北指挥官陈毅将军，受全体指挥员之拥护，及奉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日命令，于二十五日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就任代理军长职。发表就职演讲如下：

各位同胞各位同志：今天是各界同胞抗战军队，在这里举行庆祝军部成立的大会，这在中国抗战中，革命史上以及将来都是一件大事。我想只要是抗战的爱国的同胞，听到新四军军部恢复，一定也会象诸位一样的欢欣与热烈的庆祝，仇恨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反共顽固派与亲日派。因此今天新四军军部的恢复，是直接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前途。这不仅是兄弟个人、刘政委、张付军长、邓主任、赖参谋长，几个人在这里就职问题，而是全国抗战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几个人只是作为一个代表，代表出来讲话。我们要很好的完成抗战革命的大业，还要依靠各界同胞和所有抗战军队共同担负起来。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一致团结的力量，我想我们几个人大胆的来就职，一定能够负起责任来，而且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鼓掌）一定有把握打倒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全场鼓掌）这是一个光荣的责任，它将直接有力的使中国抗战革命取得胜利。我们可以告诉亲日派和反共顽固派，新四军是不能取缔和消灭

的。反共顽固派一月十四号消灭了军部，但是一月二十五号我们的军部又成立了。皖南新四军被歼灭了，但是新四军在安徽、湖北、江苏、河南，仍继续存在，而且会更加发展和壮大，这是一定会使亲日派反共派感到失望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大会，有坚持抗战最大的政治意义。

我想在这里讲一讲新四军的问题。新四军是一个什么队伍，在座的同胞和同志们都知道得很清楚的。在新四军成立那一天起，兄弟就在新四军工作，直到现在十四年中都没有一天离开过。在民国十七年冬天就有了新四军（新四军前身是老四军）。大革命失败了，反动派破坏北伐革命，不愿意实行三民主义，与北洋军阀勾结，爆发反革命的清党运动，在南京广州擎起了反共的旗帜，一方面反共，一方面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人民与中国革命的事业。亲日派、反共顽固派头子，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想一想：在这十四年长期的历史中，是不是消灭了新四军——中国革命的军队！事实证明他们是失望了！（全场鼓掌）叶项军长、朱彭司令、毛泽东同志，在过去为了建设中国工农红军整整奋斗了十四年。反共顽固派动员了几百万大兵，经过了六次围剿，都不能消灭我们；顽固派着急了，抵不住了，只好拿下反共的招牌来合作。大头子被捉去了，还是周恩来去讲情放出来的，难道忘记了吗？

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只带了八百多人上井冈山，就发展成为今天五十万大军。这样干下去是一定会胜利的。新四军的前身是南方各省的游击队，那时全部只有二千多人，因当时在残酷的斗争中，还受到损失。项英同志和兄弟在一起，在广东、江西交界的一个山上，只有二百多人。三年后，新四军发展到九万人，今天九万人还被他消灭吗？要被消灭，

在大革命失败时就可以被消灭；在三年游击战革命失利的时候，也可以被消灭，但是没有被消灭，相反的是十倍百倍的壮大与发展。今天新四军有九万人马，四五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近一万万的人民拥护。谁想来消灭他，谁就要失败。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他是最坚决的，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中华民族一天不解放，中国人民一天不解放，则新四军必然会发展，是毫无疑义。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革命民众的帮助，爱国同胞以及成千成万的青年的加入。虽然在斗争中有牺牲有伤亡，但是新生的力量继续的涌入我们的队伍，使我们愈加强大了。新四军是由优秀的分子组成，是代表抗日民众利益与要求，始终保持着和高举着这面抗战的大旗，坚决的抗战到底。有了这面大旗，这便是不能战胜的力量之根源。真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越打越强！正因为这样，所以重庆当局的亲日派、反共顽固派，看见新四军不可抵挡的发展，所以要来打新四军。他们不愿意抗战，与日本鬼子勾结起来，消灭取消抗战有功的新四军，这不仅是与新四军作对，而且是与中国抗战作对，和四万万老百姓作对！新四军有四万万抗日的老百姓的拥护，是一定会胜利的。今天新四军军部成立，受着苏北各界同胞的热烈拥护。我们的同志要明白我们的责任，是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的大旗。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新四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皖南事变后，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的命令——取消新四军，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恢复军部。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

抗战的命令！（全场鼓掌）重庆当局制造皖南事件，取消新四军，这完全是双簧，后面有日本鬼子发命令。同志们！我们要反对重庆当局的非法令，反对他们就等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各界同胞要了解，重庆当局变了。在皖南事件以前，重庆当局还是领导抗战的；皖南事变以后，他不打鬼子，欲消灭新四军军部，取消新四军，发动二十万大军进攻我们。不愿领导抗战而领导内战，破坏抗战了！重庆当局负责的虽还是那几个人，但是变了，很快的会撤去抗战的招牌了。汪精卫不是堂堂的付总裁、行政院长、国民参议会的议长，他公开的讲反共，他就变成汉奸了。皖南事变以及取消新四军番号，就是重庆当局改变其抗战国策的证据！这完全与汪精卫的改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成立军部，就是要和他们作对到底。

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新四军十四年的历史，是为全中国谋解放的历史。新四军是为着老百姓的利益，为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文化界、教育界及公正开明士绅的利益奋斗到底。新四军是与军阀、腐烂政客、卖国贼作对到底！“中国人”三字的解释，应该是真正爱国的人，才能算是中国人。爱国的士绅工农青年妇女，这是十足的中国人。过去的封建军阀、汪精卫、政客、党棍、韩德勤、李守维……他们压迫中国人，与帝国主义勾结，高高在上，把我们老百姓踏在脚下，自命为高等华人，把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经常同日本帝国主义勾通；这些人不是中国人，不让他们冒充。各界同胞是清楚知道的，我们苏北，被重庆大头子的徒子徒孙搅得一塌糊涂，新四军当然要与他们坚决作战到底，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所以新四军主张民主政治，提倡文化教育，组织民众，减轻苛捐杂税，军民合作，提倡革命的艺术，正当娱乐，

这些是与他们相反的。他们取消和压迫新四军，就是要夺去老百姓的自由平安的生活。现在汤恩伯、李品仙带了大批没有纪律的军队，要跑到苏北来发洋财。上官云相带了反共大军把新四军军部打垮了，在一月十五号，他的军队就开进了云岭、泾县、铜陵、繁昌，三年来新四军所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顾祝同说是去剿匪去，就是去摧残民众团体，去剿老百姓，说他们是勾结新四军，是犯法的。顾祝同不但要消灭新四军，而且要消灭老百姓。日寇也出动了大兵，配合起来夹击新四军，打得非常好看。这是因为新四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顾祝同要压迫老百姓，就先要打新四军。今天我们新四军军部的成立，也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我们一定能打垮他，一定能粉碎华中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二十万大军的进攻。我们华中的老百姓，一定要团结起来打垮他们，我们才能抗战到底，过太平日子，不受压迫。最近我们盐城的九区区长，他不是当官的，是替老百姓做事的，现在被韩德勤绑去了。因为韩德勤不准他替老百姓做事，要替他压迫老百姓。我们新四军军部成立，我们几个人的就职，我们是坚决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到底。我们相信，有了军民一致团结的力量，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今天军部成立，各位同志要了解我们新四军和其他军队的不同，是我们新四军有政治委员制度，有了这个制度，我们几个人一定可以担负得很好。新四军一定可以由几万人发展到十万二十万，因为新四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新四军的每一个战士，不是为了做官拿薪水，是为了民族解放。他们的非法命令，新四军可以不接受。因为新四军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政治委员的制度，有政治部，这是保证新四军永远为革命事业，民族解

放事业奋斗到底，不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压迫欺侮老百姓，不会失败。我们今天军部的恢复，还要庆祝我们的政治委员就职。在抗战三年前，我们与重庆当局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主张全国抗战军队，都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不但是军官指挥，而且是政治委员来指挥。重庆当局的亲日派汪精卫不肯，因为有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就变成真正的国家的军队，私人要利用军队去做反革命投降，就做不到。他们要造成家兵家将，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要抗战就抗战，要投敌就投敌。新四军就决没有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委员的领导。现在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我们的政治委员。我们军事工作人员只管训练军队，如何拿枪瞄准，如何包围迂回；政治委员就指挥我们如何打，打谁，打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打亲日派，反共顽固派，不能打老百姓，所以新四军是最可靠的。今天我向盐城各界同胞贡献一个意见，庆祝军部成立，一定要立即在全国抗战军队中，实行象新四军一样的政治委员制度，才能保持抗战军队不会被野心家阴谋利用，去作为压迫民众、投降日寇的工具。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一。他有二十多年的斗争历史，中国的工人运动，就是他一手领导起来的。他不但为了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奋斗了二十年，而且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已经奋斗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历史。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北，他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同志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胜利的，因为在政治委员领导之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我们能依照中共的政策做下去，我们好象

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的达到目的。我们军部今天成立，就更要加强军队的政治领导，拥护政治委员制度，我们军队一定能够百战百胜！

同胞们，同志们！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九万人的强大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反共派所得并不得，他却失去全国人民的同情，引起全国军民的抗议，对比起来，坚决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希望大家努力！（全场鼓掌三分钟）。

（原载：《江淮日报》，《皖南事件专辑》江淮日报社编。此处录自中国人民大学：《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资料选辑》1957年）

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

陈　毅

四年抗战，我新四军以坚忍不移的意志，突入敌后，转战大江南北，恢复华中大块国土，而开辟创立了数个抗日根据地。纵任敌伪之疯狂进攻，亲日反共派之妖氛重压，终不能屈折我们坚强的抗日贞志。在中共中央英明领导之下，我们新四军始终贯彻一致地高揭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义大纛，以铁的步伐，踏破困难，迈向辉煌胜利之前途。今日，新四军已成为中国人民团结的模范与抗战的前卫。

皖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万人，大部被歼，军长叶挺因向对方周旋，负伤被俘；付军长项英，政治主任袁国平至今生死不明。事变之翌日，立即有一一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接着是三十万反共大军从鄂豫两方并进，向新四军大举进攻，南京徐州武汉敌伪军亦同时出动，向新四军地区扫荡，一时在新四军所有地区都被攻击而进入残酷战争的状态，此种先击破首脑部从而分解肉体，优越的进攻计划，无疑义置新四军于最危险的境地。敌寇及亲日派同时以消灭所谓新四军残部相号召，而同情人士莫不感到惊惶，关心新四军的前途。在中共中央英明处置之下，一月二十八日于苏北建立新的军部，立即应付时局，着手突破难关。此时总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日寇扫荡，予以坚决的击破，对亲

日派的反共政策及其对我军之军事进攻，则坚决抵抗，以达到坚持抗战镇压投降的目的。对友军中不明大义受人煽惑的挑衅行为，则采取一再退让的办法来促进对方觉悟，只在退让无效而危及自己根本生存的时候，才采取严肃的自卫手段；一待对方退去，本军又继续待以友好态度，力求再度实现抗战的团结。本军在豫东对汤恩伯部，在皖东对桂军莫德宏部，在苏南对冷欣部，在太湖沿岸对忠救俞作柏部，均采取此种办法，绝不开衅，绝不向其进攻。皖变爆发，群情鼎沸，本军在苏北对韩德勤部未派遣一兵一卒向其进攻，该部得保持至现在，此皆本军顾全大局不采取报复行为之充分明证，且为当地人民及地方士绅所共闻共睹。

我们认为平常时期讲团结是极容易的，在自己受着无理压迫又当着可以寻找报复的机会，而能压抑愤情，力持镇静，为大局着想，以最大忍耐挽救危局，不动摇自己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方针，此种宽大胸怀，非具有革命的政治远见与对民族抗战团结的高度真挚之忠诚所不能为。对方，因皖变中取得反共的侥幸胜利，即以“剿匪”军事顺利，大吹大擂，硬干到底，企图乘人之危，包围与歼灭新四军。从两方面事实上的表现对照起来，真不难了解新四军今天于抗战团结曾尽了最大努力和最大赤诚。

如果问新四军今天从皖变以来的危急中摆脱，有什么宝贵经验，那我们正面的回答，最大的一点，就是于最紧急的关头，能以自己的坚持团结的精神回答对方分裂行为，绝不因为别人的反共分裂行为，动摇自己对外抗战对内团结的方针。同时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则大义所在，自难忍让，绝不偷安苟且，同流合污，因此对一切破坏抗战的行为，均采取坚决

的自卫斗争手段。我们实际的经验指出，必要的让步与适当的自卫斗争，均是达到坚持抗战，达到巩固团结的不可欠缺的措施；过度容忍让步，只能助长投降势力的发展，必至使抗战失败。同时我们又绝不过分苛求，宁委曲以求全，隐恶而扬善，责己也重，责人也轻。这是我们皖变中的经验，并以贡献于全国抗战的军民。我们此种临危不乱的团结精神，虽然付出巨大牺牲和流血的代价，但最终克服了反共投降的危险，保持了抗战大业的仍然继续。在斗争中新四军以团结全民族的模范行为，产生了十分雄伟的力量，使它已能巍然独立直至现在。

新四军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进入大江两岸担任抗战任务，其遭迁之艰难困苦，约有如下数端：以敌情而言，则当平津京沪应城徐海重镇逐渐失守后，敌之海陆空军无一不可随时出动联合进攻；以地形而言，则长江地区，湖泊湿润，水道纵横；以交通而论，公路之横截，既无崇山峻岭，又少茂林修竹，除了人民可以依靠为助外，无一有利于我；以装备补充而言，本军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本军为国军，经济制度最初每月给经费八万元，二十八年春增加至十三万五千元，是时本军实有人数万余，每人月饷不及四元，而后本军人数增至十余万，每人不及一元，特别从民国二十九年秋起，每月十三万五千元亦完全停止；以军医设备而言，本军完全依靠国外侨胞与国际同情者之援助，三战区之陆军医院，历来拒绝收容本军伤病员，其理由为“防止赤化”，本军残废的荣誉将士，经其批准送往休养者，亦遭排斥，而于皖变中竟遭杀害。本军这些痛苦，实已出人意料之外，然而本军从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抗战职责。以四年来的战绩计：作战四九六七次，破坏五四五次，缴获步马枪四八〇四八支，轻重机枪一六四四挺，掷弹枪

一九八挺，大小炮一四四门，战马二一三二匹，日本大衣五八六六件，生俘日兵九二名，伪军五四七九名。此一统计，仅系根据皖北指挥部及苏南指挥部的统计，系很不完全的，全军正确统计，在皖南惨变中全部遗失，抗战文献功勋毁弃，良可痛惜。然仅此一残缺的战斗纪录，已足以供证亲日反共派一切谎言之无耻，亦即敢以告慰于国家民族和全国同胞对我军之热望于万一。

皖变发生，一月十七日取消本军番号之后，本军对抗战的职责仍未放弃。一切外来之横途，反更加激增了本军抗战的意志。二月十七日，鄂苏皖游击军付总指挥李长江在苏北泰县率所部二万人叛变投敌，无论重庆政府当局及三战区顾祝同、苏鲁战区韩德勤，事到目前，均束手无策，本军正当皖变之后，仍令我粟一师全部，不顾本身厄难险困，自动挺身讨逆，血战两周，攻克泰昌，击溃敌军从江都镇江增援之部队数千人，李逆长江仅以身免。是役本军缴获敌之枪械，在四千以上，俘获敌伪五六十名，击毙敌伪在二千名以上。李逆长江部二万余之叛变投敌，开辟抗战以来之新纪录，本军于被取消番号后，毫不踌躇，自动执行神圣抗战讨逆任务，亦为抗战以来全国军队中所仅见。三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本军第二师在津浦路东反扫荡之役，血战一周，击溃敌伪军七千以上，保全了津浦路南段西侧十余县国土。二月初至六月初，我皖南突围部队所编成之第七师，在巢湖以南地区，在皖南铜陵繁昌地区与敌作战，先后二十余次，保全了巢县、无为、庐江、铜陵、繁昌等国土，至今不被敌伪所犯。此种虽遭大难犹奋勇抗击敌伪的精神，最为刚毅可贵。我第六师在苏南京沪线，第三师在淮河地区×阜地区皖东北地区连续与敌寇不断接触纠支（缠），使敌

寇陇海线京沪线运输不便，运河线长江线水运受阻，保全了广大人民的安全。我新四师在津浦路西萧县、永城、蒙城、涡阳、宿县、铜山一带，一面遭受汤恩伯大军之反共进攻，一面遭受徐州敌人之侧面扫荡，经过三个月奋战，我方死伤代价三分之一，始终未向敌人却步，保持我阵地不动。我第二师位于大江之滨，竭向敌寇之武汉重镇××××平汉线钳制长江汉水之敌，确又与本军各师远离，作战境地更为艰苦，战斗亦频繁，迄未停止。本军不仅长处敌后，长被包围，无喘息整训机会，且常受国军中反共成见甚深的部队之迫攻，此种情状，已极人世之难，全国军队处境无如本军危险之甚者！今将自皖变以来一月至六月与敌作战次数及缴获列下，以告国人。

作战次数　　三七二次

缴获：

步马枪	一一一二六支
驳壳枪	二二六支
手枪	四八支
掷弹筒	八三个
轻机枪	一三八挺
刺刀	三把
步马枪弹	四八一二二粒
驳壳枪弹	五〇七粒
手枪弹	二二八一粒
手榴弹	四三八个
各种枪弹	二四三个
电话机	三一架
自行车	八九辆
电台	一架

	军旗	一一二面
	爆布汽船	三艘
破坏：	破坏桥梁	一二座
	汽车	××辆
	破坏公路	二八三里
	电线	一〇〇斤
	击落飞机	一架
毙伤敌伪		六六九二八名
俘敌伪官兵		九八四三名

这些胜利收获，是我新四军全体军人从半年苦斗中付了相当大的伤亡代价取得的，让那些恬不知耻的造谣专家们胡说吧！我新四军是否如此辈所谓“游而不击”，有良心的正义人士自有公论。

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与敌后抗日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没有理会当局解散新四军的乱命，我们违反着亲日投降派的意志，在华中敌后广大地区内坚强的存在发展着。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顽强的战斗着。我们根据抗日人民的意志，实行我们武装抗日的神圣权利，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实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权利，并与千万以上抗日人民共同执行我们这种抗战建国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相信，新四军是会在抗战中，继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皖南事变，只能加强我们战斗的意志，增涨全国抗战人民对我们的同情，决不能阻止新四军的发展。我们在敌后抗日人民要求进步的意志之下，除努力建设自己的军队之外，还以一切努力开展了各项福国利民的设施。

我们欢迎各地青年来新四军中参加抗日事业，我们很盼望

各地热心救国的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机关办事人员来参加新四军的工作，参加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欢迎各地革命的青年，来到苏北皖东皖北的抗大鲁艺及其他学校，不要任何介绍，不拘什么资格，只要是爱国的青年，来到新四军活动的地区，一律保证入学，一切待遇条件，同延安抗大一样。各地人士来新四军者，如果是从香港、上海、汉口等地起身，只要能到海门、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泰县等地即可。向东向北走出敌人据点以外十里二十里的乡村即可找到新四军或地方的抗日政府，能打听到新四军活动的地点。或者到扬州天长以西，六合以北，在津浦路的滁县明光以东以西，无为县附近，芜湖区附近，洪泽湖的四周地区，及徐州宿县以西，萧县永城地区，均可找到或打听到新四军。在汉口至信阳附近，沿平汉路两侧乡村，亦可找到新四军。长江沿岸各港口与上海经常有小轮船帆船来往，津浦沪宁各地，经常有车来来往往。在上海即可探知到海门、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泰县、六合、滁县、明光、蚌埠、徐州、芜湖、无为等敌占城市的办法。由这些城市到新四军地区，虽然要经过敌人的检查，但只要应付得稍好一点，是没有危险的。如能取得利用伪政府通行证则更好。我们盼望各地抗日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自动的找办法来本军，不胜欢迎之至，并保证一定能找到抗日救国的工作做或入学校读书。我们这种措施，社会人士咸谓为和平时代别人所不能为而新四军在抗战困难期中，能尽力为之，且达到尽善尽美之程度。并谓新四军不仅作到抗战模范，即建设一端，亦胜过前人。此为苏皖人士之公言。一切皆据事实，毫无虚举溢美存乎其间。

本军驻防地带，一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家生活初步改善，

一面实施交租交息，使富人收入适时不缺。一面改善工人待遇，一面提高劳动纪律，使劳资双方都各得其利，抗战内部团结，在于维持其平，凡使任何方面引起纠纷之处置，皆本军所不取者也。

本军地区的抗战法规，期望人民全体遵守。本军首先即为奉法守法之模范，不非法搜查人民，凡非法逮捕人民并审讯者，应受军法治裁于人民，此种处置，造成各根据地内军民之协和共处，各安其业。抗战以来，其流亡他乡者，大半归家，更为事实所力证。

本军地区之日报，计有二十七种，周报月刊及半月刊共四十余种，部队报纸计四十余种，油印报纸，以区乡部队计，约二百余种，是主持抗战文化之各级文化团体所主办。有专门培养文化干部之鲁艺华中分院，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有三，东南最高抗战学府之江浩大学，正计划创办，明年今日，即当开学。在文化运动上，内容确定为民族性，科学性，和适合大众要求。中小学计有四千二百余所，共有学生二十余万人，均在本军掩护之下，照常授课，不受敌情所影响。小学教师之待遇，业已改良，且与教职员抗战月会，作为保护其本身利益参加抗战工作机关外，教师均有代表列席各级参议会，且居重要领导地位。

各种小型工业，均在本军地区内次第兴办，如纺织业火柴业皮革业造纸印刷等。大小商业均次第恢复，门面一新，在新四军地区，准许出口之货物，只纳税者，保护其安全运输，通行无阻。

一面抗战，一面建国，乃新四军奋斗之总方针。四年来，本军言之必行，行必贯彻以终。虽因时局影响，成就不大，而

一切以福国利民，争取抗战胜利为依归，则此心此志，自问无愧，瞻望前途，益当奋勉自励！

皖南事变之危境，以时局之推动，使新四军踏上新的阶段，作战境地，遍于敌后四省，本身编制，超过七个大师。正面来攻敌寇之数量，达到敌侵华兵力六分之一。华中敌后抗战任务，全部放在本军身上。本军过去仅只做到模范游击兵团之程度，今则业已走到正规化的大兵团的阶段。此种集团大军，其任务，其编制，其补给，其行动，其数量质量均与往日游击兵团实有新旧时代不同之概，本军抗战职责所负之重，真堪与全国各战场相比。

苏德战争爆发，世界政治进入新时期，战争置以新面貌。中国抗战，实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一部份，中国民族利益与苏联民族利益愈益密切接合起来。保卫苏联，即所以保卫中国；坚持抗战，发动反攻，即所以援助苏联。国民党蒋总裁于“七七”四周年纪念日宣称世界业已造成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两大分野，指明利于中国抗战胜利且提出阻止敌寇南进北进之任务。国民政府复有与德意法西斯国家绝交的严正表示，中共中央同时作了坚持抗战援助苏联的号召和加强国内团结扩大抗日力量的指示。新四军同人，站在两个伟大号召之下，切实整顿自己，作反攻的准备，待命出动，愿用一切力量，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为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为打倒法西斯侵略恶魔，保卫苏联，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与民主！

（编者注：陈毅同志此文因收到时有数处电码不明，恐有错误遗漏之处，概由本社负责。）

（原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卷第八期
1941年8月25日）

附：新四军东进抗日记略

1937年7月7日—1943年1月20日

1937年

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

9月23日，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抗战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八省（湘、浙、闽、赣、粤、鄂、豫、皖）十三个地区（浙南、闽西、闽北、闽东、闽南、赣东北、闽赣边、粤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11月11日，上海失陷。

12月13日，南京失陷。

1938年

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长江以南的为第一、二、三支队，以北的为第四支队）。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

3月，一、三支队先后于岩寺集中。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

4月4日，军部由南昌移岩寺。

4月中旬，二支队到达岩寺，司令员为张鼎丞、副司令员

为粟裕。

4月28日，从一、二、三支队抽调部分团以下干部和侦察连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同志率领，挺进江南敌后作战略侦察。

5月中旬，一支队离岩寺，经茂林，北上南陵。

6月1日，一支队从南陵出发，越芜（湖）宣（城）封锁线，东进高淳。

6月14日，一支队到达茅山，立即展开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

6月17日，先遣支队卫岗首战告捷。

7月1日，新四军军部北移皖南泾县云岭。

7月，二支队到达宁（南京）芜（湖）铁路以东、宁（南京）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

一支队于宝埝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二支队成立了“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

10月25日，武汉失陷，日寇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对蒋介石改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集中兵力对付我军。

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投敌。

1939年

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加紧推行防共、反共方针。此后，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是“越界活动”，进一步限制我军活动范围。

2月23日，周恩来同志抵皖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继续东进北上的方针。

5月，一支队六团在叶飞同志率领下，以“江南人民抗日

义勇军”名义，东进镇江、苏州、淞沪三角地区。

夏，一支队派部队开辟了太（湖）漏（湖）地区。

6月下旬，叶飞同志率“江抗”夜袭上海郊区虹桥机场，烧毁敌机四架，震动中外。

10月，二支队四团在陶勇同志率领下经扬中北渡长江，改称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挺进。

11月7日，为了更好地向东、向北发展，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江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同志任正副指挥。

12月，国民党顽军开始进攻我陕甘宁边区中央所在地，不久又袭击我太行区八路军总司令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江抗”与丹阳县游击纵队合编为挺进纵队，向苏北泰州、扬州地区挺进。

5月4日，中央指示东南局：当顽固派以反共为投降作准备的时候，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要坚决以斗争制止其军事进攻，争取时局好转，陈毅、粟裕等同志坚决执行这一指示，立即在大江南北敌后战场全面部署反对日伪顽进攻的斗争；而项英同志却长期株守皖南，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以致造成后来皖南事变的严重损失。

6月28日，郭村保卫战开始，经一周奋战，取得胜利。

7月8日，陈毅同志率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7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同志任正、副指挥；同时，在苏南重组江南指挥部。

7月29日，挺进黄桥，成立“通（南通）、如（皋）、靖（江）、

泰（州）执行委员会”。

9月13日，解放姜埝。30日撤离姜埝。

10月3日，黄桥战斗开始。

10月10日，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师盐城。

11月，华中总指挥部在盐城成立，叶挺同志任总指挥，陈毅同志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叶挺同志未到江北时，由陈毅同志代理总指挥职务。

1941年

1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惨案”，叶挺同志负伤被俘，项英同志惨遭叛徒杀害。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反革命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

1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同志代理军长。不久，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均属新四军序列。

（原载：《革命文物》1978年第3、4期）

在“七一”纪念晚会上的报告（节选）

陈　毅

……当中共创立之日起，党还处在马克思主义小组时代，即有人主张将党保持为纯粹的学术团体，不作实际工作，当时党克服了这一偏向，坚决走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毛泽东同志那时即在湖南开始工农运动，即是一例，这是我党创立之日起，即采取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正确路线。

当民国十二年到十六年，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最初关于是否同国民党联合问题，陈独秀采取右的路线放弃了自己立场，而张国焘则采取“左”的路线，反对国共合作，只有毛泽东同志同其他同志等主张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联盟，应加入国民党去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其次，民国十六年党的五次大会前后，党内关于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争论，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勾引对革命动摇的一些人，掉头压迫工农。而工农阶级因未得到革命实际利益，开始对革命不满，特别是农村的农民所受压迫未有丝毫改善，要求革命深入实行土地革命，以巩固革命势力。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在湖南五县农村调查，主张实行解决土地问题，以扩大和巩固联合战线，以挽救大革命的危机，陈独秀不能接受，反而斥责工农运动“过火”，对工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第三，在大革命最紧急时期，毛泽东同志

主张党建立自己的武装，发动游击战争以开新的革命形势。陈独秀则主张放弃实际革命工作，回到书斋去研究他的取消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主张首先在湘粤赣闽诸地实现了，遂开始了以后以江西为中心土地革命时代。土地革命（民国十六年到民国廿五年整整十年）伟大的成就是不但保护了中国革命的传统，而且使党在极反动的时期中占领了革命阵地，创造与锻炼了强大红军，创造了革命的新的战略战术，有了政权工作、群众工作和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及以后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和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特别是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形势非常紧急，都赖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得以平安渡过这难关。

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党即完全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对抗战对民族解放事业作了空前伟大的成就和贡献，顺利的完成了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转变。只有张国焘一个人落伍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个特务。抗战以来我党坚持对敌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尤其敌后抗战最为艰苦，均能渡过重重难关。同时我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分裂，排除万难，始终保持了合作局面。毛泽东同志在党内提出整风建党的方针，都是极有远见的英明指示，——所以我们已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正确的中央，是百倍的提高了我们战斗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原载：《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单行本）

伟大的二十一年（节选）

陈　毅

……因此廿一年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过的布尔塞维克的党。他的党员和干部，他的领导中枢，党的中央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都是久经锻炼能征惯战，基本上已经走上完全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对一切斗争环境均能适应，一切斗争方向均能掌握。最初中国共产党要依靠西欧的理论，自己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建树的。廿一年的实践中，完整的发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个中国革命规律证明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问题只有依靠马列主义原则才能正确解决。这个中国革命规律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发现所提炼的，可是他又丰富了补充了发展了马列主义原则。马克思时代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代，马克思的伟大的创造力，在于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列宁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与革命战争时代，列宁的伟大在于具体的解决了无产阶级为革命前革命后建立专政和巩固专政这一伟大的革命课题。斯大林的任务是继承列宁的任务，如何去解决一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巩固这一建设问题，以及发展这一建设的问题。但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地问题均已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立场上作了原则的考察。而且有了基本的原则指示，这指示正是中国共

产党行动的根据，也是其能取得胜利的原因。可是无论马、恩、列、斯，他们除基本的原则指示而外，他们并没有更具体实际的替我们解决中国革命全部原则问题与全部实际问题。这个运用马列主义来全部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任务，不能不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二十一年来的实践由于全党的努力，特别毛泽东同志的天才走得更远，这一问题是开始获得正确的解决。

举例来说，比如：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动力，前途，以及相应而引起的革命战略策略诸问题，特别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对待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问题，中国革命民族民主的两重性问题，历来在国内外以及中国党内外均是争辩不休的问题。只有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他的两面政策，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确定了中间势力的地位，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应采取针锋相对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开始揭穿了历史之谜，彻底的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长期斗争历史，所以人与人斗争的这一类知识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丰富。但在人与自然斗争这一类知识属于生产和自然科学这方面的知识，近三百年中国远远落后于欧美，人们每每看见后者的现象，遂连带否认前者，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以中国为最复杂，最丰富，没有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绝不能理解的。我党在二十一年内两次与资产阶级合作的经验，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发掘之下，正确建立了联合与斗争的理论系统。这正是马列主义的战略策略学说上的新发展。

又如：在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的问题上，特别其中的战略

战术方针上，这是一个历来的大的争论问题。不仅发生于党内而且于党外，就是在苏联的军事家中也有不相同的见解。十多年来依违于苏联经验，北伐经验，欧战经验之间，傍徨歧路，无所适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十多年的实战经验获得了正确的解决，提出了以弱敌强、以被动对主动、以分散对集中、以农村对城市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与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的战略战役方针。提出了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联合运用的战役战术方针。提出了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游击时反对游击主义。这些正确的新的原则正是得力于十年来的战争实践，解决了争论问题。依靠他在战争中打了胜仗，反对他的又在战争中吃了败仗。这不是平常军事家或者一本兵学书上可能解决的问题。

又如：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理论和建设问题。列宁、斯大林根据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苏维埃的经验，灵活运用，创造并确定了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的形式和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遂获得新的完整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根据苏维埃的理论和经验，根据中国共产党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的经验，能够很熟练使苏维埃成为半殖民地的工农民主专政武器，这又是苏维埃政权理论上实际上的新发展。

又如：关于建党的问题。马克思时代已创立了党的学说，但工会与党的界限并不清楚，党与工会是混同的。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创造了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党的学说。斯大林则最善于进行党内两条战线斗争去保护党的原则党的组织及其战斗力，更把马列主义建党的学说发展到更丰

富、完整的地步。但马恩列斯建党的学说均根据西欧各国的条件，坚决反对把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主义传染到党内，反对把第二国际党内的极端民主化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的习气滋生在党内，故特别强调铁的纪律，强调民主集中制。我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来建立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二十一年的经验教训，在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组织领导上的家长主义、惩办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调和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斗争中，获得伟大的进步和创造。比如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几年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主张锻炼党性，锻炼党员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发扬党内民主，保持党内原则的高度的统一；特别最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倡导的整顿三风运动，发动了全党的思想上教育上的革命，讲到全党同志的思想的深处和最里层，这更是伟大的创举，影响我党本身及中华民族将不能计量。这种建设党的理论和办法无疑义是根据着马列主义建党的原则，可是又不是照抄书本，而是充分根据着中国民族的特点，根据着中国党内的实际状况，具体灵活的运用了马列主义武器，发展了马列主义武器。刘少奇同志许多关于党的论文，恰可作全党在这方面极优秀的代表。换句话说，马列主义建党的原则如今落在中国共产党手上变成活生生有肉有血的东西，变成了全党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变成了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有力的武器。这是我党历史上所没有的创举，就是在世界各国兄弟党中也不常见这样新颖而正确的先例。

又如：关于正确思想方法问题，对待西欧新学术问题，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问题，中国学术思想的改革问题，中国革命建国的理论实践问题，这些问题是几十年的新旧争论不决的问题，据我所知五十年前有张之洞、叶德辉、辜鸿铭、严复、康

有为、梁启超等的中西学之争，往后有孙中山、康有为民主革命与君宪改良之争。往后五四时代又有蔡元培、陈独秀、鲁迅、林琴南、王国维、丁文江、张君励等新旧文化与科学玄学的争论。再后有普罗文学中国社会史等论战。这些争论表面是新旧之争，其实质是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之争，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争论。其政治上阶级属性，是包括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三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确切反映。这样复杂错综的思想斗争先后表现了几种倾向：第一是完全保守封建传统的闭关主义，主张排斥欧化拒绝任何些微的改革，这就是封建主义的代表。第二种倾向是全盘承受欧化出主入奴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倾向，或者换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买办性在思想学术界的反映。第三种是新旧调和维持现状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依违两可于新旧争论之间。第四种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正确吸收外国的经验，正确运用民族传统，正确联系理论实践，根据人民大众要求彻底进行改革的革命倾向，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后来居上的主张。从五四时代才开始正式走上政治文化的午台，以李大钊、鲁迅、毛泽东等为最优秀的代表，是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具体灵活的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这就正确解决了几十年的学术思想的争论问题。在五四时代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主办《湘江评论》时即一面反对当时最时髦的洋八股和守旧的顽固派而主张实事求是彻底革命。而后在大革命以前即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与党内舶来品教条主义对抗。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转辗游击于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思想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

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最后，是在抗战之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乃是一百年中国学术思想上及社会实践问题上，其中新旧争论的最正确的解决。这是一本马列主义的新创获的著作，也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古典的著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光荣代表。一百年来的中华民族是最受苦难的民族，在长期斗争被人家击败爬不起来的民族，精神上思想上作了舶来品的俘虏，失掉了民族的自尊心，和民族的自信心，中国资产阶级的新学派，正代表着这个倾向；另一面便是顽固守旧夜郎自大的夸大狂，阿Q主义的主张。这两种主张无例外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内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都或多或少是上面两种倾向在党内的传染。党在遵义会议以来的一切设施和教育，一直到最近整顿三风便完整的正确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他不仅于全党有意义，且于全民族有伟大的意义。……这些一切已足够说明我党二十一年全党和毛泽东同志在艰难困苦中，在失败挫折中，在与自己的错误斗争中，在与强大敌人斗争中，其创造其成就的伟大。

我们只就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二十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不仅于中国有意义，也于国际方面有其重大的意义。其教训中的某些方面，甚至可供其他各国的取法。比如在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于统一战线策略，对于革命战争策略，对于建党的经验，取法于中国党是完全可能的……。

（原载：《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单行本）

论军事建设

（华中局扩大会军事建设报告的一部分）

陈　毅

胡服同志在扩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我党我军今后在华中工作的总的政治任务是："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及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同时为了执行这一总的政治任务，又提出九大工作任务，军事建设工作是九大工作任务之一，其具体内容是："要切实依照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指示，来继续提高主力军，加强与扩大地方军，广大的建立与训练人民武装，建设与提高兵工生产及正确指导各种战斗，只有建设强大而精悍的军事力量并培养很多很好的指挥人材，才是我们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最可靠的力量基础。"我在报告了华中敌我友三方具体情况及几年来实战经验之后，现在进一步根据这一总的任务决定，来具体提出军事建设的各项工作。

一　一年来建军工作的一般检讨

几年来军事工作的成绩和弱点，在胡服同志总的报告中已正确而扼要的一一指出，无须在此重复，但应略作下列补充：去年军部重建后，华中局及军分委建军工作讨论会已指出新四

军建设的新阶段，即皖南事变后予本军以严重锻炼和试验，“本军突破了被包围的危境，取得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阵地的伟大胜利，本军本身较皖变前反而更加充实壮大，完成了全军铁的统一，由游击兵团提高到正规军团的阶段，由无数小块游击区形成了一片宽广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当时根据这一估计提出建立正规化党军的任务，规定了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地方武装工作作为三大建设内容。同时又指出建军工作是伟大的组织工作与伟大的学习工作，是号召全党全军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正规化党军作严重斗争。这些决定，八个月来一般的获得了下列成绩：华中部队均经过相当整训，战斗力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不同的战斗方式历经试验，本军均比较能顺利进行，各级参谋处工作的建立初具规模，九个抗大分校的创立，先后培养了万名干部担负了新的工作，团旅级干部亦有二百余名经过党校训练，在党性锻炼上提高了一步。去年秋季反扫荡以来，各部队的巩固程度提高，逃亡大量减少，个别团队在几个月内消灭了逃亡现象，营连消灭逃亡现象的成绩则更大，部队中流动现象亦较前减少，部队中保持半年至一年以上的比较熟练的老战士。这些证明部队军事工作政治工作一般的加强，部队人员消耗总数与扩大总数的比例，约当于一与三之比，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编制。供给卫生诸后勤工作均重新建立，获得成绩。军区分区各地均先后建立，在不大的基础之上开始武装人民，各地地方武装建立后开始了独立担负保卫地方的战斗任务。以上这些证明部队数量与质量是在继续提高和加强之中。军部重建之际，指明新四军游击兵团阶段的结束，开始正规化的阶段，今后则要求正规化之继续提高，走向铁的党军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的弱点是：某些部队违反党的统战政策的事件，时有发生；某些部队中游击习气和军阀习气的残余仍未根本纠正，在实际工作中仍占着上风。去年一年干部逃亡及犯严重错误，如贪污腐化堕落倾向的分子，总数约四百余名，其中团以上干部亦有十余名。部队中对党的政策的实施、命令的执行和对地方的关系仍有极大缺点。独立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的倾向并未在锻炼党性的运动中根本纠正。轻视军事学习，轻视军事技术，轻视参谋工作的倾向，仍然存在。供给制度极不严格，浪费贪污现象一般继续存在，在某些部队仍极严重。政治工作制度仍未做到完全巩固的地步，不少的政工人员尚未能保持自己在部队中的模范作用，某些指战员对政治工作轻视的倾向仍然存在。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尚未能做到严明整肃的地步。敌方特工的破坏仍在不断发生，甚至在个别地方得以售其煽动逃跑的奸计，虽然仅限于个别兵员或排班以下干部，但这种现象仍是极为严重的，证明保卫锄奸工作仍然不够坚强。这些弱点和缺陷，是今后军事建设上的具体的斗争对象。我现在根据中央指示再进一步来检讨建军中的思想问题。

二　纠正建军中几种不正确倾向

一、把中央精兵简政指示及中央军委精兵建设指示，看成一般的裁兵，不论时间地点及具体情况，要求主动裁减，这种裁兵论的呼声已在地方工作人员中发现。二、认为精兵主义是扩大主力充实主力的机会，特别借此收编并地方武装，这种论调部分发现于正规部队的工作人员中。三、精兵简政是需要裁汰老弱，及缩并骈枝机关，结果是一方面并未认真实行必要缩

减，某种程度的大后方主义，大行李主义，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又不分皂白，缩减一切的倾向，把必要的机关和部门都不设法去保持和建立，以致影响工作之开展。四、就是形式主义的了解精兵简政，忘记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乃是中心环节。五、借口所谓华中的特点，认为精兵简政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华中，又有在认为完全适用时，即机械执行，缺乏具体步骤及灵活执行办法。六、在执行过程中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主力军和地方军，对地方武装及自卫军的努力仍不够，特别对军工生产的扩充，对旧武器的大量采取，则在认识上工作上均未有实际的转变。总之，完整的了解中央的指示，正确的执行中央的指示，实际而具体的以执行情况按期上报，则一般缺乏。这是我们华中各地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军事建设上的共同弱点。

我们要求完整而正确的执行党中央的根据地建设方针，必须正确认识下列诸方面：

第一，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敌后斗争的新阶段，和依据此新阶段所定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新方针。“由于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及我军之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之斗争方针应当是无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采取一切方式与敌人周旋其目的：节省与保持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民众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这一指示是极为明显清楚的，告诉我们必须首先顾及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顾及民力为军力之泉源，军力为民力之掩护。在战役中战斗中应有的消耗和不惜牺牲，正是坚持长期斗争的必要条件，反之，为了坚持长期战争又要在使用力量时对

战斗中的消耗必须十分谨慎，十分顾及实力（包括军力民力）的保持。偏于任何一方面，只站在那一方面讲话，或者把民力与军力对立，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截然分开均是不正确的。比如在某一根据地民力财力物力动员已达到饱和点，则此时期便不应再强调扩充和大规模动员，宜力求休养生息，即使是最短期的甚至暂时的休养生息均十分可贵。又比如在某一地区，民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并未达到饱和点或距饱和点尚远，则此时期的迅速扩充和必需数量的动员仍是必要的，此时指导中心则应争取时间，在短期内完成自己实力的充分发展。又比如在某一地区，当民力已十分枯竭而军力特别主力更形枯竭的时候，这时候则必须咬紧牙关，说服一切人民，指出保持主力的必要。我们根据地是敌后根据地，无主力掩护则一切安定和秩序无从说起，且有立即沦陷，陷于不恢复的危险，处这情况，动员一切力量顾全主力，是党政军民应有的神圣职责，这种指导和决断常见于根据地斗争有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决定意义。估计华中根据地一般状况，则人力物力财力之动员和消耗，并未达到华北那样的高度。华中地区之开辟较迟两年，扫荡不如华北之频繁，在乡人口与入伍壮丁比例高者仅达百分之一，低者尚在百分之一以下，根据地物力财力之储藏的可以征用，裁兵论者、缩小论者是于此点缺乏调查研究的。另一方面华中斗争日益激烈，一般有紧步华北局面后尘的趋势；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鄂豫边区差不多与华北相埒，仅天然富源较优。再一方面华中尚有强大反民主势力的存在，随时秣马厉兵，向我整装待发，我于分散游击战外应有大规模的自卫战准备，因此我们现有实力尚在数量上质量上均不够充分应付事变，特别在主力方面急须补充缺额。在地方武装方面则数量发展不大，这乃是

华中的实际情况。地区特点论者，并不是真正认识这些特点，而是把这方面片面夸大，不知道华中斗争的长期性与华中根据地的趋向是与华北基本上相同，而中央指示在基本上也是全部适用的。此时提前注意到军力保存，人力物力财力的储蓄，和正确配备，正有利于长期作战。中央根据华北经验给华中的指示，正是主观的正确指导，能有力的影响到今后斗争的客观发展前途，正是先见之明，能预见事变以防患未然。说中央军事建设指示不适用于华中，借口华中特点，不愿实行必要的裁减，舍不得以一部主力地方化，仅片面强调主力之扩充，忽视地方武装，或强调地方武装重要忽视主力扩充，无视敌后根据地游击性之加强和运动战之可能减少，不深切注意到人力物力财力之储蓄，以及主力之正确使用，这种特点论当然与裁兵论，缩小论同陷于主观主义的泥坑之中。过去皖南特点论即片面夸大皖南特点否认全国工作在抗战环境中的共通性，借以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已遭受了历史的惩罚，这是不能再重复的教训。最后指出在地方工作同志中一般缺乏培养主力、爱惜主力、顾全主力的观点。在正规部队的工作同志中，缺乏对根据地人力物力的爱惜的群众工作观点。这两种倾向不扫除，正确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中央军委军事建设的指示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央军事建设指示着重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分，同时又注意到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正确关系，指出独立建立地方军事机关的重要性，同时指出某些地区又同具体情况不必有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又指出："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份其主要干部，应当是本地的，因此培养当地干部，由地方党选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是一等重要的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均应适应本地情况

（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因此空喊正规化，把主力军的一套机械搬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又指出：“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与指挥机关，但主力军帮助地方武装的责任，不仅仍旧不变，而且较前更加增重。”又指出：“在主力整编时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干部枪械弹药等。”这样明确的指示是建立主力军与地方军正确关系的工作原则。在我们华中地区一般说来是地方军数量质量均极不够用。第一种现象是使主力分散担负地方任务陷于地方任务，不能进行集团的整训，减少提高主力的机会；第二种现象是在主力担负地方任务的条件下，形成地方依靠主力，主力抽调，地方防务即难于维持；第三种是主力长期担负地方任务，也在客观上使独立生长地方武装的机会减少，在不利环境，逼着主力消耗于地方任务；第四种是主力在成分上，战斗作风上，工作作风上，均与当地群众斗争联系比较薄弱，所谓“主力始终要走的”，把主力视为客军，以及主力部队某些同志认为部队除作战而外一切不必顾问或参加，一切脱离当地群众，不与当地群众斗争密切联系的客军观点，是或多或少存在着，要纠正这些现象，只有正确执行中央规定的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关系。目前的工作仍处在建立地方军以减轻主力的地方任务的阶段，只有完成了比较强大的地方军的建设，主力始有集团整训与集团机动的机会，主力的缺额补充也才有经常的保证。目前应纠正主力部队专送质量较差的干部到地方军去的倾向，纠正正规部队工作干部不愿到地方军工作视为降级使用的错误观点，纠正地方党政机关不派遣地方领袖到地方军去工作的倾向，即或派去工作时亦给以闲职，挂名而已，不下决心予以培养和提拔，因此一般对地方军忽视，对军区分区工作重视不够，不愿意独

立建立，或者在兼军区分区时，仅视为次要工作部门，仅委托一个地方武装科去管理，或视军区分区为主力师旅的附属机关，或动员部门。这些观点都是极有害的，目前已到必须彻底纠正的时候了。

第三，民兵自卫军的工作，是华中刚才开始的工作。过去仅有一些游击小组，或参战自卫队如担架队盘查哨的工作，仅苏中、淮海、淮南诸地区稍有些数量上的发展，比较能担负战斗，因此这一部门的工作经验，十分缺乏。目前从实际建立民兵自卫队的过程中去积累经验，去力求发挥和创造，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在认识上第一应特别指出民兵自卫队的建设是在于加强根据地的武装自卫力量，以造成战争的新局势。弄惯了旧的一套，主力与地方武装孤单单的战斗，大大减弱了我根据地的战斗力，减弱我根据地的声势，使得敌伪可以乘我军的空隙，独来独往，横冲直撞，使我军应付敌伪之游击，疲于奔命。特别华中某些地区的土匪猖獗，以及边区匪伪扰乱，于我人力物力财力的侵害极大。中心区巩固程度不够，边区警报频起，主力部队应接不暇，地方机关时受袭击，工作人员时受摧残，这就是根据地的战争的旧形势，或者稍为强调，只说就是现存的局势。要将此种局势改观，则非从民兵及自卫队的大量建设着手不可。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武装男女壮丁，人人武装自卫，每人拿一件武器，随时准备自卫加入战斗，配合主力作战，击退任何方面的进攻，为保卫家乡而战，为抗日救国而战，为救国救家自卫而战。这些口号之具体执行，组织了几百万民兵自卫队走上战场，则我根据地的力量好象铜墙铁壁又伟大又雄厚，我主力部队及地方兵团便如虎添翼似的凶猛，如鱼得水似的基础，敌后战争形势必改变旧观。根本解决了自卫

问题，根本解决了长期坚持问题，以及造成了反攻的基础。目前的毛病即在对新旧局势的估计不足，即或认识了而没有从民兵自卫队工作去实际着手。第二在于建设民兵自卫军的形式主义官办政策，不想根据革命的创造精神去解决这一伟大的群众武装自卫问题，而想轻松的利用国民党壮丁训练的旧基础，挨门选派、委派改编，满足于大会检阅的捧场示威，而缺乏实际调查和具体组织工作，无专门工作机关，无强有力的干部去独负专责，把群众武装的严重任务放在其他斗争任务之末尾，经费毫无来源，教育毫无制度，武器毫无统计与补充，于是使人民武装工作成为空喊。官办政策的表现在不切实依靠人民自卫的自愿原则，照抄国民党壮丁队办法，以命令强制执行，对地方士绅参加自卫队问题，站在狭隘的宗派观点上拒绝吸收；另一方面又完全委任个别对象，听其包办，采取放任政策，结果把广大人民武装权利，垄断在少数人之手，使基本群众失却自卫的屏障。第三就是群众武装要求，常常在群众斗争发动之际，就自然涌现，不懂得在群众的政治经济斗争情绪提高之际，即联系着去利用斗争热忱，切实解决民众自卫队问题，即或开始这一工作又限于少数自卫队的狭隘范围，不大胆向全民武装道路上迈步。

第四，军事建设中兵工建设，其目的是具体解决武装问题。目前这项工作在满足主力的需要上是已开始了相当的工作，获有很大的成绩，但在地方兵工的建立尚未开始。在民兵大量发展中，武器问题便成为最严重的问题。兵工建设是中央军事建设指示四大项之一，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尚未提到与其他三大项并列的地位。主力军因有切身需要，故尚重视兵工建设，而某些地方党政机关对兵工建设则尚以为“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这是极大的错误。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条件下，在友方断绝对我接济条件下，一切转到自力更生。敌寇以近代军事技术占强大优势，我们则只有以极大量的旧式武器凑合起来，相对的减弱我之装备劣势，以企图在某种场合能转为相对的优势，或局部的暂时优势。依据我们目前的条件，大量制造白刃、炸弹、地雷三大武器是极可能的。如果能几万几十百万的集团使用，必然使我们的战斗火力加倍改观。因此轻视兵工工作等于残害自己，是必须纠正的，要了解兵工工作比吃饭更加重要。

第五，还要纠正不耐心做教育整训工作和不耐心做组织建设工作等偏向。我们的干部长期生活于游击环境，流动游击、广泛发展、独立应付、大刀阔斧的干是其所长，但另一方面即养成不惯于作耐心的教育整训工作的情绪。在过去几年的发展过程中，部队天天到新环境中去，作惯了开辟的工作，每天能看到自己人枪的增加，胜利的积累。但今天由于根据地业已形成，部队与地区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人力物力财力的征调达到相当限度，大规模战斗的减少，过去工作以发展为中心，到今天要转移到以巩固工作为中心。那种习于发展、扩大，追求数量的工作热情，必然与力求巩固、力求深入的工作任务发生矛盾，就是说工作中心业已转移，而主观上的愿望尚停在旧的阶段。发展扩大工作是走州过府，日新月异，眼前兑现的工作；巩固深入工作是化验室内显微镜下的耐心研究的工作，其伟大的效果必须在事后甚至在很长时期内才可以表现。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干部懂得今天不抓住时间作深入巩固工作，则力量不能继续发展，不能应付新生的事变。过去发展扩大的成果，必须经过今天的精雕细刻的点滴工作才能消化和加强，不

然过去的成绩会丧失，过去的努力可能等于白费力气。同时也只有经过今天的深入巩固工作，才能更打下将来新的伟大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今天的深入巩固工作，绝不是消极保守，自满自足，画地自限，相反的乃是充分的积极发展的精神的强力表现。那种“给我几百人，让我到某地方打游击”，“我愿意到前线去打仗冲锋，不愿搞整训工作”，“整训整死人，整训无用，过去不整训有了大发展，今天这样整训，整不出金子银子”，这些观点是我们军事建设的大障碍，必须耐心去克服。我们号召全党全军以反扫荡反磨擦的战斗精神进行军事建设工作，号召全党全军以扩大部队发展部队的前进精神，来进行整训工作和学习工作。奖励整训有成绩，学习有成绩的干部，处分逃避整训、逃避学习的干部。把整训捷报、学习捷报提高到与战斗捷报一样高的地位。学习、整训、建设工作的落伍者，等于战场上的逃兵。

第六，彻底揭发我们过去整训部队的弱点。过去我们的部队是否经过一番整训呢？我们回答，华中部队差不多都经过初期整训，但时间是短促的，因此整训工作是短期突击，对应付临时情况上获得效验，对根本的建设并无经常工作，一曝十寒，并未能根本改变现状。而且各部队也未十分注意选择整训机会，甚至某些游击师团，一年两年未经过整训的情况仍然存在。过去我们的部队整训，一般趋向是注意战士的整训，全部精力用在战士身上，对干部整训反而忽略。由于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准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影响到对战士的整训，不能在质量上有日新月异的提高。师不高弟子也不强，因此使整训工作变为循环重复，不能高度发挥学习的热情。过去我们的干部整训一般的注意到政治学习，党性锻炼，军事学习竟被忽

视，文化学习更未提起。由于文化水准低下，使学习工作仅在门外摸索，不能接近更高的水准，军事学习既被忽视，自然影响到军事技术不能提高。

我们今天的整训工作，是抓住整训机会，用整训部队的方式来进行根本的军事建设，整训不仅限于操课学习，而要将部队编制，制度建设，作风转变，生活改善等围绕着整训的中心去统一的进行。干部间、部队间均采取轮训制度，每个干部每一年均应受训三月，每个部队每季至少整训一月，一般行军作战期间的整训还不算在内。整训部队要求有计划性，要求有自觉性。计划不周密，课目不讨论，教员不先加训练，教育进度表发下去就算完事。做完了一期，在办公室内检查一下又算完事，又是第二期进度表，这是官僚主义的整训办法，要根本反对。在整训中主观上有严格的注意，能努力去干，这是好的，可是又发生不注意启发部队的自觉性，用简单的激将法，用惩办手段，使人人以整训为苦，无法提起整训的积极性，也同样使整训失败。

三　军事建设的新方针

在指出军事建设工作各种偏向后，应提出我们建军的正确的新的方针。这个方针应如下分别的提出：

第一，主力的建设方针，就是精兵主义的建设，其内容是：提高正规化的程度，整理编制，充实编制，力求精悍，建立铁的党军，加强整训，建立突击旅团，便利战略战役的机动，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进行适合环境便利坚持阵地的必要的地方化。正规化、精悍化是主力建设的两大口号。

第二，地方武装的建设方针是：建立独立负责的军区和工

作，努力加倍扩大，同时注意巩固和精悍，一年内达到与主力军相等的数目，完全能分担主力现有的地区任务之一部或全部；建立正式的地方军团，提高战斗力，提高纪律，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保护地方群众日常利益，彻底完成地方任务，这是地方军建设的基本内容。提高纪律，行动积极，加强党的领导为保护地方群众日常利益而斗争，是地方军建设的政治口号。

第三，民兵及自卫军的建设方针是：进行抗日的全民武装，组织并武装男女壮丁，以工人自卫队、农民自卫队、青抗先及模范自卫队为乡区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的民兵武装骨干；再普遍建立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坚决实行民兵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武委工作，以乡区两级为中心。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武装保卫家乡，就地游击，就地坚持，是民兵建设的四大口号。

第四，兵工建设的方针是：扩大兵工制造所，扩大生产数量，提高兵工技术，利用和改造旧式兵器，至少每分区或每县应有一兵工制造所，专门训练最可靠的技术人材，从雇佣外来技术人员，逐渐过渡到自己能全部掌握技术，收集和贮藏大批兵工器材，做长期打算；后方生产要力争保证对前线的供给。每人拿一支武器，少吃一碗饭多造一件武器是扩大兵工生产的标语。

第五，政治工作、参谋工作、供给工作、卫生工作及其他后方勤务部门的工作以提高和深入业务教育为中心，提高工作效率，锻炼和提高工作能力，建立各部门的协同动作，建立经常工作制度，奠定连队工作的基础，一切工作是为了达到建设强大而精悍的军事力量，培养大量指挥人材和工作干部。以遵守党的坚持抗战，巩固根据地，积蓄力量，待机反攻的总的政

治目的。练兵练将同时进行，首先以练将为中心。建设主力军实行精兵主义，用建设地方军团，实行全民武装两者同时进行。第一阶段以地方军为中心，迅速转到充实主力强大主力的第二阶段，这是伟大的建设工作，我党必须在一年内赶速完成其大部分的建设任务，在二年内应要求全部任务的完成。扩大会闭幕后，我们建设工作立即开始，做出成绩，以待来年的检查。主力军与地方军达到相等数量，发展民兵到二百万，其中至少要求有几十万基干队。

（原载：《江南党刊》第六期
苏皖区党委出版　1942年12月10日）

应付时局与整风

（整风笔记之二）

陈　毅

在最近讨论时局当中，我答复了某些同志对时局估计上的几个主要问题，因为这是对自己的思想方法的一番实际锻炼，特笔记之如下：

（一）有些人头脑转不过来

此次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本身是一个突然事件。是爆发于国际反侵略集团情况好转，斯大林格勒和北非两大胜利之后侵略集团连遭败北之际，是爆发于中国抗战坚持到六周年之际，大局日益明朗，时局理应好转，而国民党偏偏来一个大反动，表面看来很突兀，不可解。但仔细研究几年来国内时局便不难了解国民党今番大反动的原因。我们检讨几年来国共关系虽经几次磨擦，终于保持了合作局面，特别去年七七纪念党中央的宣言指出抗战中国共合作及战后国共合作的途径，尤其党中央在处理皖南事变时的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精神，制止了反共派当时的投降反共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变之后两年来不断作武装反共的军事尝试，均告失败。这样综合观察，由于国际时局好转，及抗战坚持到六年，及我党处理国共问题很得宜，代表着全国人心的向背，使国民党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军

事行动，而不得不在全世界全中国人士面前通过其十中全会的继续联共的带忏悔性的决议。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赞助国民党十中全会的精神。这一精神虽然表现其妞妞妮妮改过不勇，但较之过去的反共磨擦的反动行为不能不说是大大的进步。这是七月以前一年来时局造成国共关系的比较平静的情形。我们说这种平静对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符合的。我党中央为着鼓励国民党此一进步表现更大度的予以协助，因此几年来一切足以引起两党纠纷的事态均竭力避免，作更大让步。可以举华中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即豫鄂皖国民党不断攻击我第五师，我军皆不向西增援而竭力以和平手段制止其进攻；第二个例子，今春苏省主席韩德勤先生反扫荡被敌围困，我军予以援助始得出险，而王光夏、顾锡九等竟以怨报德乘机率军进占淮北我第四师之中心区，我军不予计较，且做到制止其进攻为止，而又从以粮食经费护送韩部安全西移。这两个例子均说明我党我军绝不愿制造不幸事件以妨害团结，迁着国方进攻亦尽最大努力做到平息风波为止。我党我军以这种态度回答国民党绝不是示弱，而是为了促进国民党之反省。这是七月国民党进攻边区突然事件以前的情况和我党我军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国民党不但不履行十中全会的诺言，而到了今年春间，一面看着德国尚有反攻力量，一面看着英美对第二战场迟迟不开辟，一面看着日寇准备攻苏，一面又看见日寇诱降的办法是公开宣称以争取蒋介石转变为主旨的新政策之实施，一面又看着我党几年来的委曲求全的态度，于是开始从新作反共准备。今春蒋介石的反共大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出而问世，这是蒋介石抗战以来第一次抛头露面亲自出马反共的第一次，这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共严重准备。五月共产国际解散，认为中共内

部，将有不一致，于是六月开始大调人马，决定七月突击边区，这是国民党在其十中全会之后的不久又向法西斯化的大转变。而我党我军因此不能再予容忍，才有七月以后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强反抗的态度。

以前对国民党稍有进步表现便予以赞助，甚至不惜退让忍痛牺牲，今天国民党反动派气焰高涨到进攻边区，要取消我党我军，我党我军便予以坚强反抗，前后两种态度均为了坚持抗战，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以前赞助国民党的可能进步时并不是没有看见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并未根本放弃，而党中央早指出过国民党的政治反共特务反共是要大大加紧的。同时在今天我党我军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罪行既不是整个反对国民党全体，而只是反对其主持反动政策的当权派。国民党内进步人士也会与我们一道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同时只要国民党能改变其政策，则我党我军仍然可予以赞助。不过在此点上，由于十年来的经验，尤其抗战以来国民党屡次背信弃义不履行其诺言，因此我们不能有任何幻想而要国民党立即以自己的行动来表现。

因此可以明白国民党进攻边区本是一个突然事件，但自有其来龙去脉，绝不是劈空掉下来的，国民党之反动有其阶级根源和时局推动的因素。世界上任何偶然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只要细心考察，便可以从偶然事件找出它必然的因素。

从党中央两年来的工作部署和指示中，如整风，如党政军一元化，如精兵简政，如拥政爱民，如生产教育，如审查干部，如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这些英明指示不仅照顾着坚持敌后克服困难的情况，不仅符合与国民党长期合作的目的，而且也正是制止国民党突然反动的预先准备。因此过去强调团结，今

天强调斗争并不就是过去上了国民党十中全会的当，同时今天坚决与国民党斗争也仍然不拒绝国民党好转时与之进一步合作，而这种斗争也为着达到坚持抗战继续保持团结的目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统率着国民党当权派。他们是极有反动经验的，极其狡猾，极其毒辣的，同时他本身的漏洞也非常之多，他之钻牛角尖前途必然是钻不通的，但还依靠我们能在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同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他的十中全会的决议稍有进步表现我们即予赞助不予抹煞，亦不为之麻醉，对着今天的反动猖獗，我们也毫不惊慌，并不放弃坚持抗战团结的统一战线方针，既不幻想也不愿为己甚，这就是我们应付时局基本方针。此次讨论时局当中有些同志对突然事件，对前一阶段和后一阶段均弄不清楚，脑筋只从一面想不晓得转弯，其毛病即在于对党中央的方针之不了解，这是要好好学习的。

时局到今天八月底为止，国民党原先估计德国今年夏季攻势必能压退苏联，而事实上则是苏联击退德军，连夺几十个大小城镇超过开战以来的记录。国民党原先估计日寇将配合德军攻苏，而事实指明日寇仍在原地未动，国民党估计英美在夏季不会有行动，事实上是英美加军在西西里登陆，国民党估计国际法西斯的命运还很长久所以敢于把中国之命运也法西斯化起来，结果是法西斯鼻祖墨公垮台，国民党估计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内部将有不一致，结果是我党全体团结得铁一样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行动，国民党打算以闪击战揽下延安再讲，结果为我党事先揭破，更引起世界舆论和全国人民的非议。七八两月的时局发展处处都与国民党的估计作对，国民党原先预定发动大内战的良好时机完全不对劲，只好偷偷歇手。因此七月初的

大内战危机便克服而制止了。但是并不是说国民党已有觉悟而自愿放弃其反动罪行，相反的国民党今天极端严重仍保持其反共的军政大动员的状态。对日寇仍一枪不打，而日寇三番二次的诱降申明，国民党也毫不作声，国民党是在等待机会再动手，这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国民党反动派此次大规模准备宣告落了空，当然又一次严重教训他今天全国人民是不允许反共罪行的，再要硬干下去必更遭受抵抗而更落空，这是一面。另一面国民党反动派不到黄河心不甘，必更作积极准备，因此我们仍不能放松，必须严重注视时局之发展，把自己力量好好准备起来，以击退任何反共投降的企图，这就是我们的时局任务。

（二）时局往何处去？

时局之可能发展均有几种前途，但其可能之变为现实，中间要经过复杂的斗争过程。可能性并不就等于现实性，中间以主观努力为最大的推动条件。因此估计时局的可能性是容易的事，以主观努力加在可能性最大最有利的一面，以促成可能之实现，这就是革命党的任务，这对于时局有决定作用，这是极大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两年胜利的口号是就其最大可能而提出，是估计到同盟国各种主观努力，其中以第二战场之决定开辟为根本条件，因此遂敢断然估计到其实现上的时间问题，如今年或明年等。这样说来何以能说两年胜利口号之估计为不对呢？至于两年内胜利终于推迟，由于第二战场原定开辟又不开辟之故，这就是主观努力不够的问题而不是估计者错误。另一面两年胜利口号另一意义是号召克服敌后的艰苦，这一方面又恰恰被许多人忘记了。最初根据当时的各种条件提出任务之可能实现再加上各种努力以促其成这是一面，但在尔后发展中由于原

定条件已有不预期的变化，则我们即应根据此新情况重新部署以新口号新任务代替旧口号旧任务，因而继续振作，重新的努力以奔赴革命胜利之目的。这本是革命指导上的常规，这种变动是应该的，是正确的，毫无奇怪之处，这又是一面。口号一宣布，任务一提出，不管尔后情况之发展变化如何，均不愿承认有变更和修改的必要，这正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的表现。两年胜利口号提出后，一部分同志当着条件已变不应再强调时仍然去强调他，一部分同志当着提出不应再强调时而掉头转来责难最初提得不对，这两种倾向均犯了机械论的错误。因此把可能性与实观性看成一样，忽视主观努力的重要，或者硬要“做出龙来才现爪”，实在了事才敢讲，而不敢言任何可能，这样便根本取消了革命事业，那么大家等着共产主义自然建立好了！此次国民党进攻边区明明是一个事实已到了实现的边缘，可是有些同志仅视为一种可能，减轻其注意力便不得不松懈自己的保卫边区的部署。可能的反面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反面是不实现，这是人人熟知的事，而两者之间取决于力量与力量的斗争。我们要以主观努力去扫除国民党爆发内战的努力，同时国民党反共派也以其努力去进行反共内战之发动，双方努力才能解决时局前途。这是能开拓内战可能性到实现性的道路。此次时局讨论一面有人轻视时局危险性，一面有人不联系到转变实际工作和动员自己的力量，他的毛病在于不了解可能性到实现性中间的演变过程，而主观努力恰恰是决定的因素。

（三）你站在那一边？

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所以有了各阶级的对立，此其一。中国现处在与日寇抗战环境，这一抗战处于今日中国

的政治生活的支配地位，此其二。前者是中国社会阶级基本的对立和矛盾，后者是时局的暂时的严重矛盾。由于日寇威胁全民族各阶级的生存，这一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所以产生了各阶级的抗战合作，把各阶级间矛盾降到次要地位，可是不要忘记并未根本取消他。尤其到抗战艰苦或接近胜利的时候加上日寇的挑拨，各阶级间矛盾会时时抬头起来，其最大表现在资产阶级的抗战路线之不同，这一不同便直接影响到抗战之进行。这一幅图画便是抗战以来国共关系的基本写照。国民党当权派他一面需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抗日，一面又用各种办法限制人民力量在抗战过程中超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需要而自由发展，这样产生了他的两面政策，即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政策，任何时候不忘记独吞抗战果实，随时做着既驱逐日寇又消灭共产党的迷梦，甚至不惜与日寇勾结达到灭共的目的。国民党当权派的心理便是他的阶级立场的表现，尽管他说什么民族至上全民利益等，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切打算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上，为此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他是可以断然牺牲。不认清国民党这种立场也无从与国民党斗争，更无从与之合作。

我们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工农占民族的大多数，工农不解放民族也不会解放，所以我们强调阶级利益和立场不仅不与民族立场和利益相违背，且是在基本上符合的。因此反共顽固派可以断送抗战而专力反共，而我们则必须坚持抗战以反对反共派，抗战是共产党的工农阶级的神圣义务、为自己而抗战，并不是利用别人或帮助别人。我们并不反对全民利益，但这一全民必须把汪精卫的国民党汉奸托派及反共分子等除开，必须严格限制着，只有抗战的才准列

入全民之内。这就是我们与国民党顽固派显明不同的立场。因此在抗战时代国共之争不单是阶级之争而实实在在就是民族如何才能真正解放之争。当国民党联共抗日的时候与他合作是对的，当他反共以断送抗战的时候，再事事迁就他那就是违背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也就是脱离了自己的立场而变成错误了！

（四）反对两种投降主义

抗战期中，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合作的时期中，让资产阶级拿着民族至上的幌子去做镇压人民的反动罪行，无产阶级政党毫不作斗争，一味追随其后作尾巴，这就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投降主义。在抗战期间无抗战到底之决心而中途与敌寇妥协，这就是民族投降主义。这两者是两件事，但其中是有其一定的联系的，因此严重对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帮助其抗日的一面和其努力抗战的一面，有一点好处不予没灭抹煞，委曲求全相忍为国，这是对的。如果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努力抗日，专力破坏团结抗战，如最近之表现，而我们却哑口无言，任其嚣张，甚至猖獗到中共可以取消，进步军队和政权可以任其摧毁，这样正是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这一投降主义到对日斗争方面必演化为民族投降主义。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讲抗日讲团结，讲道理，讲礼貌的时候，我们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不惜让步牺牲，共体时艰，因此产生各种统战的形式，措词，发言，行文，拜访仪节等均所注重，这也是对的。不如此会妨害团结抗战，乃是错误的。可是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讲团结抗战，专力反共，向我开炮的时候，我们当然礼尚往来，一个钉子一个眼，此时而讲礼貌、宽宥和客气，这种懦弱表示则只能鼓励狼子野心，使他雷公打豆腐专干软的，则会走到败坏国家

大事，使人民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上首先被解除武装，无从坚持斗争，而民族利益之断送造成抗战的大失败，也就是阶级利益之毁弃。这种表现也就是阶级投降主义的表现。投降主义的理论又产生投降主义的组织和宣传及外交诸方式，故必须予以根本弃绝才能保证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

最后党内如果有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可以说他是身在抗战方面，共产党方面，人民方面，而精神心理早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国民党的影响经过他而传播到党内来，是必须无情纠正的。因此只有正确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既联合又斗争的路线和针锋相对的政策才能纠正统战中阶级投降主义；也才更能有力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克服民族投降主义而战胜日寇。

自然在统一战线中除反对投降主义外，也不许有过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之存在，而这方面也是在党内存在着的应予纠正的严重倾向，这方面将另有论列，不在此论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在抗战时期所提出的基本政策，他是无产阶级在抗战时期最好的阶级政策，中国人民遵循此一政策才能达到解放民族和解放自己的目的。此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为了民族利益也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是这问题提法的基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的利益是不是国民利益一致呢？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把他的利益建筑在剥削压迫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工农大多数人民身上，所以当他讲什么民族什么全民只不过为他少数人的狭隘阶级利益打算，所以他不能真正代表民族和全民。恰恰在某些时候他为着巩固其少数的狭隘利益，不惜与民

族敌人进行妥协来进行内战，造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利与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民族利益相违反，这完全是事实，并不冤枉他。无产阶级是社会上最受压迫剥削的阶级，无产阶级得着彻底解放，其他社会被压迫的阶级当一同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利益他不仅不与民族利益全民利益相矛盾，反而正是民族利益和全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因此我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大表现，凡我党员忠实于统一战线政策，即忠实于阶级政策忠实于民族利益，即忠实于自己的阶级利益。因此统一战线教育，就是阶级教育。在抗战时期没有可以离开统一战线而有所谓单独的阶级教育，同时也绝无离开了阶级立场而另有所谓单独的纯粹的超阶级的统一战线教育。这个道理必须讲通，否则要自陷于错误泥坑中。

（原载：《思想与方法上的革命》北方文丛之二
艾思奇、吴黎平编）

新四军在华中

陈　毅

一

七七抗战爆发，我党即在东南各大城市进行抗战动员及组织工作。随着徐州武汉的沦陷，我党即留在敌后，由城市转入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武装，掀起华中人民武装抗日自卫的浪潮。一九三八年，新四军奉令东征，与江淮河汉各地之人民武装汇合，更加强了敌后抗日阵线，由零星游击武装，变为集团的抗日部队，指挥统一，地区联系，各种战争建设次第兴办，蔚为大观。而敌寇之“扫荡”，亦日益频繁。自汪逆精卫粉墨登场后，更以“反共”“清乡”为敌寇“扫荡”之前驱。战局之紧张，斗争之艰苦，物质补给之困难，诚为前此所未有。本年恰为抗战六年度，亦即新四军东征后之第五年，抚今追昔，训诫良多。试略举敌我一年来军事斗争之诸大端，为本军同志告，并以就正于国人。

二

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去年夏敌寇以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为基干，向我长江下游苏中区进行“扫荡”，六月开始进攻南通、海门、启东地区，七月转至靖江、如皋、泰兴，八月九月转至高邮、宝应、兴化，并第二度进攻南通、海门各

地。敌之锐利武器为水行利用装甲汽艇，陆行利用装甲汽车，水陆配合，且有大量土著伪军配合，运动迅速，刀锋深入每一农村角落。我一师粟裕部，经四个月血战，始于十一月初制止其“扫荡”凶焰。北面敌寇于九、十月之间大举“扫荡”山东我一一五师地区后，十月十一月以十七师团小林部队为基干，徐州为指挥中心，大举“扫荡”淮海地区及淮北泗水地区泗阳、宿迁、灵璧诸地，兽蹄所至，并及于津浦路西之凤阳、怀远、定远诸地。敌伪动员数达二万余人，继续“扫荡”有二月之久。我三师黄克诚部、四师彭雪枫部、二师罗炳辉部，均轮番与敌伪纠缠。敌虽曾占我中心地区，终在我苦战之下，不得不被迫撤退。去年十二月为战局比较安定之月份，但敌寇是时正转移兵力进攻大别山及豫南友军李品仙、汤恩伯诸部。本军决心自动配合，我二师罗炳辉部、七师傅秋涛部在淮南路两侧及巢湖、桐城之线予前进敌军之后路以袭击，我五师李先念部在黄岗、黄梅及平汉线上发动游击及破击战，均收效甚宏。敌虽占领英山、潢川、罗山、商城、固始、立煌诸地，然历二十余日之激战，终在我国军抵抗及我军配合夹击之下怆惶撤退。

当大别山战役进行之际，一月初敌伪不断在南京进行“扫荡”新四军及鲁苏战区副总部韩德勤部队，公开广播东京报纸社论，连篇累牍讨论“扫荡长江下游中匪军之必要”，“且谓予韩总部苏省府及新四军军部以毁灭性之打击，是粉碎英美反攻的太平洋总力战之必要部份。”又谓“长江下游富于食盐棉花粮食等战争物质，实不容渝、共盘据其间。如让其坐大，将为皇国百年大计之祸患”云云。敌寇鉴于多年“扫荡”之失败，转而与汪伪协商对策，选定人员，专门研究中国内战经验，尤注意于江西时代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的研究。敌寇二月间草定

之进攻计划纲要，其为日后攻战所证明者，其概要如下：敌寇判断鲁苏战区副总部及省府与新四军军部均集结于旧黄河与射阳河之中间地带，东至于海，西至运河、高邮湖，两部常在该地带流转。敌寇决心以三个师团之兵力，进行大举包围，由西向东，由南向北，以实现歼灭我军于海滨之迷梦。敌寇计划之毒辣于此可见。敌寇之准备迅速就绪，于二月十二日即开始进攻，北面出动之敌为十七师团，由淮阴、涟水进攻，南面之敌为十五师团、卅五师团及独立十二旅团，由兴化盐城北攻。十七、十八两日敌寇即在阜宁城、东沟、益林、凤谷村、曹甸一线上，完成其合击计划。本军三师黄克诚与韩总部互为犄角，策应得力。韩部于二十日后分批突围，渡运河西移。敌寇乃以全力“扫荡”我三师部队，及于整个盐阜地区。敌方分布据点构成大小包围圈，敌人大小合击数十次，企图打网收网，期一举而得鱼。我军反击突围，时分时合，忽现忽隐，敌我双方极尽其纠缠、迂回、扭打之能事。当此之际，我一、二、四师粟、罗、彭诸部，出动部队援助友军，打击敌进军之后路。在路北侧翼二月二十四日彭部攻克泗阳之洋河镇据点，韩部突围路经此间，彼此配合，恰收协同对敌之效。韩楚箴先生曾驰书致勉谢。我们深感援助友军共同杀敌，乃我们应尽之责，本军愿以更大之配合期诸将来。二月二十三日我一师粟部攻克南通东北曹家城，孙密等地。二师罗部乘虚以奇袭入淮阴城内，夺获敌马匹甚多。淮安淮阴两城闭门数日。敌寇正面进占盐阜区，既难于站稳，而翼侧又受威胁甚大，顾此失彼，乃被迫撤退。敌寇宣称之盐阜、滨海“扫荡”，遂于三月中旬结束。敌寇于三月中旬，自信其可靠之侦察，判定本军军部西移皖中无为、桐、庐之线，并以另一部南移苏南之茅山地区。敌寇不愿休息，复于上月十

七日以大军进攻我三师之巢县、无为地区，并在苏南茅山地区加紧其第四期“清乡”，此为盐阜区大“扫荡”之尾声，亦即敌伪夸称对新四军之穷追计划。

巢南战局至四月初略趋平稳，而苏南敌伪之“清乡”工作，则已进至所谓第五期矣。我六师谭震林部活动于苏南地区，出没南京镇江城下，穿插京沪线上，为本军斗争最艰苦之区。一年来经过四次“清乡”，至今尚在坚持不懈中。

敌独立十二旅团南浦部队于“扫荡”盐阜区后返驻苏中，即于四月初连续进攻李明扬、陈泰运，黄逸峰诸部，我粟师迭与配合，不分畛域，使本军地区友军能够自由转移，能够获得必要供应。李、陈两将军与本军抗敌合作之亲善关系，诚为敌伪所嫉视。此种抗战中的真诚团结，应随斗争的愈加紧张而愈益巩固。敌之独立十二旅团长南浦，乃敌方专任之公共指挥官，进驻苏北已历三年，日与本军接触。三年来其所属五个大队长，保田阵亡，石井负伤，部队消灭近三分之二。发动伪方向我军清剿，为南浦得意之作，南浦亦以此自夸。今则以清剿苏中，历未完成任务，复与伪方矛盾加多，不能协作，南浦因此去职，继任者传闻为小林师团，伪方为张北辰，我一师在苏中之反清剿战斗必更加紧，可以预测。

我五师李先念部队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则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进，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亦五年矣。今春二月十五日，武汉敌寇向长江与汉水间三角地区进击我国军一二八师王劲哉部，沔阳以西地区失守，我五师即在汉川、天门之线进袭敌寇，给友军以支援，迄三月八日，敌寇发动长江南岸攻势，分五处于岳阳、沙市间渡江，进占公安、石首、华容一带，我五师即在敌后发

动全面配合对敌之破击战，五月中转战于宜都、安乡、南县诸地，复先后在潜江、沔阳、监利、襄阳等地发动游击战配合。总之，今春敌寇三次进攻我国军正面，我五师即三度在敌后痛击敌人，配合作战，其中以四月廿一日我五师攻入蕲春城，三月十日进攻黄岗柳子港两役，对敌震撼之力最大，尤为当地绅民所称誉。

三

本军战斗举例：

（一）去秋九月二十五日南通战斗，我军歼灭敌保田大队长以下日兵八十五名，伪军三百余名，战斗形式为伏击。该敌于夏家渡被我待其半渡袭击之，敌退守沿岸村庄顽抗，我继攻至半夜，放火围歼，始克竟功，敌伪全部就歼，生擒三名。战后我军捡还保田尸首于南通，以示我之伟大器度。敌方收尸复信感谢谓："贵军战后归还战骸宽仁厚德，诚贵军政略之胜利"。是役我军由奇袭转为强攻，伤亡亦达百余名。这一战役之意义，在于阻止了敌伪下乡挺进之企图。

（二）去冬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定远之敌松尾中队长率敌伪四百余，事前诡秘进攻，突然企图一举而歼灭我驻在定远东南老人仓之驻军和党政机关。我军仓卒应战，予包围之敌以反包围，酣战至午，定远敌大队来援，复陷我军于二度围困中。我军应战至夜，突围而出。是役敌伪伤亡五十余名，我军伤亡数目略等。老人仓虽沦为敌伪据点，然迄今敌未敢再出。又三月下旬，淮阴淮安之敌逐日向我淮宝区推进据点，企图蚕食我军根据地，四月初已进至顺河集，企图进占高良涧、蒋坝之线，控制洪泽湖东岸，对我作更大之危害。我军于四月初袭击

顺河集之敌，敌退至陈集。四月十日夜我军大举进攻陈集，亘一昼夜，敌三路来援，复放射糜烂性瓦斯以自救，十五日天明我主动撤退，敌我伤亡均重，是役后敌向南推进之计亦不得不自动放弃矣。

（三）今春敌寇扫荡盐阜区之际，二月下旬即密布据点，计二月末到三月初，在不及两县范围之地区即新增据点六十余处，妨害我军民居住活动甚大。我军乃于三月中旬复发动拔除据点之反击战，三月二十五日我军进攻阜宁西之陈家集，战斗当夜开始，敌据屋顽抗，继以火攻，战至天明，敌不支突围。阜宁城之敌来援，亦被我军截击于中途。是役敌卅五师团之骠智也中队计八十名全部歼灭，伪军一部亦同归于尽。我军亦伤亡计营长以下百五十余名。除了此役以外，还有八滩、单家港、建阳诸地之著名战斗。敌不得已乃紧缩其据点，将新增六十余据点减至十一处。敌寇密布据点，即所谓钉铁钉之政策。我军拔除据点，即所谓拔出铁钉之战术。钉铁钉之力甚大，拔除之力必超过之，始克有济。战斗之凶恶残酷可以想见。

（四）今春三月十六日淮海区敌寇分兵十一路，计敌兵千余人，包围我进驻梁岔之部队，企图以铁壁合围全部歼灭我军。我军闻讯，灵活转移，跳出包围，敌跟踪追击，复于十七日续行第二次合击计划，双方遭遇于涟水老张集朱杜庄一带，激战半日，我军复于黄昏后突围，转移至蹂皮镇刘老庄等地。十八日晨敌三度合击，我军先头部队安全突围，而后卫则陷入重围中。我军乃就田野间之交通沟进行拒抗。第一阶段，我军进行突围，屡次与敌肉搏，均无效，乃决心固守待援。第二阶段敌见我转攻为守，欺我废弱，以大队骑兵向我猛冲，为我军击退，其冲至防御工事前沿之敌，下马肉搏，均为我刃毙。第

三阶段，敌悉知我仍不易与，乃选择较远距离，重新配备火力，以机枪大炮集中放射，对我进行火力毁灭。是时敌寇知我军已突围无望，乃妄想降服我军，无耻的伪军乃开始其招我投降的火线喊话。我军将士坚不为动，乃从容将机枪步枪拆毁，并将文件杂物付火，将忠骸掩埋后，乃集中未伤者之廿余名进行最后之突围。战至下午五时，终全部殉国。此我三师七旅十九团二营第四连全部，连长白思才、副连长石学富、政指李云朋、文教孙尊明、排长尉庆忠、蒋员连、刘登甫等以下计八十二人，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敌寇虽歼灭我军一连，其损失亦相近。此役敌寇所获者无一可用之武器和杂物。伪方传出消息，敌军对于我军壮烈殉国之牺牲精神，深致敬佩。当地人民于战后三日内，即将忠骸举行公葬，题为新四军抗战八十二烈士之墓，谒者无不低徊流涕。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励来兹。惟本军转战敌后，长年累月，应与敌之包围作斗争，切忌陷入敌之重围。此战术上之重点，本军将士宜知所警惕者也。

（五）四月廿四日我军进攻运河西岸之洋河镇，经六小时战斗，歼灭敌伪军四百余名，残敌据房屋顽抗，我军以洋油火攻，房屋全毁，敌寇无一得脱。当我军在洋河镇上向民众收集火攻材料等，均照价给钱。洋河固苏北大镇，长十余里，战斗前后我军秋毫无犯。而后洋河伪军给罗圩伪方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并谓新四军固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混乱之际，表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云云。

（六）苏南我军于四月十五日奉令渡石臼湖（溧水之西高沟以北）西向游击，十七日进至明觉寺附近，当被敌寇发觉，天明时敌寇四路包围，双方遂于石臼湖、东冈、前堡、新张家、

小赵王家、东王墙之线，发生肉搏激战。敌寇企图全部压我投入石臼湖葬身鱼腹，我军背水抗敌，士气倍增，激战至夜，我军全力突击明觉寺方面之敌，敌不支溃退，撤围而去。我军当夜安全执行渡湖西进之原定计划。

四

战局平衡，分散兵力，巩固其占领之点线，集中兵力“扫荡”其攻击之目标，此敌寇战法之大要也。全面出动，以包围我军之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此敌寇“扫荡”初期之动作也。密布据点，进行封锁，部署不断之大小合击，以肃清其占领地区附近之我军，巩固其已得阵地，此敌寇“扫荡”中期之部署也。“扫荡”末期，则进行所谓篦梳式之“清乡”，其目的不在打击我之主力军，而以全力摧毁我方之党、政、群众组织，厉行其归化运动，即所谓政治“清乡”是也。敌寇进军之初，先以军事镇压，火烧掳掠，无所不至，继则进行其怀柔政策，以“反共”口号掩饰其毒谋，妄图使居民健忘而堕入其彀中，伪方上下，则为虎作伥。敌寇之分区“扫荡”，为敌寇兵力不足之证据。敌寇“扫荡”时期有继续至二月以上者，虽较过去为更持久，但终不能弥补其时间之中断。敌寇之施用毒瓦斯以及所谓三光政策怀柔政策等，均为敌寇外强中干、力量不足、对我无可如何之表现。此一年来敌寇“扫荡”之规律也。敌寇之所得，在予我根据地以极大之破坏，予我部队以相当的损失，但不能予我以根本歼灭。敌寇之所谓胜利，盖暂时之胜利，军事掳掠之胜利，战术上之胜利，而战略政略上之失败则与日俱增。敌寇亦自知之矣。

分散游击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兵力以突击敌之薄弱

部门，此我军反扫荡之战法也。“扫荡”初期，避免正面恶战，而必予前进之敌以阻滞。“扫荡”中期，相机击敌而必予敌新建之据点和封锁以适当平毁。“扫荡”末期，则必予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部，以剪除敌寇之羽翼，歼灭敌寇以动摇伪部之心胆。我军抗敌有方，则伪部人心思汉，此乃事理之必然。我主力为反扫荡的骨干，灵活转移，在适当时机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军之时隐时现，零整互化，民兵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神出鬼没，及于敌伪之卧榻居室，构成敌伪之日常恐怖。三者互相配合，互相转化，使敌伪难于捉摸。敌伪虽强大，终必低首于此。在军民联合打击之下，“清乡怕不清，扫荡白费心。”此为敌占区人民之民谣，实为对敌寇扫荡之正确结语。“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新四军，新四军，你为人民死，人民得你生，大家来参军。”此为华中人民要求参军前线之歌谣。盐阜区士绅慰军大会，其传单有云：“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挥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国民党书记长某君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淮海士绅见农抗会领导之民兵活动，使敌不敢下乡滋扰，盐阜区士绅见民兵作战得力，土匪乘机窃发，为民兵削平，交口称誉“党政方面有远见”，并谓“始知减租减息扶助工农政策为抗战建国之大端。共产党能担负艰巨，又能让人民同享其成，乃知我等以前之不满，属于浅见”云云。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适来华中，亲见反扫荡军民合作情况，指出“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

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谄言。余不亲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苏中有九十老人某君有言：“几十年来，数经世变，凡大战兴起于城市，匪乱必起于乡闾，战祸之直接损失尚小，战祸引起之兵荒匪乱使人民受祸甚大，不料苏北处在经常与敌伪对战中，大军转移吾村，月必数至，甚有日必数至者，而乡闾秩序井然，无跑匪畏兵畏匪之累。此乃党政办事之得法。战后之天下太平可于此卜矣。”沪上文化界某君等获悉反扫荡中我军与苏北友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为之大乐，远道驰书，申其敬佩。以上为人民对本军之评论，其于本军之缺点或略而不言，或嘉其长而宥其短，或言其大而忽其小。以本军之实况当之，自省仍有愧恧之处。然而反顾国人中间，亦有人以“游而不击”的蜚语，诋毁本军。古人云，止谑莫如不辟，止毁莫如自修。本军素以此义自励。但上述人民之言论，固系公正之判词，当为国人所共鉴。

五

克服困难，迎接胜利，抗战第七年，时局对日寇必日益不利，其疯狂镇压敌后，必日益加紧，严重扫荡必然来临。本军决心不惜重大牺牲，换取坚持敌后支撑全面抗战之代价。本军损失固无可避免，而敌寇亦不能不付出重大代价。战局之必趋更加严重，此困难之一面也。

抗战第七年，华中根据地平原地区甚大，战局时紧时弛，尚有喘息余地。今则敌我战斗趋于狭窄地带，寸土必争，进退皆非易事，游而不击者必亡，击而不力者亦必亡。既游且击，击必得力，此本军在敌后生存发展之道。违此者必降，为敌寇之降虏。其证例甚多，无庸列举。惟本军在武器拙劣和弹药缺

乏的条件下，向强大之敌寇作战，故战斗之夜间性、白刃性、流动性、短促性、群众性表现最为明显，伤者多重伤，重伤者多死亡，此医药缺乏之所致，此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自皖变以来，迄今仍有友军不断予本军以高压，我五师六师方面完全处在两面被夹攻之地位，我四师亦常在被友军袭击状态之中。本军忍辱负重，不愿轻启事端，扩大事态，一切仅限于严正的不得已的自卫。去秋浙赣路战役爆发，苏南皖南友方千里撤防，本军无一兵一卒南进，此为铁铸之事实，为江南友军官兵地方绅民所目睹者。如何加强民族团结，援助敌后抗战之孤军，撤消磨擦方案，放弃特务政策，此本军所馨香祈祷者也。国内关系僵持不决，友军煎迫迄未停止，此本军处境困难之又一方面也。

近年法币贬值，百物飞腾，敌后部队给养更见困难，去冬以还，本军即采"寓兵于农"之旨，从事生产，力求自给自足。比者黄梅初熟，麦黄菜青，荒地辟而水利兴，耕耘多而收获大，官兵生活略有改善，人民负担亦为减轻，此我军生活之困难，以及如何克服之又一方面也。

以上仅就内部外部之困难条件大体言之。本军将士身经数百战，出生入死，一心一德，政治觉悟和战斗能力均历经考验，加以当地各界人民同情环绕于本军者数百万人，人民乃本军之父母，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故本军虽临万难，信心坚定，始终如一，盖困苦艰难之来，既无可避免，惟奋斗不息，尽其在我者，足以克之。最后之胜利，盖属诸最后之搏战。孟子云，独孤臣孽子，某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本军对国家民族之忠悃，庶几近此。如何以民主方策澄清时局，外以适合国际民主之潮流，内以解决多年内争之纠纷，万方有罪，反躬为上，是

非混淆，民意是从。是在明达者一转念间耳，抗战六周年，胜利在望，克服困难，以迎接新时代之胜利，本军将士谨以此自勉，并待教于国人。

（原载：《解放日报》1943年7月5日）

纪念邹韬奋先生

陈　毅

我对邹韬奋先生的倾慕，不仅在其少年时代的刻苦成学，不仅在其壮年时代挺身入狱，作了举国抗战的响导，不仅在其以犀利文笔，竖旗文坛，横扫千军，刺透反动派的肺肝，尽了大众喉舌的光荣职务，而尤其在其能以一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坚决走上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道路，这是韬奋先生永垂不朽，可为式范的地方。我们熟知韬奋先生的历史，他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最后以他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事业说，置诸共产主义者前列，可说毫无愧色。因此邹先生的道路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最终结合的道路。彻底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在邹先生一生历史实践中，又一次证明了。比如孙中山先生是前三十年的一个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一生实践，晚年达到很正确的承认共产主义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朋友。比孙中山先生稍后约当十年至十五年左右的鲁迅先生，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大师，他几乎完全走着相同路线，其晚年不但与共产主义相结合，且成为献身前列的最坚强的舵手和战士。这是第二个例子。继孙、鲁两公之后的韬奋先生，从革命民主主义开始，直达到共产主义行列，那么，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件偶然巧

合吧？我想不是的，我想这里极其庄严慎重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总规律，这一条定理有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启蒙大师们，均遵循这一条路作了开路先锋，反动派的任何手法都是无法逆阻的！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绝难半途而废，他至少会承认中国共产主义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反之，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拒绝参加民主革命，或不献身民主革命前列，或于献身之后陷于同化，不能彻底推行民主革命，忘记了本身的任务，那必然是假的共产主义者，亦必失败无疑。我想这种例子也很多的。因此，我肯定的说韬奋先生一生的奋斗，其伟大成功便是继孙鲁两公之后，再度指出中国革命的总规律。这种价值是无可比拟的，也是我所最倾慕的地方。

现在韬奋先生死了。我想当着播种者精疲力竭走去安息的时候，那预兆着收获季节已经不远了！将收获的黄金果实呈献于人民大众，呈献于播种者的英灵之前，那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我们继续前进吧！

九月二十九日夜

（原载：《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

追忆彭雪枫同志

陈　毅

得到彭雪枫同志阵亡淮北前线的消息，对于我的心灵是个极大的震惊和痛苦。中国丧失了一个民族英雄，党和新四军丧失了一个重要的干部，我自己也丧失了一个亲密的战友！

我与雪枫见面第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反三次“围剿”之际，他在三军团二师任政治委员，我作赣西南地方工作，他来我处商量发动人民配合红军作战的事宜，初见的印象是“少年英气扑人眉宇”。第二次是反四次“围剿”前的宜乐战役，他来江西军区要我协同他处理叛徒郭丙生问题，这件事他办得很好，挽救了部队，表现了我们红军的政工人员的领导作用。这个时候，我看出他应付事变的机警和能力。第三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反五次“围剿”时，他奉命任江西军区政委，到部之日，我赴西线任西方军工作，一切军区后方全部工作由他独立处理，两个月左右处理得很好。是年冬他奉调随大军长征，我们从此分手，直到一九四二年秋淮海陈道口战役才又重见。这个时候他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十年重逢，长谈竟夜，我觉得他当年英锐之气收敛很多，似乎正转向沉重老练方面，而严肃整饬，仍一如往昔。这个时候正当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厉行武装反共政策，配合敌伪向我军进攻，我新四军全军处于被夹击状态中，而我军第四师则更处在被夹击的最前线。雪枫同志领导第

四师几经艰难困苦始脱出危局，转到巩固发展的道路。雪枫同志此时的修养上有极大的进步，其特点是勇于自我批判，努力虚心学习。我认为不怕自我批评，不怕反省，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是我们党员和干部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必须具备的革命精神。多年在革命斗争中有功劳的人，如雪枫同志，他敢于揭露自己，批判自己，这种勇猛精进的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同志应向他学习的，连我自己在内。试看在近几年我党的伟大整风运动中间或也遇着有拒绝或躲闪自己批判的人，这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的庸俗习气，其作用只在于使自己腐烂，等于拒绝日光和新鲜空气。毛主席警醒我们，要每天洗脸扫地的譬喻，正是对症良药。我认为假如一个人是真心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愿为人民事业作英勇自我牺牲，则事业为重，自己为轻，就不会对自我批评却步。雪枫同志牺牲了，他生平的一切长处，为人人所共睹，而近几年这点尚不大为人所知的美德，我认为特别值得介绍出来。这正是雪枫同志对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的具体表现。

从一九四二年之后，雪枫同志主持淮北根据地及四师工作，把四师这个抗战后新建设的部队提高其战斗力，与华中各老部队并驾齐驱，又经常亲赴前线指挥打破敌伪“扫荡”，巩固淮北根据地，又历次亲身主持淮北民兵会议，开展广大民兵运动，又迭次主持淮北参议会工作，奠定民主政治基础，这些优异成绩都与雪枫同志的名字不可分离。我相信雪枫同志这些贡献和努力必长留遗爱于苏皖人民的脑海中间。雪枫同志的牺牲实是人民与党的绝大损失。

在我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民主事业的道路上，又新加添了雪枫同志的英勇牺牲。对于一个同志，一个干部，一个战友，一个典型革命人物的英勇牺牲，我曾亲见毛主席、中央各同志

和全党同志所引起的悲痛。这个悲痛将转移在加强全党的工作上面。我们纪念他，学习他，在工作中不忘记他，则他的一切长处和美德，将帮助我们在工作中前进，去完成我们伟大的抗战与革命事业。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原载：《解放日报》1945年1月28日）

痛悼与奋勉

陈　毅

四月十二日晚，从广播中突然得到王、秦、叶、邓诸同志及黄齐生老先生被难的消息，真太突然，真太悲痛。震动全身压缩呼吸的沉哀，反使人不敢相信会是事实，反希望这是广播的错误。就是有吧，定不会有这样多人同时被难，这一夜对灯痴坐，追想与惨痛杂乱的交织着，总望有另外的消息，突然来一次衷心渴望的更正，有几人蒙难，几人受伤，或者几人幸得生还。

然而不幸啊，一次一次的消息，毕竟完全证实了，我党中央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了这个新闻，最后宣布了这个惨痛的全部的消息。全中国几万万人同声悲痛，正在悲切哀悼他们自己的伟大战士。和平民主的破坏专家们——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这些人类中多余的渣滓们，他们当然不是悲痛，而是暗中狞笑，他们会想几个伟大战士们的被难，他们的反动事业会好办些。因此我们就应该勉抑悲凄，不要让这些坏家伙得意，我们要继承诸先烈的遗志，完成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伟大胜利。

眼前的中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中国。一方面和平民主的潮流已坚强的确定下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阶层民主战士协同中国人民的伟大成就；可是一方面那些腐朽的阶层，人民的公敌，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正在

以各种技巧，明目张胆向人民进攻，企图阻击和平民主潮流，要把中国重新推到内战分裂专政暴虐的黑暗世界中去，光明与黑暗的决斗，就是而今中国的新面貌。

王、秦、叶、邓、黄诸先烈们，他们便是手执光明火炬的伟大战士，他们先前的奔走呼号，舌敝唇焦，以及触山被难，身为焦土，这就象征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他们以血肉牺牲赢得战争，他们也必然要以血肉牺牲赢得和平，王、秦、叶、邓诸位同志的牺牲，正是中国人民力争和平民主的英勇气慨之表现，他们的被难，必然引起全国人民的怒火，去冲破层层黑暗，确定人民的和平民主的胜利。

王、秦、叶、邓、黄诸先烈们，他们廿多年为人民为民族奋斗的历史，证明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或在牢狱中作过多年挣扎，如王、叶等同志，他们或在前线或在后方或在文字工作上，或在受压迫的工农兵大众的底层作过痛苦的熬煎，如邓、秦、李、赵等同志，他们或者多年在颠沛流离中渡过悠悠岁月，坚持为人道正义服务，如黄齐生老先生，他早准备了以自己热血去灌溉中国的民主自由的鲜花，因此他们的死是最有价值的，他的死对中国人民是惨痛，但也是最好的典型，更是一种高度的奋勉和深刻的教育，他们的死必然更唤起中国人民，获得进一步斗争的精神和力量。

面临着当前的紧急时局，我们应该变追悼的悲痛为奋勉，我们高举和平民主的光明的旗帜，去粉碎黑暗势力，这是我们在王、秦、叶、邓、黄诸先烈英灵之前的誓词。

我们宣布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三大决定，不准许改一句，改一字，必须百分之百的执行。

（原载：《四八烈士纪念册》中共代表团编 1946 年）

纪念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

陈　毅

临沂廿九日电（迟到）新四军陈毅军长在罗炳辉将军墓前发表演说，全文如下：

当我们与罗副军长永别的时候，我代表中共华东局暨山东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他致一沉痛的崇高的革命敬礼。罗副军长享年四十九岁，且有三十二年是为革命而斗争的。他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役，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十年苏维埃运动，和八年抗日战争，四次革命运动。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十六岁时入伍当兵，三十年来，罗副军长一直保持农民和士兵的革命群众本色。他从来没有忘本。他并不因为当了军官，便带着兵掉转枪口去反对农民。相反的，他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当北伐末期国民党举行清党反共之后，又大举进行“围剿”革命武装时，他便从起义中转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反革命。罗炳辉同志是一个当兵出身的革命将军，又曾是一个国民党军队起义的革命将军。从组织起义之日起，罗炳辉同志便由一个民主老战士进而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创造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并在抗战期间有力的培养了新四军，开辟华中解放区。罗炳辉同志的名字，已为爱好和平的中外人士所传颂。罗副军长的病故，是我党一个重大损失。近数年来，由于敌后战争的极端艰苦与困难，致使罗副军长积

劳成疾，患血压过高症，党曾数次通知他休养，但他恳切的拒绝了。因为他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高度负责，已超过他对于自己的爱护。最近病势转剧，再三相劝，他才勉强的愿意休息。可是当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三大协定，再度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时，炳辉将军又不得不亲自出马，奔走于自卫战争的最前线。当枣庄伪军在他英勇的指挥下消灭了，十万矿工及附近居民乃得重见天日，申诉冤苦。可是当此军务繁忙，夏日炎炎之际，罗炳辉同志不幸旧病复发，十六日突患急性胃炎，二十一日由前方返临沂休息，行至兰陵途次，又患脑充血，多方急救无效，终于下午五时与我们永别了。同志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及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对于他的先锋战士革命领袖的死去，是比失去任何亲人都要哀痛而难受。但是罗炳辉同志的亲密的战友们，应该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我们狞笑，正在计划消灭我们。反动派正要中国人民撤回一切民主要求，承认法西斯封建独裁，要中国人民服从它的反动命令，放下武器被他消灭。因此，我们应进入自卫的准备，千万不能让法西斯反动派得手。我们今天，要擦干眼泪，勇敢的坚定的站在自卫的岗位上，去承继死者未竟的事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万分艰难的，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冲上去，第三批冲上去，以头颅热血换取人民的自由和保护民族的独立，最后胜利是操在我们人民手掌中的。只有这样才是纪念先烈的最好办法，也只有这样，革命的先烈才喜欢我们来纪念他。罗炳辉同志在十九日和二十一日动身回临沂的那几天，都再三再四的和我谈滇军的革命光荣传统，他为潘朔端师长在南满的起义欢呼，他亲手拟具贺电，并分函他所有的云南故交。罗炳辉出身于滇军，在滇军中受到革命民主的教育，一生最关

心云南人民及其军队。罗炳辉同志代表滇军的革命光荣传统，他致贺潘师长的电文是他对滇军将士的热望，和他留给他故乡军民的遗嘱。我们应该负责将他的遗志之一传达出来的。最后，我们说，罗炳辉同志，你好好的安息吧！我们今天在你坟前宣誓，在你遗像前许愿：值此内战威胁极端严重之际，我们誓以胜利的保卫民主和平来纪念你。同志们，全中国的和平进行了数月的谈判，在证明我们人民的和平不能由反动派恩赐，反动派也绝无诚意放下他对中国人民的鞭子，我们不能向人乞求和平，恩赐和平，我们只好准备自己的自卫力量，如果反动派敢于进攻，我们一定将他击退。让我们在取得和平民主的最后胜利时，再为罗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新华社南京分社）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7月5日）

关于知识分子参加解放区学习与工作问题

陈　毅

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开封各大中学学生，中小学教职员及其他职业青年一批，乘机来解放区学习或参加工作，于去年七月中旬某日到达中原解放区某地，陈毅同志曾亲至驻地表示欢迎，特志其欢迎词全文如下：　　编　者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

大家对中国革命满怀热望，对蒋介石集团的黑暗统治，深感不满，对解放区抱着很大希望，所以来到这里。有的要求参加工作，有的要求继续求学，我们一定满足大家的愿望。我们首先欢迎大家参加解放区工作，向大家致革命敬礼。

从中国近百年革命历史来说，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重的压迫。无数仁人志士为求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而流血牺牲。但历次革命运动都不幸失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只是对国外敌人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努力的结果，但盘踞国内的反动势力，依然继续骑在人民的头上，为所欲为，霸占人民抗日的果实。中国人民的生活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仅未得改善且更加剧烈下降，以至破产不能生存。更突出的是，蒋介石集团代替汪精卫出卖祖国，勾引美帝国主义，深入侵略到我中国的各方面。他们狼狈为奸，比日本和汪精卫更凶恶、更无耻。逼迫中国人民不得不起来反抗，为保卫国家

民族的独立而战，为争取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战，所以这次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人民解放战争，这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继续，就是对于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大革命。经过二年来的血战，虽然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困难，须待克服，但是在数年内一定可以打倒蒋介石，驱逐美帝国主义，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已有了确定的保证。中华民族的知识青年，受到人民辛苦抚育，能够参加这一大革命，在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事业中有所贡献，这是无上的光荣。

同学们最关心自己的学习问题，我们对此问题应首先了解解放区与国民党区教育的区别。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奴才，为统治阶级制造统治工具。教师和学生都无思想和学习自由。解放区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和造就一批为人民服务的人材，以适应今日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和将来国家建设的需要。国民党区教育，一般抄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但因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发达，培养出资本主义式的人材，社会不能容纳，造成“毕业即失业”的严重现象。许多专门人才无法施展抱负，不得不从事钻营，去混饭吃。结果是所学非所用，每个人均有用武无地的感叹。解放区的教育是根据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教育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有计划，有目的的培养各种人材。训练后就可工作，工作中又可学习，永无失业失学的危险。国民党区的教育，是一种商品经济的反映。师生关系往往被迫成为知识的买卖关系。当教员的不必一定要去专心于自己的教务，当学生的也难专心功课。教与学的目的很不明确，学校与社会脱节，学习与使用脱节，是其基本的缺点。我们这里决没有这种情形，教员和学生都是从革命的自

觉出发，教的人很认真，学的人很努力，因此往往在国民党区要学四年的课程，在解放区只要一年就可卒业。我们的教员不但不怕学生超过自己，而且希望青胜于兰，一代超过一代，教员学生间真正做到了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同志间的亲切友爱。但我坦白告诉你们，解放区的教育是有其缺点的。例如他在形式上是很不完备，设备上也很简略，这是一面；但另一面这并不妨害我们的学习，实际上在解放区里又有很完备、很精深、很实用的东西可供学习。因为我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一致的，教与学的目的是一致的。解放区有丰富的革命实际，也就有了丰富的、高深的理论和超等的本领。这些理论与本领往往是国民党区所梦想不到的。例如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战争的胜利就是军事理论的胜利。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打败了东条、冈村宁次。也打败了蒋介石及其幕后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使国内外人士所重视和敬佩。公认为中国已有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和自己的杰出的伟大的军事家。而这种军事学说都是数十年来革命战争，无数革命战士流血牺牲所创造的经验的结晶。毛主席便是能总结这些经验，加以理论化，而造成为极其完备的革命军事学说，这是一般旧军事家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更其特出的是毛主席的政治学说，它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武器，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经过伟大群众运动的加工完成了极其新颖的、更高级的科学创造。清楚提出中国人民由革命解放到革命建设的光辉道路，其造福人群将无可限量。

同学们要懂得解放区是团结了一万万六千万的广大群众，共同工作，共同学习，共同思想，共同劳动，十年来我解放区无论在文化艺术方面，在财政经济方面，在政权建设方面，在工农业劳动生产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一样都值

得我们学习。自然其中也包含着许多不完备和某些缺陷，但我相信在今后实践中，将由不完全走向完全，则可断言。自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在中国有其成功的一面，我指出它替社会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人材，我们共产党人中，好多都受过资本主义的教育的洗礼，但这种教育有其社会的局限性，必须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加以改进，才能有益于人民。我们的学习一定要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有好的造就。

再次我想向各教职员，公务员，工商从业员，各位朋友们，来谈解放区的工作问题。解放区不是人浮于事，而是事多人少，人人可得适当岗位，任何天才不会埋没，都可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你们作教职员公务员的，国民党区仅仅是为了挣薪金而工作，要仰承上官鼻息，每日都有失业危险，在工作中感觉枯燥烦闷，不得不被迫去从事自己不愿意的行动。在解放区则不然，每一件工作都有益于人民，每个人无生活威胁，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工作与学习一致，故工作的兴趣能逐日增加。每个人都有远大前途。外间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埋没个性，这是误解。只有在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使个性得到健全的发展。要知道个性的相对方面，是社会的群性或共同性。脱离了社会的共同性，没有什么孤立的个性。所谓个性必须受社会共同性的限制，这乃是事实。向以“自由主义”标榜的美国，实际上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约束着美国人民的个性和自由。在那里资产阶级的利害和偏见，起着极大的指导作用，甚至走到迷信程度。例如美国高出一切国家，要求统治世界以及迷信原子弹万能、金元万能等等例子无庸多举。美国帝国主义根据其侵略欲望，正在制造战争，强迫美国人民去牺牲流血，请问美国人民的自由和个性还能有什么保障？至于蒋管区里，其法

西斯统治，对于人民自由个性的迫害，诸位已经身受，这也是诸位要来解放区的原因之一。请问那里还有什么个性的正常发展？今天在解放区只要求人民大众为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的总要求作共同努力，在此总的政治要求的指导下，决不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和个性。相反的都让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要求得到适宜的满足，凡对革命有贡献的工作，均得到鼓励和帮助。对个人除要求其工作尽责而外，一切私人生活，只要不妨害革命事业，均听便自由的。解放区是将社会的共同性，与每个人的个性统一起来，加以调剂，造成正常的健全发展；而蒋区则根据其法西斯专政的要求绞杀了一切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这乃是事实，大家不要被他瞒过了。

同学们，我上面的意见，是提供大家作商讨。我们共产党人是主张民主的，在军队里都实行军事民主，一般场合，民主范围更大。共产党人只有一个权利，就是向人民提意见，人民同意就做，人民不同意只得耐心说服，或暂时保留或撤销。共产党人从来不相信自己的意见样样都对，更没有权利强迫人家服从自己。强迫人家做坏事是要失败的。蒋介石的罪恶就在训练大批军队和特务，专门强迫人做坏事，他的灭亡日期也不远了。孔夫子周游列国，迂腐不切实际。他当然不是劝人做坏事，而是空空洞洞的劝人做好事，结果也无人听他的，弄得在贵省陈蔡地方挨饿。这证明强迫人家做坏事固然要失败，就劝人家做好事，如其空洞不切实际，文不对题，不能适合人民的要求，也并不妙，孔老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全场哄堂欢笑）。我们共产党人办事就是根据人民的要求，根据自愿原则，协同人民去办，所以到处都告成功。你们来解放区的学习与工作问题也按这个原则来办。

今天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而一旦全国胜利实现，要在十多年战火余烬上，进行建设，更是百端待理。那时需要的不只是几千个几万个人材，而将是几十万几百万有决心、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材。回忆抗战开始，曾有无数万热情进步的青年，涌入解放区阵营中来，经过十年的实际锻炼，在思想上、能力上都逐渐成熟，成为今日各个部门的重要领导人材。现在处在人民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中，必然又有大批人材参加进来，我们相信他们必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祝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原载：《论知识分子》
《新华日报》资料室编　1949年8月版）

新四军苏北陈总指挥官毅对时局发表谈话

近日新四军陈指挥官仲弘先生由东台来盐城公干，并与地方绅民接洽关于时局进展问题，各方颇极关切，记者乘便特于本月二十八日晋诣，蒙陈指挥官接见略谈时局问题，兹将谈话内容发表如次，以饷读者。

（一）记者问：外传西面将有大军开来苏皖进攻贵军，此事确否？究有若干部队可否见告？

（二）陈指挥官答：西面大军东开进攻新四军确有其事。本月初旬对方已公开准备进攻我军为汤恩伯部九个师，由鄂北豫南已向东开动，李仙洲三个师，连同张淦、巩连芳、孙桐轩、马彪、何柱国等部，均已开至河南新四军彭雪枫部及皖东新四军张云逸部驻地附近，总计反共进攻军约有二十九个师，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其中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以增援韩德勤，武装调停苏北磨擦名义，业已开至泗水以南风谷村车桥等地，唯沿途经过八路军防地，八路军为顾全大局一面劝阻，一面让其通过，一方主张维持东北军与八路军多年友谊劝其不要参加反共内战，虽霍部态度不明，但由八路军退让，故尚未立即发生冲突。

又李品仙所属之莫德宏部业于上月通过淮南路，联同原在皖东之驻军李本一等共约九个团，约于本月中下旬猛攻我新四

军四支队驻地，接连攻战合肥全椒县境内之梁园草庙大马厂复兴集周家岗界牌集等阵地。新四军四支队为顾全大局，促对方觉悟，乃自动忍痛撤退，莫师不察，继续猛进，以致我四支队损失重大，情势已属万分严重。

反共大军之前哨战事实上业已开始。莫德宏在皖东奋勇冲杀企图取得反共首功。霍守义师南下挑衅，待时而动，或系违反于总司令意旨，因于军在鲁南与八路军共患难日久，或不至出此，汤恩伯李品仙等部，将为此反共内战之主力，现正向东急进，目前已开到皖豫边境，若主持反共的阴谋家不悬崖勒马此破坏抗战团结的惨剧，终难避免。吾人处此危局，又值大敌当前，对此种反共罪恶，诚不胜惋惜。

（三）记者问：敌寇盘踞中国，抗敌乃天经地义，内战为人民所反对。今大军出动内战用意何在？贵指挥官观察如何？

（四）陈指挥官答：照平常人心理，对此种举动，当然吃惊，甚至不相信，但我们试把两月来国内外情势略略探讨一下，便可了然其真相。先生知道第一，日本强盗已放弃南宁龙州宜昌等地，并闻岳州武汉敌亦有准备放弃之说。第二，德意两国劝中日停战言和的消息，已公开传播。第三，日本天皇最近召集御前会议决定，重新以重庆国府及蒋委员长为对手寻求和平谈判。第四，日外相松岗洋古公开宣称日本意旨是在使汪蒋言归于好。第五，何应钦先生电令八路军限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扫数开往黄河以北，先生知道这个命令是一种违背事理的故意刁难，也就是一种发动内战的信号，这是不难明白的事。我们把以上事件，结合研究可得到结论，此时不乘日寇后撤，加强团结动员大军抗敌，反而大军深入敌后打新四军，加上中日和平妥协空气高唱入云，则知道大军剿共，必然是中国亲日

派投降日本的一种大胆尝试可无疑义。就是我离开本人的职位，以老百姓的眼光来观察也多少知道亲日派与日寇两方的配合作用。日寇忙于发动太平洋大战，德意日三个侵略国忙于与英美决战，都需要一个太平的中国，即是取消中国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共领导之下，是最彻底的抗战力量，自然是他们的眼中钉，非首先除掉不可的。新四军力量是比八路军小，于是首先向新四军开刀更属必然之事。总之此次反共内战，为亲日派的发起为日寇所策动，其违背全国人民意志破坏抗战国策乃属显然。

（五）记者问：外传汤李大军进攻系增援苏省韩部解决苏省纠纷，此种臆断属实否？

（六）陈指挥官答：本人认为此种说话恐系亲日派宣传借口，事实上苏北问题在上月十日新四军八路军已停止进攻兴化，同时提出退出盐城东台立即共同挥军抗敌作为与省府合作的条件，省方不断与本人交换意见，李明扬韩国钧两先生及苏北士绅代表又双方调停不遗余力，则知苏北问题在新四军重大让步之余，事实上已停止军事行动，前途已有和解可能。此时出动大军的当然别有用意，其目的在扩大反共战争破坏对内和平，便利投降日寇，更可证明。

（七）记者问：省府韩德勤先生对此问题态度如何？

（八）陈指挥官答：本人与韩先生未蒙见面，韩先生代表亦仅间接交换意见，韩先生表面虽愿意实现苏北和平，但不愿阻止西面大军东开及霍守义师南下。最近有人警告本人，谓韩先生恐系一面借以缓兵一面援兵开到即将大举反攻，本人早已料到此层。但为顾全对外抗战对内和平局面，只得委曲求全，不料八路军让霍守义师于本月二十日左右南开与省军联成一片

后，韩先生的态度转而强硬，推翻前此和平协议，勒令新四军恢复黄桥战斗以前状态。韩德勤先生决心进行内战绝无合作诚意于此可见。

（九）记者问：时局至此前途发展如何？

（十）陈指挥官答：目前莫德宏师在皖东已大举进攻，霍守义师开至车桥泾口与韩会合后，即决定采取挑战态度，我皖东四支队力量恐难应付，情势危殆，在苏北的新四军八路军恐难坐视不救。

另一面汤李数十万大军东开，其目的在彻底消灭新四军，新四军为自卫计只有请八路军援助，新四军同人等电请朱德彭德怀总司令至少派援兵十万人南下应援。

目前唯一希望，希望汤李大军立即停止东开，由双方协商和平解决前此纠纷，不仅苏北一隅问题可以和解，即全局亦可好转，进而以剿共之师转攻日寇，全国人民谁不称庆。如果不顾一切，一味硬干到底，新四军除了自卫应战，力求生存而外无他途。

如果时局坏到那步田地，责任应该由亲日派将军们负责，全国统一局势可能破坏，政府领袖威信及抗战国策将扫地无余，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限于危殆，我人除太息痛恨外，只有努力打破反共军的进攻，才有使时局好转的一天。本人相信我们的自卫战争在广大人民赞助下，是有完全胜利把握的，但本人仍望政府当局及全国人民主张公道力挽危局也！

谈话至此，记者见有外客乃告辞而出。

（原载：《江淮日报》编《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面观》，此处录自中国人民大学编《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资料选辑》1957年）

陈毅将军谈话

据十五日由青岛返京之郝汀上校谈：此次在临沂得晤陈毅将军，当以山东各地冲突之事真象如何为询，承告以外间谣传我军攻青岛，攻即墨，图截断青岛水源等说，均非事实，纯系国民党方面别有用意之虚构。至德县、泰安、大汶口、枣庄、周村、张店、胶县等七处，则确有冲突。而此事之由来，实由于国民党当局不断增兵徐州，积极准备北上，并于五月中旬曾攻占我陇海路南之夏邑、萧县两城，又强占我安徽定远县为中心之淮南津浦路西广大解放区，残酷“清剿”；六月七日东北休战后，又在路东强占我来安，进窥天长，后在扬泰一带屯集重兵，有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之势，我山东苏皖新四军谊属一体，自无坐视不救之理。而须特为指出者，德县、泰安、大汶口、枣庄、周村、张店、胶县等地，并未驻有国民党军队，只驻有伪军。其驻德县者为伪王金祥部，驻泰安为伪宁春霖部，大汶口为伪吴化文部，枣庄为伪王继美部，周村为伪王砚田部，张店为伪张景月部，胶县为伪赵保元部。彼等过去凭藉敌寇势力，无恶不作，山东人民恨之入骨。乃胜利以后，竟被国民党全部收编，命为内战先锋。自一月十日停战令后，该伪军等毫不遵守协议，仍不断向我解放区袭扰，进攻我军之事，几无日无之。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民众不堪其苦。枣庄且有殴击我方小组代表，几至丧命之事发生。凡此情形，我军已不至一次向徐州、济南各小组及北平军调部提出抗议及备忘

录，要求制止，但迄今并未有一件获得圆满解决。近届麦收，各该伪军又复结队至解放区抢麦，民众纷纷向我军哭诉，要求除此巨害，我军迫于不得已，遂采取自卫手段，将该伪军等缴械。现在上述七处，战事已于本月十二日全部结束，当地秩序迅已建立。溯自白崇禧将军去华北巡视之后，国民党当局即加紧空运军队至济南，每日飞济军用机达十五架之多，估计至今已增兵一万以上。据报现在江西之第四军与在越南之第五十三军，亦有于短期内运来山东之消息。是则国民党当局在山东布置大举进攻之企图，已昭然若揭。我山东军民为了生存，断不能坐以待毙。倘国民党军事当局仍继续大事运兵增兵，并在山东、苏皖及中原各地向我新四军进攻，则我山东军民只有被迫实行自卫，但此绝非我们所愿。

最后陈将军表示，德县、泰安、枣庄三处执行小组国民党方面及美国方面代表，均在我军保护下安全无恙。关于胶东一带纠纷，彼建议在青岛派一执行小组就近调处，并解决恢复交通问题。闻此项建议，彼已电达周恩来将军转三人会议考虑。

（原载：《群众》第11卷8期　1946年6月22日）

陈将军对郝鹏举的谈话

背叛人民的郝鹏举，于二月十三日被押解至临沂附近某村，他要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陈军长仍以宽大态度同他接谈。这次谈话有记者在场，兹将其经过报导如下：

郝鹏举见着军长即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陈军长回答："请坐下，慢慢谈。"郝此时手足无措，感愧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陈军长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答："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只谈了两小时。"

陈问："你见着蒋介石吗？"

郝答："没有。"

陈问："你与陈诚谈甚么？"

郝答："谈战局，薛岳亦在场。"

陈问："陈、薛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答："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战。"

陈问："他们有信心吗？"

郝答："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各路部队均怕暴露和后路被切断。半年来，他们失败很多，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问："难道要你出任'鲁南绥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丧声叹气说："唉！陈诚向我说，四十二集团军番号仅是一个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绥靖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了当，不过是要我以一个孤弱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提。"

陈问："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声叹气。他回答："我二十九当天（按是一月二十九日郝叛变后第三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队，一、部队不准进驻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白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队未领到经费，仅有段茂霖（按是国民党五十七师师长，亲率预四旅驻海州地区）暂垫一部分，又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烦，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一百三十四斤，但仍照二百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抽烟穿鞋就不要想到。一年来，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四军及八路军部队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是天壤之别。所以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二月六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心为上的战术，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问："那么，为什么你要投蒋呢？"

郝悔恨叹气地说："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

陈问："你说是被骗投蒋，如何又枪杀我派去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把他们安全送回？"

郝答："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数坏分子的劫持，企图以此向蒋、陈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数

日内，我受良心的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军长态度很温和地说：“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数点：第一、去年六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六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阴谋已露，自卫战已不能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已无希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对你们部队采取一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者欢送’的民主自愿的政策，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区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不保留你们，是决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于开到边境之后各种待遇不变，无非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人民方向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首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军长个人，一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说：“那么为什么你投蒋时一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能安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郝答：“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说：“到了去年九月两淮失守前后，蒋薛与你们的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用电报屡次劝告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优

待，不咎既往。到了今年一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我又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方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不觉悟，我知道已无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降，我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放弃此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蒋介石。这于解放区并无什么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即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仍然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令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总不听话，敢于在二月初参加前线进攻。到这时，我才派部队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对于拖走后如敢反叛，定可迅速辑拿归案惩办，也是早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竟到了这种地步！”

郝俯首点头，顿足叹息。他说：“对于拖走时捕杀军长派来之联络人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说：“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十三日，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投机取巧必至身败命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

和爱国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很大，一出击，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及你作用很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如有能够保全、能够宽恕的地方，人民定可酌予考虑，不过你作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犯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陈军长谈话至此，即令退出。郝俯首辞出，连呼：“一切由我负责！我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共，对不起军长！……”

（新华社）

（原载：《群众》第十四卷九期　1947年3月2日）

就是这样我们过了江

——记陈毅将军讲渡江准备

杨　刚

这几个月以来，我常常有一种自己非常渺小，不知所措的感觉。这种感觉初来时，也曾使我有些烦恼。时间很短，我就明白这是很自然的。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惊天动地的大大小小英雄事件，而且是那么多，多到使人能够把被敌人打死而身体不肯倒下去的人视为平常；近来，解放军宁肯睡在人行道上，不肯走到人民房子里去暂坐的事情是早已被大家认为自然现象了。然而正是这一类似小而其实是惊天动地的事件点化出了伟大历史的须眉。我感到自己渺小，我只想努力的跟上这个震动世界的伟大时代。

五月廿三日我和十来位先进先生们到了丹阳。丹阳是一个有近四万人口的城市。第三野战军总部在那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当时在那里驻节。可以想到，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看到陈毅将军。人民想看到自己的领袖如同想看见亲人那样的迫切专诚。我们是夜里到的，一到，我们就约好第二天大家守在家里，等候看到陈将军的机会。果然，第二天上午就有人来告诉我们说“军长下午四点钟要招待大家。”这时我们才知道虽然陈将军已经是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是许多军长们的统帅，大家还是叫他军长。因为他是万人爱戴的新四军的军长，大家舍

不得把这个称呼从他分离。

在一条狭隘街道上一所小而比较精致的房子里，陈军长出来接待我们，他的样子衣服不消说得。人人都知道解放军的领袖和他部下的指战员没有大分别，完全是朴素、诚恳、谦和。陈军长更有一种英迈之气。宾主之间简直没有什么客气捧场的话，因为大家都不会说。陈军长告诉了我们许多问题，同时也和我们讲了一些叫人不能不从心里惊叹的前线故事。横渡长江，粉碎天堑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准备，它的进行就是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件。

第三野战军所管的渡江前线是在安庆与芜湖之间的江面。渡江是四月廿一日早晨零时举行，廿四钟头之内，三野几十万大军即已全部跨过长江，使反动派匪军崩溃散逃。我们从报纸上看来，好象这是非常轻松的。却不晓得在渡江之前的困难要需用多少力量，多少准备才把它们克服。然后，长江才由匪类的坚固防线，变成了解放军的坦途。陈军长和我们讲的就是这种准备。

国民党匪军也晓得长江要紧。尤其是芜湖安庆之间是历史上军事渡江的地方。解放军选择的渡江地点是裕溪口，正是匪类防守最严的地方。他们在东西梁山上驻了重兵，安了炮位。江面上有一百五十只美国给的舰艇游弋上下，见到了人影船只就开炮。同时，所有江面上可能有的船只都被他们集中到南岸去，不许出来，几百里江面森然无人，只有茫茫白水。

准备渡江的解放军大部分都是北方孩子，不习于水。他们听说长江比海还要宽阔。鸟儿飞时，嘴里要衔一根小枝。在江上飞一阵，累了，落下江面来，把小枝放在水上，然后站在枝上休息一下，衔起小枝再飞，飞了再歇，不知要这么歇多少次，

才能达到彼岸。他们听说在江南地上随便伸手都摸到长蛇，蚊子有蟑螂那么大。有的人上了船连站都站不住，看见水就要头晕。上小船的跳板他们害怕，走上去，一看见水就不大敢迈步。在过淮河的时候，他们已经感到了困难。好在淮河是没有敌人防守的，没有担心。但是过了淮河之后，南边不如北边的感觉就在他们心里生长。南边第一是多雨。行军时一雨七天，战士们在路上跌跌滚滚，弄得象泥球。完全不象北方乾乾燥燥好走路。南方田径又窄，两边水田，不象北方到处路宽好走。尤其是炮兵在江南田埂上感到为难。有时候大炮得用几十人抬着走。所以战士们没到江边已经觉得大江和江南令人讨厌。

除了战士们怕水之外，解放军还有其它的困难。供应就是其中之一。几十万大军所要的粮食、柴禾、草料，其势不能完全由淮北供应，而需要就地老百姓帮忙。

所有这些困难解放军完全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也看得到。反动派素来不肯动一个指头来解决他们的困难，因此，他们以为解放军也会被长江难倒。对于人民的解放军，问题却不是这样。解放军定要渡江，必然渡江。并且他们一定要在雨季以前把江渡过，否则雨季一到，春汛大发，他们就只有把军队拖回淮北，到秋季再来。然而这是江北淮南的老百姓所极端反对的。因此，即使解放军要把自己从久经陆战和山地战的军队变成水军，他们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他们所依靠的不是神力，不是外力。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为人民而战，他们所依靠的是人民。

首先，他们的粮食柴草不成问题。皖南是新四军旧地。老百姓对于回来了的新四军看得比自己的亲人还要切。他们自动的收粮割草供应自己的军队，只要军队不再离开他们往北走。他

们替军队出许多主意，帮忙他们战胜水的恐怖，战胜渡江的困难。在解放军自己，虽然已经是百战百胜的雄师，却决心从头做小学生，日以继夜的学习渡江。

巢湖练水军应该是解放战争史上重要的一页。三月间巢湖沿岸的老百姓天天看见成群成队的解放军围在湖边，专门上船下船，下船上船。走走跳板又下来，下来了又上去。把船摆出水去，没几远又摆回来。不但是战士们如此，连武器也是如此，天天把枪枪炮炮搬上各式各样的木船，搬上又搬下，上帆下帆，摇船撑船。日日夜夜，解放军如同疯了一样，专做这些老百姓看来毫无道理的事。就这样，几十万北方人学会了跑跳板，在船上站得住。他们学会了在一百吨重的木船上放什么样的武器，在二百吨的船上又放那一种。

以后他们要学渡过湖面。使用了两个师去做这件事。一个师在一点钟内，掌着顺风就渡过了湖。湖面比长江宽了好多倍，能在一点钟内渡过，北方人因此就知道过长江无非几分钟的事。但另外那个师却在巢湖里搞了三天三夜，又遇逆风，连自己的队伍都不能集合。解放军就使用自己习惯的检查办法，来研究两个师成绩大异的原因。发现第一个师在渡淮之后就把掌握水当作大问题来探讨。他们实行找诸葛亮。师长将军们亲自去拜访地面上有经验的水手，请了几百人来吃饭请教，送这些人到连队里去讲驾船，风向，水性的道理。随后又请他们带了队伍天天到水上去练习。结果，他这一师人在一点钟之内抓到顺风就过了湖。另外一师也是练习了的，可是没有第一个师做得完到仔细，它失败了。而第一个师的经验就成了全军的模范。这时候，老百姓都自愿替解放军驾船渡江，可是解放军因为老百姓不习于战争，决计自己依照人民的办法练自己的水

手。每个军在一个月内练了二三千水手。于是飞渡长江的翅膀就完成了。

翅膀完成，还要找寻飞的路径。我们说过，安庆芜湖间，只有裕溪口是经常可渡的。而这个口子是由匪类重炮和飞机军舰守护。并且在江心沉了铁船以堵住过江的路。巢湖和小河流里练好了的水师不能摆在江上听其毁掉，但又不能不准备在攻击时期，以极短时间将水师冲入长江。有名的翻坝故事就是几万船只由湖港翻入长江的史迹。

由湖到江有许多小水流，有时水流不够或流向不便，解放军自己就动手挖小运河。这些水流和长江的水位高低不同。长江水高则进小河的水太急，船要被打回湖里。长江水低则船冲出去太快又危险，因此必须筑坝以控制水位使之平衡，这样船只才能按计划整队出进。若遇两股水高低太悬殊，解放军水手就得把船背起来，从陆地翻过了坝送到长江去。有时候，他们还要找诸葛亮。军长师长亲自去拜访有经验的水手及水工程师，请他们到军队里来教导在江堤下面打洞，打开几层洞，使船能从洞里入江，而江堤上则过炮兵。所有这些挖运河，筑坝，翻坝，打洞的事都在夜里做，由军长师长和指战员大家动手拿锄头，掏泥土。有时候陈军长自己也去做。到了四月十号，这套工作全部完成，渡江有了把握。晚上拿船放到长江去，在长江里又每晚演习。等到下令渡江的时候，长江已经是和北方的公路一样，战士们对它丝毫也不生疏，不觉恐怖了。

可是敌人却还在梦里，他们绝对不能想到这样可怕的长江，有他们的海陆空军大炮和飞机监视的长江，我军怎样能够靠近。

解放军到了长江，派了侦察员过江去，在他们的大炮下面

练习爬悬岩、走峭壁，他们完全不知道。刘汝明杨干才这些脓包早已被长江水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四月廿一日大军从江上排山倒海而来时，他们疑为神兵天降。同时江南游击队又出来夹击，匪类只好摸头就跑，还是跑不掉。杨干才垫了他自己乱军的马蹄。

大胆精细，是这一次准备渡江的奇迹。我们每个人听着都感到有点目瞪口呆，眼盯着陈军长，唯恐他停止了不讲下去。那时陈军长目光炯炯，燃烧着为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敢骄傲的光辉。

“这也是从老百姓学来的！”陈军长在讲救生设备。“我们只有极少极少的救生圈。那里够用呢？但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用三角板和稻草圈。”三角板是三角形的木板，中间空了，套在肋下象一面枷。稻草圈是十二斤稻草扎成的，扎在上身周围。人下了水浮起来可以游过水去。在船上的战士们照例是不开炮的。因为每开一炮，船就往后退一截。只能任敌人开炮，炮火密或者船翻了，就游过去。事实上敌人的机关枪极难打中小船，打中了，也只是一个小洞洞。这也是练习过了的。解放军故意把空船放到江心开枪去打，船只是打转转，却不能沉。渡江船的数目损失甚少。打伤了的用帆布很快就修好了。

我们所听到的实在是惊天动地的事实。经常我们总记得一些老话。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什么“习惯是第二天性”。都是说人所习惯者永不能改。可是在这一次坚忍卓绝的渡江准备中，却把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把陆军变成了水军，把敌人严重防守的浩荡长江变成了平阳大道。这不是奇迹是什么？然而陈军长说这不是奇迹。他说：

“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养成了一种风气，遇事跟

老百姓学习，跟他们商量，实事求是的演习。一个地方学会了，就传布出来大家学。我们有事就拜访诸葛亮，请他们来教我们。我们又有军中的民主讨论，连队里反复开会，提出许多问题来，补充老百姓的法子，使那法子一定是尽善尽美，就是这样，我们过了江。”

（原载：《大公报》1949年6月5日）

江西革命斗争中的几个问题

（根据访问陈毅同志的记录整理）

一、对编写江西党史的意见（略）。

二、关于红四军游击赣南问题。

这是一九二八年冬的事（即公历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经上犹、崇义、遂川到广东的南雄，又经三南（龙南、全南、定南）、会昌、寻邬、瑞金、于都等地，到兴国、永丰、吉安的边界东固和二、四团会师。以后敌人进攻，就走乐安、宁都、广昌、石城又到瑞金，打下了汀州，到龙岩，又倒回江西省。红军行动的路线大致是这样。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古田会议。以后，朱总司令先带一部分队伍回江西，毛主席后一步来，在宁都会师。以后又到兴国、乐安、荇田、富田，开了“二·七会议”，成立了二、四、六军，又到兴国去赣南。在赣南走了十个城，又回到汀州。以后蒋冯阎大战开始了，江西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红军两次打长沙，回来拿下吉安。冬，又退出吉安，成立了河东。一九三〇年各成立省苏维埃政府，以后是反国民党一、二次“围剿”。一九三二年整整一年敌人没有大的进攻。“二·七会议”我没有参加，那时我们留守在荇田，毛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代表前委去参加的。“二·七会议”后编了个六军，我被调去当政委。

那时红军到的地方很多，包括现在赣南的十七个县，吉安

的许多县，还有南丰、南城、宜黄、乐安和福建的建宁等。你们问当时红军游击赣南时撒下了一些什么革命的种子，那就是当时红军纪律很好，给群众影响很好，地方党组织并不是红四军去建立的，革命种子是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各个地方的党组织，也是那时的江西省委建立的。北伐战争在江西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赣西南的影响最大。当然，影响最大的是湖南，而红军正是利用了这种影响，罗贵波、赖传珠同志就是受了那种影响在北伐时期入党的，以后再和红四军结合起来。至于各地党的组织的大规模的建立，那是建立根据地以后的事情，是从上而下建立的，这点和其他根据地是一样的。特别是“二七会议”以后，党的组织才很快发展起来。在这以前，有些党员出来干是逼上梁山的。那时，有些党员的机会主义很严重，甚至不承认自己是党员。看到我们红军只有一千多人，穿的又破破烂烂，不敢出来，相反的群众倒比他们更积极些。当时我是做地方工作的，去找地方党员出来，他们有的便推脱说：对党对革命我们是相信的，但是出来工作很困难，别别扭扭的，于是我们便采取这个办法，到了一个地方就召开群众大会，把这些党员找出来，请他们上台讲话。这样就公开了他们的身分，逼上梁山，然后再给他们一些枪，这样就干起来了。所以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两个因素，一是红军的力量，一是革命时期留下的种子。本来一九二七年以后，江西也很反动，反动派杀了我们很多同志，有的逃去了，尽管这样，还是留下了一些种子。这点与湖南不同，湖南是斩尽杀绝，杀得最干净，原则上只有自首，而自首了的就不能和我们见面，江西则不同，江西留下了一些人，如陈奇涵、肖华等同志都还能站住脚，而且有的是头面人物。

红四军到大余时，和敌人打了一仗，没有打好，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响导，真是有些寂寞之感，后面白军紧紧追赶，地方土豪劣绅的武装又很强，一走错路便有全军复没的危险。在平头坊就因为我们的响导把路带错了，遇到了敌人，以致吃了大亏，到南雄时，弄得我们狼狈不堪。当时一般群众不太愿意给我们带路，我们也不敢随意找人当响导，我们找的人是曾经和北伐有关系的人，有些人愿意给我们带路，而且比较可靠。在三南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带路的人，是党员，信丰人，他是信丰暴动后跑出来的，在龙南地主家里教书，他听到我们来了，便自动地找来，说是党员，愿意给我们带路，在苦于没有响导的时候，我们也就拿着黄牛当马骑，叫他带。当时我们比较怕的是广东军，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寻邬一带，都没有反动派的军队，并告诉我们寻邬有地下党员。这个人很活跃，沿途做工作，他是赣南人，说话群众都懂，他沿途宣传说：我们是红军，是经过这里的，不动你们，你们也别动我们，河水不犯井水。有一次我们在宿营，他打听得后面廿里有敌军，我们连夜就走。这个人就是黄达，后来，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叛变了。到寻邬，我们见着了古柏同志，他是逃出来的，县里要捉他。以后直到东固和二团会师，这时耳目才灵通了。由此可见，当时建立苏区的地方，都是大革命有基础的地方。上海、北京的学生在外面呆不住，就回到家里来，搞一点农民工作，红军一到就结合起来了。所以根据地在南方很发达。北方虽然有秘密工作，但是没有红军，所以没有根据地。这两个因素，主要的是红军，所谓星火燎原，火是红军，燎原是群众，风助火，火助风，但引子还是红军。

江西根据地的建立，除了以上这些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领

导的选择问题，当时选择井冈山根据地的，是毛主席，而不是当时的中央。井冈山处在两省的交界地方，包括江西、湖南省若干县，群众、地形条件都很好，“天高皇帝远”，在这里可以发动群众，训练干部，取得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所以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的建立，除了各种客观原因之外，领导上的选择，这是一个主观的因素。事实上，那时上海党中央并不是同意这样做的，自井冈山根据地开辟以后，发展的方向主要是向江西，而不是向湖南发展，因为湖南方面的敌人比较强，而江西则没有本省的军队，外省军队与地方有矛盾，所以我们就利用这点，避强就弱。以后井冈山站不住脚了，便向东发展，选择赣江以东建立根据地，这是很好的一个根据地。以后我们转来转去总是不肯离开这个地方，惨淡经营把根据地搞起来了，以后在这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而失败了，我们被迫退出了这块根据地，如果没有“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可能在这里最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

根据地工作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只打游击不坐下来搞政权，这便会形成流寇主义，很危险，光打游击确实很轻松，有吃有穿，而搞根据地则很苦。另一个倾向是保守主义，死死地守在根据地里，军事上和敌人硬拼。

当时赣西是兴国、吉安、东固党的组织比较强大，寻邬、信丰、闽西党的组织也很起作用。兴国有陈奇涵同志，东固是曾山同志。江西省的两次党代表大会，我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执行中央的路线，你们说陈正人任省委书记时开了一次党代会，我记不起了，但李富春同志当省委书记时所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我是知道的。

三、关于几次“左”倾路线的问题。

你们可以看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也讲到了，而且讲得很好。

第一次瞿秋白，江西没有什么，江西的损失也比较小些。

第二次李立三，江西也没有贯彻执行。

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多缺点，例如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肃反上党内不信任，逼供信，扩大化，不相信知识分子。事实上杀ＡＢ团许多人是冤枉的。当时，有的人动摇是真的，也可能有个别的ＡＢ团。解放后邵式平同志和我谈如何处理被当作ＡＢ团错杀了的同志的问题，我说不要说什么ＡＢ团了，都称作革命家属算了。这些人我都很熟，我代表前委和他们接过头，这是肃反上很惨痛的教训。主力红军长征以后，江西老百姓说：共产党、红军在这里样样都好，就是肃反搞得不好，当然，少数反革命分子还是有的。

关于中央苏区的错误，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个电报，指示苏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知识分子问题上，和同军阀矛盾上，……曾经有十个错误。你们写党史作结论就应该根据这些。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针对这十个问题接受了经验教训，没有中央苏区的这段好的经验，抗日战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百团大战后，我们很困难，但是我们坚持下去了，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统一战线的工作，这都是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

关于苏区武装问题，提起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很有趣味，有三种形式：即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赤卫队。苏区末期还有模

范队——事实上是脱离的，和反动派的武装是兵对兵，将对将，我们的主力对付敌人的主力，地方武装对付靖卫团，模范队守边界。主力部队最强，但是很象海里的大鱼，很孤单，需要地方武装的掩护，地方武装也要出发打仗，就由赤卫队掩护。

四、长征前夕，中央对江西的布置，只能根据印象谈谈。

中央是有布置的，当时只剩下宁、瑞、长、会五个县城了，于是决定长征，组织中央局江西分局，项英是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全权在握。陈潭祖是组织部长，汪全象是保卫局长（赣东北派来的），贺昌是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我是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做政府工作。我当时带了花，不能走，又因为在这里搞了七、八年地方工作，所以被留下来做政府工作。名义上中央局负责指挥赣东北、湘赣、湘鄂赣、闽西、闽赣……等地，实际上只和方志敏通过一次电，其他地方都联系不上，只能指挥原中央苏区这块地方。曾山同志领导江西省工作，毛泽潭同志领导闽赣省工作。当时组织部署是有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政治部署。当时中央博古这些人，对中央苏区局势的看法是悲观的，认为会完蛋。同时为了所谓军事上的保密，便不作动员，连党内也没有作动员，所以红军长征是没有交待就走的，走了以后才动员，而且中央事前交待说，要等红军过了河，过了大余，到了白区才能宣布红军退出的消息。所以以后就来不及了，一动员敌人就进来了，形势急转直下，本来事先应该作些准备工作，结果什么都来不及作。当时还有五个县城几十个县委，如果派一批老苏区干部去参加领导，还可以坚持游击战争的。后来，我们在油山能够打游击，为什么别的地方就不能打游击。当时没有告诉留下来的人上山去，结果大家还象那样在苏区时代的一套作法。

到最后一批人离开时，博古、总理是到医院来看过我，问我对留下来有什么意见，我对博古说，你们要走，不说我也知道，但为什么不先告诉呢？那时，东南北三面都不能去，要走，只能向西走。

其次是项英要负责，这位老兄，军事上不懂，政治上也不高明，他估计红军一过江就会打大城市，会在湖南搞一个苏区。作了这个打算，所以一切工作不是为了转入游击战争，还是象苏区那样大规模的干，大编队伍——编独立师。征兵，大摆摊子。那时我们在苏区有很多家底，项英都要带着走，不肯丢，象一个事务长。我说对野战军（红军主力）不能指望了。我估计在赣江，中央主力在两岸打了胜仗，在湖南建立根据地也很困难，但野战军被消灭也是不会的，因为出去了，回旋的余地很大，但决战是不会打的，我们现在只能作自己坚持下去的打算，蒋介石兵很多，只要一部分去追主力红军，另一部分仍然会留在这里，这些印刷机等东西丢掉它算了。我当时提出三条办法：1．发展游击战争，上山搭棚子，准备好敌人三个月的狂风暴雨，让这阵狂风暴雨过去就好了；2．搞地下工作，准备灰色群众，国民党军队都是外省人，不必怕，怕的是还乡团，但也不要紧，和他们谈判，最坏的杀他几个，就可以安心了。其实那些地主自己是很怕的，逃到外面生活也很艰苦，现在回来只要有碗饭吃，他们大部分可以和我们相安无事。敌人搞自首，我们可以派地下县委去当自首大队的领导，应付敌人，假装带他们搜山。3．不要再指望野战军了，野战军出去是自求生存，蒋介石怎么会让我们恢复中央苏区呢？现在怎么还能搞什么征粮、征兵，编什么师团营呢？而项英一直要“大”，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三个月来

还是老一套办法，没有转变过来，天天打败仗，悲观失望。项英有一次集中八个团去打广东敌人的一个营，结果损失八百多人，士气的瓦解可想而知了。以后我的脚上的伤渐渐好了，扶着拐杖能到阵地去看看，感到硬是抵抗不住敌人的进攻，士兵退下来，李天柱就枪毙。我说不行，收兵好了，怎么能强要人家去打正规战呢？

如果中央走的时候，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说明局势的严重，作好准备，在苏区内搞两面派政权，那么中央苏区游击战争还可以坚持的。即是没有这样做，以后在看到形势转变时，还可以来得及的，而项英却不肯这样做。有一次在病院中开会，我主张搞两面派，我说一百个地主中，至少有五十个可以和我们妥协的，最后只有瑞金县委中几个同志如钟得胜来医院找我，他们说他们很赞成我的意见，所以瑞金以后能够坚持游击战争。

我在病院起草了一个文件，等到后来项英同意时，已经发不出了。在过去苏区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公开的，凭一个纸条可以走遍全区。这时形势转变了，过去那种情况结束了，这时应该搞灰色，搞两面派，游击小组，晚上来活动，锄奸，给游击队搞情报，做点白军工作，不要说项英，陈毅在这里，不要出什么布告（项英喜欢出这种布告），这种布告吓不了人的，要等待时机，当军阀混战或日本进攻时，来一个总暴动，中央苏区说不定又可以恢复。蒋介石、陈济棠之间你能保证他们不会打仗？闽西工作比较有准备，他们能坚持下来。

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武工队差不多，是地下工作和乡保长两面派和游击队相结合，搞敌人活动的情报，领导群众抗粮、抗捐、抗税，不搞什么土地改革，搞半合法斗

争，把最坏的地主杀掉，封锁敌人耳目，这样，其他地主就害怕了。

赣南游击活动发展到南雄、大余等地，新城、池江都有我们的组织，光有游击队是坚持不了的，敌人十几个团来“清剿”我们，我们就是要到平原去，敌人很奇怪，找不到我们，我们天天和敌人兜圈子，有时甚至和敌人住在一个庄子里。

（抄自江西省展览馆　　1978年3月27日）

室中旅行法

爱克惹维叶·德·马斯特

Exavier de maistre 发明

曲　秋

有一个怪物终朝围绕着我们。使我们一天到晚，站又不是坐又不是。想出去又不知何处可去，想作事又不知从何作起。你若去找人谈话，这怪物会使你更难受，每每弄得彼此相对无言。你上娱乐场，也一样使你感到无可奈何的痛苦，因为这个怪物跟着你时，纵有美好的音乐你也听不上耳，并且只有愈来愈觉得烦躁的。好容易混到日落西山，好容易坐到灯前，你想打开你爱读的书，以为可以开心一二；殊不知这怪物又马上把书变成迷迷麻麻的黑团。你闭书倒床，以为整天的彷徨可在睡乡中得些香甜，岂知你才"辗转反侧"睡不着。假如你邻人的鼾睡声打入你的耳里，这个怪物的可恨更甚了。你想起床，但起床后又不与以前一样么？你不起床只好闭眼强睡，但无论如何你是不能睡熟的。这不是你自己的错，这是怪物把睡神给你驱除了。这个怪物是什么？它是终朝寻着我们，使我们既不能痛哭，又不能大笑，只是伸懒腰，叹闲气。大家见着只说："无聊无聊"你自己也不觉要说："枯寂枯寂！"这无聊和枯寂便是我们所谓的怪物，——它颠倒我们，播弄我们，摆布我们到休

无可休！

这怪物之落在我们身上，并不是从天飞降，乃是由各种道路而来。譬如你的爱人背叛了你，你的朋友对不住你，你的计划失败，你的事业瓦解，你遭了丧亡，你遇了变故，这时你便要碰着这怪物了。她便引你到无可奈何之天去。你和它勾搭上手，你的苦恼开始了。终要到无法排解的地步。在时间的过程中，有几人能逃出这一只苦恼的罗网？

难道这怪物真永远征服我们，而无法解脱么？不然，解脱的方法是有的。最妙的法子我以为应让法人爱克惹维叶·德·马斯特（Exavier de maistre 1763—1852）。请允许我来介绍他的驱遣枯寂无聊的方法。

说也奇怪，马斯特的方法的产出，并不像国故整理家那样辛苦，也不像科学家那样实验，仿佛不费神地便得出来了。他发明出来的时候，他自己还不怎样觉得。而且他能发明，仍然是靠这个怪物的督促，因为这怪物跑来引逗他，想给他苦吃。他不动声色便把这个怪物对付过了。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法子是很妙的，才知道有传给世人的价值。

他看着许多人被这怪物苦得了不得。有血气的人忍耐不惯，迫得死去活来。莫泊桑晚年拿剃刀割颈子，恰是一个好例。性懦的人顺水推舟，不喝酒精，便肆肉欲；在我们同胞里便是抽大烟搓麻将，无论抵抗的效力如何，结局还是糟踏了自己。马斯特知道这个毛病，很为大家忧虑。碰巧他又发明这个妙法，因此用来贡献世人。他想他的方法不但对于被怪物所祟的人们可以采用，即一般终日营营的名利客也可照样去做。他又知道社会的阶级悬殊，多少人每每对于愿做的事常常限于财力，终归废然而返。他这方法则是不论性情品格，不分富贵贫贱，不管

生在热带或者住在南北极也一样可以自由举行。这个方法真是平淡无奇，与薄纸一样，一夺就穿的。你若问这是什么方法，直截答复你便是叫你作“室中旅行”。

只要你有一间屋子可以一个人在里面退休几刻，你便可作室中的旅行了。完全不用花费而能得到至乐。四张墙壁，数张桌椅。屏退了众人，你自己得纯然清静一刻。如果你是一个劳碌奔波的人，每天手胼足胝，披星戴月不曾有一刻的清静，现在一旦能设法偷闲作一度静中观己的功夫，岂不太妙？虽然是在一间破屋里，你的精神可以巡游天外。情人们可以重温旧梦，伤别者可以再理旧欢，好武者可以亲临战阵，求仙者可以身入天宫，这一份至乐的情味可惜没有多少人懂得。你要板起面孔骂我在说梦，或者说我在提倡玄功，那你真冤枉我了。我耳上无轮，并不敢有福听无音的音乐，何敢说在破屋里会有如许多的神妙。不过我们知道巴惹尔克（Balalc）的人间喜剧，确是破屋中的枯寂无聊得出来的。无论枯寂无聊是怎样可厌的一个怪物，但他遇着了能者，也无所施其伎俩，反足以助才人之成功。马斯特的荣誉完全是“枯寂无聊”中的产物，就是说他不怕室中的枯寂无聊，反能作起旅行来。把室中旅行的记载发表了，便给法兰西的文学花添了许多光彩。

爱克惹维叶·德·马斯特(Exavier de maistre)生于法国南边沙瓦地方。此地离瑞士极近，多山水。土著中在文学界成名的很多。这些文人都带有本地的多情，快活，诙谐的色彩。马斯特也是代表这种气色的人。他是出于大家，家教极为严厉，而且是极守旧的。他的哥哥惹瑟夫·马斯特(Joseph de maistre)，是当时的独断的政论家。一个反革命潮流的恶魔。他生于卢梭，福禄特，孟德斯鸠之后，虽然那时人心已经浮动，革命已经

爆发，他仍然唱着拥护王朝，主张绝对的专制政体。靠着他的锐利的思想，矫健的文笔，独往独来想将一代的新思潮一笔勾销。俨然能代表旧思想与革命政论家的鏖战，完成了押阵大将的资格，气概之雄厚可以想见。但是马斯特则绝不受他哥子的影响。他是一个活泼少年，胆大子弟，每天只是到处征逐，发展到他的不羁天性。他在二十一岁时，桑伯儿勒地方的少年狂热的讲求新发明的气球，他虽在服兵役，恰巧因休假到了这地方。你想这位少年军人还有不趋之惟恐不及的么？他不但附和而已，还自己亲手作计划书，这里已露他的笔力了。他又自己作则捐助不少。到后来放演气球这一天，预定的乘球人中的一个被父母叫回，空下一个位置，找不着人去冒险。自然是马斯特去出这回风头了。这回气球飞升后，从天空返来，饱受当地人士的热忱的欢迎。少年的马斯特之心，真不知若何荣幸。日后他服兵役到了俄国，他的哥子正当驻俄大使，他因得了升迁，后又到波斯因功绩升为将军（Genral maior），在高加索（Gaugase）时曾受重伤。于1825年返到沙瓦。不久重行外出，死于拿卜（Naple）年八十五岁。（1763—1852）

马斯特的一生便如此过去了；虽然在气球上露过一回头角，虽然在枪林弹雨中博得几分荣名，但是好奇的冲动与杀人的恶绩，终经不起时间的销毁。无情的时间，真不知埋没几多英名美誉啊！十九世纪独手建立批评学的圣皮韦（Sainle—Beure）曾亲问过马斯特的著作情形，只见马斯特答道：

“我老实自认我在幼年时，心里只想过军人生活，从不曾梦想过著述的，即读书时间也很少。倘若没有那回使我被拘禁的事件时，你一定永不能听见说我这个人了。”

他的自白如此。那使他被拘禁的事究竟是怎样的呢？你去

想罢，一个大家子弟，赋性轻躁，完全是一个好事之流。晚年自传诗曾有“警奇万物”之句。他在荒唐欢愉之中，不幸与一个人决斗。这时他是一个在职军官，他的长官把他囚禁起来。从此他的卧室变成他的监狱了。在室内不能出门一步。你想他是怎样的枯寂无聊啊。他想着往年乘气球，排空御风的气概，及他执枪与人决斗时的威武，一旦囚在四壁突立的屋子里，终朝无所事事。如果这时有大烟他也许抽上瘾了。你看他一天只挨着墙来回的闲踱。有时坐在椅上，将椅脚敲起左右摇摆，有时又带着椅子向前不断地拐进。或者将寝衣蒙着头上糊睡。你看他真是无聊极了。殊知他才不然，他的身子虽在室内，他的精神已早游行于六合之外。因此他说在室中可以作有趣的旅行。这种旅行法真是又平淡又希奇又简单人人都可以作的。

他每回旅行之后通通有记载的。我们从这种报告上才知道他的旅行是极有趣味的。他在室中被囚四十二日，他的旅行也便延长四十二日。四十二日中的报告便给我们发明了一个旅行的新方法。许多人读了他的报告都大受感动，法兰西的文艺之花算被他增色不少。马斯特算有运气能碰着四十二日的拘禁，不然他的杰构室中旅行（Lc Voyavse aueour de machambre）便不能出世，他的天才恐怕也无所表见了。马斯特自己也曾感谢长官们对他的拘禁，但他却有一点悔恨。他说“假若他们的厚情不尽时，永远使我在室中旅行我随时都可以出一部大著作了。”所以马斯特是很爱枯寂无聊的，不像我们那样空口诅咒。他说：

“啊！甜蜜的枯寂呀！我知道你对于你的情人们的温柔了。凡是一生中无忧伤的经历而又不曾独居一日的，和那甘愿与愚人谈话而忘却自己的人真是不幸了。可见枯寂无聊，又何偿是

可厌的东西，无非在各人的运用而已。”

马斯特终身的杰作只有这部“室中旅行”。这部书于出囚室时，他交给他的老兄。他老兄与他印出来不意竟享盛名。他才取来略加修饰便成一部至今传诵的名作。

这部书的体制虽然是些叙记感想的小品文字，其实中间所包含可算是许多不用韵而成的美丽的诗章。我们读后便如在清流里照出了自己相似的容颜。便如在凉风里舒松了自己负重的形骸。精微的哲理使我们玩味不尽，清灵的笔致使我们依恋不已。有时我们读到书中幽默处，会感觉着无限的愉快与沉痛。有时读到巧妙的故事使我们又会向着书呈出笑脸来。

他作这部书时正是二十八岁的时候。凭着聪明，生性好奇，于一切事物早有不少的明悟。他脑中的感念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不过因在外面游乐无闲心执笔记述，只好任其消逝。一旦迫不得已，屈处室中，少年的心胸，沸腾不已。但想着自由是无望的。只好忍着暂时寂寞，用心思冥想一切。旧梦重温，新意纷来，在他的灵活笔致的捉摸之下自然能表得真切，能真切便成了大功。

上面是论文体，书中思想集中在日用的细故来分段证明人身有两个主宰，一为灵（L'âme）一为兽（La bête）。这个兽并不是指的肉体(Le corps)，肉体不过是一个灵与兽共同指挥之物。他说：

“我由各种的观察，察出人是由灵(L'âme)与兽(La bête)组合而成，这两种东西是绝对有区别的。但是却是互相绾合的。他们的区别即在灵较兽要优越些。我从一个老教授处知道柏拉图（Platon）叫这质体为‘别的’。这是极对的。但我却喜欢给她——这与我们的灵相绾合的——一个极好的名字为兽。真

的，这种无形质即是柏拉图所谓的‘别的’。她常用奇异的方式作弄我们。大家粗浅的观察以为人是双料的，都说人是由灵魂与肉身（Lecorps）组成。许多人把许多事都推诿在肉身上真太冤枉了。其实这肉身不但不能思想也不能感觉。更错的大家都认为是定论而不可移易了。殊不知应遭告发的乃是这个兽。这个兽是感觉的东西，与灵完全有别，而且是独立存在的。她有她的嗜好，倾向，意志，而她之能超出别的动物，仅是靠着她受了豢养而具有极完备的官能。

……

……我对于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的结合的经历，实在不知道曾做了多少。譬如我明知道是灵在驱使兽，但有时兽动气灵又要常常失意被反抗的。照规矩灵是一个立法的能力，兽是一个执法的能力。常常这两种能力会互相冲突的。有才能的人的大技巧，便在知道好好训练他的兽使她能自由行动而不逾规矩，而使他的灵从这种烦难的绾合里抽出，能飞升于天上。”

为证明这种主张，他曾举有许多例子，今择译几段。

“先生！当你正读一本书，忽然一种极有趣味的思想钻入你的意想里。你的灵立刻跑去依恋这种思想而忘却了读书。虽然你的眼睛机械似地顺着一字一行地在不断进行。你读完了一页并懂得所读的，也不能记忆所读的是什么。这便是由于你的灵在命令她的同伴——兽——与她念书后，并不曾通知兽而急要去依恋旁的，便抽暇一时，因此兽只管继续下去，你的灵便没有听着所读的了。

我曾经把我的铁挟子放在火焰上来烤我的面包。在几时刻后，正当我的灵游行之际，有一着火的柴枝滚出来了。我可怜的兽便跑去拿那烤在火上的挟子，于是我自己烧了我可怜的手

了。”

照这两个例子，读者恕却我这不能达而信而雅的译笔，谅然可以明白作者的主张。作者曾声明他在劝人采用他的消愁的旅行方法。但为明白他的方法起见，不能不懂得灵与兽的存在的关系。他虽然不愿意走玄学的岔路，但又不能不牺牲几节来略说一点。上面我所译的几节，可以说在原书上比较是沉闷的，但原文亦极有趣，因使我了然了兽的存在。作者又曾举一个例：他在一早晨画了画。出门他决定到王宫去。在途间他的灵便想着了图画。他的灵推想图画是极为高尚的艺术，能工物状情，能使美丽的大自然在纸上毕现，能使风在纸上着声，能使潮在纸上汹涌，山林的黑簇，田野的荒芜，人面的悲愁，内心的情感，都能微妙达出，而且所达出的还不止人世间的，常可超而上之。绘画真是宇宙的妙事能事了。他的灵这样想了永久，不觉到了一个所在。他的灵警觉后一看，才不是王宫，乃是到了他的情人的门前了。这足见兽之背叛灵，而趋迎所爱。可爱的兽，可恨的兽！这段原文很长，我不敢动手翻译。论绘画的功能一段快利慎密，真可称为妙品。

我们若果相信他的话，我可以引申来谈一联旧诗。譬如我们读：“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两句诗，我们便知道诗人黄仲则何以这样傻能在风露里出神了。薄命的黄仲则他的灵已离开他的兽，作天外巡游，或者他的灵已飞到他的旧人身边去了。他的兽失了主宰只好在风露中痴立，如他的灵不转来，他或许要永是如此的。

书中除解说灵与兽的分限外还有不少的好文章，试摘译几段。

“一张床瞧着我们生，瞧着我们死。床便是一块复杂的地

方，人类在这类轮次地演了许多有趣的、滑稽的、悲惨的戏剧。可说是一个铺了花的摇篮，一个爱情的御座，一个死寂的坟墓。”

原文论床这一段文笔，非常细致，思路也极清新。在吾人童年时，床真是我们的摇篮，温暖的被褥，同卧的兄弟姐妹，和着母亲的催眠的歌唱，谁人也享过这样幸福。少年时假若有幸运的，床当然会成为爱情的宝座的。晚年——不到晚年，现在的壮年中年都是如此——的床真是一块坟墓，寒衾如铁，残灯似豆。窗外风雨之声，远处不知因由的悲泣，使我们失望，凄凉，颓丧，悔恨，恐惧，无可奈何。我们真望床能是一所供我们长眠的坟墓。然而却又不能！

有一天马斯特叫他的仆人把他的情人的像片挂在墙上。他的仆人接了像片看了一眼，脸上忽呈难色。他问他：“你看了这像有什么吗？”仆人答：“没有什么。”他催说：“究有什么呢？”仆人放着像退了几步。便说道：“先生！请你与我解释为什么这张像老望着我。早上我理床她的脸便向着我，我退窗前也是一样。并且连走路时都跟着我。”马斯特答说：

“总之，让乃底（仆人名）假如我的房间是住满了人，那末这位美丽的太太便要一同望着各方，望着众人。——唉！是呀！先生！——她将与对我一般的对往来的人媚笑么？让乃底一言不答退走了。我躺在我的长椅上，并且低着头。我沉没在极深严的默想里。——有什么味！可怜的锺情者们！当你因远离你的情人而不能忍受的时候，或许在她近前已有人替代你了。当其你的眼睛注在你的情人像片上，自以为她看的当然只有你一个人了。其实这不对人的像片——忘恩负义的——已向她的周围人众瞟眼风卖笑容了。”

世上的情种听者！这里虽然滑稽。其实是极沉痛的。原文

带笑含泪，极为佳妙。本来人心都是这样，身迩心远。莫泊桑在“人心”上分析得极为清楚。痴情人每每要博得别人的心。要别人的心死在他的身上，或许硬要将他的心嵌入别人的腔子里。请他来读上面这段俏皮的文字。谅然可以醒一醒迷梦。

“……夜间的月儿升在天上了。我便挨近这块愁地上默想。我听着蟋蟀快活地不断它那不倦的曲子，藏在我朋友的静寂的坟上的草丛里。生物的末运和人类的灾祸在大宇宙里计算起来一点也不值了。一个多情人在他的可怜的密友怀中断气，和一个被朝冷冻毙于花丛的蝴蝶的死亡，在自然界的广场上相比是差不远的。人无非一个游魂，一块黑影，一口蒸气，消散在太空里。”

原来马斯特有一个朋友，他们极为要好。他们“两人只有一只烟袋，饮酒只用一个酒杯，睡觉同在一张蓬帐之下，并且同经许多危险的战事，而死神特别为他们俩发慈悲，使他们的心一天一天彼此需要”。不幸终于这个朋友死了。一个同嗜好，知心性的朋友死了。他觉得异常悲伤，常晚间一人去伴着荒坟。他悟到人生不过一个游魂一个黑影一口蒸气。这里虽不能算是他的人生观，我以为这种对于人生的看法是对的。只要你知这朋友的必要你来读这一段怀旧的文字，便要了解得更深些。因为我们最好是利用心境找适宜的书来读。

“一堆穷人们半露体的睡在豪华贵居的廊门的檐内。仿佛为困苦和冷冻而要断气了。——何等的悲惨呀！我愿人们都知道在繁华不尽的城里，当着严冬极冷的夜间还有一群不幸者露宿在外。他们的头枕着阶石或宫殿的门限。

这里有一群小孩彼此紧抱着为了不要冷死。那里一个妇人战栗哀呼得声嘶了。然而过客们因听惯了而毫不感动罢。高车

驷马的杂响扰攘的喧声，音乐的悦人的曲调，一阵一阵与穷苦人们的哀叫相搀和造成了可怖的杂响！”

这不是一付贫富不等的写真么？马斯特虽囚在室中，他却又看见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谁来削这不平？

马斯特在室中旅行的所得，就上面的类例可见一斑。本书并不很长，我很望能者费神译成国文。目下文坛尽在短篇小说与抒情诗上努力，能得这样一本妙文妙作，谅可收些良果。并且在我们的生活中，每日无所事事，似生非生，似死非死，简直在糟踏生活。马斯特是一个比较尝过我们的枯寂味的人，我以为他的东西于我很有效的。虽然不敢担保是一份起死回生的灵丹，谅可以尽一点滋润心情的贡献。我盼望着有人能做这份工作。我非智者，我爱智者。我更盼望智者能多多与我们作工。

十四，三月，十八日

（原载：《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5—67号
1925年3月25日—4月15日）

报　　仇

曲　秋

“可怜的孩子！
你被谁人欺负？
你要下过复仇的决心，
莫让你的仇人死去！
要仇人死在你的手里，
这样的努力，
才算可取！”

黄沙集中的警告

在公园内绕了几个圈子，寻不着什么开心。我无聊奈地坐在池塘铁栏旁的木椅上面。游人们都到坛前去瞻仰英雄的遗容去了，留下一个冷静给我！我趁着四下无人，便长躺在这木椅上。木椅仿佛真为我而作似的，因为它与我的头足一样长。

我起初头是向上睡着的，两眼从柏叶缝中去寻青天，去看那飘忽无定的白云。只有城市的嘈杂，时时搅动我的耳鼓。大约因我平睡无枕的原故，不久头部有些昏痛了，我又才翻身侧睡。当我在转动时，我的头略抬了一下，猛然两个人影打入我的眼帘里。我如受打击似的，心上鼓起热潮来。“哼！那不是他么？”

是的，这两个人中的一个真像是他。矮小的身材，胖白的双

颊，分梳的头发，与那一双凶恶的眼睛，仍然有神光在威吓周围的游人。尤其他那鼻尖下几根向上翘着的胡子，更明证了这一定是他。他胸旁挂有标帜，是的他是与我们的英雄有关系的。他在我们本地老是打着英雄的招牌，作他们杀人放火的勾当。是的，这是他了。哼！我与他真有相见之日么？可怜我走遍天涯地角，那里访得出他一点踪迹。今日狭路相逢，休要错过，休要错过。快追跟上去。

我翻身起来，追上前去。这两人已迈步进了社稷坛的东门了。只留下衣襟角的一闪指给我他们是从那里进去了的。我着忙了，扯脚就走。不几十步，我跨进东门，只看着高栅上的白色挽联，迎风飘舞。吊丧者如蚁聚般的蠕动，那里找得出我所追跟的人的影子。

难道我竟让他从我手中逃脱么？我心里慌急了，立即向人群中找去。推推攘攘，我如疯狗似地乱攒。我撞倒了几个用铅笔抄挽联的君子。我踩着了几个妇女的小脚。他们都发怒的说："你怎么嘞！嗤！真是！"我可不瞅睬，我要找他去！

幸而我偶一抬头，恰看着他们两人正从门外横走过去了。我喜极了，我提着拳头跑上前去。我想这一拳头要把他活活打死。报了我血愤的冤仇！

可是我一冲上前去，便被人挡着了。我仔细一看才是两个警察。他们说："先生，你出去请走东边。"我说："请你让我出去，我有要紧的事。"他们又说："你不能从这里出去，你不用多话。"我回头急寻出去。我计算了一个方向和他们碰头。我算着他们是往北的，我也往北去，或者在北门角上可以碰着他们。等我走到北门我站在那儿老不见他们的影子，我感觉失望了。我顺身坐在一块石磴上出神，我记起了……

……在一个早晨里，我刚起来读书，门外的号笛声乱鸣起来，我的屋前后被兵士围着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兵士抢入了中堂，口口声声喊着："不要放走了曲仁义"——这是我可怜的亡父的名字。——我吓得躲在门角里，只听得屋内母亲和姊姊的哀号声。一时我父亲满脸流血蓬头的被贼子绷了出来。我的姊姊死拉着我父亲的衣角不放。有一个兵士说："连她一下带去，她生得漂亮，我们师长一定喜欢。"……母亲披头散发地连滚带爬的跑出院坝里，王嫂抵死拉着她不放。我立即跑出，跪在她的面前。母亲把我抱在她的怀中，她脸上的血与泪浸满了我的眉目双颊……

我想至此处，我的泪早流下了，两个眼角成了一条小河，泪河的水流湿我薄棉盖着的胸膛。春风的荡漾，更加倍刺痛我被血愤奇冤填满了的心怀。我想着这回弃世长眠的英雄，我一个小子诚然应该佩服你的精神和主义。但是恕不了你的下走们。英雄啊！可怜你的一生竟被坏东西把你误了。我是被这些匪徒残害了的一个人。这贼人也来你的灵前顶礼，谅然也是你的羞耻罢。你不信请你看罢……在一个清明节里，一个中年的母亲带着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守着一座孤坟。坟上的野草怒立，代表出冢中人的怨恨。这母亲用手巾蒙着脸长声悲号。这青年强忍悲泪，拉着母亲的手臂，劝她不要伤心。这母亲说，"儿呀！你莫忘了仇人，仇人杀了儿父，逼死了儿的姐子。你记清仇人的样子，娘两回在街口指给你看过。"

亡母生前的谆谆的哀嘱，一字一泪地历历在我耳中复活。好容易我从恶贼的毒手中逃脱，好容易我免遭了恶贼的斩草除根的计画。好容易我得有旅费，才能南去北来寻找我的仇人。又好容易靠了英雄的英灵，使他和我一齐在这一个园里。

但是我亲爱的母亲呀！你的儿不中用，让仇人随便就走过去了。望你阴中保佑，望你勾住仇人的魂，使儿好下手。他在园中没有卫队正是儿与他拼命的时候。母亲呀！你保佑我，复仇的时期到了。恶贼假了名义，不知伤了多少人的生命；不知杀了多少人的父母；不知奸淫了多少人的妻女姊妹。儿今报仇绝不是私仇，算是替天下的父母姊妹兄弟，出一口恶气。亲爱的父母，报仇的日子到了，请保佑我！……

哈，哈，毕竟仇人来了，正从我迎面走来。这回他是一个人，正便宜我下手。哈哈，恶贼你也有今日。我念着我断了头的父亲，我念着我垂死不忘仇雠的母亲，我念着在恶贼淫虐下抵死不屈的姊姊，我念着一切含冤的孤鬼，和将来还要遭恶贼践踏了的生命。我的心胆壮了，提了拳头，直奔拢去，先用拳头打，后用头撞，然后用脚踢。我一起手只听仇人说：

“你怎么嘞！无故打人！”

我抬头一看，乃是一个四尺来高的警察。不是我的仇人，我的仇人跑了。我失了我的仇人，我一时头目昏眩倒在地上。

四月一日，于香山。

（原载：《晨报副刊》第43期
第77号1925年4月7日）

十年的升沉

曲　秋

我回忆着我消逝了的青春，是在国立大学的门前。当我瞧着大学门前贴有请听名人讲演几个字样我的足已无意识地往里走，无意识加入满堂人满的听座里。台上的演说家正慨慷激昂地痛陈外寇的阴谋和卖国贼的恶罪，台下万人攒首，从各人的脸色上看得出兴奋的样子；我知道听众的情感已被演说家的词锋鼓动。接着不断地拍掌声，过后又是叹息声。这是演说家的成功。因为他使听众受激动是容易的，要使听众发出几声叹息，必定是他的演辞能凄凄婉婉发人深省。四海漂泊，毫无牵挂的我，对于前途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对于世界的事物也渐渐有些疲乏了。既不能开口大笑，又不能号淘痛哭，我的心枯寂若死。我自认我是一个行尸走肉，或者是凉血的动物。然而在这拍掌声里，在这叹息声里我也不觉“未能免俗”去凑了大众的兴趣。旁坐的一个老人向我说：“这位演说家真漂亮，词令和精神都是绝顶的，而且还在青年时代。先生，你以为如何？”我立即唯唯回答“不错，先生的评论不错。”这样一个老人，我仿佛看见他的下半截已在棺材里了，他居然能这样受感动而表示其倾慕之诚。我想这老人一定要回忆到他青年时候，而发出许多叹惋的。我呢？论年岁我不是与这位演说家差不远么？自量身材，觉得还比这位演说家要大的多。不堪推想，我心上

感觉着一种没落的痛苦。

我在听座上瞑想了，已不知台上所说的是什么，一阵拍掌声打入耳鼓，使我惊觉转来。我才抬首去细望演说家的风仪。我的座离台过远，我趁着前面有一个空，我便蹑足走上前去，演说家的丰仪很明瞭的现于我的眼帘里。他是一个二等身材，穿着青呢的学生装束，头发很长已披至肩上，可以看出他还是能深思的人。他的脸上虽然有被风霜所苦的痕迹，但仍然不能掩饰他那正当发红的青春。他的目光，神气很足，绝不是灰色的，仿佛随时都射在台下想搜寻什么似的。有时我和他目光相碰，我如被压迫的自己把头低了起来。我又去看他的眉，很粗的向上斜立着，心中不觉一动。“这孩子的眉毛很立，将来一定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这是一句旧说，是我童年的塾师向我的同伴P君所说的。我记忆着幼年的P君，便觉得这位演说家有些相似。我越看越觉得像。虽我和他别来业已十年，但很早曾听着父老说过他去干造反的事业去了。啊！P君，P君真是P君，我喜欢你这样有成就。

我虽然满心欢喜，又觉得未必靠得住。天下同相貌的人很多，既照事实上说我们本地若出了这样的人物那有不遍传之理。而且故乡的山水也不是育英孕灵之所，几百年来“文不举”“武不进”历史的实例也足打消我的欢喜。我不很放心，我便走问一位司招待的人员。我问说：

“这位演说家的旧名是P么？是A省B县的人么？”

他答：“是的，他是A省B县的人。他的旧名我可不清楚！”

唉！够了，够了！这几句话迫得我返身就走。我心想我这样颓废无聊，我怎好在此让他看见，走罢，走罢！在你的旧友中照出你自己的丑颜多么难看！走罢！走罢！

我反身往外就走，可又被招待员挡着，“先生，请你听完走罢！”这话又使我惭愧起来。是的，别人演说得非常好你为什么要走？因此我又重行坐下。我望着了台上的P君，我想着了我们幼年同学同游的经过。

原来我家的老屋非常宽大，全院分坐了五家。有五个槽门进去，各家相连处有小门可以相通。为借小家具或找不归家的鸡犬，或调停结了仇不说话的儿童的关系，五家人的亲密日甚。大人们有时还分这一家那一家，当时在我和P君看来，觉得有些麻烦。我们常想为什么我们要分五个大门进出？把五个和拢做一个门，这门岂不更大更好看么？我们又为什么吃饭睡觉都要分开，反正每天都是一伙的人。有时彼此开饭或起床的时候不一致，弄得人等的心慌。这个时候正是十余年前，P君的家与我家同居。因他的父母都是知书识礼，所以与我家要特别投合，独生子的我和独生子的他，两人顶着两家的锺爱，更特别溶成了我们的交情。

我们同在一个私塾念书，念一样的书，写一样的蒙格。念书的行数都谁不让谁的。起初我们的欢喜是在多得红圈，日后老师不用红圈改成红点，略略使我们失望，我们所最望者便在换新书了。我们早晚到学校都是一路，午间在老师处寄食，我们又同桌，只可惜老师太严厉，吃饭要纠正我们的食指。他说二指拇在拿筷子时要抓紧点，不要让他指着外人，这样指着长辈是不恭敬的，而且要指脱你们的地方。这类罗嗦的话老使我们不快活。我们的快活乃在放学后田边水涯的嬉弄。最好看的是鱼儿洒水，和点水雀儿的飞跃。

在这时我们一连同住了三年，便是同在私塾中受罪三年。老师的威严如暴风雨一般，我和P君便象一群细竹互相搀扶

着。巧避于这暴风雨之下。两家的母亲常坐在一起评论我们。她们公认P君的眉毛立，性情刚，将来是敢作敢为的男子。说我性情柔和，将来是一个读书人。她们又说："这两老庚（我和P君是同年）应该一起做事才好，因为他们恰恰可以互相调剂的。"尤美丽的是在秋月的清辉里，在秋虫的哀曲里，在秋豆的凉栅里，这两个母亲伴着她们两个儿子。她们闲谈着，我每每翘首望着星光，P便往来驰逐去捉流萤。P常笑我不同他合作。"你那样傻望着星子，有什么意思？我手上不是有星子么？你爱星子你便应去捉星子去！"他一面说把他手上捉的萤向我撒来。我急忙躲闪让萤虫射过。我含笑向他说，"我要的是天上的星子，地上的星子，我怕他烧了我的衣裳！"一阵笑声从豆栅中发出，只听一个说："你瞧这两傻瓜！"

这样的回忆使我回忆，假若演说不中止，我的回忆一定也不会中止的。可是听众攘动了，台上的人退去了。一阵足步声和椅凳的移动声杂乱地交响。拥拥挤挤，我走到了大门前。美丽的童年的交情不让我快步走去。客中岑寂过甚了，我又舍不得这一段可以预期的快乐。我心想我这样混沌下去终非了局，我不如去会他一面，或许他的奋斗精神可使我振作一些。是的我应该去会他一面。我正这样想着，门前的警察用手指挥我说："你为什么不走？你靠边去罢。你要看，你到边上去看！"这几句话使我气愤了！哼！你看我穿得烂褛么？他是什么？也不过与我一样的一个而已！我应该站在此处，等着他出门时，与他欢然道故。

门前的行人穿流，车马已有些蠕动。我站在门角翘首望着大门里面，好容易由内往外的人渐渐稀少了，但是演说家的P君老不见出了。噫！莫非他已早走了？但是我看着门前的侍卫的

期待的神气，又很不像的。好容易，好容易里面有一群人走出来了。我的P君走中间，两旁许多人卫护着，P君微微带有笑容，在天光之下，我更认明他真是我的P君。我远远把帽子取下，我畏缩地向前，我还未走近他，我的心中异常不宁，我忙中不能呼喊，只说出一个，细微地说出一个“我……”，可是我不知道他注意或听到与否。早有人把我向旁边一推，“请往边儿走！”一瞬间，P君在我眼里消失。P君被拥上怒马高车。。我只空望着乌黑的飞尘，不一会连车马的灰尘都消失了。

我只痴望着，我只记忆着P君的壮健的体躯，和那英发的丰姿。我反顾横在沙面上那个清瘦的影子，谁人看来我总比P要老的多。谁也不谙我们是同年的老庚。在以现在的地位来说，他出入于枪林弹雨，生死于艰难险阻，造成了现在。国家靠他为一个柱石，他两手撑着将倾的大厦，让我们小民在这厦里过活。我真应该感谢他，我不惭形秽，我也可略略骄傲。所以在警察小看我时，我不觉动气了。但是说到我呢？我不知他曾否有一日记着他的旧伴。他记着了我，不知他又是否挂虑着我的生死？又不知他是否要叹息故旧的消息的没落？唉！他是一个英雄，为国为民的英雄，他所顾虑的是在生民的疾苦，假若我成他的敌人，他当然只有杀无赦的。若顾忌什么小节那里能成为一个英雄！只可怜我终朝在困苦中挣扎。我的雄心远志不知不觉便丧掉了！但不知他的际遇怎样？我更难了解者，我和P后天的培养有一个时期是极相同，何以到如今有这样的差异？又何以他的外表这样年轻，而我变得这样苍老呢？我俩间的得失利钝难道没有原因吗？这样疑问使我作难。我沿着大学侧边的小河，随着水的方向在垂柳条下走着。我沉思地想解决这个疑问。我想着，想着，想着。我忽然拍手欢呼：“啊我懂

得了！”

是在我和P君同学的一年，那时是什么年纪，我记不清了。总之那时我们不过与方桌一样高，因为我们背温书的时候，脚下那个小板凳已让给更小的同学去了，有一晚我同P君转回家去，走到一个斜坡上远望去有几个同学先站在那里了。P君先跑几步去看，他看了便叫旁人站开。我也急忙走拢去。当我将走近时，只见P君用手中的竹棒在地上向我一挑，口里叫了一声“你看！”我正走着猛受一惊，觉有一冷冰的长东西在我颈上冰了一下便过去了。我仔细一看才是一根死蛇。我生平最怕蛇，无论他是生是死。蛇的小头细眼已足使人全身肉麻，何况黑乌不能分的皮色，行动时蜷舒逡巡，有时还向人撵来。我经了这一吓，我便昏倒在地上了。我睁眼转来我已在母亲怀中了。我虽然在母亲怀中，我仍然看着死蛇的眼睛老把我盯着。我仍有些害怕，紧抱着我的母亲！母亲说“你这样没有出息。活人都怕死蛇，遇着生蛇岂不要吓死么？你知道么？P还用手把那个蛇拖回来埋在菜园里说是埋龙，你怎的如此没有出息？”

又有一次我早上起床时，母亲说P家里捉住一个偷东西的贼人，你快去看。我那时虽知道恨贼人，但总以为贼人是凶恶的。所以我不等母亲的话说完，我便跑到P家里去了。我看着父亲站在大门首同许多人谈话，我钻入人群，探头一望，才见着槽门柱上一个人被绳缚着。我看他的外面似乎与平常一样，但他的眼光老望着我，我反觉得他有一点可怜。因为大家都自由站立，他一人被捆得紧紧的，麻绳在手上确勒出血路了。一会P从中堂飞跑出来，他向我说“这就是贼娃子，他来偷我们的东西，该打，昨晚他们打得好看，可惜你没有见着！”他一面说，一面拾起一根竹条，两手用力向贼足弯上打去。这被捆的人发出了

几声哀号。我听得怕了，我反身伏在父亲的腿上吓得不敢作声。父亲带怒似地说："这孩子太没有出息，你看P多么胆大，捆着的贼你都怕么？这孩子这一生算了！"

我回忆起这两段故事，我知道我亲爱的父母早已料定了我的命运，早已判定我和P的优劣。我如今想来死蛇有什么可怕，但是叫我现在用手弄来埋葬，我仍然是不敢的。至于用竹条抽被缚的贼人，我现在仍然没有这种勇气。这并不是我理解了贼人是无罪的，并不是我理解了贼人的罪应该给社会担负。我只觉叫我拾起竹条向一个人打下去，我是万办不到的。我有时也打人的，但是这个人不是我的学生一定是我的幼弟，甚至于是我的心爱的人。因为我正萦想着为了爱是可以杀人的。不然何以威尔勒伦要用手枪杀伤他的爱友？

是了，是了，英雄的P君干了英雄事业，他仍然是当年的本色。我么？也孤苦偏执着己见，任着自己的怪性，才沦落到了现在。他之不能如我，犹我之不能如他。有各人的世界，用不着追求与羡慕。当我刚去倾慕P君时，旁人已代他拒绝了，因为人处境不同，而欲求能接触便是世界的奇异。我微微地发笑了，我寻着自己的归途。我忘记了P君，但我恨尚未能忘记我自己！

四月三日重稿

（原载：《晨报付刊》第43期94—95号
1925年4月28—29日）

译米塞诗两首

曲　秋

（1）歌

当娇媚的希望，
挈着我们的手腕经过。
只见她展翅飞扬，
还回头含着微笑。

人去何处？只随着心之所向。
虽燕儿游于和风，
也不及这般轻快，
像人们追随着他的想像。
唉！飘荡的邪魔女呀！
你只顾你自己的路么？
难道要苍迈的命运老人，
才配有这样一个年青的情侣！

（2）愁

我失掉我的勇力和生趣了。
我失掉我的友朋和快活了。
即那使我自信有天才的骄矜，
我也将他失掉了。

我曾倾服过真理，
我以为它可作一个朋友。
待我刚一了解它时，
我又将它厌弃了。

虽然真理能够永存，
但从它那里回来的人们，
在世上，依然全不觉醒。

若上帝发言，便应回答他：
在世上我能享受的唯一的幸福便是能有几回痛哭。

以上两首诗译自亚弗乃得·特·米塞（Alfred de Musset）全集中的 Poesies nouvelles。米塞为法国浪漫派有名的诗人。他的一生完全在醇酒妇人中过活。沈湎酒色的痛苦造成了他的精妙的诗歌。他的任性殉情的历史，颇不少人羡慕。莫泊桑年轻时也想学他。他的诗歌恰可用美妙凄清四个字来形容。他的诗也并不伟大奇特，只在凭着感情在纸上的幽咽，可博得读者的同情。他的著述都是随意着笔，因此足见他的不朽的天才。他还著有剧本及小说甚多。（详细的评论后当再行介绍）

上面两首诗是他的名作，略略可代表他一生忧郁颓废的气分。他说希望是一个不易捉住的东西，是极容易消逝的。可恨是消逝了还要回头微笑。这一点留恋便是我们的痛苦的根源。第二首诗咏叹的是愁闷。更是吾国现在青年朋友们的愁闷。比如做事无勇，觉得活着无趣。仿佛天地之大竟无一处可以立

足。往年自负的雄心失掉了，而前途的希望更是渺若云烟。这时上帝的威权不能为力，哲学的理智也隔隔不能相入。米塞在这时的快乐便只有痛吸几回可以尽一尽伤悲的情怀，但是我们的青年朋友呢？

我们的青年朋友大半是：

血已枯了！

泪已干了！

心弦已断，

连话也说不出了！

这样悲哀的程度，比米塞还胜十分，这是什么原因呢？

四月二十日。

（原载：《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第68号
1925年4月25日）

文学家你走那一条路？

（劳动文艺的重要观点）

曲　秋

“文学家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提起一支生花的笔儿写一些书本，于是取得了自己的吃喝，取得了无上的荣誉。别人便来恭维你的天才伟大，说你能改换人类的思想，激发人类的感情。多情的姑娘太太们向着你的书流些眼泪，她们在跳舞疲倦了之后找你开一开玩笑，或者请你吃一点肥肉。或者她们狂热了与你接一接吻。或者要你一个笔头拿去作为终身纪念。或者你走过她们的面前，她们又用花将你围绕着。或者你的书真算能于茶余酒后使他们开心，他们便给你一个奖金，或者几万几十万的奖金。新闻纸上间或提到你饮食起居，有时把你的像照出来，让你自己看了喜欢。或者这里又有人请你讲演，那里又有人请你做序，而且这时候，你的文章不象往年那样呕心吐血说自己的苦楚了。最好是短，因为越短越名贵。最好多用正义，人道，公理等一类的字样。或者骂一骂别人不争气，更好是摆老气横秋的架子，因为这个时候有大人物捧你，你有身分有名望，差不多后面的排臭物都是香的了。难道你还不敢大发妙论么？……你冬天便往热带搬，夏天又向寒带移。你睁眼只看着欢迎你的人，你一闭眼便当然想着博物馆陈列了你的手迹与雕像了。这多么荣耀呀！文学家真可贵，文学家的光荣真

不可朽，许多人都想学你。甚至于得到你一句话的暗示他会做出一般大文章来。你死的时候，不消说是大大地举动一下，将你的骨头埋入土中。你真荣耀！文学家哟！你真不朽！其实你仍然一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所赞美的真呀！美呀！善呀！正义呀！人道呀！都是替有强力的辩护。不过你的取媚比别人高明，所以得的报酬也更大。其实你写的那些圈圈洞洞，又有几人感着兴趣。恐怕只有害人罢。譬如，你劝有钱人施舍，你劝有钱人发善心，你说劳动者可怜，你说命由天定，人类无可奈何。你劝人爱国，你劝人主张正义。你拥护私有财产。我看你只是一个妖精罢，你只知道倚门卖笑以取媚强者。你替强者施麻醉剂。你真是一个忘却根本的人。你的文笔，你的哲理，你的诗兴，只是有钱人的一个玩具。可怜你自负聪明，终究在别人的淫虐下过你的一生。你难道还不自知么？呸！呸！你真丑。你鼓惑我们的青年，你替虎作伥，你真是一个文妖，你不是一个人！你跳入东洋大海也洗不了你一生的罪！"这一段话出来之时，正当一九二五年，我们再看一看外面是一个什么世界。费尽了资本阶级勾心斗角的经营，和一般文妖们的心血的鼓吹，哄骗了世界人们打了一个空前大战。一番残害不知冤枉丧了多少生命，但是人们通是蠢才，他们还正在准备来第二回。

一边是保守党组阁，一边是兴登堡登台，一边是法西斯党在发泄兽性，一边正利用着道威斯计画来破灭人的家国。这些恶魔，他们知道打仗于他们是无关系，反正他们不上前线一样可以养尊处优。所以他们不知悔悟，日夕准备再来。

但是这一般可怜的生命，在机器的齿轮下榨绞了他们的嫩骨纤手，在钱财的淫虐之下丧掉了他们的青春。父传子，子传

孙，孙传重孙，永远替别人作牛马。可是牛马也终有反抗之时，所以现在牛马也有点觉悟了。俄国的红旗高举，自然不消说，恶魔们的恐怖更不消说。但是我们要知道俄国红旗的高举不是俄国一国的光荣，而是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光荣。譬如英法美各国的劳动者莫有不援助俄国而反对他们本国的政府的。因为他们知道要同利害的人才能合作，什么民族祖国不免是笑话。所以他们现在唯一目的便在团结起来，大联合向反动势力进攻。

所以今后的世界便划分为这两个阶级，我便要问一问文学家你往那一边倒？你到底去取媚权贵，或是合你的同类携手呢？

过去如专以娱乐王朝的古典主义，专为发泄自己野心不遂的牢骚的浪漫主义，专为仇视中流阶级的写实主义，和那想入非非而沉湎于灵感的象征主义，都让他过去了罢。任他去罢。我劝你们不要再弄老古骨罢，你们快从这争斗的现象定一个去取。

你若只顾一个人的利益，你如果要娇妻美妾朱楼洞府，你最好去捧权贵阶级资本阶级，这类文章最好写，最值钱，最受听，你成功最容易。法律再也不干涉你。太太、小姐们最容易来捧你，你的寒酸也最容易洗掉。你是天才，你是……你是……

你若果不愿这样，你若果觉得这样做去无味，或者说空虚一点，你能计较利害，你还有良心，你觉得倚门卖笑的可耻，你觉得你的心血不应拿去给人作玩具，你觉得还要顾一顾自己的伟大，你还觉得人类有共存的必要。那么文学家呀！请你掉着笔头，睁开眼睛，忍着一点痛苦。反正一死，谁能免死，那么这样你还怕什么？你须知监狱里便是天堂，你不要怕罢，你快用你的心血眼泪染点着你的笔尖，鼓动劳动者的心血向恶魔泼

去，至少要将恶魔淹死。你要与恶魔战，尤应与一般在恶魔裤裆底下的文妖鏖战。

你不要劝善，你不要代苦人乞怜。你要知道求的不如与的，与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取的，取的不如争的。你认定这个争字。用你的生花妙笔，使群人起来驱逐害群之马。这样我们的理想、幸福、自由，统统可以得来。而且是最快最速最可靠的方法。

今天是五月一日了，这是一个人日。我在这天真正难过。文学家们，你们不要徘徊歧路，快服从大多数，替群众作工。

今天是五月一日了，这是一个人日。在别国的京都，不知要怎样庆祝这样一个人日，但在我古国里恐怕仍是寂静罢！

我们的文学家，都是殉情任性的人，见月流泪，见花心闷。他们要爱，但总不知爱不能及于他们的原故。他们要钱，但总不知道钱不能跟他们的原因。他们自嗟命薄，他们想自杀，他们用忧郁颓废无聊穷苦种种字眼来描写自己。他们仿佛是已经死了。但是他们：

日间第一件大事还是吃饭，

日间第二件大事还是入厕。

哈哈！五月一日到了，人日到了。你是人你便起来。文学家你究竟走那一条路？

（原载：《晨报副刊》44 期第 97 号　1925 年 5 月 2 日）

西山埋葬

曲秋

二十四年前，从饥寒交迫的娘怀中，有我这样一个两脚物堕地。堕地以来，在严师的鞭扑下，在子曰诗云的牢记之中，我这两脚动物如一瞬似地便销毁了我的童年。童年完了便接着是兵荒马乱，我不肯饿死在故乡中的沟壑，凭着自己壮盛跑到四方去。在盗贼兵匪的刀锋枪尖之下，费尽躲闪才留得一个遍体鳞伤的生命。我这可怜的生命在大千世界中本来也值不得什么；因为有一个时期我自己也愿把这生命送掉完事。现在可不同了，我觉得这生命虽不值什么，但总在艰苦中漂泊过来的，凭着这生命能引起的回忆，无论是辛酸甜蜜，也值得几分依恋。假若一个人从生到死都平凡过活；譬如从小便登大宝，又从大宝上老死，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近来一天一天有些爱惜自己了！

因此近年来我每每梦想着，以为自己是很疲乏了，想得一块清静的地方，与一切有关自己的人隔绝；自己趁着清静可作一番修养的功夫，净洗一下自己心灵上所受的污垢。我颇怀念故乡中的山水，以为父母的慈爱，姐妹的温柔，祖先遗物的默启，必然可以稍稍安慰我。所以我曾决然回到故乡去。

我走到家门，父母的老迈便足紧锁着我的双眉，何况姐妹的远嫁，弟兄的流离呢？乡曲的冷眼，最先钉着我轻如一叶的行囊，次则打量我捉襟见肘的破衣，最次则询问我几年作客所

得到的官阶。有时我借青年应当爱国，不应与浊流征逐的好题目，来遮盖自己的失败，但这样解说徒足以引起人们的轻视而已。然而，能怨谁呢？若埋怨自己，谁对于自己的行为，不能有合理的解释？若埋怨乡中父老，这更难怪；故乡中生产有限，而生齿日繁，富者转贫，贫者转尽，唯一的希望，便在出门者能饱载而归，庶几可以救济乡中的困穷。譬如某某旅团长家里的洋楼高耸便是一个好例，他们那能不把这场好梦的完成，放在我的身上。我不能如他们的梦想也便罢了，然而我自己还不识趣，要加入他们的奈何天里，要他们不诧异不失望，能行么？能怪他们有错么？我如此，别人也如此，多数人也如此，虽然世界广大又能于何处找一块乐土？要乐土只有自己造；我于是醒了我的静修的梦！我间或所游的无非在陶潜卢梭的著作中每每走到了自己所萦想的境界；便见着山水悠悠，诗意蒙蒙，仿佛自己的一切都消去了似地，虽然这样的世界在一睁眼或一注目便要消逝而感得分外的凄凉，但在我这孤独者看来，总算慰情聊胜于无！

谁知这样书本上的天地，不必怎样降格以求，我仿佛已经找到了。这地方便是我将要离去的西山。西山的风物并不算秀丽，差不多南边春去时，这里的草还未青，花还未开，而且春夏之交的风沙，更使人烦闷不堪。这样一个地方，又怎能和自己所怀想的乐园相比？不过西山也有它的妙处，我们爱物应如爱自己的情人一样，应当记得她的好处，而忘掉她的缺点。西山有石塔。在塔上我们的意想可以伸张，伸张到世界以外去。有时乡愁萦怀，登塔也可以远望当归，稍稍得一点排解。西山多流泉差不多你深夜独行，有几处也可听到泉声的琤琮，这样的自然音乐，我们不必说它怎样神妙，却可以使我们流连。因

为流泉的调子，和那沁脾的凉意至少可以集中我们的感觉，使我们从神思昏乱中静穆一刻。还有西山的风本是一个厌人的东西，但得了柏林松簇的调剂，在山谷来复响应，假如你在石塔上听着，你必然有念天地之悠悠独仓然而涕下的情怀。假若你在深夜凉月的窗台独坐，听着了这样彻远的松涛，你更要悠然神往。你若是一个诗人，这时的气分，最适宜写诗，或者这涛声便是你的内心的象征，只要用了符号，随风的音波，便可得一首绝唱。假若你是一个报国的壮士，你从永不暇暖的席上，应声而起，你感着四面山村中居人们的好梦，不曾因这样涛声而觉醒，你或要自伤你的精力不能得较大的功用。但你另面着想，这样大的风声，正如那般海寇大队掩至，这正是你精忠报国独退群贼的时候，你的神威可以奋兴了，你可以去……总之人们因物生感，凭你是任何种人，这样妙的松涛总能将你鼓动。还有风，大风，穿户，出门，走瓦破壁的大风。它在树梢呜呜的叫，它诅咒人世似地。它扑你的窗帘，如欺你软弱似地。它弄些灰尘扑到你的脸上。它将你的书任意开拆，它将你的纸吹起在屋中作蝴蝶飞舞。总之它讨厌。它使你生气，它使你发怒。我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每每开门走到院中大叫。别人每每笑我这种举动近乎疯狂。我的回答是："难道风压迫我，我也不应反抗么？"还有西山的黄沙，如一帘疏雨远远来将自的一切笼照着。昏暗的，愁惨的，丧容的，迷目的，塞鼻的，使你感着如象世界的末日到了。便这样昏暗从朝至午沉到黑夜里，然而这样你依然得过去一天，正如你在这昏暗的世界上依然得过一生。啊黄沙！黄沙！便是宇宙的象征罢！西山是这样便足使我流连了。

还有的，你走在大路上，远远来了一个人。分明他是怡然自得，大可代表东方精神文明。他走拢来了，你猜他要向着你

做甚？他并不向你问安好，他也无闲情别致与你说说天气的好坏。他只是向你伸着手，请你给他一个大化。你想他分明走他的路，然而他要这样做。这明明是想一伸手不费力便骗你一个大。你想可不可恨。但是这也难怪，他们没有职业，没有地种，只有挨饿，或者整天睡着；有时他们出来了，你门前的草木自然要招殃。你阶檐上晒挂的衣物，你都应该当心，否则你稍转眼便会自然的走到他们的手里，这样并不可恶，只有一点使人心痛，非心痛自己掉了东西，只心痛他们不得不饿死，因为命运叫他饿死。饿死了谁去管他们，就是那一般抱国家主义，讲我们民族应同生死的先生也不管，假若是生在海那边或许也不至如此残酷罢！啊！啊！这样的西山，那里是乐园。假若你有仁心，你或者要决心施舍了。

西山竟是这样，我终留了四年。小休了四年。朋友说："与其说你在这儿小休，不如说你在这儿埋没。"他的语气带着一点讥讽。我并不是京中政变负气来山的伟人，更不是百战将军生了悔意更无雄飞远志，要在这儿藏着以待时清。但是一间四壁的小屋，不象一具棺材么？我平昔的颓唐丧气又不象冢中人么？是了！是了！我在西山埋葬罢！

谁知冢中的我，也有蠕动之时。我蠕动了，因我耐不惯寂寞。我有时又自信是一个有用的青年，不应这样死气沉沉，应该动一动。远地的朋友，他们与我分别之后便去干造反的事业去了。他们来信劝我要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恶习。他们说："你要自杀，快自杀罢！你向人乞怜么？那更是朋辈的羞耻。你若自命高傲不屑与流俗为伍，这更是你卑怯的表现，正如得不着朱门的酒肉，你才自高而唾弃之。总之你是怕恶势力，你虽不降服，而你的浪漫只是变相的妥协！你要自杀，快自杀罢！你要

投降快投降罢！你敢再走上人生的战场么？你敢再来么？”平素妄尊自大的我，绝不愿甘居人后的我，读了这样的信，我自己也有点奋兴了。有时候自己心中热潮鼓荡，回想起几年前的我，竟会泣然流涕！啊！眼泪有什么用？女人们正因眼泪多始终被男人们欺负。男人中眼泪多的人，多被那眼泪少的人欺负。我自奋了，自奋地投入群众里。在千人攒首的讲座里自己跑去大放喉咙。在万众奋兴的聚合里，自己跑去揭竿高呼。舌战一些青年，拳打一些壮夫。口中只嚷着杀杀杀，一拥一拥的前进。假若手中有枪弹何尝不能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业。万一不幸到囚室里去休息，又是何等慷慨！又是何等英武！男儿！男儿！谁不应如此！是！是！我去这样做。这样回到民间，回到群众里，一如往日四方奔走的时候。然而当我一走入人群我的头便低下了，虽然有口连一字也不能吐出。虽然有手连一字也不能写出。我只是满脸羞惭，我只是踊蹐不宁。我只有自伤，自伤我不是往年的我了。我何处染得黑潮而至于现在。我不能自解，自容，自慰，我只有羡慕一般英雄们。我只是适宜一个人独处，甚至于连走到人前，我便不好意思起来。有一个朋友向我说：“我可以随意邪闹，因为在这世界上，我就没有看见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时，我自然便要恭敬礼让起来。”好口气！好胆量！好快乐！好气魄！可恨我不能！我看自己极小，小到无可量度，所以不敢走入人群里！

当我一走到自己的屋中，四壁萧瑟，冷静幽暗，又使我不惯似的难以终日。虽然将一日终了也只是混沌过去。内心中不断地冲突，一是向上，一是退后。向上与退后的冲突不能调和便是我日夜的苦恼。我曾在乡间一个庙宇，见着一个年青妇人从远远地三呼九膜拜地膝行到了佛前。她不顾市人的非笑，不

顾车马的冲撞，她只是一心礼佛。向佛要她所求的。我很惊异她有这样定力，我不敢笑她迷信。我隐想我能象她这样岂不好么？于是我在一个夜里，走到了佛前，禅堂的寂静，略略澄清了我自己的心神。我看着佛龛上踞坐的一位偶像，我虽然立刻膜拜叩头，但如开一回玩笑似地于自己毫无益处，即那泥塑的圣像也窥破我的隐私似憎恨我，拒绝我的请求。我退出佛殿，到了一所村市走到酒店旁边，我以为可以得救了。我取钱到了自己物里，我又取出古人对酒的诗歌，我尽量的醉。不到数盏果然醉了。但在醒来之后，我又更外感着了凄清。辗转反侧不能熟睡，虽然，只一夜，而这夜便似一年样的长啊！我真无可奈何！

万幸，西山的道路近数日重光了。吾族空前的英雄的遗骸决定搬到西山来寄殡。在古刹石塔之中，于青天白日之下寄放着为光明而牺牲的遗躯，山水为之生色。埋葬中的我，枯寂，矛盾，混纯的心中居然有点感受。是的，古昔的圣哲们，在生前为广播他们的福音，遭人误会，有时竟活活被人用石块打死。但在他的死后，别人了解他的伟大了，当他的尸身过道时，常有美丽的姑娘，把她们的长发铺在地上，让圣哲的车从发上经过，以报圣哲们载复之恩。如今我们的先觉到来了。

“喔！你快去罢！你去接受这伟大的精神！你若还未死，便应该去哟！”

我心里这样想，我的脚已出门了。我一口气跑到石塔上去，丧仪的礼扎，居民的蠕动，车马的宣阗，挽联的飞舞，路警注神的指挥，使我目不暇接。一切人的眼光都向着北京瞭望，都渴望遗骸早早归来。

一会前面尘头大起，车马络绎动来。群人齐集了，我在人

群中转动不得。挤得我呼吸急促遍体汗流。风也乘势施威，细沙扑在面上藉着汗水便涂上了。我心里便想回转家里。我努力望空处钻，钻到了空地我满身才舒畅了。我想看也未见得能怎样清楚，倒不如回寓的舒服。我又被人群把我挤了回来。一阵阵的喧声起来。群众哀切的号叫，我知道遗骸已经到来。我在自己的房中只望空遥视着：

（一）

你是一个泪尽了的鲛人！
你是一只血干了的夜莺！
你是光明的战士！
你是民族的母亲！

（二）

如今你归来，
你归到山丘；
有柏林森森，
有流泉幽咽，
有石塔峥嵘，
有风雨凄清，
还有白云依恋，
伴明月长照丹心！

（三）

试看国门，
已被外寇拥进！
试看国土，
已被外寇并吞！
你如今归休了，

能安否，你的亡灵？

（四）

谁是你的后身，
能禀着你的精神？
谁是你的后身，
能守着你的遗命？
又谁能如你一样，
完毕了革命的工程？

（五）

亡灵啊！你亡了！
你不能由死回生，
我只愿青年头上，
寄托着你的精魂！
你长休罢！
我们起行！
你长休罢！
我们猛进！

这样讴吟完了，我到了一个境界，前面炮火连天，四面沙尘飞扬，人在喧号，马在雄嘶。我随着一般青年，血浪汹涌，气壮身雄。我们猛进，我们猛进。然而我们的战友死了，我们洒了一点泪便上前去。我们应当着强敌，无时来哀悼我们的死友。我们哀悼的方法只有上前，上前，上前。我们以不死在敌手为耻！我们这个敌人是吾民族的敌人，也是全世界贫苦人的敌人。我们是为人的世界而战斗，我们要使人在地球上能够安居！在这个境界里，我抱着这个目的向前战斗。我竟是被光荣绕着我的全身，我杀了敌人的大将，我搴了敌人的大旗，我带

了无数的重伤，为人道而受的重伤，我不感觉着苦痛中我足是欣幸欣幸……等我从这雄武的幻觉，醒来了，外面已经寂静，晚色四合了，我决计这日起走出棺来，重回到人群里！

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重稿。

（原载：《晨报副刊》45期文学旬刊
第73号1925年6月25日）

失掉了的孩子

（圣诞节的故事）译后记

曲　秋

本篇作者法朗耍哥伯（Francois Coppin 1842—1908）巴黎人，为法国高踏派著名诗人。他生于贫贱，长亦不曾烜赫显达，他的盛名，乃由他的诗歌成就。不过他的诗名，并不怎样宣传于富翁贵人们之口，而是永远不没灭于贫苦人民的脑海中。本来自来的文学，无非描画皇王的富丽，称颂权力阶级的功德，即有忧伤离丧慷慨流涕一种的文字，无非骚人墨客不得志之所为，换句说，无非他渴望朱门酒肉不得而发出来的羡慕与呻恨。这类文字当然能引动权力阶级一点恻隐之心，或者会可怜他们天才埋没，或者会用金珠去洗掉他们的俗气，或者会让出几间空着不用的朱楼洞府，使他们作门客之一，以便闲时开心。象这类文学，好者便是傲骨嶙嶙的山林文学，坏者便是杨雄司马相如之流，至多只配称个人的文学，于人类全体又有何益，他们自己寄食一生，枉送自己的生命。法朗耍哥伯生当十九世纪后叶，当着写实主义的狂潮，远追承雨果，歌咏世纪，赞颂贫人的仁心；近则追随功特里失提的为人类说话言愁的主张，不以自己的愁苦为意，努力宣泄贫苦人们的情感，努力发现下层人们的才德。他在巴黎街上，或附近留心观察，深深的向穷苦人们表同情，他洞察他们的内蕴，领悉了他的情

感，他知道他们的痛苦，也知道他们的快乐，他们痛苦，诚然可以悲怜。但他们的快乐在愁苦的末世又属难得，这一类的平凡琐碎的事物和情感，他用他那自然的笔致，细腻的谱出，使平民读之，便如自道一般，因此他的诗的艺术化的价值远不如平民化的价值大。啊！错了！我承认文学的艺术价值，即以其接触民众的程度为断。所以法朗要哥伯，终不愧是一个伸张人权的平民诗人。这一篇《失掉了的孩子》，他的作意他已经说明了。即是想“在富人面前揭开一角遮蔽着穷苦人们的生活的帷帘”，而要使“不好的富翁”知道“记念着世上还有穷人们”。他的作意如是，他用的材料，结构，描画方法，算把他的作意达到了，在这一点可以说他的成功，或者无用批评家们的指责。（老实说，批评家的饭碗，只能放在此处，其他便不应该饶舌，不过近代的批评玩意儿，越来越不守本分了。）不过在鄙意，他算是过去了。如果说：“过去的便过去了”。哥伯的东西总是过去了的。他的神主牌位，早安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现在已成了古董。不过中国是例外，别人的滥货，到了中国便成了至宝。外国的滥枪，卖与中国军阀，便独霸天下。外国学校的不成形的几篇讲义，到了中国，便有人因之而成其学阀。但是这是无法之事，大家知道跑快点就得了。（不过我说的跑是脚踏实地，不是凭空一翅千里）你若问哥伯这种诗的主张对不对？中国的诗人值得效法他么？我的回答极干脆，就是以为“不对”。不可效法。我也与一部分人反对共产主义一样说他不合国情，但是我却不是象大家到了山穷水尽的现在，还去梦想一个法国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成功。哥伯的主张何以不合国情呢？我以为我国现在情势，一切怪现象，皆有两个阶级所造成，一方面狠心的压迫，一方面麻木的忍受。现在反抗的情势

略略开始，我认定我们要得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只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打倒那压迫阶级，真切的说，便是自己起来杀敌。用不着去向仇人请愿，用不着去请仇人发恻隐之心，更不应替强权力阶级下麻醉剂。哥伯的主张，他只知道穷苦人们有长心，有才德，但却不叫穷苦人们起来独立，只叫富翁不要忘记了穷苦人们，至多只叫他们施舍。而哥伯还隐隐奖励穷苦人们的廉耻自好的精神，这不对。天赋人权，自己的人权万不能牺牲。资本家们，权力阶级们，利用自己的财力——抢来的赃品，穷人们的血汗——来压迫穷人们。穷人们当然要起来收回权利，在这种使天下为公的目的之下，无论何种手段都可以采取。如廉洁退让，无非受资产阶级的道德的愚弄而已，所以我说是不对的。说到这里，我对于吾国文坛的主张，便已说明了。近来有人用白话诗，喊国家主义。大概还不知道国家内面包的什么东西，我以为值得思考一下。

九月六日西山

（原载:《晨报副刊》第48期第1274号　1925年9月17日）

生　　日

曲　秋

“我已知我的生日，尚不知我的死时。我何必问我的死时，只须好好过我的生日。不要弄到虽生犹死，那便略可以自慰了。”

五年前我在法国东部一个中学堂里念法文，遇着自己的生日写了上面几句话。当时同学的朋友，正举酒向我祝贺，读了上面几句，都以为还说得通。后来我分行写出，便又冒了一个诗的美名，登在四川的某报上。曾记两年前有一个批评家，估量某诗人的诗，谓为文字的游戏，我这几句话正是游戏之种。这位批评家的严重的威权，便不知不觉地把我慑住。我很羡慕一个人能有这样的正气，因为他至少能把我们生活中滑稽的成分减除。老实说人生不过一个大舞台，我们不过其中的演员。一切悲欢离合于我们都有一份。我们看他人扮演，他人又看我们扮演，彼此往复，直到死神降临而歇台。所最紧要者不过演员间彼此合戏的时候，应该互相照应，不应该恶作剧，跌出常轨，使人手足无所措。因为大家演剧都是照本宣科，你说了上句，我便唱下句，你怎样问，我便怎样答，虽说其中也可以让天才家有伸缩余地，但是总不要太突如其来，以至使对手无法应付，一场戏岂不收冷场么？人世间的英雄们，每每不顾及对手方，而特出新样，如帝国主义者及中国军阀等是，真未免太

自利了。但是又有一辈过于脱略的天才，他们随时点缀成趣，有时又过分滑稽使人难堪，这时正应该有严厉的指摘者，出来纠正，或者垂涕而道。可惜我不是一个英雄，更不配如天才家能超脱一切，连一点指摘的勇气及欣赏的情趣都没有。自己在人生舞台待了二十五年，每每感觉合戏之苦，但又无法摆脱，只是每当自己出台纪念之日，发些无聊的感慨，真不知如何是好。

生日又到了，出台之日又到了。以前关于过生日的回忆如潮一般便涌上心头。如幼年时在温柔的母亲的怀中，衔着乳头憨笑，那是多么的使人宠爱。如童年时忽然在姐妹口中知道了自己的寿诞，又才向着祖父母纠缠，要几文铜钱去买自己所心爱的，又是多么的快乐啊。又如在壮年时，家庭远了，祖父母死了，父母不在身旁了，但又有何妨，反正有同辈四五，环坐在一间酒店内狂饮，谈一谈时政，骂一骂国贼，画一画自己美丽无尽的前途，几乎确定的，分明的排在前面，只须自己一动，便可以得到手里，踏在脚底。这又是多么快乐！这样的豪情胜慨，怕永远是黄金的少年时代的花，而暮年的枯朽时代的好梦啊！这样波涛平白地又来心海中汹涌，假若自己有闲暇，何尝不可以到北海边去坐着，让独自一个人去追思沉想，又何尝不可以登上白塔，向着这东方的首都，世界人的集矢点，祖国的首善地雄视一番，远眺一番，以抒一抒壮怀，使他年的生日的回忆，又多织上这么一层京华的美锦，岂不更快意么？对的！对的！应该去！然而为什么不去呢，谁知道！一到天明后五点钟，自己便起了床，六点钟便出了门，便到了一个红门前，自己取出了名片，口里说出了会你们老爷！啊！这那里是在过生日，怕真是到了死时！

“先生！先生！你请听！我们老爷还未起床，你待一会再

来！”

有什么说的，自己扯腿就走。走那里去呢？上公园么？时候来不及。回家么？更远了。只有在街上盘旋罢。走了大街，又走小巷，来来往往尽是演员，都与自己一样的严重，忠于职守，恐怕其中也不免有人与我同年同时生的，但不知他今天又怎样？否则彼此找一个清静地方岂不更妙么？假若更是一个女同胞，岂不更妙么？啊！太卑鄙了！太滑稽了！傻小子！

傻小子！时候不早了！快去罢！自己又到了红门之前，可是车马已停在外面，要出发了！自己幸喜来早一步。

被请进了客厅，客厅的钟正指着八点。再往四下一看，排满了许多象片，大都是知名之士，或者是在廊房头条一带相识过来，无怪乎有一点面熟。你知道每张象片上，都题有惠存谨赠字样，这是何等的有名啊，那自己所要会晤的人。再往四下一看，陈设的华丽不用说，窗外的绿阴珊珊，更不用说了。然而我一掉头，不知是幸与不幸，我看着一个东西在动，在那黑角上。我仔佃一看，那东西才起立了。大毡帽之下，黑马褂，黑夹衫，黑套裤，黑袜，黑靴白底但被泥弄脏了，也变黑了。这东西起初坐在黑褐色的安乐椅上，这椅又在黑角里，他全身又黑，身又小，又被盖在一个大黑帽之下叫我怎能敬重他的存在。待他脱了帽，起立点头，我看清了他的面容。额上亮顶，额皮皱了几条纹路，两眼凹下有如深坑，坑有一点水反射着微光，里面照了我的全身。两颧突出，脸如土色，难看是高拱的鼻子，我看他如象一个老猴，几乎使我失笑。他向我点头，彼此问了姓名，我们便无多话了。这时我不敢笑他了，因为他那暮年人的声音，使我觉得几分悲凉，微弱的，抖擅的，被压迫的凄凉声息，从那皮包了的牙床，呐呐结塞地吐出，使我感得

就死的生命的艰苦。他脸色已含着笑容，但是眼角的脸皮微皱，嘴唇微微耸出，微微张开，这便是笑么？即令是笑，也是假装的。啊！这假装的一笑，我虽然不知道其奥妙，但他为什么要假装呢？假如他有了资产，他能在早晨在此坐冷板凳么？他来此会客，也与我一样，有求于人。可怜他这样大的年纪，这般样的灰颓，还有求于人，还按了礼数向人装假笑，我想到了此地，我不敢再看他，我感觉着这客室中的冷浸了。我想我这时悲悯他到了末年，他恐怕这时又要赞美我的年壮，即使我向他说了我的艰难困苦，他必要说，总比他强，因为壮年便是幸福，便可抵万斗金银。可怜我耗费我的壮年，一天一天地与他相近了。那时我一样要受另一个壮年人的讥笑或悲悯。唉！这走马灯的人生，永远永远，永永远远，都是一套把戏闹来闹去么？我这样咀嚼，我忘记了我来会客，我沉没在这冷浸的空气里。我伴着一个老年人在呼吸这冷浸的、毫无生意的空气。万幸一声铃叫，我回复了我的意识。我听有人在说："东局五五六七八号，——你是仲九吗？你好吗？——昨天我吃醉了！——昨天的席钱由我一人付！——非由我付不成！——你既要付我今天再请你们到东方饭店罢——请了。"

对了！电话打了！他可以出来了罢！殊知他又叫了：他叫的是：

"西局一七号……我昨晚大醉了！——你讨姨太的事怎样——我请你今天到东方饭店咱们再赌一场——反正衙门内无事干……请了。"

请了，对了，他当然要出来了。殊知他又叫了。他叫西局，叫北局，叫东局，又叫南局，老是你好，待一会儿见那一套，真使人有一点不耐烦。好容易电话叫完，只见说与老爷取报

看，大约报看完了，又说与老爷弄早面来，又说，老爷吩咐送小姐上学去。自己总等不着他出来。我想我找他不过为一件与本县有关的事情，于自本身无大利害，又何必让他摆架子，我自己悔不该来，更不该一早就来，可恨啊！我的生日的早晨便如此耗费了。说到生日，这是多么大一个题目，我还在此替别人受辱吗？走罢！走罢！我正想走，却听了长叹一声：

“唉！……”

这是那老年人的声音，等得无休可休的声音！我怜悯他，我无法破他的寂寞。我不能再忍这官僚摆架子的污辱。我便愤怒的说：

“走罢！”

那大黑帽底下发出了声音，依旧是微弱的呼息：

“我还得等咧！”

这声音使我心痛。他是在怨怼我罢，因我走便得了，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来反衬别人的等得可怜。他是在羡慕我罢！啊！这青年多么好么？他有所恃敢于先走！可怜我，即使他不会我，我也得听传话再说。那么你走你的罢！我还得等咧！啊！啊！列位！这是多么残酷。我一步一步的走出门前。

我想一个要害人便应痛快一点。要杀人便应一刀砍死。现在文明国家杀犯人，不用大辟，用枪决，算进步了。最文明的国家不用枪决用电毙算更进步了。即用枪决的，也用枪向活人的头上打去，使死个痛快，这样的人生戏，虽算恶作剧也不顶恶罢。最怕的使人活受罪。我的生日跑来受活罪，殊知还有那样一个老人，更受罪。“我还得等咧！”这一句话是多么的辛苦，由他嘴上说出。然而我们的这位老爷太恶作剧了。全不念彼此都是演员，百岁归山之后，在泉台彼此将相视而笑，何必

如此大摆其臭架子呢？彼此不过相过相隔一屋，开一开窗，大家说几句话便可以完事，然而偏那样，使人“我还得等咧！”哼！哼！恶作剧！恶作剧！

我这样来复的想，信步在市上乱走。来往的人们都急急忙忙推挤。我想我们要看生存竞争的血痕，是不必到战场上去的。只要能注意一点，无处我们不会感觉不到。小贩们的叫声，车夫们的汗滴，僮仆们的奔走，那样不是受着生活压迫。他们被压迫惯了，知道呻吟无用。譬如一个毛驴，背上既负重物，也只有慢慢的驼走，人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说那能呻吟的人无非初初感着痛苦罢了。痛苦既久，亦若常事。大家便向着可以走的地方走去。即那车中端坐的富翁阔官，不过外表好看一点，生命的担负的艰难未必便能一概脱洗。总之，在这人世间，历史便是剧本，人类便是戏家。生命与生命互相排挤，争斗，利用，溅出了斑斑血痕，使人寒心战栗。我自己感觉到这个，使我不得不诅咒这个世间。当我一走到外面，在自己的小屋以外，我便感觉着生相吃的痛苦。一切的人们，都如披毛戴角一般，正张着血盆大口，张牙舞爪，有所攫取，我真怕碰到这爪牙上而自己不能逃脱。我行路时自己都特别留心，恐怕有危险。我四面瞻顾，我正寻找僻静处。忽然有一双手抓着我的臂，我大吃一惊，莫非真被攫取了去么？幸而有声音安慰我了：“曲秋！你上那儿去！”

友情的问询声，不带一点恶意。我回头才看见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说：

“我无目的胡逛，你上那儿去。”

“我也正想找人谈一谈！你到我那里去罢。”

我让他拉我走，走进了大学的宿舍。原来他新近考入国立

大学，他的行李都搬入大学宿舍了。他决定在这儿住六年。啊！这是怎么一个严重的决定！他将他的心与生命都交接在这大学里。他当然有不少的好梦。第一年读什么书，第二年读什么书，第三四年研究某一门，五六年怎样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心血陈出，使众人观览。六年后他怎样使将学好了的政法，使国人受福。他或者是专习文学的，又不知怎样，在文学界开一个新的时代。虽然他初进校门，他也自知六年易混，一瞬间，他便要将他的好梦攫住。况且大学正是一个好梦制造的地方。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梦，时间一到这些梦便要清醒，无论怎样失败，复继者决不灰心的。谁能拿一双笔来记这些梦呢？我这个朋友他正当青年，恰是五年前的我，我看着他，我羡慕他，我不能再象他了，我只祝他不要象我，只替自己的青春掘下坟墓。青年人除书本外另有活动，我这样警告他。他说：

“现在一切说不上，我只有念书。读六年书再说。一切我都不管！”

哈哈！好决定，又是照抄一分，不与我一样么？让他去罢！我不与他再谈，我只检察他架子上的诗书。他拉去吃了午饭，虽然极为平淡，我也觉得幸福。饭后我回到他屋里，我觉得疲倦便睡下了。

我在转侧间，忽听到叫声：

“你睡了三个钟头了！”

这话使我一惊，我翻身起坐，急忙忙地将惺忪的两眼擦一擦。哎呀！我的生日已将完了。外面的日光红黄，呈出将暮的样子。我知道时候不早了，我辞了朋友，走出来。急忙找自己的归途。电车上，人力车上，汽车上，驴背上转换地将运到山中，自己归到自己的屋里！

七月十三夜的月亮，虽不顶圆，但很明亮。初初还有一点儿云雾，将他缠绕。到中宵，碧天如洗，只有月儿独闪着亮光，我在重实垒垒的枣树下坐着，望着月儿，哀吊我这天生日的将暮。我纵然中宵不眠，也不能使生日延长。我忽然忆起生自己的女人，我的薄命的母亲，她今夜又不知怎样伤感她的爱儿的远离呢？我急忙在灯下与她写信，我告诉这一天生日的情形。我告诉她，我遇见了一个可怜的老人，我告诉她，我遇见了一个大学的新生。我说这老人是我的后影，这学生是我的前身。我又说我的命运已经排定，叫她不要忧虑。我又说："母亲！母亲！你几十年被人们幽囚。晚年你算可以自由一点。你尽量的快乐，不要堕入念儿的牢笼。父亲处我也写了同样信，但恨你们不在一处。但是你不要太挂念了，或许下年我便要回来。"我这样写了一大篇，写完了就睡。我想根据日有所思夜有梦的道理，你们必知道我梦的什么。……生命相争的血痕……可怜的老人……大学的新生……远隔山河的父母……我将要归去！

八月三十一日夜西山

（原载：《晨报副刊》第48期第1281号
1925年9月17日）

归来的儿子

曲　秋

“老师，你先抽这一口罢！”

这是一个中年人躺在床的右边，双手捧着烟枪，以枪嘴对着同床隔灯躺着的一个老年人，殷勤地劝他先抽一口。这大约是表示敬长的大道理。老年人几回略加推让，便不客气地接受了敬礼，将烟枪横在灯上，息索息索地吞吐起来。只见两对眼睛，都注视着灯口，与烟泡接触的当儿，若有无限的神秘，可思议的兴味。一会这张床被烟云弥布了，这两个瘾客便在这烟云弥布里，继续他们的礼让，制造他们的云雾。

这床是摆在一间厢房里，房内扑实的陈设显出中国西部农家的况味。两套黑漆的椅靠，摆来挨着东西的墙壁。北面便是一张可睡三四人的大床，屋正中放一张大方桌，桌上放了一把大锡壶及几个红花磁的饭碗。南墙的角上便是小门，门外便是大厅合正屋，两厢组成的一个长方的大天井。这样的房屋在中国西部的乡间，绝不是聚族而居的大户，也不是官宦人家的门第配有池台亭阁；这是一个农家，小康的农家；既不奢侈虚华，也不刻苦节俭。粗茶淡饭，终岁可以温饱。当近几年天下大乱，兵匪充斥的时候，这样的人家便渐渐难找，而引人羡慕称道起来了。

这农家一向是极为清静，近月因回来一个几年远出的儿子，

静寂的空气稍稍扰动了。这儿子在外是带去了农家亲朋们的期望，所以在初归时亲朋们都要来看望一回。看看子弟的长进，听听外面的新闻，问问亲族的安好。几日间的欢宴，忙煞这农家的主人。一日二日过后，亲族也便散了，各人归家去忙田内的农事。只留下几个年老情切的人作最后的点缀。因此在厢房中，虽更深夜静，还有两人伴着昏夜不灭的烟灯，重叙他们的琐话。

这两个人是谁？年老的便是这初归人的塾师，本境极有声名的闻人。中年人便是远归人的尊舅；师道尊严，娘亲舅大，所以两人在这家的地位是顶高的。这农家自从几年以前让一个独生子远游之后，不到一年便丧了主翁，留下一个孤苦伶仃的未亡人，抚着膝下一个年方六岁的小孤女，终朝渴望远游的儿子早归来。一切对外事务都全仗老师念着师生的旧谊，舅爷看在姐妹的情分，挺身出来代表料理。他们这样的热忱，他们这样的高义，颇为本境人所称道。

他们俩在晚饭后，到外面散一回步，便转到厢房里。烟灯点上了。一壶香茶几盘糖果，满盒云土煮好的芙蓉膏，伴着他们躺下。彼此先不着声地抽一阵，抽得略够分了，他们才停了枪手，懒懒地转动，将眼皮微微闭着，彼此对谈起来。老师自从科举停了之后，觉得圣门之徒，陡然跌价，便有点心伤，渐渐瞧不起目下的世风，口调常常不平，多是追怀往古。舅爷他是出过远门的人，南走湖广，北走陕甘，本境算他的脚长，也算他的见识高。他常骂现在的年青人无出息。常说他少年时是怎样能白手出外，满载而归。他很尊敬老师的才学。老师也都赞美他的本领。他们一碰着，便是攻击时务，什么放天足乱了男女之分咯！什么改民国无父无君咯！什么有了洋枪天下就

不得太平咯！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又同着维持这农家的事务，所以成了极好的朋友，他们在农家住得久了，每晚都要闲谈，起初虽然是说别的，但总不免要移在这归来的儿子的头上。老师说："这孩子近来大变了！大变了！"

"是的，我看他这次出门是白费了的！"

"可不是吗！他现在只能用白话写信，连文章都做不起了。往年我辛苦教出来的好笔仗通通拿不出来了！"

"他到底在外做甚么？"

"他说他在外学了什么，我看都是假的。"

"啊！他说他要办民团来抵抗军人，这简直是有心撞祸败家。他又不屑做官，他说'与其做官，不如作强盗反痛快高尚'，他的母亲劝他接亲，他便说要与女家的姑娘先作几月的朋友！"

"那简直是一个疯子！"

"是的！听说有时他自己在房中痛哭！有时又忽然无故发笑！"

"最妙是每夜跑到祖坟头上去看月亮，或者一个人独自在他父亲的坟上凉拌一夜，来回三十多里一点也不怕疲倦。"

"我看这种疯病，是无法医治的！"

"最苦是令姊辛苦一生，得这样一个不生不死的儿子！"

"真是无法，我想弄他到词堂里去，请拢亲族尊长家教他一顿。"

"恐怕他跑了啊！"

"他跑他娘的！省得讨人忧气。"

舅爷越说越奋兴，老师究竟是火气已退的人，只是温情的责难，并不出一个办法。他也知道舅爷的办法不能够得到同意。不过气愤了说一说而已。因为这个远归的人的岁数究竟很大

了，谁又能够当小孩子般去管他。何况他的母亲好容易才望到她的儿子回来，谁又忍心去逼迫。恐怕给谁逼走了，谁就要担任找回的责任！

她，这母亲，是一个易于感伤的妇人。短小的身材，脆弱的体质，灰白的容颜，完全显出她是一个常在床褥的病人。尤其那一对常常紧锁的眉峰下隐藏着的一道忧郁的眸光，是她红颜薄命的特征。只要初初见她一面，便可感觉她那一段悲惨的历史。自他丈夫死了之后到她儿子未归的三年中，她的心分成了三部：一部随了亡夫下入黄泉，望她早升天界！一部随了游子在外飘流，望他早返家园！一部便专注在她怀抱中的一个小小的女孩身上。她的心既这样放散在外，她又昼夜不宁，不能离开药炉；在这家败人亡的残局中，她只有孤苦伶丁地过活。

她从前渴望她的儿子能够衣锦归来，作一番亲戚交游的光宠，或者可以替她们夫妇一生在乡中的埋没吐一吐气。她有这样的希望维系着，她望儿的心到不甚急切。不幸她的丈夫死了，新丧死别的悲哀迫她尝着生离远隔的痛苦。家事的烦难纷乱，庭堂的孤寂清冷，外面兵匪的凶耗的起伏，游子的音信的稀疏，使她心中起无限的忧惧。她不望儿子挣功名了，功名有什么用啊！何况功名更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不见几人成功，常常有失败者堕落得一切化为乌有。她只望她的爱儿早早归来。归来伴着她过活，使她的心复还原座。间或邻居的人说：

“太太！大少爷有信没有？怎么还不回来？”

“没有信啊！听说外面又打仗了！”

“打仗不要紧的！几个月就要停的。我想大少爷便要归来的！”

“我总是这样望！怕终要落空啊！”

她说到这里，声音变成极低咽了。眼眶一红，泪珠便挤了出来。这时她只有抱着她的小女偎倚着不放。这小女一天一天地长大了。她很害怕啊！养女终是为人忙的。到了二十岁前后，总得恭敬地送给人家。她这爱女何尝能够逃出例外，这是多么可怕的前途。她和她的丈夫，夫妻一世，恩爱一生，早早的便死了，如今留着她受罪。虽曾遗下一个儿子可以依靠，但是如游魂一般，不曾归来。那么可靠的只有这个小女，然而渐渐长大了，即是渐渐地要抛弃她了。这是多么可怕！她趁她还小，努力抱着，用两手抱着，只能用两手抱着，不然便要跑了。邻居人这时安慰她说：

“太太，吉人天相！太太一生行善，谅来大少爷是凶少吉多的！当然要回来！”

是的，她也这样想过！她自思一生并没有过恶，这或者可以佑上天的怜悯和保佑。因此她家朝晚神前的敬香，都由她亲自洗手去敬。附近的圣会神诞，她更非去礼拜祈祷不可。为诚心起见，她并不坐肩舆；总是一个人背着香袱，执着拐杖，或者雇一个仆妇携着她的小女，不辞跋涉辛苦地走去。

在她本境的习俗，居民常聚金修造庙宇祈神降福。一个庙宇里面差不多诸神齐备：关公，观音，佛爷，送子娘娘，燃灯菩萨，张天师，赵公明等等。每年到了诸神的寿诞，大家便在神前致祭，并庆祝一天。这样习以为常，成了农妇们的一个游乐的盛会。每当会期的早上，大家极早起来，忙着把一天应做的大事做了。到了半上午的时候，才忙着洗脸穿戴。然后带了香烛纸钱，一斛米，几十文铜钱，手持拐杖，沿途结伴走上庙去。一到正午人到得最多的时候，鼓乐齐奏了，木偶戏也便登场，大家都欢欣的享受。神龛前香烟渺渺，蒲团上的人更接连不断。

这样纷纷乱乱闹一半天，便开席了。有时是荤的，有时又是素的。总之大家都笑咪咪地尽吃饱为止。吃完了，戏又开台，有的便看红脸进黑脸出。有的便大家攀谈起来。他们若不说王大嫂的儿媳不孝，便要说李大娘的女儿有福。这家女儿出阁咯，那家男儿接亲咯！嫁妆赛得过一州一府咯！王道士又捉了产难鬼咯！总之长长短短琐琐碎碎，说得非常有兴味，到了日落山头，大家沿途还依依不舍地不得已而别去。

但是，在这样一个快活真纯的聚会里，常常发见一个愁容满面的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小女老在神前俯仗：焚了香，烧了纸，叩了头，抽了签，流了泪，她才眉愁皱眼地起来，庙中的司事看了一道茶，她也不大与人谈话，便垂着头走了。这时戏正唱得有劲，酒席也将排出，妇女老幼们的口涎已自吞自吐了多次。单独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妇人，大家觉得稀奇，便出来互相探问，自然有知道的便出来介绍。

“她是我们本境最可怜的人。丈夫死了，儿子几年不归。有人还说已经死了，她只有一个小女儿，她来拜佛，她才是真来拜佛的唷！那像我们大家图到这里赶热闹。”

她这样的被人介绍了，有的表示几分婉惜，有的微微点首。有的又引为佐证说有儿子的真不应该让他出远门，留在身边，好歹都放心，况且年轻人都靠不住的容易在外沾花惹草，被别人的姑娘绊住，便会老不回来。

不错！男人们常被女人们绊住。女人们说这句时与其说她们是本于推理，勿宁说她们是本于经验。那一个女人不愿绊住男子，那一个男子又不愿被女人绊住。于是女绊男，男被女绊，才能在地球上演出活戏，永续不断，以至于无穷万年。不但这类烧香的太太们，对于这出外未归的儿子，起了这层疑

虑，他的舅爷更于此早有先见。他曾向着她——即那望儿念儿梦里都想着儿的母亲——说过：

“姐姐！你不用焦心！在我看一两年后，你的儿子或许要带几个回来！或者已与你添孙儿了。不然这孩子，出了门三四年，何以不向家里要钱呢？”

她听了这些话微微发笑，绝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回事。舅爷隔了些时又说：

“你还不相信么？在外面作上门郎最容易的！如今男女讲自由，大家高兴就住在一起！青年人性质未定，谁能忍耐！”

她易感而柔懦的心性，被这样决断的言词，似乎动摇了些。然而在她想来，她并不失望，即使他在外结了婚未必便不回来；她所顾虑的怕他已经不在世上，或许已经病在外边不能回来，若他还在她断定他要回来的！若他在外结了亲，她更想他必因此要早些回来。舅爷听了她这类的话，为贯透主张不得不往下说：

“假如他竟自这样回来了，我们当长辈的是不能答应他的！接亲不禀告长辈，还成什么话，不败坏门风么？”

舅爷近来提到她的儿子每每有点恶意，不像她，那当母亲的心，那样能够委屈原谅，老实说她现在的唯一希望只是在他早早回来，无论他在外是失败或是作了大官，即使接了几门亲事，也不要紧。

伏天虽然过了，凉爽的秋风却未到来。日间仍然暑气蒸腾，非晚间月上时不能凉爽。这时的农家正当是收了新谷，尝了新米之后，略略有些闲暇。大家乘着月光到各人的院前纳凉。檐前茂盛的芭蕉及豆棚的浓阴，被月光斜绘在地上，显出一段幽暗清凉的佳趣。丛草间的蟋蟀声唧唧不休，伴着农人们的老幼男女闲

谈。她，望儿早回的母亲，每夜也常带着仆妇在自己大门的院内闲坐，为的是夜凉未透还不能早睡咧！月光渐到中天了，夜露也渐密布了。这是催人就睡的法使，因为露到窗台，外面不能再坐了。她正要起身入内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叫门，她觉得声音有一点特致，她的心略动一下，照例要猜这是她想念的儿子回来了。她不停留，急忙叫仆妇去开门。门开了进了一担行李，后面跟着一个青年，母亲便抢步上去说："你是鸿儿么？"

"啊！母亲！"

"娘望得你好苦啊！"

没有话说，不能再说话。母子只有抱头痛哭。母望儿，儿念母的一切苦绪塞着他们的心，找不出话来说。他们只有痛快的哭。小女孩看着母亲那种哭，那样伤心，她也跑拢来叫着"妈呀！妈呀！"的大哭起来。

本境的人都知道她的儿子鸿回来了。

舅爷老师第二天闻信也就跑来了。见面之后，他们看他是一个短小身材的青年，体质并不健壮，两道皱眉，脸色褐黄，真果饱经风霜似地。一身穿着如本境的人一样，不华美，不时新。而他也并显不出一个出远门的人的样子。没有话说，没有招呼，不知道问好，更不知道作揖磕头，更不知道感谢舅爷老师照应他家的深恩。当他见着舅爷的时候，口中呐呐地只说出"啊！舅爷……好！"当他见着老师也仍旧是一声"啊！老师好！"如木偶般站着，此外并没有旁的话。

亲友们都来了，又有一番应酬，他虽然是一个主角，仍然不能周旋应对。问他一句，他说一句，不问他，他便不说。不但一切人都觉的兴味索然；即他自己也仿佛有几分忽忽不乐，屋内的一切仿佛都与他不合，他简直是出不得已而在容忍一般。大

家都说："这鸿！长变了！大变了！反不如往年那样伶俐了！"

舅爷老师不仅于他有今昔之感，实在还有一点愤气。怪他大气盘旋，怪他装模作样，怪他目无尊长，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曾起心要拉他到词堂去家教一番。他呢？似乎对于这些有些气愤，最终他只是笑一笑。但他总是不愿与任何人久相对坐，自他归来的一二月内。

母亲隐察出鸿是与两位长辈合不来的，但她总找不出一个调解的法子。她又察出鸿与家里的一切都不甚和谐。她多番猜度与细察，也得不到要领，更不知鸿的心事。就是她自己与鸿中间，娘儿的关系，似乎也有一层障碍。这障碍越积越高，非急设法，几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她计算他回家将近两月，他从不曾细问过，别离来几年内她所吃的苦。说到父亲的死，他便先流泪，她也跟着流泪。她看见他那样伤心，她便不敢多提。

她常常看见他发愁，这愁表在的脸上，但绝不是能引人可怜的，而竟是对于外物在愤怒一般。有时又见他发笑；这笑绝不是使人愉快的，只是一层讥刺的光，射得使人畏避。她是他的母亲，她知道这可怕的愁与笑，不是为她而发。她还可去亲近他。但是仆妇们，邻居们，人客们都与他有些间隔与生疏。有的当他是一个疯子，不理他。有的当他是一个危险物，不敢挨近他。他实在太离奇了。只有她，他的母亲偏偏不怕，要在他身上寻出一个根由来。

一夜她在房里替她的小女儿作鞋，厢房内的烟客们的灯还点着，鸿儿屋内的灯也不曾息。秋末的时分，已经穿上棉衣了，夜间更有一点清冷。纸窗被冷风穿拂着，把屋内的油灯，弄得微微摇摆。这间黑暗的屋，靠这样一只小灯的光，冲出一团光圈，照着她在这儿作工，以外都是黑暗沉沉的。她在光圈中

替她女儿作鞋，手虽不僵，嘴上却有鼻涕流下来了。母亲为儿女的辛苦，都是这般样的与冷热作战，与困难狠斗。她在这样一个冷清夜里，她想着亡夫，她的泪便下来了。她想邻屋古怪的儿子，她的泪更不能终止。她回头让灯光射在熟睡了的小女的面庞上，她又觉得有些愉悦。可怜她的心只是这样忐忑不宁。忽一会风略大了，小灯随风息灭。她四面摸索找不着火柴，她想起了才移步到鸿的屋里去。她轻步到了窗前先往内一望，正看着鸿儿在收拾什么行李似的，她心里有些着急了。她又看鸿儿脸上映着灯影有两道白的泪光。他那瘦弱的体质，孤单地在一间清冷的屋中，在她当母亲的心目中看来，这是多么的可怜。她从来未看见他这样可怜过。啊！啊！这是她的儿，她的心肝，这样可怜！她抢步走了进去！她急问：

“鸿！你怎么样了？你怎么这样使娘伤心？又这样使娘害怕！”

他见是母亲进来了，他突坐着，如痴呆似地不动，他仿佛欲言而苦于不能言的样子。她又说：

“鸿！娘的鸿！鸿啊！你回来这样久，从不问娘儿声！你在外的情形，也不多提。你只是古古怪怪，到处不能相容一样。娘实在忍不住要问你了。你倒底愁什么？又笑什么？今晚你又哭什么？”

他只是隔灯看着她的母亲声泪俱下的说，然而他没有回答。她又说了：

“现在父亲死了，只剩下娘儿三个。娘儿在本境也可好好过活，娘不望你挣功名，只望你长在娘的左右。你父亲死了还念你，还叫你不要再出门。娘自你父亲死了那一天，便望你早早归来。三餐茶饭，起早睡眠，都忘不了你。门前有个风吹草

动，都以为是你回来了。做梦也不知梦了多少次数。如今你回来，不但不能解除我的思念，你那样古怪，反使娘摸不着头脑。你是不愿在家里住，你大约是想走罢！但是你知道父亲死了，娘只有你一人，小妹妹将来也靠你一人。你能不管么？娘觉得近来你不是娘的儿子。你每每说到世上大乱，你就异常着急愤慨，但是你怎么那样不关心娘！你应当先与娘当一个儿子，再关他事。唷！你收拾行李，大约是想走，你走何处去，娘不知道，娘只有随着你去！任你到那里娘都去！可怜娘，只有你一个啊！……”

母亲柔弱得似恳求、似泣诉的声调，和着泪在他跟前说了一番。在昏黄的灯影里他们母子的泪对流着，如很痛快似地。只见鸿儿的身子渐渐往下终于跪在母亲的面前。

邻屋的小孩，中夜转侧间醒来，不见了母亲，便大哭起来。厢房的烟客听着了才跑来先将对哭的母子们分开。母亲余泪未尽便去抱小孩去了。鸿起来靠着桌子坐着，低头不动。舅爷便说：

“我不知道今晚你们母子哭些什么？你未回来的时候，你母亲不过忧愁一回便了。你回来了一家便不平安了。你也太古怪，你家只靠你一人，既不理家，又不管事，一天就是与人作气，仿佛大家都与你有仇一样……”

舅爷说到这里，却已上气了。温和的老师便插嘴打断说：

“读书人总得明理，孝父母即在一个顺字。我看你变得太古怪了，不知体贴亲心，这便算不对！你快改罢！”

他听了这两位的责难，他仍然不曾回答。然而他低头那一付含恶意的深愁，又显出来。舅爷趁着火热的脸，心中的愤恨抑止不住。便又往下说：

“你又不是做了大官回来，几年滥账，有什么可傲人的地

方？你切不要以为你母亲不能管你，须知道还有尊长在，你各自小心。”

这样严重的警告，于他引不起一点反响。他带怒睁眼愁眉地背灯立着，严厉的警告若未听见一般。

仆妇过来请舅爷老师去用茶点去了，母亲随即走了进来。她说：

“娘未有不疼自己的儿的！你也替娘想一想！”

她虽然是这样说，她心里却很痛快。这是她儿子回来后，她最痛快的一天。她明白了儿子爱父母的真诚，不过不能在口上说罢了。因为她心内蕴藏着的话已说出来了。几年积着的萦思已被这晚的泪洗透了。

外面的冷风接着大起来了，阵阵的吹拂，将这家人的情意冰透。母亲和鸿还未归寝，厢房的烟灯已熄，那东窗上又显鱼肚色了。

秋风越吹越冷，人们吃下中秋月饼，和登高采茱萸，不过恍如前日的事，一转眼便是初冬了。这时草木已经摇落，早夜的风，吹透毛骨，严冬将至，万物皆要俯首在霜雪之下受罪，忍耐等来春的救济到来。农家仓里满装着秋收，田内已储满冬水，土内的小麦已渐渐从土缝发出新苗。外面的工作少了，大家都在屋内预备过冬的一切。

鸿儿的家里也是一样，仆妇们帮着母亲制新的棉衣，长工们在屋内打竹货。槽上的过年肥猪，已到七八分了，看看可以开刀。家物的一切都极恬静平稳似地。母亲近来也喜欢得多了。夜间的睡眠很好，每天也肯发笑。绝不似往日倚门望儿的景况。更不是鸿儿初归那种惶惑疑虑不安的样子。这不是她于人

生有了什么明悟；知道徒忧无益而转变成了一个乐观者；她不过受她的儿子的影响罢了！

她的儿，归来的鸿儿！现在朝朝暮暮，都在她的跟前。初初回来的缄默古怪的样子，忽然转变了。每天晚上要陪着他的母亲闲谈：祖先的遗事，乡曲间的传闻，他都喜听，又喜问，让母亲在灯下细说。他又每每谈一些外方的风物及一些使人感动的故事，母亲常随儿子的声调、容颜、姿势而发笑、喟叹、长吁，有时他说到动人的情处，母亲的泪，便会流了下来。

鸿儿的古怪，本是本境闻名的，近来不古怪，本境人也通知道了。大家通猜不透这是什么缘故。有的人说，要明白他的根原，须先问他在外做的什么，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外读书，大家都不信一个读书人会那样古怪。近来由古怪忽又转变了，这不更古怪么？大家几回猜不透，便放过了。不过近来大家所同声常说的，便是赞称鸿儿能够顺母亲的心，他的家也变成极幸福了。

“他家近来弹琴吹唱，果真快乐！出过远门人的能干真多。”这是男人们的评论。女太太们的话又有些不同，她们说：

“鸿少爷才是一个好儿子。我们从来未看见过。本境也找不出。他常常陪他母亲到城里去买东西，看戏。那象我们一辈子在家中不能出来。”

这样的评论在本境人的闲谈里，常常可以听见。这不过是对于这家人的景况一段好结论而已，但是何以能够如此，何以近来又如此，大家依然说不出。在他家舅爷的意思，便说这是他的教训的成功，他常常引为得意，老师看见近来的转变，也觉得他是很有见地。母亲只是喜欢快乐。她依然不明白鸿儿何以能这样转变。她好奇的心便常常窥察，但也看不出什么要领。

他虽然看见鸿儿肯设法使她快乐，但在他一个独居的时候，他那抑忧的样子，仍与前一样，她忍不住，每每去问：

“鸿儿！你忧什么？”

“……母亲！我不忧什么。”

“但是你为什么又愁眉不展？”

“……大概因为我在外独处惯了，每每爱深思，所以便象有心事样的，其实没有什么。”

就这样了，其他再也不能够多知道一点。她有时又另一番猜度，她又看见他那孤单，她向他说：

“鸿！娘与你选一门亲事！你愿意么？”

“啊！不必！请妈放心！还早咧！”

他又这样便回答了。旁边人听见这类情形，便替她进一解说：

“大概他在外已经真有了，不好带回来，所以有隐忧。你要他再定婚，岂不是更使他为难么？”

是的！象这样或许有几分合情理。毕竟她不相信，鸿会瞒着她，不告诉她。但是她那母亲的心，对于这件亲事，确认为责无旁贷，她以为使他结了婚，或者他可以更转变些，他可以不至于再想出去。于是她便常提到这个问题，然而他的答复，只是与前番一样，离不了说：“还早！请妈不必操心！”他说这话时只是微微含笑。

有一天，天气晴朗的一天。她合鸿儿同在正屋的院内矮凳上坐下。暖人的冬日的光，晒在她母子俩的身上。沉冬的天气，最难过是淫雨或阴霾而吹风的时际，象这一天的晴明温暖，人们的脸上莫不充满几分喜气。她和鸿儿正在谈一件往事，鸿儿忽然向她说：

“母亲！我看乡间太清冷，我们不如搬到省上去住。”

“搬上省去住，倒是好！只怕钱不足用！”

“……卖田地！”

他突然断决地这样说了。她有一点惊异，回答说：“啊！那是祖业！”

“是！祖业不能轻易卖，卖掉了便难赎回，现钱在手中也要日少一日……。但是长在乡中，一点事也不能做，岂不闷死！”

她又是喜幸，又是惊异，听了他这几句话。这几句话虽平淡却是他归来的第一次对于家务的表白。她到底知道他在乡中觉得闷，因无事做觉得闷！她便追问：

“你要做什么事呢？”

“如今闹得这样乱，应做的事到很多！尤其我们读书人的责任更大。母亲在乡中住也很好，而且平安，我也很放心。”

她再往下问，他再答：

“在外做事本很危险，以我的性情，更危险，母亲在家中也好，搬家到外面去，必要受惊恐！”

他的言词永是这样含糊不明，她再追问，也问不出底细。在她的心间，虽觉鸿儿近来转变，不象初归那样古怪，然而她们母子中间，依然有一隔膜。她久想除去这层隔膜，她终于不能。但她总盼望着有这么一天。换句话说，便是可怜的她，终想有一天，有一天能完全认清她这个归来的儿子。

冬越深，离过年的日子更近，大家都忙迫起来，在外的人正归家，在家的人便望在外的人归家。

舅爷一家是极平静的，一家常常团园的。在这冷冻的冬天

里，整日都睡在自己的屋里拌他的烟灰，他将烟灰拌了又拌，恐怕多耗费一点。这是瘾客们最小心，最节省，最心狠的地方。

在一天正午过后，舅爷刚吃了早饭，正待喝茶，忽然有人进来说：

“老爷！外面是你的外甥，他请你出去有话说！”

“是鸿吗？快叫他进来罢！”

“他说他不能够进来，他的事情很忙，立刻又要他去！”

舅爷听了之后，便懒懒地走出房来。舅娘在邻屋里正在替她的么儿催眠，听着她的外甥来了，便急忙说：

“你去留他进来，至少要歇一宿才放他走。自己只有一个外甥，你不要使傲性子，逗人够气，让亲戚处知道了，不好听！”

“是！是！是！妈的！又多嘴！叽哩咕噜说不完，你横顺有礼，老子要你来教！”

舅爷这样骂着走了出去。看着外面来的鸿儿站在大门口。舅爷说：

“你请进来罢！”

“舅爷，我有事不能进来，我现在托舅爷一件事，请你帮忙！”

“什么事？是替你做媒么？你也得顺从你母亲才是！”

“不是这件事！”

“那又是什么事？”

“我要走了！”

“啊！你要走！你走到那里去？”

舅爷有些惊诧了！鸿儿答说：

“我要到外面做事去！我的朋友都没有象我这样无聊闲着的。因为现在万不是当隐士的时候！”

“你出去作事么！那真好！能够得到一官半职当舅爷的也有光彩！”

舅爷是最佩服能做官的，听见鸿儿出外做事，便以为他是去作官了，所以满脸堆笑地称赞。

“不是作官！正是与当官的作对！因为天下便是官弄乱的。我要作事当然不是跟着去弄乱天下！”

“啊！那不危险！”

“危险！怕什么！总比无聊活着好的多！”

“但是你有母亲……”

“母亲我请舅爷照料。家里也不缺什么。我要这样干去才是报答母亲。舅爷我先感谢你。我相信舅爷将来总会了解我！我走了！”

舅爷听了这番突如其来的话，正找不着回答，鸿儿已迈步如飞地走了。舅爷只站在大门上发呆。舅娘刚才完事从大厅内一拐一拐地转出来留客。远远地口里便在说：

“鸿！快进来坐，你是从来不来的稀客哟！”

舅爷听着，觉着可恼，便骂说：

“你嚷些什么？这个疯子早走了！”

“哼！你这么不中用！留一个外甥，都留不进来。鸿是斯文人，这样天晚还要走回家，将来传说出去，还说舅家这样不懂事！”

“你这泼妇，真讨厌！他说他有事无头无脑说一阵便走了！他说他是出远门！不愿多留一刻，又干我什么事？”

他们夫妻不和谐地正在那儿如奏杂乐一般。外面又进来一

个人说：

“老爷！不好了！鸿少爷又跑了，家太太正哭着咧！请你过去设法。”

舅爷听了撇下他的贱内便问说：

“你知道他是怎样走了的！”

“他昨晚陪着他母亲谈了一大半夜的话，刚到天明，太太睡去了。等我们醒来，看后门开着，他屋里没有人，才知道他走了。”

舅爷听了之后，知道鸿儿的母亲伤心不了。他非得去走一趟不可。便说：

“你快回去罢！我立刻就来。你顺路去请一请老师，请他也到你们那里去。”

这个家人掉头去后，舅爷一面叫人预备轿子，一面自己收拾烟灯烟枪，一面想着这跑了的鸿儿，便呢喃地骂着：“这不顾家的东西！”

冬防的紧急期已经到了，看看又是风雪盈途的残年的急景。在乡间的鸡鸣狗吠，本与百里之外是不相闻问的，天下虽然大乱而过年的兴趣，却与往年一样，大家照例地忙着。这时四野的风物：木落了，水尽了，崖枯了，山也穷得精光，处处都呈出一种绝亡的样子。若不是有来春的风光的预约，恐怕这样延长，世界怕真要到了末日。是的，有一个来春，便是万物的一个希望，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在这样一个冷冻的天气，在那长途上，还有不少的旅客，忙忙碌碌地来往。大家低着头，认着路，一直向前，向着他们的希望，而连续不断，而永永远远。所谓过年，无非在长流的时间上画一个痕迹，作一个记号而已！

七月末于西山

我心上有一个结，永远也解不开，这结便是我的薄命的母亲打下的。我预计我发狂似地跑了出来，南去北来，又是二年了。我抛了母亲，仍然毫无所成。今年春间在无可奈何中提笔写这么一篇，写完便搁下了。到了秋初搬家又从旧纸堆中拣出。当时看了一遍，虽没引起什么伤感，但却打破了我自己在文学上的迷梦。又因追念当日在乡中伴母时的奋发的心境，使我自己痛责在否定中浸润的无聊。于是我架上的黄白皮色的书被换成红色的了。我的生活算大大改变了一下。不过我的故态难免要复发，那就是因为旧日的情景常常使我回忆；我又想将旧日流浪中所产生的几十篇诗文，学学时髦订成一集。然而实际的工作逼迫着我无有推敲字眼的闲暇，我只好把这心愿留在异日完成。话虽如此，我总舍不得这《归来的儿子》，所以费了半天删节的功夫，使“鸿儿”与世人相见。这种忸忸怩怩的样子，完全证明我内心的力量薄弱，这或许是我一生无成的原因。一生无成本无关系，不过此时想着远隔的父母令自己心中念念不已。我远隔山河的父母哟！我凭这一点“念念”报尝你们养育的劬劳罢！

十月十九日北京潼川馆。

（原载：《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六号，1926年）

江南抗战之春

陈　毅

可诅咒的雨天

去年六月，我们部队初到江南，正是霉雨的时候，春天业已过去。战士们淋着雨在泥泞的道路上挣扎，尤其艰苦的，是夜间行军，挺进敌后，在日军碉堡林立，严密封锁的京沪线上穿插，急袭敌人汽车、仓库、火车列车和空虚城市。同志们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不得不忍受在泥泞地上奔走的困苦，几乎每人都在嗟怨诅咒，诅咒这阴雨连绵的天候。

尽管这雨季是令人诅咒的，但它也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趣事。

有一次在行军中，我看到同志们前仆后继的情景。第一个人提醒他的同伴说："仔细点！"不期立即他就滑倒在地上，后面的人一齐笑着，开心地喊道："再来一个！"这话未完，另一个人又扑通跌在水里；第三个正笑别人，同时他自己又继续着滑倒地下，后面的正嘲笑前面的说："你们坐汽车太快了！"但接着又是一个、二个跌下去。部队行列中跌得儿戏似的，指导员才发出警告："行军要肃静！不要笑，大家小心，再玩笑，会跌断你们的腿。"连长怕同志们丧气，指着天边的远影说："快到宿营地了，还有五里路！"指挥员的话使行列暂时沉默下来。不久，"我在南方山区打游击的时候，真比待在这儿强！"有人

又这样抱怨了。“唉！这就是雨中的江南。”我骑在马上也这样叹一声气，不期忘记了抓牢缰绳，一松手，马前足一滑，连人带马滚在塘里。幸而塘水不深，我被别人拖起，变成了一个落水鸡！

到了宿营地，每一个同志都成了泥菩萨，烧几大堆火来烘衣服。服务团团员抱怨他的日记本和书籍被水打湿，字迹模糊，不能挽救；战斗员急急忙忙擦拭他的武器。我自己的一担书籍也给雨水浸透，达到了饱和状态。我知道整理无益，也就让它摆在一边。我躺在一块门板上，被水淹过的屋里散发着阴沉沉潮湿的臭味，我心里又是一声抱怨：“这雨中的江南！”仿佛自己受了骗，因为历史上中国文人笔下的江南是多么风光明媚，同我眼见的完全两样啊！

可注意的是：许多同志只有一件衣服，没有替换的，赤身裸体等着烘干衣服，不但没有抱怨，大家还热烈嘻笑地重话着今天冒雨行军的前后滑跌的故事。我心里想着：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儿女们，在为祖国奋斗时所表现的革命的乐观的精神！

战斗的春天

然而今天的江南却不同了，不到一个整年，我便亲眼看见江南的春景。

从旧历二月起，江南很快脱去了冬日的萧索景象，换上艳丽的春装。菜黄、麦秀、柳青、桃红、墙白，到处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远山似在雾中飘浮着，每一人家常常是流水萦回和垂柳环绕，当面又是一块明镜似的池塘，这仿佛是经过人工安排的花园；尤其在湖泊地区，在月光之下湖水盈盈，景物更为秀丽。就连我们部队同志过去认为毫无战术价值的茅山，现

在也富有生气了！

原来我的部队是在南方各省的山区成长起来的，惯于山地作战，当我们向江南平原挺进时，指望茅山山脉作为我们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依托。我们想象中的茅山，应该是“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那知道去年真到了茅山时，才看见茅山上不仅山上无树、无花，连茅草也不多不厚，既藏不下单人独马，当然也隐蔽不了较大的部队，这使我们大为失望。不料经过半年多的工作我们熟悉了茅山的地形和民情，茅山的茅草不仅多而且很厚，多数的山窝曲折处，远不能见，近看才大有深奥可资利用。埋藏几支不大的游击队作为转移的依托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今年的茅山便在我们抗日部队的心目中，增加了美丽和价值。

我幼年在成都受中小学教育，成都盆地的风景，对我很熟悉。拿他来比江南，两地差不多，江南麦季碧绿如油的风景，恐在川西还见不到。哈哈，我真幸运，亲眼看见了秀丽的江南。江南人听见我说这话，就说：“你还没有到过苏州、无锡啊！那一带才是真正的江南！”这样的话，又引导我转而展望太湖沿岸。是的，我们部队的先遣队已经挺进到太湖东岸与当地人民游击队结合起来了，我是部队指挥员，我应该亲自到那一带去看一看，看看那新扩大的游击区和美丽的江南风光！

在一天的傍晚散步的时候，我跟同伴们跑上一个高高的浅山，大家向远处了望，大家指认云树：那是茅山，那是乾元观，再过去就是宝华山脉，山脉的西头就是有名的龙潭。再往东南方面看，便是太湖沿岸，那边是长荡湖，那边是宜兴山区，正东就是苏州、无锡，往北过铁道就是长江到江北的线路。夕阳的红光平铺的照着金黄色的油菜花，河堤上边的杨柳，成线式

地向远处延伸。河内的舟船，远看上去，那张挂着的风帆，慢慢地移动着，笔直地擦过树梢。还有点缀在这些场子里最生动的景象，是十几个儿童骑着牛兴高采烈向疏落的农舍加鞭，同伴中有一人突然高叫："好一幅阳春烟景！"

我立即加一句："这儿却多了一个东西！"

"你指的多了个什么东西？"同伴问。

"你们猜一猜。"

"多了露天的茅厕。"

"不是！"

"多了炕山芋。"①

"更不是。"

"那猜不着，得你自己说明。"

"美丽的江南，多了一个日本鬼子啊！"

大家都笑了，"说得不错，必须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应趁着春天的天气好，多进行一些战斗！"这是大家散步时的共同意见。

这时，我记起一个同志写给我的信，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这句话很好，我们确实在与日本军队顽强地战斗着！当着这美好的春天！

壮士军前半死生，民众后方争入伍

趁着大地春色，柳垂风和之际，我们于绿茵草地上轮流检阅部队，整训部队，准备战斗。我在一个独立团队的军人大会上问大家：

"初到江南你们几百人？"

"我们记得那时是三百多人。"

“现在你们多少人？”

“现在大概多了几百人。”

我接着说：“我建议，让我们来统计一下吧！你们中间是江西人的举手！”我仔细一数，仅有二十一人。“湖南人举手！”仅八人，“广东人举手！”只二人，“北方人举手！”仅十四人，“四川人举手！”连我仅四人。我最后说：“江南人举手！”立刻眼前仿佛升起一座浓密的竹林，遮盖了一切，我简直数不清了。这一股江南人的潮流淹没了、溶化了外省来的指战员。

对战士讲解新四军的历史，特别是用它的前身——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来进行教育，列为我们整训部队的重要项目之一。所以我在讲话中接着问道：

“以前从江西、湖南来的那些老同志哪里去了？”

“为国家光荣牺牲了！”听众一齐怒吼似的回答。

“我们应当怎么办？”

“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我大叫一声：“好！”

“新四军坚持江南抗战，就是江南人民的抗日武装，江南人民要爱护新四军，爱护自己的子弟兵。军队与地方血肉相联，团结一致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四军江南化，江南新四军化！”这就是我最后的演词和结论。会场上还有另一支队伍，那是附近的村庄自动集聚拢来的老百姓，大约有三、四百人，他们站在部队的外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大家在笑声中散会。这笑声我分不清是来自军队，还是来自民众。但这明明白白是中国人民的声音，是抗战的声音。

同一天，当我回到宿营地的时候，政治部一位同志告诉我

说："今天有一个老太太送她十六岁的一个女儿来，要求加入服务团。"又有一个镇江人来见我，他带了三十多个新兵来入伍。在我的办公桌上，还放着我们一团的一份工作报告，那里面写着他们近来扩大部队的成绩，特别提到一个老农民亲自送他的儿子来当兵，并且带着一支步枪。这些胜利的消息使我愉快而且兴奋，同时我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早上那个独立团队的军人大会上的热烈情景。

隔壁传来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勤务员的歌声："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

哀悼烈士，和尚抗敌

北国传来快讯，说五台山和尚也参加抗敌了，动员的口号是："你们出了家，但你们却没有出国。"这种生动的、鼓舞人心的、含有真理的词句，就把几千个五台和尚武装起来了！我们学习这个经验去敲茅山道士之门。去岁九月间，我们到茅山的乾元观去进行工作。这儿曾经是南齐陶宏景隐居之地。他是有名的山中宰相，中国道教以"宏景真人"的道号称呼他，表示崇敬。我们就抓住这段故事，加以强调："你们陶真人在山中也关心朝中大事，难道你们不管抗敌？"但这些话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有一次，我军与日寇在茅山作战，我们的伤病员住在乾元观中，当我们发现日军有袭击乾元观的战斗部署时，立即掩护伤病员撤走，一面劝道士们避开。他们不但不相信，而且说："日本人不会杀出家人的。"结果，日兵杀来，放火烧了乾元观，道士们也在日兵的刺刀下惨遭杀戮，这真令人痛心！

五台山的经验，在茅山不能显圣，尝使我挂记着，但是今

年春天的江南，却有了意外的春讯。在句容、镇江、丹阳三县交界的地方，三月七日我们有个团政治主任肖国生同志，在上下会战中光荣殉国。这件事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同情，先后举行群众大会表示追悼。一次在元庄有千余人，一次在薛庄有七百余人。在元庄的追悼会上，出现了和尚二十余人，带着钟磬，穿着袈裟，自动地先一天赶到元庄来，日夜礼佛念经，超度英魂。还有一个和尚在追悼会上登台讲演，代表出家人表示：第一、他们决心做七日道场超度英魂，不要任何报酬；第二、他们要组织和尚抗敌协会，参加抗敌工作；第三、他们要求新四军发给武器，组织游击队，为烈士报仇。和尚演讲完毕，哄动了全场。到会人都称赞和尚热心爱国的精神，又说新四军纪律好，作战勇敢，深得人心。而且一致表露了内心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这里引起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和尚都能，为什么茅山道士不能参加抗敌呢？何况他们又有山中宰相的传统呢？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工作不到家，我们应该检查自己的工作，改善自己的工作，一定有一天能把道士们吸收到战斗中来。

破路插禾，公路变田

四月初的一天，大清早，一出门就看见成群结队的人遍野穿流而来，远远望去，好象是无数散兵线向着同一目标前进。他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从这个标志就可知道这人群不会是新四军，也不会是日本鬼子。我恰好碰见其中的一队，看见他们扛着锄头，手提饭包，我明白他们是去破坏公路的。但顺便问一句：

“老乡，上哪儿去？”

“破坏马路呀！”他们中有人这样回答。

“官长，你是来照拂我们破坏公路的吧？”又有人反问我。

我想起昨夜我只是答应了第三区区长的请求，派兵一部担任掩护，并没有打算亲自去督促这项工作，我于是如实回答他们：

“我不是来破路的，我另外有事，但我出来看看你们出发的情形！”

“破路倒好，就耽心鬼子今天是不是会来？要来怎么办？”

“鬼子不会出来，就是出来，新四军会在前面掩护，你们不必耽心。我办完事今天下午会跑来同你们一道破路！”

我抽身回来，破路民工继续成群结队地前进，远望去好象一道汹涌澎湃的水流。这是为了抗战，为了保家卫国，一个简单的通知，就使得整个农村空了起来，人们一齐集中到公路上去。我们要知道目前已接近到“四月乡村闲人少”的时候了，江南此时正要割麦、插秧、耙田、点豆、养蚕培桑，已开始准备。然而大家知道破路重于一切。路不破坏，鬼子下乡扫荡则一无阻碍，那么民间会遭到更大的苦难，所以破路成了维护人民利益的迫切的要求，抓住这一点进行动员，一声号召，万众响应。我们知道有人就是不了解这个窍门，只管强迫摊派，造成无数鞭打捆绑、抓夫抽丁的悲剧。

下午我赶到公路上去参加破路的伟大工程。

当我走到工地的时候，大家停止了破土，转眼望着我这面，内中有对话：

“骑马的来了！”

“又会是来打人的吧！”

“鞭子上马打马，下马打人，那是老总们的本事！”

这句话使我毛骨悚然，我跳下马说一声：

“辛苦辛苦！”

“哈！你辛苦！”

“哈！是新四军的同志，他们的人是不打人的！”

“哈！我们都知道，他的军队在我们村上住得很久，我的老大还在他第三营当兵呢！”

看这样，他们对我的警戒算是撤去了，我就问他们：

“吃午饭了吧！今天可有什么事情不痛快？”

“没有什么，只是刚才有一位乡长先生打人，怪我们破路不用力呀！”

“这不好，我们去劝劝他，再不要有这样的行为，但大家要努力破路，一次彻底破完它……把马路变成田，田上插禾、种豆……鬼子不能来，今年秋收，又增加一些收成。”

“哈哈，同志先生讲得好呀！”

我们同来的同志把传单送给他们，大家欢欢喜喜地接过去，保长就下口令说：“大家休息读传单。”约莫有七、八百人的集团，真的在口令下一致行动，我向同伴们说：“这就是一支军队哩！”

在休息间一个老头子向我说：

“以前我们出力修马路，现在又来破，唉！”言下大有无限感慨的样子，另一个青年抢着说：

“现在破坏，将来一定再修啊！”

老头子睁着眼睛，惊异地望着他，似乎不懂得，那个青年接着说：

“以前修的路，现在鬼子要用，所以破了去。打走了鬼子，再修起来，中国人自己用，永远就不会破了哟！”青年回答得有理，老头子被说服了。

忽然一阵波动，人群中乱嚷着：“鬼子来了！”有人惊慌地打算跑走，保长站起来，大声喊道：

“前面有军队，新四军都还没有走，不要怕。”

“还没有枪声，哪里有鬼子的影子，你们心中有鬼，自己把它赶走吧！”我于是加几句话助兴。

人群稳定下来，有人咒骂说：

“真搞鬼，这又是汉奸造谣！”

想到刚才一场虚惊，大家都觉得好笑。大家又兴高彩烈地动手干起来，锄头飞舞，碎石乱掷，保长甲长往来招呼，如在战场上指挥一样。我看着自己也很兴奋，也动手参加了破路。两小时的功夫，使半里长的公路完全变了样儿，我向保长说：

“这样干下去，敌人的坦克、汽车是不能通过的了，就连步兵，也得请它绕路。我们今天的工程圆满了！”

慰劳新四军

我到某部队检查工作要经过七十里路程，走了约莫五十里之后，途中看见二、三十人成群的一队，吹着箫笛，打着锣鼓，往前悠扬行进，后面抬着鞋子、毛巾、衣服，也有一部分鸡、鸭、鱼、肉和喜炮之类的东西，一共有十几担。我猜是结婚？但当中缺少一顶花轿。又猜是迎神？但找不出任何宗教仪式的标志。猜是祝寿？但寿礼不会送这多衣鞋。我正要问，我的马已冲到他们跟前。他们停止吹打，让在一边，大家喊：

“官长骑马来了！”

这句话使我想起官与民的界限，是这么深，是谁筑起的这一道墙，我们应把它完全拆毁！我随口问：

“你们到哪儿去，做什么的？”

“我们是慰劳军队的。”

“慰劳哪个军队？”

“慰劳新四军。”

哦！他们原来是我们部队的客人，我于是跳下马和他们谈谈，我提议：

“大家坐一下吧！”

“好，你坐，官长！”

我仔细一瞄，中间有一个老头子打鼓，三个青年：两个吹箫笛，一个拉胡琴。五个农民打大锣小锣和边鼓，其余的人挑着慰劳品，还有七、八个儿童跟着，我很感兴趣。

我问：“你们为什么慰劳他们？”

“他们的纪律好，打日本！”老头子说。

“我们常常看见他们活捉日本兵！”另一个老头子又补充一句。

“我的大哥在那里当兵！”一个青年说。

“他们在我们村上住过很久，常教我们唱歌，他们很喜欢我们。”儿童中的一个抢着回答。

“为什么不多送些猪肉鸡鸭呢？”我又问。

老头子说：“官长，你不知道，他们军队最缺乏鞋、袜、手巾、衣服，每人每月配不着一双鞋，几个月配不着一双袜，去年冬天只发一套棉衣，还是在快要下雪了才发下来。眼前衣服早穿烂了，我们慰劳就特别注意他们的实际需要。”

“这是谁的主意？”我又问。

青年抢着说："这是我们青抗会讨论过的，也是他们军队服务团告诉我们的，另一方面，我们去年夏天看见邻乡慰劳吃的东西太多，反叫他们吃得生病了。所以我们就换一个办法。"

"他说的还不全对！"另一个农民抢着把话头接过去："上回，我们村上王先生，他是本县的首富大先生，办了几十桌酒席招待新四军的兄弟们，还请许多老百姓作陪客。王先生以前听见人说新四军如何如何对有钱人不好，现在看见，才证明是相反的，所以办酒席来招待。在酒席上那个营长道谢，还说国难时期，象这样太花费了，先生这样热心帮助军队，还不如换一个办法，用办酒席的钱，办鞋袜，那就更合军队的需要了。"

"这回慰劳是不是新四军要保甲长派下来的呢？"我又问。

"不是的。他们常常找保甲长办事，也常常跟保甲长商量许多问题。保甲长派差事，他们总觉得不好，总说应该先与老百姓商量，讲清道理，不强迫！"老头子第二次发言。

我又加上几句：

"你们老百姓受日本鬼子烧杀，已经很苦，哪里还有钱慰劳军队，太不应该了，军队受你们慰劳是很惭愧的！"

我这话使他们转移到新的问题：

"请问官长，你是新四军吗？"

我说："是的。"

"你是官长吗？"

"是的。"

"好大的官？"

"请你猜。"

“排长，啊，连长吧！”

“连长无马骑吧？”

“恐怕是营长。”

“恐怕是团长或司令？”

“对了，差不多我就是一个司令吧！”

“哈哈，怪和气的新四军司令。说起司令，日本鬼子来了后，江南司令真正多，大小游击司令差不多天天屙尿都碰得到，新四军来了后，部队扩大和整编，有些被日本人打散了，有些参加了新四军，现在抗战有进步，江南的司令也少了，司令的威风也看不见了。你这个司令怪和气，反而不象一个司令样子！哈哈！”一个老人很感慨地絮絮叨叨地说。

“你的话完全对，我是新四军的司令，你来慰劳的那个部队，我也要去那里，我替你们引路。”我提议继续前进，我一马当先引路向前。

“好呀！司令替我们带路哟！”行列中有几个人这样同声喊叫着。

在乐声洋溢的行进中，我们觉得很快到了那个部队的驻地。

晚间，部队举行了一个晚会，欢迎来慰劳的人们。政治部送来这一天各地民众慰问品的清单一张，计开：

布鞋七百双、衬衣一百件、毛巾五百条、鸡八个、鸭四个、鱼二十条、糖果半篮、面七斤。

菜网设埋伏，麦林捉俘虏

北方的青纱帐遮盖田野的时候，是最好的围困敌人的季候。在江南也有与这类似的一种可爱的春景：麦林和菜花林，虽不

及青纱帐那样高，但也很长，人站在里面只露出上半身，坐在里面，过路人走在近旁也看不见。

聪明的日本鬼子就上过这样一次当。

丹阳日本兵二百多人，下乡追捕抗日分子，强迫组织反共青年团，绑架绅士到城内写降表再放回来，这样加紧制造汉奸分子，同时放出空气，不归顺的就全村全乡以通新四军论罪。日寇更利用中国旧时代的传说，加以曲解来进行欺骗。例如说他们是秦始皇时代的徐福的子孙，为了求仙飘流海外的，现在到中国来，是亡子归宗，中国人务要收留，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鬼话。借此达到消除中国人民抗日意识的目的，这就是日寇在今年春天的新政策。若说这个政策完全无效，那是假的，它显然在某些地方起了欺骗作用，我们已经听到有人发表“日本军变好了”的谬论。

这一次，我们一个主力连带着两个地方部队，在鬼子下乡的归途上布下埋伏。指战员们隐蔽在一线起伏小高地的菜田麦垅里面，耐心坐着，弯着腰等上几个钟头。有人不耐烦了，嘀咕着：“鬼子不会来了吧！”“怕走另一条路回去了哩！”“早点撤回吧！久等无用。”“争取另一个时机吧！”但是指挥员的决心绝不动摇，时时低声发出警告：“不要分心，肃静！”“不要打瞌睡！”“不要伸头望外面！”“埋伏的原则就是肃静耐心。如果暴露目标，就会被敌人发觉而使伏击无效。”

及时的政治鼓动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记得有个中央社的新闻记者对我说过：“我看你们部队很活泼，恐怕是难得做到几分钟不唱歌、不讲话、不谈笑的。”这话指出了我们部队的优点，也说着了我们部队比较散漫的毛病。在伏击场合，就要特别注意纠正这一点。

耐心等待着，看看太阳要落山了，忽然低声传来："发现敌人！"全体兴奋极了，但更不敢轻动，大地上显得比死灭还肃静，这是过渡时间的静寂，也是过渡时间的紧张。大家知道敌人愈逼愈近，但不敢抬头看一看，这个时候只有指挥员先饱眼福。大家静待命令下来，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心中想："这回该痛快干一下啦！"

"第八连沿麦田匍匐前进，抢先控制住敌人的前进道路，堵击敌人，要等敌人接近我时才开火。"大家看着八连迅速出动了。

"金坛游击队等敌人过了桥，立即跑步占领桥头，阻敌退路，用火力封锁，压迫敌人投向第八连的火网。"我们又看着金坛游击队的同志们，弯着腰悄悄地跑步前进。

"丹阳游击队跟我来，协助第八连解决当面之敌，并作预备队。"

"砰"的一声枪响了，同时响起手榴弹的爆炸声、轻重机关枪的哒哒声，金坛游击队与敌人开火了。丹阳队如得赦令似的，挺起腰，伸起头，向敌人行军纵队跃进，并用火力射杀敌人。

金坛游击队顺利地占领了桥头，敌人朝第八连那边跑去，第八连的轻机关枪和排枪从麦垄菜地中突起射击，敌人吃了一个冷不防，陷入混乱，折身往南就跑，又恰恰落进我们丹阳队的火力射击中。敌人豕突狼奔似的逃窜，我们乘胜追击。等丹阳城内的鬼子兵慌忙出来增援时，我们就胜利结束了战斗。俘获日本军负伤军官、士兵各一名，译员一个。这回敌人逃得慌忙，丢了十七具死尸。我们仅一人阵亡，三人负伤。缴获敌人步枪十二支。这是一个很大的伏击胜利。

我们作战部队全部集合起来，指挥员作了简单的战斗小

结："在八连还未到达指定地区，敌人还未深入到八连火网时，金坛游击队就开了枪，失之过早，以致敌人能向南引退。这个时候，丹阳队动作又慢了一点，只顾火力杀伤，没有坚决投入白刃搏斗，让敌人逃跑了，这是个大缺点。但是，这一次是进行埋伏袭击和季候战斗的模范，告诉你们，要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我敢说，日本鬼今后看着麦田就要害怕，我们自己也要注意搜索，警惕敌人的反埋伏，大家听到没有？""听到了！"如雷吼似的回答。

我们扛着缴获的步枪、大衣、旗帜，押着俘虏，胜利归来。沿途老百姓围观庆祝胜利，有一个老先生说："地方武装打这样的胜仗，真不容易，只有配合主力部队才行啊！"

到了宿营地，看见几十个老百姓也押着一个日本鬼子过来，那是他们捉到的一个溃兵。他们高兴地叙说着："这个鬼子躲在麦田里不敢出来，起先我们还怕他开枪，不料走近去一看，他向我们叩头呢。把他捉住送给你们军队办！"

指挥员问鬼子的枪呢？敌军科长向他讲日本话，那个俘虏战兢兢答复，科长翻译出来，就是："枪丢在池塘里，可以去找回来。"

尾　　声

上面就是江南春天抗战事实的一个小记录。

回想去年我军初到江南时的局面：日本鬼子横行无忌任意下乡烧杀抢掠；而打着各种番号的中国军队和地方武装不敢跟鬼子打仗，或者一打就垮，甚至有不打就垮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那时候，在人民群众中间，标语口号不准写，说是怕日本人烧房子，民房祠堂不让新四军住，怕

鬼子来杀人；马路铁道不叫你破坏，你破坏就是引敌人来烧杀。那时候，到处听到这样的论调："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你打仗到远处去！""陈司令你司令部仅仅七条枪，你赶快去吧，敌人包围来，你穿便衣都跑不脱。""可怜的新四军哟，无衣无食，还爱打仗，我们得做道场替他们超度超度。"这一些都是旧年的旧调。比较起来，一九三九年的情况，显然有了一个极其显著的进步。

"我们在江南正处在良好的游击战争的局势中，这个局势是我们努力创造和开辟的，我们要保持和继续扩大这个局势！我军在江南坚持抗战，和敌人苦苦纠缠，奋发了人心，转变了空气。江南的民气发扬，又帮助了我们有力的进行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公式：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等于战胜日本强盗。现在说来，我们兵力已大度使用，但民力仍尚未充分发扬，这仍是弱点，我们不能有任何自满。要大规模动员一切抗日力量，要大规模扩大军民合作，向东发展直抵上海，向北发展渡过长江，打通与山东八路军的联系，争取抗战胜利，是今后努力的总方向！"这就是我在今年四月初干部晚会上讲的结论。

注①当时江南土匪很多，经常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把财主捉住，用火烘烤，以诈取钱财，人们称这为"炕山芋"。

（原作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之东线，一九五七年五月应《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之请，略作修改。）

（原载：《抗敌》第一卷第九号1939年4月，此处录自《解放军文艺》1957年6月第6期修改稿）

关于陈毅和新四军（节选）

福　尔　曼

一九三七年日本开始侵略战争时，困在山里的陈毅与他底游击队才因国民党的讨伐军撤退北上而得到了解放。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他们才得国民党的同意。于是，散布在华中八省的数万游击队中的一万二千人被承认编成新四军。新四军沿着长江集中在上海及上海——南京地区。重庆政府允诺在华中赤区解决土地问题，允许共产党参加地方政府并补给新四军抗日。

陈毅坚决地说："国民党破坏了所有这些诺言，我们请求抗日完全出于自愿。否则我们很可能仍自由自在地留在我们底根据地里不分青红皂白地牵制国民党军队。"

当新四军由长江地带移防时，长江一带的守军都不允许新四军入城。可是，相反地却有很多人从城里逃出加入新四军。照陈毅说：新四军很迅速地就增加了十万左右的生力军。但是，他们却被严命不许增加数目，他们虽然于一九三八年到了南昌并在该处设了司令部，但是，重庆政府却没有叫他们开赴长江前线的真意。当年七月他们终于到达了上海、芜湖及南京地区。他们从南方开到长江的军力是八千人，其余的四千人渡过长江到达了芜湖对岸。

他继续说："其实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事实上已放弃了这个地区。这块地区已成为土匪及地方政府统治人民的傀儡底天下。我

们穿着很象日本军服的黄卡叽制服，误认我们是日本人的老百姓们，发觉我们不是敌人的时候，他们真欢喜极了。我们马上开始与敌伪及地方土匪作战。那年底，我们底军队便增至三万人。这应完全归功于我们底广大游击队。汉口沦陷以后，日本军一向是看不起中国军。所以他们对我们也不加注意。因此我们得以机会突袭敌人。我们有时以巧妙的埋伏将敌人底整个连消灭。亲眼看见我们奏功的老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来参加我们。他们特别对于我们士兵底纪律感到满意。我们底军队严禁向老百姓强取任何东西。在我们行军时，我们一定先与当地的长者打个商量，然后才令军队驻扎过夜。我们底军队把屋子打扫干干净净，而且在我们离开以前把各种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回原位。由是观之，那么有很多人要参加我们底队伍还什么希奇吗？我们欢迎所有要抗日的积极分子。我们以抢自敌人的武器把民众武装起来，把他们训练成国民兵。随着我们军队数目的增加，我们愈觉得局促于南京附近的小地区的困难。我们底活动被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束缚在这个小地区里。此处敌人更开始对我们倍加注意，以劲旅对我们底过量大集中发动攻击。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将兵力散开渗透到敌后为妙。我们底这种行动，大概就是我们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间的第一个症结。国民党最高统帅部严令我们集中留守在指定的地区里，但是，这个区域很明显地就是敌人攻击的脆弱目标。正当这个时期，降敌的国民党军队一天比一天多。在这些降敌的军队中，有 Yu Tso-Pei 直接指挥的在上海——南京地区活动的直属××的忠义救国军。忠义救国军底一部分马上加入了城中的傀儡。其余的停在城外的村庄里。由于他们把他们底军队分成两部分，所以他们能两面工作，全线无战事地活下去。可是，重庆政府却命令我

们新四军至少在十天内非作战一次不可。但是，每当我们袭击城里的伪军时，××便骂我们说我们打他底军队。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继汪逆精卫的建立傀儡政府，有五万名××系军队在 Hoshing-chin 指挥之下投降于日本。一九四一年李长江麾下的五万名又投降于敌人。我们新四军必须与这些叛逆者作战。这群新傀儡熟悉当地的情形，所以我们与他们作战时吃了很多苦头。”

事虽如此，但是，新四军在恶劣的条件下仍继续生长，作继续扩张他的势力与活动圈。安徽事件以后，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指派陈毅代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同时共产党更决定：新四军受延安朱德总司令部底最高指挥。

日本军采取了各种各样对付八路军的战法与新四军作战。敌人时常在秋收后，也就是当五谷剩在平原上很少，甚至没有掩护新四军的东西时，才发动扫荡战：“坚壁清野”战术，就是用以根绝新四军，使新四军失去躲藏的地方的战术。日本军说：“扫荡战好象梳头，而坚壁清野却是剃头。”

陈毅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象大力士似地始终不停地在斗争着。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补给我们作战必需品的后方根据地，所以我们必须经常地发挥主动的能力。寻觅敌人底弱点，为着抢夺武器及给养而打敌人。加之攻击是最好的防卫啊！当敌人集中而我们感受重压时，我们便暗中散去。因为我们底武器落后，弹药缺乏，所以我们主要的是在夜间用大刀及手榴弹作战。我们更向敌人作宣传战呼喊战及优待俘虏。一方面游击队与新四军在上海南京汉口等长江沿岸大城市的城边活动，他方面则正规军在距这些城市平均一日的路程内保持着根据地。他们握有上海以北约六十哩的沿海一带及距南京城二十哩距汉口

三十哩等地区。大反攻开始时，我们将成为收复这三个集中最主要的大城市的先锋。”

（原载：《中国解放区见闻》第十二节
新四军，1943年中译本）

陈毅将军印象记

——山东纪行之一

李　普

陈毅将军在法国住得很久，学的是艺术文学，但这十几二十年来，却以善战的将军而闻名，特别是在抗战期中，创造了广大的华中解放区，更使他威名远播。在华中战场上，他曾经受伤，有一次几乎淹死，幸亏他会游泳，才给中华民族保存了这条伟大的生命。他的一个部下告诉我，有一次他很幸运地和陈将军一起行军，走了一天，陈将军说要宿营了，他四面一望，没有看见房屋，原来陈将军打开被包，就在麦田里睡起来，那正是冬天，第二天天没亮，陈将军就爬起来，继续向前走。二月四日，记者随济南执行小组在临沂会见了他。小组在临沂的一天多时间中，他谈话的范围非常广泛，就是在餐桌上，也没有停止研究重大的问题，但是一点也不使人觉得枯燥。恰恰相反，他时而十分严肃，时而轻松谈笑，风生满座。尤其是他的豪迈爽直的气概，更象老朋友似地，使每一个人都觉得安适愉快。

他并不算很高。但他的茁壮的身躯，和那戴着一顶大遮风毛皮帽的硕大的脑袋，却处处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他稳重沉着，仿佛一座山一样。等到听见他谈话，好了，你就发现这座山正被明朗的阳光照耀着，而且长满了青葱的树木，带给你一

种生气勃勃的喜悦。

他说他二十年前曾是一个新闻记者。对于现役的新闻记者，他正是一个十分生动的引人的人物。雷克上校和他谈到他的兴趣，问他的将来，他回答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更不在战争，我的兴趣在艺术。我愿意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当我的书出版时，我将首先送一本给你。"

他十分严肃地发表对于停止内战的意见说："用枪杆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过去，用和平民主解决中国问题的时期已经开始。这种形势，没有谁反对得了。国民党还有几个好战的朋友，也打不下去。我们是不愿意打的。这不是由于什么伟大人物的决定；不是由于什么学说的指示，而是形势如此，没有谁能够反对。"

"我接到停战命令之后，立即下令遵守。只有陇海路海州方面最前哨，到十四五号才送到，才停战。我负责说这句话。"

他是以极度严肃的心情来对待这个命令的。他说："我可以把我的命令内容告诉诸位。我是这样写的：停战令下，和平实现，是中国三十年来的重大事件。如果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更是百来年的大事。所有同志要重视这个空前的重大历史事件，令到立即停战。如果你敢破坏，我就要杀你的头！"

关于修复交通，运输食粮和煤炭的问题，陈将军主张愈快愈好。他说："有的地方急需煤炭，而解放区产煤堆积如山，也急于要销售。正象恋爱一样，这是双方面的要求。铁路要保证是运输和平，而不是运输战争，在联合政府和联合的交通部成立以前，在解放区中的，我们要有管理权和警卫权。但是也不能拖，能够修的地方，先赶快修起来。"

这真是个十分真诚坦白的人。正如对实现和平表现了极大

的信心和诚挚一样，对敌军受降的问题，他也表示了极大的不平和愤慨。“剥夺一支战胜军的受降权，这是对我们军队的极大的侮辱。我们甚至派一个代表参加受降典礼的资格都没有，我无法向我的部下和战士们解释。这不是武器问题，而是正义与军队的荣誉，我们不想要那几枝破枪，你打了我七八年，你至少要向我鞠一个躬！我不能不愤慨！我不能不抗议！”

对于马歇尔将军，他表示了极大的钦佩与感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卓著勋劳，又以退休之年为中国的和平而远涉重洋，到中国之后，广泛接见各方人士，倾听意见，研究实际情况，尤其使他尊敬。他对雷克上校说：“我不懂外交，又好久没有出国，我们做朋友谈，我看赫尔利先生是太性急了。他不根据事实办事，不听多方面的意见，吃了亏。”他一再的称赞马歇尔将军的作风。他说在马歇尔帮助之下，这个停战命令是慎重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说他对此很有信心。

他说和平的实现是百年大计，他衷心希望和平，但是要处理得好。“我负伤三次，个人无所畏死。一己的成败不足惜，但是我必须对得起老百姓。我们赞成普选。如果没有人选我们，就是失败，我们没有话说。如果山东的老百姓不要我，那就是我没光彩，我就卷起铺盖走路。”

对于民主，他表示了极明确的信念。在解放区山东省政府欢迎执行小组的晚会上，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第四次竞选的时候说：如果美国的最高总司令——美国的人民，要我继续干下去，我绝不当逃兵。这是负责的民主的精神，我们愿意学习他。杜威先生竞选失败，电贺罗斯福说：‘上帝将帮助你完成你的任务。’这种退让也是民主精神的表现。不对的，我们要放弃。对的，我们要坚持。否则，都是不负责任。不尊重自己，

也不尊重别人，都是不民主。”

他的谈话极广泛，我这里所写下的，只是某些要点而已。他自己解释说：“我有学究气，先要把道理谈清楚。我要说的，都当面说完，没有背后文章。当面不说背后又搞一套，最伤脑筋。我上的当太多了。”那一天多里面他所说的一切，给他的这种朗爽豪迈的性格做了最好的说明。

他是四川人，除了去掉了四川人常用的那些语尾和一些写不出来的土音之外，他的四川话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改。雷克上校听得高兴时，常常和他亲热的握手。他间或也用几个法国字来表示他的喜悦。雷克上校很钦佩他。当他回到济南，见了现任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先生，他又一再的称赞陈将军，说他很少见过这样叫人尊敬的将军，这样坦白，这样有学问。

他原来准备和雷克上校一同到北平去一趟。那天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有什么意见？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和他生活在一起，听他谈话，是愉快而能够使人聪明的。因此我决定跟他到北平去。但是第二天，他因为临时有重要的事，一时不能成行，特别派了他的参谋长陈士渠将军和政治部主任舒同将军和雷克上校同去，帮助他解决问题。他笑着向雷克上校说：“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左右手，现在都割下来给你了，我变成个残废的人了。”对于我，这是个很大的失望，我热望着能够在最近再到临沂去一次，我曾会见了他部下的许多高级中级和下级的人员和战士，他们没有一个不带着孩子似的喜悦和骄傲向我称赞他们的司令和军长。在他的教育和指挥之下，是幸福和快乐的。他现在是新四军军长和山东军区司令，统率着几十万大军。远在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初创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委员，朱德同志是总司令，陈毅将军便是政治部主任，他

们每人又兼任一个师的师长。他们都是被迫而拿起武器来的。如果是生长在一个民主国度里，他的创造和组织的才能，正如他自己所渴望的，将表现在艺术和文学上面，那么，他现在也许正是一个以多才的作家而闻名的人吧。

（原载：《新华日报》1946年3月12日）

访陈毅将军

白蒂·葛兰恒

昨日记者往访陈毅将军于其指挥部，将军告记者：此次在峄县、台儿庄一线所使用之装备兵器，三分之二系在上月内于淮北战役或兰陵附近战役中所缴获者。

陈将军于分析这增强了中共部队实力的两次胜利时，他指出两个主要因素：国民党部队放下武器之迅速及俘虏们自愿参加中共军队之极大数量。

他回忆在淮北战役五昼夜歼灭了六十九师，降服的一万八千人中四千人即时自愿参加了中共军队，其余的大部也跟踪掉转枪来；而兰陵战役共用了四十一小时，即歼灭了强于六十九师的二十六师及其快速纵队，在投降的两万人中，有极大部分立即掉转枪口，向着他们原先的长官们。

陈毅将军指出：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及士兵投降并参加中共部队之踊跃，证明了中国民主运动飞快的生长。他说："了解目前军事发展，必首先认清国民党部队中普遍的强烈的民主要求。"

他继又称，目前战争之性质，日趋明显，被蒋介石抓来的士兵现都已认出这是反对独裁的战争，他们日益痛恨蒋的殖民地政策——那表现在中美商约及美军继续驻华的与美国"亲密合作"的政策，因此他们都感到这个战争已成为民族的战争，

成为争取独立的战争。

关于两次胜利的战略意义，陈将军认为此两战役系局部反攻性质，而非全面反攻的开始，他认为是对延安前线的一个援助，他并预期蒋必将为集中力量修补华东之兵力而从其他战场抽调部队。

“再有几个这样的战役，即将迫使蒋完全会停止其进攻。”陈将军补充道：“我想很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再取得几次胜利的。”

陈毅将军预期对新缴美式装备之使用没有什么困难，虽然他的部下对于许多武器是并不熟悉的，他解释此问题时说：“我们的部队素有基本的科学的军事训练，便能掌握新的武器，经过三四次战役，我们就成为使用这些兵器的专家了。”他的这种信心的来源，正象他们所说，是因为每一种新武器都是在旧武器的原理上发展的。他以火箭炮如何由迫击炮发展而来，作为说明之举例。他加重语气说道：“如若认为我们的部队在军事上那样无知，以致于不能使用新武器，就是错误的认识。另外很多从国民党部队中掉转过来的新兵，也在帮助我们使用这些武器。”

说到国民党宣传中共军必是有日本或苏联顾问才能很快有效地使用机械化装备时，陈将军气愤的说道：“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中国民族是比美国或苏联都优秀的，而以后却又认为没有美国人或苏联人或日本人的帮助，中国人则一点也不能懂得现代兵器，这实在是可笑的！”

陈将军的意见认为最有用的新缴获的武器是榴弹炮，坦克和电料器材，他说：“如蒋想再送些来，我是愿意打收条给他的。”（一月九日）　（原载：《人民日报》1947年2月16日）

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

秋　羊

本文是陈毅将军的小传，全文约一万余字，由今天起连续刊载本版。陈将军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就是他统率的解放军解放的。上海军管会成立，陈将军兼任军管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长。从这篇小传里，我们可以瞭解陈将军的生平，和他得有今日伟大辉煌成就的由来。　　——编者

本来在这一篇东西中，我不应当提到我自己；但在陈毅将军的十几年读书生活中，我同他朝夕相处，先后竟有八年之久；如果剔除了我这样一个不重要的人物，反不易显得陈毅在事业上创造的伟大。

陈毅在学校时就叫陈毅；他也有一个号叫“仲弘”，但现在已很少使用了。他是四川乐至县的人，今年计算是四十八岁了。他并不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是农民出身，他的父亲在满清末年还作着湖南省内的一个县官或者府官。在陈毅五六岁的时候，由父亲带到湖南“任上”去住过几年，直到九岁或十岁父亲丢了官，才回成都来住在东门外的牛市口。父亲虽说作官归来，却并没有钱，牛市口的家是很破烂的，全家的生活异常清苦。

在成都甲种工校时代

我同陈毅认识是一九一八年春天的事；这以前，他是同他

的亲哥陈炎在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念书。这学校是中学程度的职业学校的性质；里面也有机器实习等功课。这学校在成都最出风头的并不是他们的功课而是他们的足球队；他们足球队中的若干有力人物，陈毅便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打第四排，所以外号叫做“陈Four”，他的极灵巧的盘脚，几乎可以把敌人脚上的任何球勾来为自己使用。

在一九一八年春天，李石曾和四川省长杨沧白，为了提倡一种半工半读的留学办法，在成都创办了一个学校，这学校的名称是长得可怕的，它叫作“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宣称毕了业就可以到法国去留学。

陈毅便放弃了甲种工校而去考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我呢，为了不信奉上帝而被华西中学斥退以后，也去报了名。

考取留法预备学校

可是我们真不幸，全考在备取中去了。学校开学以后，我们差不多二三天总要去探询一次备取生可否入学的消息。我们竟迟到一个月以后，有一天那么凑巧三个人在同一时间去探询，同时望见“陈毅、杨持正、×××准予入学”的字样，陈毅、杨持正和我，我们三个人由于意外的高兴，互相谈起话来了。青年人总是那么热情，三人立刻成了今后不可分离的朋友；后来竟闹到好些同学讥笑我们，喊我们作刘关张，我们不但不生气，反而常以此自况。

这留法预备学校，校址在成都的爵版街。学生一共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功课大多以法文为主，说的是一年毕业。李石曾虽是提倡人，他却不是校长，而且也不曾到成都来过。教员中有很多留法学生，至今这些教员在社会上还知道的只有二个，

一个是画家林君默，另一个便是青年党的李璜了。

陈毅的学生生活很吃苦的，他经常只穿一件兰布长衫；冬天的衣服也没有加厚许多。每天早上，他差不多要走十华里的途程才能达到学校，而晚间又要如此走回去。我几乎每逢星期日都要到他家里去吃饭，但在我的记忆中他有闲招待我的次数很少；不过因为他的哥陈炎同是留法预校的同学，伯父伯母，对我竟象自己的家人一样，所以我对每星期的来回走二十里路去吃一顿澹泊的饭，认为是一件极愉快的事。饭后，我们在田野中看那些一片黄的油菜花，或者到最近的锦江楼去吃茶，都觉得满有风味。天黑我要回学校宿舍，他常又再送我走四五里才折转去。

陈毅天资好，功课考得不错；但我却要公正的说明，他并不是很用功的人；至少在学校的课本上，他是不十分使用功夫的人。我同杨持正和他三人，都差不多是同样的懒人；学校只要一下课，时间又还不到他返牛市口时，我们便去一个有名的花园双柳村吃茶，或者少城公园吃茶，或者以半元钱吃皇城坝的回教牛肉馆，大家以学生时代的见解，纵论古今天下大势。我不知道他的政治见解是否当时便有些成熟，但我知道他的古书读得比我同杨多得多。至少那时他已会写旧诗而我则今还不会。

读兵书，做旧诗

最近常常遇见一些知道我同他相处过很久的朋友，于闲谈中总向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陈毅是一个文人何以带兵带得这么好？”如果在我的记忆中来寻求他这一种萌芽的话，我觉得他的多读古书恐怕有点关系。我想起他曾经介绍我读过几本

兵书，除孙子十三篇外，有黄石公的三略和姜太公的六韬。（按六韬三略实是伪书，但当时我们不知道）。

“你将来想带兵么？”我问他。

他说他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说他是听见他父亲或者另一位前辈说过，读兵书不一定是带兵，而是为人处世都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处朋友之间，例如“攻心为上”，例如“知己知彼”等，都可以作活的运用。另一好友杨持正，（此人是四川著名的杨遇春杨侯爷的孙子，现尚在法国。）更从而在他家里的古书堆中，找出了好几本这一类的书。不过大家当时的注意点是寻求这书中能够拿到社会上应用的格言，谁也没有想到谁会变成一个大将。而且我相信今日的陈毅，如果他不再重新翻古书的话，他一定已忘了这一批当时所热心读过的书，一如我今日已再背不出三略中的任何文句一样。总之，我回忆三十年前的陈毅，无论如何发现不了他有军人的气质和修养。老实说，那时候距满清还没有好远，我们还忘不了那以文取胜的头名状元的典型；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特别注重书读得多和文章写得好。所以我们虽在留法预校念书，而预校的功课十分之七是法文，我们还是不十分注重法文。要在课外读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拿一本资治通鉴或史记菁华；而我也常常拿一本史记菁华或一本资治通鉴。他与我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时时要拿一二首新作的五七言律诗或古诗给我看；而我只有点头而不会了解他作得好或者不好。我记得他所佩服的诗人是二黄，一个是江西派的黄三谷，一个是清末的黄仲则。但这两位仁兄的诗如何好，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因此他在这方面很有些生气，又劝我读他的亲戚谢无量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诗学入门，结果我读了一阵也没有入门，而陈毅的旧诗到一天一天地更叫知音者佩服了。

官费留法，离开家乡

一九一九年年初，学校当局宣布了一件叫我们伤脑经的大事，即是：学校在两月之内要大考了，在一百二十名预备学校的勤工俭学生中，只有前三十名才有官费留法。三十名以后只有自费去。陈毅，杨持正和我，三人都是破落户，自费留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立志三人都非考前三十名不可。我们议决：如一人考不起，两人的官费分与他用；两人考不起，考取的一人也不去；总之三人要有福同享。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三人在两月之内，有好多夜完全没有睡觉。陈毅尤其辛苦，他每天要走二十里的途程，不能不一面走路一面读书。好在结果我们的成绩很好，杨考第六名，我得了第十名，陈毅考了第十六名，陈毅的哥陈炎也在三十名之内；大家真是踌躇满意；榜发以后，陈毅第一次开始喝酒了。

所谓官费是杨沧白省长拨了一万二千元出来，前三十名学生每人分四百元；我们大约是在那年的六月便出发到法国。除三十名官费外，还有三十四名自费生；一共六十四人。各人先回故乡乐至、仁寿、峨眉等地辞别父母，约好一月之内在重庆会齐。七月初，就坐轮船到达上海。这一群学生就住在徐家汇放了署假的南洋公学内。等了两个月的船。

到 上 海

花花世界的上海，好多学生都经不起环境的熏染，因此而堕落的大有人在。惟有陈毅最为沉得着气。他除了偶然喝一点酒，开一听罐头荔枝或菠萝解渴外，他很少进戏院或游戏场。天黑，他总是等着我回来，同坐在南洋公学内的溪边，望着对

面马路上灯头很亮的往来汽车，他告诉我这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才明白他等我的用意，是不准我不回来；而且我的不读书贪玩的事，他已经写信告诉我的哥哥了。我的哥哥除了来信责备我以外，郑重地向我说，你这位朋友，不但是一个志诚君子，看他的来信，他将来必成伟大的人物，叫我对于这一个人要一生一世好好地结交他。我们的友谊已由于他这一种作人的恳切处而进了一大步。

不久到法国的船有了。我们须准备一切行装。这时候陈毅提议了一件傻事，而我也赞成了这一件傻事：我们把预计已无甚用处了的钱，买了两大箱子中国线装书。陈毅的见解是到了法国，法文书不消说容易买到，但中文是我们的命脉，要没有书怎么办？于是史记、汉书、庄子、老子，……买了一大堆。这些书后来竟丢在巴黎一个工人宿舍中，我们从未翻过一次而回了中国。

我们在上海曾听过吴稚晖、张溥泉用英文向我们演说，但这都是重要的。对于陈毅影响最大的我想要推康白情的一段演说了。康白情现在广州文化大学执教，热心教育，是我们的好老师。当时他的“草儿”刚出版，五四运动刚刚才过去二三月，他就由北京到了上海而召集我们作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演说。听了他的演说后，陈毅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极大的震动。他懂了他的演说而我则没有懂。他找着我谈新青年的问题。大约康还介绍了一些书给我们读，陈毅是马上要去买这些书，他告诉我他从此不作旧诗了，他要作一个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出　国

我们大约在九月中旬动身。船由黄浦江出口，陈毅极高兴

谈吴淞炮台和崇明岛的地形，他一直望着崇明岛不离开船头。可是船一过崇明岛后，他就开始不能支持了，他晕船了。他的身体虽然十分健康，但晕船病使他狼狈不堪。我比他支持得稍久一点，但终于也睡倒了。我们三天三夜不吃饭，一直到了海防。见着陆地，病好了，大家高兴，吃了很多中国饭，结果再上船，似乎又吃坏了。陈毅一直不断地生病，到了马赛，我记不清是不是他的脚肿了，不能动，是有人背他上的岸；上岸即住在法国一个公立医院中养了差不多半月的病。病后他赶到巴黎，与其他的学生过同样的生活。

由于“勤工俭学”四字的号召，产生了今日中共的若干重要人物；这里我似乎应当赘说一下所谓勤工俭学是怎么一回事。

在巴黎睡地板，吃冷水面包

当时的法国总理班乐卫，李石曾同他是同学。为了沟通中法文化起见，李同班商量好送一千乃至一万个中国学生到法国去半工半读。我们当时的想法，以为是半天读书，半天作工；那知道李石曾的办法，是要这些学生们先到工厂工作，以积蓄来读书，而这些学生们又根本不会工作，法国工厂当然也就不客气地拒绝。幸好班乐卫出力写信介绍，大工厂卖了面子，允许每厂中安置四、五人。而当时四川湖南的学生先后已到了四百人左右，一时还安置不完。这些安置不完的学生就在巴黎城外法华教育会的楼上楼下地板上睡觉。用汽油炉子自己烧菜。钱呢，由教育会每天发五法郎的维持费（约合中国钱半元）。有的学生并不烧菜，单吃面包和自来水。陈毅和我都住在教育会好久没有工作，吃了很多次的“冷水面包”（当时成一名词）。

间或加一点猪油或巧克力，都算是一种浪费。巴黎的天气很冷，我们五法郎的维持费还要积蓄一些下来买大衣，所以吃的方面毫无讲究的余地。发维持费的人是刘厚；登记名字的是曾仲鸣，我永远记得他们对待学生们的态度，活像慈善家布施穷人一样。当过湖南某中学的校长的徐特立先生（中共中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来法国勤工俭学，同样领过维持费和吃过冷水面包，

进克虏伯兵工厂做工

大约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我才进了哈佛的大炮厂，陈毅则进了克虏伯兵工厂。实际上我们在工厂不是作工而是学作铁锉工。所以工厂等于白送我们一笔维持费。陈毅约有十二法郎一天。

在工厂学了半年铁锉工以后，我们就同教育会交涉不愿作工要读书了，加以四川省政府又汇了十几万法郎来放在郑毓秀手里，她似乎也不好意思不拿出来分配；于是四川的学生，愿意读书的便可以退出工厂。除了我们的好友杨持正已同法国女人讲了恋爱不想读书外，我同陈毅便再聚首在圣日耳曼公学。这学校说起来也不过是一种高中程度的功课，而我们觉得最苦的是要用大部分时间去读法文；其次几何代数这些功课常常赶不上法国学生。不过陈毅似乎满不忧心这一点。我不知道谁在中国寄了些“新青年”一类的杂志给他，他很喜欢去读这些杂志。同时那位校长只知道要中国人的较高的学费，对于学生的功课马虎已极。所以方便了陈毅从事课外的种种活动。

在圣日耳曼公学，从事爱国运动

到了一九二一年的夏天，陈毅的政治意识就渐渐地显著起

来了。他好象同当时也在法国的李璜、曾琦已有相当的往来（这一点他却没有告诉我），他也似乎化了名字在周太玄主办的旅欧周刊上发表文章，但这些他都不肯同我说；我只看他天天忙着在写甚么，后来我才想起来这时期大约他正在投稿。

这时学生中已开始萌芽了一种爱国运动。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当时同法国政府正在进行借款；把中国的好多权益都抵押给法国人。这时候陈毅和一位四川同学李家秀和另外几位忘了名的湖南同学（大约有李立三在内），便以油印通讯的方式，号召起全巴黎区的勤工俭学生（那些非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竟没有一个人参加，）约四百人左右，在巴黎中央市场的广场上集合，然后就到公使馆去找陈箓叫他宣布借款的真象；一面向法国政府表示我们反对这一次借款。

陈箓不肯见学生代表，派了他的秘书出来应付。这位秘书我只记得他姓王，是一位白白胖胖的漂亮小子，他用官僚态度向学生说了几句话就挨了打了，头也打出了血，几乎送了命。公使馆立刻打电话叫警察来，学生们有一部分吃了法国警察手中的短棒，大部分则从地道车逃跑了；幸好这一次并没有人被捕或受伤。不过陈毅从中央市场回来以后，非常气忿。从那时起，他便不大读书了。我记得我们就忙碌起来。陈毅似乎是我们中唯一能写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得他天天不得闲了。

法国有一种“胶印”，是把一种特制墨水写在一张胶纸上，然后反印在一张有光道林纸上，就可以印出六十份至一百份东西来。这时候起草是陈毅，写字的是李家秀，我们许多人担任印刷和寄送等各项工作。圣日耳曼公学，俨然成了勤工俭学学生运动的司令部。但我们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个人行动，没

有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什么“自治会”或其他社团一类的名称，没有党派色彩，虽然陈筱最后终以共产党的罪名而陷害了我们。

号召勤工俭学生占领中法大学

打过公使秘书以后，勤工俭学的学生觉醒了自身是受着甚么人的欺骗；于是对于李石曾的信念开始动摇起来，尤其恨他所使用的刘厚和曾仲鸣等。郑毓秀也被我们请来质问过一次，要查她手边握着的四川、湖南各省政府付托她管的勤工俭学的专款。那一次如果不是学生中有郑毓秀的追逐者李鹤林等保护了她的话，她一定挨打了。

由于觉悟到勤工俭学不是我们所理想的前途，到了法国两年还没有进到一个正式的学校，于是发生了第二次运动。那时李石曾、吴稚晖在里昂利用庚子赔款及法国人赠送的一座大房和花园等办一个中法大学，勤工俭学生们就要求无条件地进这学校。但学校当局表示非考试不可，非缴费不可。圣日耳曼的司令台于是发出号召，全体集合去占领这学校。但因为巴黎距里昂有八小时的火车，所以那一次只集合了一百零六人。不消说陈毅是首先在内了；我自然并没有离开他；还有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李立三，还有一位我们同学认为他的前途有绝大办法的，极能干的赵世炎（可是赵回国不久为反动派枪杀了）。

被捕、入狱、绝食

我们一百多人坐了火车，到达里昂，直扑中法大学的校址。学校还未开学，校内只有一个唯一的办事人褚民谊。这家伙看见学生们来了，吓了一大跳，表面上对我们十分客气。我

们就在还未完工的各课室中展开行李就住下了，表示非在此读书不可。褚民谊一面敷衍我们，一面却打电报给陈箓，叫他设法对付我们。陈箓勾结了法政府，说这些闹事的学生全是“布尔什维克”，于是派了大批里昂警察来逮捕我们。来的时候恰巧我们正在开会，于是没有一人例外，全部被捕，六部囚车，几十名武装警察就押送了我们到一个陆军监狱。这要说实话，这监狱除了不能出门而外，倒绝不象犯人的住所。里面有图书馆藏有几千部书，有咖啡厅可以打纸牌喝啤酒，有花园可以散步。每日三餐都有肉吃，只是没有床，大家都睡地板。

在监狱中不知不觉过了两个月，陈箓还没有解决的方法。十月十日三十节（恰巧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所以我们叫作三十节）那一天，我们就议决在监狱中绝食一天，表示抗议。这一天我们在花园中开大会，唱卿云歌，法国人一切全不懂得，看见大家不肯吃饭，那监狱长急死了，立刻拍电给陈箓，表示不欢迎这一批太可怕的犯人。适巧吴稚晖到了法国，陈箓派他来向我们演说，这倚老卖老的家伙就把学生们大骂一顿；于是群情愤激，要主张二次绝食。陈箓打听到这些消息，便一不做二不休，用武力把我们押送回中国。法国人小心，竟使用二个警察押一个人的稳妥办法，使我们无法脱逃，终于被迫了上船。

这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的事，陈毅当时二十岁。

被押送回国

在这一事件中，陈毅大大地露头角了。除了一切文件多半由他起草外，在槟城、新加坡、西贡、香港各地去向侨领接头和宣传的四个代表中，就以他为最重要。我们沿途接受各地的侨胞赠送了不少的食品、用品、以及现款。

提起这一段历史，我始终忘不了李立三的一段有趣的小故事。李立三那时叫李隆郅，极少说话，最易害羞脸红。有一次川湘同学两方面赌下围棋，四川方面是陈毅和我及一位姓苏的，湖南方面则为李立三及一位姓汪的；四川说湖南的棋下得臭，湖南说四川的棋下得并不香。于是李立三便和陈毅作了主将，在船上大厅中比赛起来。李立三的棋显然是越下越不支了。他的脸由白而红而紫，在大家的嘲笑之下，他生气了把棋子和棋盘一齐抓了起来，跑到船边抛下海去了。而这一付围棋，是监狱中花园里的黑白小石经多人拣了来作成的，李立三把它丢了，这气得众人想打他，但陈毅则始终挂着笑容，十分高兴他的胜利。

回到上海后，陈毅一直是我们的四位代表之一，并写着他的文件，向各方面找津贴，救济这一百多名穷学生。在上海以津贴维持了约有三个月以后，终于不能再维持而大家分散了。我是去了北京住在李石曾为我们创办的中法大学，（起初还只叫陆谟克学院），陈毅则回了四川。这是一九二三年春天的事。

秘书、参谋、编辑

在四川的陈毅，起初作了杨森的秘书；但大约还不到三个月，又改任了陈书农师部的参谋。今日他同刘伯承为莫逆之交，大约便在这时期认识的。不过我始终相信，虽然这在一时期他结交了不少的四川军人朋友，但他今日军事上的成就和他的这一段生活却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后来表示并不高兴作这些事，而且实际上不久也辞了它，回到重庆新蜀报作了编辑。在报人的生活中，并没有发挥他的抱负。在这里他倒发生了一

件很美的罗曼司，而他作的那一首新诗就成了他一生的最值得纪念的作品之一。原来他在新蜀报发表了一首用意极深的诗：

“孩子，有谁欺负了你？有谁是你的仇敌？
你不要叫别人把他杀死，
你还要好好地保护他的生命，
好叫他死在你自己的手里！”

这一首主张亲手杀仇人用意十分深刻的诗，竟引起了一位美貌的女郎给他来了一封信，表示对诗人有无限的缠绵。那个男子不善钟情？诗人竟也爱上了她。可是这一对情人一生只见过一次面，而便永远不能再往来了。少女生长旧家庭中有一个母亲左右不离，诗人作了很大的努力才冒险到她家中去会她。母亲亦在场，这认识英雄的少女，颤巍巍地亲手捧了一杯茶来递与客人，背着母亲的身，茶杯下一颗金戒指掉在青年诗人的手中了。女郎丢了一个眼色回到母亲身旁……事后陈毅向我形容当时的情景，他说他幸福得几乎昏眩了。可是从此他们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他得着我大大夸奖中法大学的信，于这年的秋天就来北京西山碧云寺读书了。

到北平进中法大学

一九二五年在中法大学毕业，在校三年的期间，陈毅和我实际上等于在那里自修。中法大学的教员有李石曾、徐旭生、张竞生、宋春舫、李书华、高鲁等，他们所担任功课的钟点都很少，讲的也没有系统，各人都讲自己喜欢的学问，也不管学生们需要不需要。如李石曾讲生物学，宋春舫讲戏剧，李书华有时还讲没有一个人听得懂的相对论，张竞生则讲孔德实证哲学……于是陈毅和我，我们只有拼命自己发展。陈毅最爱的是

新文化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

从“思想家”到“文学家”

不知道是当时的风气呢还是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都想变成“思想家”；当时陈毅是把叔本华、尼采、孔德、卢骚之流都看作思想家的。这是直到毕业那一年，陈毅才同我提出我们来努力作一个文学家。

陈毅的家始终是穷的，他和我一样，中法大学读书的钱，只靠四川省政府每年一百二十元的津贴。那时全年伙食要用六十元，其余六十元他大半用来买书，衣服大家都穿得很破旧。在我们毕业那一年，我因为兼任了一个法文专科学校的教员，每月有四十元的收入，我们才比较充裕起来（当时我们的经济是不分彼此的）。

从那时各方面看来，说陈毅要变成一个文学家，是一点也不值得我们诧异的。文字的修养，他比我强得多也进步得多。下面一件小故事可以证明：

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也向来没有同我开过一次玩笑；但是有一次我要到秦皇岛去找我正在追求中的女友，在临走时我向他说：

“我到了那里，一定给你写信。”

“写信？你老先生的信我最受不了的是一派仁兄阁下，满纸之乎也者，不知道你甚么时候才可以改良！”他第一次如此嘲笑我。

我脸红了。我知道我太不进步；我允许他以这一次到秦皇岛去为起点，立志写白话信。我在旅行中，努力用不纯粹的白

话写了好几封信给他。归来时他对这一件事只轻轻点了一下头，说，有些进步了，但他还劝我多读《新青年》。

热爱莫泊桑、译诗、写小说

陈毅努力从事于文学，在中法大学毕业以后更积极了。他尤其爱法国的诗。他在图书馆中发现了一本莫泊桑的诗集，读了以后高兴得了不得；他除了把吟墙的一首译了出来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外，并大为莫泊桑抱不平，说大家只知他是小说家而不知他会作诗，真太冤枉了；于是他写了一篇“诗人莫泊桑”，大大地捧了一下莫泊桑的诗才。小说方面，他创作了一篇“十年深沉”，发表后得到很好的反响。同时我因为研究法郎士而引起报社方面的注意；于是我同陈毅还有一位叫作李嵩高的，三个人对于文学有莫大的信心和自负。我们常常谈起法国的若干青年文学集团的种种轶事及其成就来比况我们自己。

斗千社

我们三人毕业以后，简直象中了魔一样，也不想到要去找事做，就在西山下租了一所很漂亮的洋房住下。那洋房名宋氏别墅，我们三人各据一房，有客厅，还有花园。我们准备在那里最少住三年再说。房租和三人的伙食费用每月预算是八十元，但我们认为卖稿一定会有这三五倍的数目。适巧我的第一部译作为北新书局以二百元买去了。更坚定我们的信念。陈毅想重译茶花女，李嵩高想试用白话译离恨天……

有一天晚上三人都喝了酒，忽然想到我们还没有社名，实在不象话。我们的社名要通俗，要别致，声音要清楚，笔画要简单，要表面看去似有意义而实际没有……三人先定了原则，深

思了许久，我们终于想出了两个字“斗千”，我们对我们的斗千社的前途抒发了无数的幻梦。附带的一事，便是陈毅想取一个与此原则相同的笔名，结果又想了许久，才得到了“曲秋”两个字。

可是我们的斗千社才成立不久，经济就崩溃了。正在危难的时候，居然有人以访贤的态度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来。来信的人是晨报副刊的编辑刘勉己，说的是要我们三人负责为晨报编一文学周刊。关于稿费等等，请我们到北京去商量。

从书生到革命斗士

陈毅于是被派为“斗千社”的代表。代表未出发前，我们举行了一个“会议”；就是编这个刊物，要求对方每月至少有八十元的稿费。我们有了这笔基本收入就可以安心从事于文学了。陈毅去交涉的结果是一时不能决定，须听回信。三天之后，回信来了，说报社惯例，一个周刊最高稿费是二十四元，八十元相差太远，无法接受。

事情破裂了，“斗千社”不能维持，我只得跑广东；李就回了四川；陈毅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工作。后来，我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使当时晨报方面，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斗千社”能维持下去，陈毅必然在文学上继续努力而有更大的成就；到今天大概只会有文学家陈毅而不会有将军陈毅了。现在看见报上记载，说陈毅常对人说，一旦战事平静他还要写小说，这必是他内心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到来的时候，将军陈毅将会兼而是文学家陈毅了。

一九二六年离开陈毅以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再见着他。他到了我的住处，立刻就倒在床上睡了。我一面正在编民众日

报的副刊，一面不断地望着他：他变了，满面风尘。他已不是斗千社时代的他了。从下午直睡到夜深醒来才告诉我，他是从江西奉了命由浙江转到上海有重要工作的；但几乎被人发现了他，他一直走了两天两夜没有睡觉。

这时候我们大家全变成了大人，他要同我喝酒，想重温一下过去的愉快。我邀他的大哥和我的二哥一同去馆子中喝了很多的酒。我问他：

“你这样跑不觉得辛苦吗？”

“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他的大哥笑了，说：

“老弟，如果要找对象，上海有的是！”

我们的两位老哥，郑重其事地计划如何替他介绍一个适当的对象；他已有些醉意了。我同他回了我的住处。我问他：

“我这里，那些作特务的不会发现你罢？”

“一定不会。”他说。

“那么，你可以在我这里多休息几天。”

“好的。”

于是我准备了许多东西要给他吃，许多话要给他说。第二天大清早，他说有一点小事出去一下就回来。但不到两小时，一个小孩子送来一张纸条，是陈毅写的。他说我的地方特务们大约也知道了；他因此已上了火车到南京转芜湖要过江北去。他的生活在这时已如此紧张了。

人民将领、书生本色

从此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在一九四六年春天，政协开会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并寄了一张象片给我，穿著已完全北方

化了。信上他告诉我他在延安养病，又告诉我他是快到四十岁才结的婚，但却已有几个孩子了；又告诉我政协成功后他预备先回重庆住一个时期，然后回家乡乐至去见父老。但政协为蒋特破坏了，他也没有回川，一直奋战到今天。

关于他如何会用兵如神这一点，我以为是他到了江西后学习得来的；这些学习的过程已为各种书籍刊物所介绍过。我所要说的是陈毅虽是一个英勇卓绝的人民将领，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却并不如一般所想象他的作人如何硬性。实际上他是一个缠绵悱恻的人物；情感极丰富，有时为了受到感动他会流泪的。对于友情极为珍重。去年襄樊之役，康泽和四川人旅长郭勋祺都被俘，后来郭被释放了。郭是陈毅的旧友，据郭勋祺回来后给朋友的信上说，陈毅曾去看他，对于蒋区的旧友，无不一一殷勤问到，并且很关心大家的生活。他虽以书生而变成大将，却并不因为作了大将而就不是书生。既作大将而又不失书生面目，这是普通人所难能的。但他做到了，就是陈毅。

（原载：《大公报》1949年5月30日—6月4日）

《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一文辨正

陈 昊 苏

秋羊，即金满城。1918—1926年期间和陈毅同志是同学。由于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故1949年他写了一篇介绍陈毅同志早年事迹的文章，材料大体可信。但也有不少臆断不确的地方，特为之辨正如下：

第324页："他的父亲在满清末年还作着湖南省内的一个县官或府官。"此说大误。实际上是陈毅同志的外祖父在满清末年花钱捐了一个九品官巡检，任所在湖北省利川县的建南司。外祖父自已的儿子不成器，就把女婿和外孙接到任所，用女婿做书办（相当于文书）。所以陈毅同志的父亲只是到外祖父那里当了一个帮手。因为两家有矛盾，干了一年就辞职先回四川去了。陈毅同志到外祖父任所去时是七岁，回到成都是九岁。

第325页："陈毅放弃了甲种工校而去考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留法预备学校）"，应指出当时陈毅同志是因家庭景况下降，读不起甲种工业学校了，才报考留法预备学校的，希望将来有机会出国勤工俭学，这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是一个令人响往的出路。

第327页："又劝我读他的亲戚谢无量的诗学入门。"按谢无量乃四川乐至县人，是陈毅同志的同乡。此处说成是亲戚，恐误。

第329页："我们大约在九月中旬动身（赴法）"，应为八月

十四日乘船离上海赴法。

第 330 页："上岸即住在法国一个公立医院中养了差不多半月的病。"应为在马赛的华工医院养了近两个月的病，是营养不良所致的脚气病。

第 331 页：关于陈毅同志离开工厂一事，其说不确。事实是因一九二一年春天参加学生请愿活动，而被工厂解雇，而请愿的目的即为勤工俭学生争取求学经费，故不是因为有了求学费用而自动退出工厂。

第 332 页：从事爱国运动一节，应指出在巴黎集会并痛打驻法公使代表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第 332 页："我们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个人行动，没有组织，没有章程，也没有什么自治会，或其他社团一类的名称"，亦不确，实际上当时已有世界工学社组织，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和外围（团正式成立是在陈毅同志等回国之后）。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蔡和森、赵世炎都是世界工学社的成员，另外在争取"里大"过程中也组织了运动团、联合委员会等组织。

第 333 页："那一次只集合了一百零六人"，应为一百零五人，其中有赵世炎，但被迫回国的仅一百零四人，无赵世炎。赵后来被国民党枪杀是从苏联回国以后的一九二七年。

第 334 页：被迫上船离开法国是十月十四日，非十一月的事。

第 335 页："秘书、参谋、编辑"一节大多不符事实。陈毅同志等十一月廿三日到达上海，即请求各界支援，与反动当局展开斗争，十余天后他受川籍同学委托回川请求援助，找过杨森、刘湘等军阀，但他们都不肯出钱解决留法学生的困难，陈毅同志也不愿只为自已找出路，拒绝了他们对个人的聘请。

关于和陈书农的关系，更是附会。那是在一九二六年第二次回川做党的军运工作，党派陈毅同志到陈书农部做工作，策动他们起来响应北伐。与刘伯承同志认识也是在那时候。在新蜀报任编辑事，则有云是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回了一趟成都后再到重庆的时候。

第336页："在这里他倒发生了一件很美的罗曼司"，亦值得研究。据陈毅同志回忆，当时并未提及个人婚事，盖因当时社会上人情险恶，国家危亡日日萦回心头，无暇顾及此事也。这里引叙陈毅同志的一段诗，称不上是"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作品"，但这一材料对我们搜集陈毅同志的遗作不失为一条线索。

第336页："这一年秋天他就来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书了"。应说明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毕业时间按中法大学毕业同学录应为一九二六年。大约是一九二五年底结束学业，一九二六年初发给的文凭。

第338页：关于"斗千社"一节。陈毅同志曾参加过文学研究会，此处未提及。又陈毅同志用"曲秋"这个笔名是一九二五年初，并非在大学毕业之后。

第339页："陈毅大概是这个时候正式参加了共产党的工作"，此系误揣。陈毅同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入党，他在中法大学学习和从事文艺工作，都是一种职业上的掩护，而一九二六年五月陈毅同志离京回四川是党派他回去搞军运工作的。

第339页：关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再见的情节。当时陈毅同志是做为红四军代表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又返回苏区。当时利用了金满城这个老同学作为掩护，但并不可能向他讲明真实身份和行动路线。金满城所叙见面的情节大致可信。

（记于一九七三年）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关于我们的父亲陈老总的回忆片断

昊苏　丹淮　小鲁

我们要说的，是难忘的一九七一年。

这一年，父亲发现患了癌症。从年初到年终，他接受过两次腹部大手术，在与恶病顽强的搏斗中，走完了生命最后的路程。与此同时，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剧变，这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父亲的迟暮之年带着重病投身到剧变之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向林彪、陈伯达一类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作了一次最后的斗争。

重提往事，需要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父亲做为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并处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岗位上，很早就对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的反革命政治野心有所察觉。父亲反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反对在“大民主”的幌子下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封建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也反对把革命理论宗教化、禁锢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现代迷信。他曾经仗义直言，在一些公开的场合用犀利的言词抨击隐藏在革命旗号背后的鬼蜮伎俩，使许多革命的同志听了感到痛快，但也因此招来野心家阴谋家们的嫉恨。一九六七年二月，正当林彪、陈伯达以及反革命的政治暴发户“四人帮”

鼓吹并实行“全面夺权”发了狂的时候，他大声疾呼：“不能把权交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样，他就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站到尖锐对立的立场上，而被他们打成了所谓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流”。

接踵而来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迫害，父亲很快就在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一九六八年和六九年，他两次参加中央会议都被编在华东小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他们一帮子小兄弟围斗的主要目标，会场上喧嚣着无休止的辱骂，扣过来的是一顶又一顶重得可怕的大帽子。“四人帮”真正的狗头军师黑顾问也跳出来肆意诬蔑我们的父亲要搞“政变”，居心险恶地要把他完全打倒。在一九七〇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父亲因在石家庄蹲点的关系，被编到华北小组，正好碰上大野心家陈伯达在小组会上搞突然袭击，父亲又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围攻。持续四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最终导致肠癌的爆发。

在石家庄的一年中，父亲就经常感到腹部疼痛，但由于政治上处于逆境，得不到及时的认真的诊断和治疗。一九七〇年冬回到北京，一度住院检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一九七一年初，腹痛加剧，到一月十六日大痛难禁，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大手术，手术进行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转而采取切除措施。父亲病情这一意外的发现，从此给我们家庭的命运罩上了浓重的阴影。

父亲在承受大手术伤痛的折磨时，又遭到心脏病发作的威胁。病情之重，给母亲精神上带来沉重的打击。有几天母亲去医院探视，走到父亲病房门口就感到两腿发软，支持不住，简直没有力气进门。在共同经受了政治上大风大浪的冲击之后，

还需要他们一起去和恶病搏斗。母亲振作起精神，尽一切努力照顾病倒在床的父亲，父亲也处处体贴母亲的心情，他绝口不谈自已的病痛，还时时用乐观诙谐的笑语安慰母亲。幸好，经过一段紧张的治疗和护理，父亲的病出现转机，他的伤痛逐渐平复了。

医生曾把真实的病情向父亲隐瞒着，只说是肠梗阻，但为了治疗的需要，后来还是讲明了。父亲听罢，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了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除，再长出来再切除，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番话表现出父亲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是藐视的，他的情绪始终很乐观。可是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他已经年近七十，能经得起几次手术呢？回过头来想一想，那时我们全家对于这种恶病的严重性都没有足够的认识。

乍暖还寒的春天到了。父亲在和疾病搏斗的时候，还要经受政治上的冷风侵袭。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批陈整风运动逐步展开。这一运动的锋芒直指林彪反党集团，也触及到“四人帮”。所以他们彼此呼应，竭力扭转批陈整风的方向。他们玩弄的一个现成的毒计，就是继续对我们的父亲实行陷害。有人放出一股所谓“二陈合流”的谣风，竟然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我们的父亲与陈伯达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还煞有介事地在陈伯达的罪状上加了一条：“与二月逆流某些人勾结起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云云。母亲在机关里听到这股风，气愤极了，天晓得他们这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是从那里学来的！父亲得知后，却处之泰然，并劝我们的母亲，用不着为这种事生气。他说：我们党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造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进行批判可以不要事实作根据。大讲“二陈合流”的人，恰恰就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起

哄十分卖力的人，他们何时能有一点自我批评呢？父亲还说：毛主席把意见讲得很清楚，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

不久，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这是对林彪反党集团作斗争的一件大事。林彪反党集团以守为攻，一面由几员大将登台作假检讨，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我们的父亲正在做抗癌治疗，向会议请假。林彪的几员大将求之不得，乘机扣发全部会议文件。父亲无从了解当时会议内外的斗争情况，但凭着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他感觉到斗争正在深入，其影响将是很深远的。

这一年的五一之夜，父亲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这是他在两年中第一次公开露面，在当时曾发生很大的影响。许多人为乐观爽朗的陈老总重新出现而感到欣喜。五月二日，为了庆贺父亲在大手术后顺利的恢复，母亲自已动手，在庭院里摄影留念。现在收入《陈毅诗词选集》的那张我们父亲母亲的合影，就是那天拍的。母亲把照片放大出来，寄给当时散在各地的我们四兄妹。当我们从照片上看到父母双亲慈祥的面容时，不禁悲喜交集。我们在工农兵群众中生活，多少了解一点人民的情绪。人民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是满怀愤怒的，随着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开始斗争。思想解放的潮流需要一个汇集和蕴蓄的过程，但先声夺人，在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已经可以预感到狂飙雷电的来临。那时有不少同志向我们流露出对老帅们处境的关心，并坦率地表示：老帅们没有向他们（林彪和江青）低头，人民因此对老帅们表示尊敬。

阴云似乎在逐渐散去。随着父亲身体一天天恢复，我们家

庭也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六月，离家三年一向音讯很少的小鲁从部队回家探亲，丹淮和妹妹丛军也请假回家和父母团聚。七月，昊苏结束了在部队农场两年的劳动锻炼回到北京。当我们回到父母双亲身边时，看到他们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身体已显著衰老了。我们做儿女的对变化莫测的政治斗争已不甚感到兴趣，只希望父母能有一个幸福安定的晚年。但我们的党还处在多灾多难的时期，这个愿望又怎么能实现呢！我们发现：两位老人和我们想的不尽一致，他们的精神依然十分健旺，谈起时事来还是和过去一样充满着热烈的爱憎，只要党和人民需要，他们还会再一次投入对阶级敌人的英勇斗争。

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七月间，父亲母亲由丛军陪同，到北戴河海滨疗养。在多年不通往来之后，父亲与朱德伯伯、聂荣臻伯伯在海边亲切地欢聚，度过了一个值得纪念的夏天。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这平静的海滨预伏着一场狂风巨浪，也不知道这段疗养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重大战役前的短暂的休整。

那年阴历七月十三（按阳历算是九月二日），是父亲的七十寿辰。为了表示庆贺，丹淮从部队驻地寄来了一首按《永遇乐》词牌填写的祝寿词：

寿日皆欢，今度尤殊，七十古稀。
霜天淡云，松江初寄，正家门始离。
萧瑟复到，滦峰重贺，不觉十年满期。
忆风云，善恶终报，两鬓皆白何惜？

五十年内，才得宽余，谁知又斗病疾。
唯谢重恩，安乐晚年，秋风送家喜。

海滨情深，松涛散香，再领北戴深意。

放眼量，悠闲高龄，更添健力！

这首词在格律方面没有着意讲究，但却写得真挚感人。其中提到十年前的往事。丹淮在一九六一年夏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是我们兄妹中第一个远离家门的。当时父亲写诗送行，勉励我们兄妹千锤百炼，永远革命。丹淮在那年八月为祝父亲六十寿辰写了一篇五言百行诗，从父亲“井冈领红兵”的光荣传统写到他参加人民解放军的战斗激情，这就是“松江初寄，正家门始离”。父亲曾提议把丹淮这首祝寿诗连同他写的《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即丛军）》，再加上母亲和昊苏写的几首诗放在一起，编成一部家庭诗集，后来因为忙，没有来得及做，可惜的是，丹淮那首诗现在竟找不到了。

父亲很喜欢丹淮这首十年重寄的祝寿词。特别是其中“忆风云，善恶终报，两鬓皆白何惜”一句，道出了他这个为真理而斗争的老共产党员的襟怀。当年父亲在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时，并非没有估计到可能给自已带来严重的后果，但他对人民的力量怀有信心，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总要伸张，真理终归获胜，而把个人的升沉荣辱乃至生死安危置之度外。陈伯达被揭露出来，父亲的信念部分地得到实现。人民的胜利就是给予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报偿，个人遭受一点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丹淮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只是就陈伯达的垮台而发出感慨，却没有想到，仅仅过了十天，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林彪也垮台了。正义进一步伸张，人民再一次获胜。这种结局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是历史的必然；但那样迅速的就发生了，又好像是历史的巧合。后来，当我们全家在北京重新聚会时，父

亲高兴地提到丹淮的词，说：写得好呵，有点预见性呵！

北戴河的狂风巨浪发生在九月八日到十三日之间，林彪为了挽救自己的失败，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这是一伙叛徒卖国贼对人民发动的猖狂反扑，但落得的却是惨重的失败。林彪带着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最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之上。我们的父母双亲是九月八日离开北戴河回到北京的。大约二十日左右，父亲听到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正式通知，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庆贺，并郑重地向党中央建议：要追究林彪在中央和各地的死党，要彻底批判他们那条误国害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父亲以满腔喜悦欢迎党和人民取得的这一胜利。同时，他心潮起伏，联想到许多问题。十月一日，母亲也听了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他们在一起讨论九一三事件给予我们党的深刻教训，父亲翻出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五首》，母亲把它全文抄录下来，后来并交给我们阅读。一千多年的时光流逝，这篇东西很久不被人们重视了，但谁想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它又能重新给人以启示呢？试看下面两首：

其一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其二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两首诗都是讲辨别真伪，我们在批判林彪时恰好提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大问题。历史这面镜子提供了许多可以引为鉴戒的先例，白居易列举的是其中两对。臧孙讫在鲁国曾被誉为“圣人”，但他对于当世并无建树，后来还因谋叛而出逃，客死于齐。宁武子在卫国作官，本来很有能力，但因国君无道，就故意装傻来保全自已，孔夫子赞扬他“其愚不可及也”。周公忠心耿耿地辅佐幼主成王，却被诬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拳拳之忠，几乎无法辨白。王莽谦恭有礼，骗取人心，好像是汉室的柱石，而终于篡夺帝位，建立新朝。这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另作别论，白居易是把他们当作真与伪的对立面（诈圣和佯愚，真忠和假忠）介绍给读者的。古往今来朝真暮伪的戏一再上演，这样的人物不是比比皆是吗？

文化大革命据说是要反对修正主义，可是在修正主义头子乘乱夺权的关键时刻，反对他们的人却被打成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和“逆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老帅们被诬为要搞“政变”，搞“兵变”，而真正处心积虑研究和策划政变的奸雄却被加上“最忠实”、“最正确”、“最光辉”的桂冠。这不是骇人听闻的颠倒吗？白居易笔下的真伪对立在我们眼前重现了，教训是多么深刻呵！假作真时真亦假，无数的悲剧，无穷的灾难，都是由此造成。在以假乱真方面，林彪当时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请看：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那张口闭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其实是歪曲并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罪人！

以假乱真并不可怕，问题在于辨别真假。父亲主张加强党和人民对领导层的监督，给群众以更多的发言权，允许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人民群众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是最强的，而且只有人民群众这个历史的主人有权作出对于是非真假的最后裁判。如果人民的意志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们就会有所顾忌而不能胡作非为，一旦他们伸出了黑手，党也能够比较容易地揭露他们，而不致付出过高的代价。

九一三事件在人们思想上引起极大的震动，这一点我们兄妹都有切身的体验。林彪“一贯正确”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了产，促使人们考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恶魔呢？也许可以说，思想解放的暗流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冲破闸门，一变而为汹涌澎湃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贯和林彪打得火热的“四人帮”，这时依然以“左派”的面目出现，好像林彪恨的是他们，而他们是一贯反对林彪的。这又是一个以假乱真的标本。父亲针对这一点对昊苏说：还记得“二陈合流”那股谣风吗？当时是有人借批判陈伯达大捞政治资本，现在批判林彪，他们又捞了一把。斗争很复杂，也许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看清楚，你们是可以见到分晓的。我们记住了父亲的话，他是要我们懂得：林彪虽然垮台了，林彪一类人物并没有绝迹，那朝真暮伪的戏还在继续上演。本来，江青给林彪拍了一张令人作呕的“读书”照片，刊登在当年九月发出的《人民画报》上，为林彪篡夺上台作鼓吹，万目睽睽，他们怎么遮掩得住？九一三事件之前，林彪和“四人帮”是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九一三事件以后，“四人帮”对林彪是多方辨解，百般包庇，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批判过林彪。林彪与“四人帮”也有过争斗，那是所谓

“权力再分配”的角逐，不过是竭力挖取对方控制的阵地以扩大自已篡夺的权力而已，在实际上“四人帮”对于过去和林彪一起奉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倒是颇为忠实的独家奉行到底的。举例来说，一九七四年他们公开打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旗号，实际上不批林，假批孔，偏偏对批判周公很有兴趣，变本加厉地重演林彪祸国殃民，以假乱真的政治丑剧，唯一的不同点，是戏的主角由王莽换成了武则天。这些是众所周知的后话了。

为了揭露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的庐山真面目，十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召开有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父亲当即参加，奋不顾身地投入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去。那时他的病已经发展到晚期，连续的治疗已经引起身体正常机能的保护反应，却未能制止住癌组织的恶性发展。在这样危急的关头，党和人民的需要再一次超过个人生死安危的考虑，父亲又奋起战斗了。在老同志座谈会上，他作过两次长篇发言，集中揭露在我们军队初创时期即从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到开辟中央苏区这一段林彪所犯的错误。在林彪反党集团猖獗的几年中，这一段历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曾经当过逃兵的林彪，被打扮为“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为了证明林彪是天生的“圣人”，他们从头开始伪造历史。我们的父亲愤怒地斥责他们：伪造历史就是犯罪。他坚信历史对于阴谋家野心家的制裁是无情的，当王莽篡位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他过去伪装谦恭的假相不就被彻底戳穿了吗？幸运的是，父亲终有机会亲自来揭露林彪的假面具，把历史的真象讲出来。

正当党和人民需要老一辈革命家贡献丰富经验继续战斗时，父亲却再一次病倒了！十一月二日，他突然呕吐，以后就

基本上不能吃东西了，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他想亲自动手把自已的发言稿整理出来，终因病情的恶化而未能如愿，这又是多么不幸呵！

十一月下旬，父亲转往日坛肿瘤医院治疗，为了解决进食的问题，决定再做一次胃肠吻合手术。手术前周恩来伯伯曾亲到医院探视。当时，我们兄妹都陆续回家看望父亲。我们满怀希望，在排除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之后，有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父亲的病还能一点一点地挽救过来。但我们没有想到，时间已经迟了。

阴云再度笼罩着我们全家。父亲第二次手术后，一直未能恢复。母亲却因过度忧虑和疲劳，身体垮了下来。那时候母亲咯血不止，无法休息，整天为父亲的治疗奔波，同时还要考虑整理父亲诗词的事。为了不影响父亲的情绪，她忍着病痛，千方百计地安慰和照料父亲，在焦急和痛苦中度过了那些万分压抑的日日夜夜。

十二月底，小鲁探家的假期将满，虽然父亲的病情更重了，但父亲仍要小鲁按时归队，母亲也同意了。小鲁临走时向父亲告别。我们特意把齐白石老人手书的诗词挂轴带到病床前打开，那上面录的是父亲有名的《赠同志》诗：

二十年来说是非，一生能系几安危？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春蓓蕾。

母亲也拿出她写的四句话，其中两句是陆游的诗：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生征途履危难，抗疾亦当如是看。

我们是多么想给病中的父亲以精神上的安慰呵！他一生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三十六年前他写了《赠同志》和

《梅岭三章》诗，就是在生死关头留下的千古绝唱。种种难关都被他用顽强的意志闯过来了，我们盼望这一次还将是这样……

父亲好像是了解我们的心情，他露出笑容说：我会好起来的。小鲁回部队要好好干，不要挂念我。等我手术伤口长好后，我还要站起来，我还要下地走路，我还能做些工作。

以后回忆起当天的情景，母亲就忍不住流泪。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他无论干什么都很快，就连最后缠绵病榻的时间也是那样短促……确实，我们全家都没有想到，小鲁在连队只停了三天，刚刚迎来一九七二年的新年，又再一次赶回北京，父亲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们的妹妹丛军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一月四日，当叶剑英伯伯来看望的时候，父亲好像有很多话要讲，但却没有力气讲出来，只听见他吐出了这样一些不连贯的话：

“党中央”，“红军”，“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可以想见，父亲是在回顾创业艰难的岁月。南国烽烟正十年，父亲在赣南闽西粤北的丛山峻岭中坚持战斗，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当祖国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的时刻，他坚守在党中央分配给他的岗位上，团结同志，依靠人民，与阶级敌人作殊死的斗争，终于保存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迎来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新高潮。现在他已经生命垂危，但革命的壮志并没有消退，从他的遗言里，我们还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战斗生活的向往。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父亲不幸逝世。他是怀着对党和军队的无限眷念，对林彪一类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无比憎恨而离开我们的。在诀别的时候，他期望我们后人把斗争进行

下去，一直到最后战胜那帮穷凶极恶的敌人，这是铭刻在我们心头的永不磨灭的遗教。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这七年时间，我们党和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在思想解放的澎湃激流中，进行了一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政治革命，迎来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新时期。我们的母亲因患肺癌，不幸在五年前逝世，未能全部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但她在最后两年中，把自已的全付心血熔铸于父亲遗留的诗稿之中，编成了《陈毅诗词选集》，并冲破“四人帮”的阻拦，把书稿送到人民群众中去广泛流传，在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决战中，发挥了战斗的作用。母亲和父亲一样，在自已生命的暮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

伟大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事业正在突飞猛进，这是足以告慰包括我们父母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的英灵的。我们相信，烈士的壮志不会泯灭，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向新的胜利进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附录：

一、建国后陈毅同志部分著作、文章、报告目录

上海市工作任务报告　1950.4.20.

《新华月报》　1950年第2卷2期

华东政治军事报告　1950.7.17.

《新华月报》　1950年第2卷4期

中共上海市委整风报告　1950.10.13.

《新华月报》　1950年第3卷1期

世界青年团结起来为保卫和平而奋斗

扬州市委编《国际和平斗争日》

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　1951.8.

《解放军报》1978年9月7日

为争取“五反”运动底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　1952.3.25.

《新华月报》1952年第4期

陈毅同志谈文艺创作和批评　1952.6.10.

《文艺报》1979年第1期

和青年团同志们谈学习和工作　1953.8.22.

华东《青年报》1953年1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典范

《人民日报》1955年11月13日

中共中央代表、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讲话 1956.4.22.

《新华半月刊》1656年第10期

目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政策 1956.9.25.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21期

关于红与专及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问题 1961.8.10.

《中国青年》1961年第17期

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2.3.6.于广州

《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文 艺 报》1979年第7期

谈外语学习 1962.

《英语学习》1978年第2期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965.9.29.

《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

二、回忆陈毅同志文章目录 (1975.11.—1979.9.)

艰难的岁月 杨尚奎

《解放军报》 1975年11月22日

《解放军文艺》 1975年第12期

※黄桥之战——忆陈毅同志 蔡子悟

《文汇报》 1977年1月4日

※陈毅同志，上海人民永远怀念您　　《文汇报》记者
《文汇报》　1977年1月5日

积雪消融显青松　　吴世俊
《解放日报》　1977年1月6日

怀念我们的好司令陈毅同志　　龙　跃
《解放日报》　1977年1月6日

功绩如山　岂容诋毁
——怀念陈毅同志　痛斥“四人帮”谰言　卢　平
《文汇报》　1977年1月6日

忆陈毅同志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江南二三事　　林　晖
《新华日报》　1977年1月6日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辛勇义
《新华日报》　1977年1月6日

宿北军民忆当年　深切怀念陈司令　　武长久
《新华日报》　1977年1月6日

忆可敬可爱的陈毅同志　　姚　鼎
《新华日报》　1977年1月6日

☆向陈毅同志学习　（青松长存记忆中）　　陈茂辉
《新华日报》　1977年1月6日

亲切的接见　巨大的鼓舞——忆陈毅同志
接见宜宾“白毛女”罗昌秀　　郑明章等
《四川日报》　1977年1月31日

陈毅同志在大江南北的战斗生活片断　　洪　伍
《南京大学学报》　1977年第1期

陈毅同志在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　　谢世诚等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哲学）　1977年第1期

怀念陈毅同志　　李惠海
《工农兵评论》　1977年第2期
《江苏文艺》　1977年第2期

陈毅同志与鲁迅先生　　顾八纮等整理
《语文战线》　1977年第3期

难忘的三个月——随陈毅同志赴藏一行　　肖国勤
《徐州师院》　1977年第3期

为建设一个新上海而斗争
——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赵丁失等
《上海少年》　1977年第5期

威震孟良崮——回忆陈毅同志　　汪晓云
《上海少年》　1977年第5期

※创业艰难百战多——回忆陈毅同志在赣粤边
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杨尚奎
《历史研究》　1977年第6期

☆光明磊落　革命一生
——缅怀陈毅同志　　谭震林　粟　裕
《人民日报》　1977年7月29日

难忘的回忆　深切的怀念——陈毅同志
关心爱护战士二三事　　毛奇新
《湖北日报》　1977年7月30日

和陈毅同志一起战斗的日日夜夜　　刘亨云
《浙江日报》　1977年7月31日

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
——缅怀敬爱的陈毅同志　　周爱义等
《安徽日报》　1977年8月5日

陈毅同志关怀地方武装　　乔文聚
《大众日报》　1977年8月8日

※茅山峰火　　江苏镇江军分区政治部
《体育报》　1977年8月10日

向敌人巢穴里投进烈火——忆陈毅同志
指挥的新四军黄桥之战　　胡　毅
《广州日报》　1977年8月14日

回忆陈毅同志对围棋运动的关怀　　罗建文
《体育报》　1977年8月15日

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缅怀陈毅副总理　　陈祖德
《新体育》　1977年第8期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张爱萍
《人民日报》　1977年9月2日

严冬过尽绽春蕾——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　　丁上淮
《云南日报》　1978年1月6日

陈毅同志给民歌题词　　里　冈
《解放日报》　1978年1月22日

一个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形象
——纪念陈毅同志逝世六周年　　龚克昌
《文史哲》　1978第1期

重读《赣南游击词》

——忆陈毅同志战斗在赣粤边　　杨尚奎

《革命文物》　1978年第1期

《江西日报》　1978年8月28日

☆将军本色是诗人——陈毅同志与诗　　臧克家

《人民文学》　1978年第1期

※“红旗十月满天飞”

——忆和陈毅同志的三次会见　　张爱萍

《上海文艺》　1978年第1期

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姚　耐

《上海文艺》　1978年第1期

巍巍孟良崮　　苗得雨

《上海文艺》　1878年第1期

在新四军东进的道路上　　松　植

《革命文物》　1978年第3、4期

陈毅同志在二十年代的一段讲演词　　易新鼎

《北京师院学报》　1978年第3、4期

抗日旌旗到江南

——陈毅同志东进江南抗日活动片断　　马洪伍

《南京大学学报》　1978年第4期

☆兼资文武此全才——忆陈总领导上海工作片断　　许涤新

《历史研究》　1978年第5期

《解放日报》1979年5月26日

☆击石有待于刀斧——忆陈毅同志勤工俭学前后　　陈孟熙

《四川文艺》　1978年第7期

※怀念陈总——回忆陈毅同志对部队
文化工作的亲切关怀　　吴　强
《解放日报》　1978年8月3日

☆陈老总，家乡人民怀念您　　甘　泉
《四川日报》　1978年8月27日

投身革命即为家——忆敬爱的陈毅同志　　丁上淮
《云南日报》　1978年8月27日

陈毅同志的故事　　周　倜
《革命接班人》　1978年第8期

从陈毅同志改诗所想到的　　润　荃
《北方文学》　1978年第9期

☆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粟　裕
《人民日报》　1978年12月1日

☆弥天烽火举红旗
——回忆陈毅同志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陈丕显
《文汇报》　1978年12月17日
《湖北日报》　1978年12月20日

※霜重色愈浓　斗争见英雄
——忆陈毅同志　　杜　易　石国宝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1979年1月6日

※回忆陈老总　　邹　进
《工人日报》　1979年1月6日

☆肝胆照人显英才——忆陈毅同志对我的帮助教育　肖望东
《解放日报》　1979年1月6日
《中国青年报》　1979年1月13日

日月重光世运开——回忆陈毅同志　　林辉山
《浙江日报》　1979年1月6日

前进心不灰——怀念敬爱的陈毅同志　　丁上淮
《云南日报》　1979年1月6日

巍巍雪山立青松——缅怀敬爱的陈军长　　王仁义
《解放日报》　1979年1月7日

回忆陈毅元帅　　张伯驹
《社会科学战线》　1979年第1期

新四军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缅怀陈毅同志的一段光辉战斗业绩　　姜　平
《南京大学学报》　1979年第1期

彻底砸碎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白专道路”——回忆陈毅副总理视察安徽大学期间对我们的教诲　　王开玉
《安徽日报》　1979年2月28日

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同志　　童怀周
《历史研究》　1979年第2期

陈毅同志和兴国模范县　　李崇林
《江西大学学报》　1979年第2期

陈毅青少年故事　　郭久麟
《青年一代》　1979年第2期

从《放言五首》想到……——怀念我的父亲陈毅　　陈丹淮
《工人日报》　1979年3月1日

慷慨畅言艺文事——忆陈毅同志领导文艺创作　　沈默君
《解放军报》、《解放日报》　1979年3月3日

正确塑造银幕上的英雄形象
——怀念陈毅同志谈电影创作的片断　　沈默君
《电影新作》　1979年第3期

雪化倍感松高洁——回忆在陈毅同志
身边工作的日子　　贾胜令
《人民铁道》　1979年4月5日

※难忘的陈毅同志——杰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
和卓越的革命外交家　　朔　望
《世界知识》　1979年第4期

军民游击满南华——回忆陈毅同志开辟江南、江北
抗日根据地　　管文蔚
《群众》1979年第4、5期

怀念人民的好市长陈毅同志　　陈丕显
《解放日报》　1979年5月20日

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奠基人——回忆解放初期
陈毅同志对城市建设的关怀　　叶进明
《解放日报》　1979年5月22日

好领导、好同志、好朋友——怀念陈毅同志片断　　匡亚明
《文汇报》　1979年5月23日

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保路风潮的启示　　郭久麟
《重庆日报》1979年5月27日

“我要为众人　营私以为羞”
——回忆陈毅同志在上海工作的片断　　刘　晓
《文汇报》 1979年5月28日
美好的回忆——记陈毅司令员和孩子们一起欢度
“六一”儿童节　　归兆恒
《新华日报》1979年5月30日
最高的奖誉——回忆陈毅同志参观
“美术电影展览会”　　卢怡浩
《大众电影》1979年第5期
“博文约韵坐春风”——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　　郭久麟
《重庆日报》1979年6月14日
陈毅同志二三事　　徐　行
《中国青年》1979年第6期
追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于　晶
《文汇报》1979年7月10日
怀念陈毅同志对文博事业的巨大关怀　　沈之瑜
《光明日报》1979年8月25日
老军长指挥我们打程道口——忆陈毅同志　　胡炳云
《新华日报》1979年8月26日
追怀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的讲话　　陈　淼
《旅大日报》1979年9月4日

注：有☆者又见《人民的忠诚战士》
有※者又见《怀念陈毅同志》

《跟随陈毅同志打游击》　　宋生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78年3月北京第二版

《陈毅在赣南》 杨尚奎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年12月版

《人民的忠诚战士》

要为真理而斗争

——记留法勤工俭学中的陈毅同志 何长工

风云突变看青松

——记南昌起义前后的陈毅同志 郭化若

插一杆红旗在山上——忆陈毅同志在红色赣粤边

坚持游击战争 丁上淮

难忘的三年 宋生发

龙游大海下山来——记一九三八年春向陈毅同志

请示汇报工作 温迎春

勋业争传大江南北

——忆陈毅同志在东进抗日的岁月里 钟期光

抗日旌旗战局开 周 林

弯弓射日到江南——忆陈毅同志领导创建

茅山敌后游击根据地 吴仲超

刀丛出入历艰辛——忆陈毅同志在郭村

保卫战前后二三事 惠浴宇

后发制人歼顽敌——黄桥决战前后 黄逸峰

永远响在耳旁的教诲

——回忆敬爱的老首长陈毅同志 滕海清

泰岱霁雪明飞帜

——忆陈毅同志在山东的片断 陈锐霆

刀丛扑去争山顶——记孟良崮战役 洪 隆

一片丹心照汉旗　　冯　定
戎行兼言艺文事
——陈毅同志与苏北的文化工作　　阿　英
他也是文化司令员
——忆陈毅同志对部队文化工作的关怀　　吴　强
阑珊灯火启情思
——深切怀念陈毅同志对我的教诲　　苏　堃
人民培养汝　一切为人民
——忆陈毅同志对干部教育工作的关怀　　张崇文
“仍自教尔分人狗”
——忆陈毅同志重视战俘教育改造工作　　郑文卿
严冬过尽绽春蕾——回忆陈毅同志二三事　　周而复
淋漓兴会溢行间——读陈毅同志诗词　　赵朴初
棋虽小道　品德最尊——忆陈毅同志与围棋　　姚　耐
争作再发春花——忆陈毅同志对
京剧改革的关怀　　赵燕侠
给陈军长当警卫员的回忆　　黄朝天
在陈毅同志身边七年　　陈鼎隆
青松挺且直　　原陈毅同志处部分工作人员
革命永向东——怀念我的父亲陈毅同志　　陈昊苏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12月版

《怀念陈毅同志》
陈毅在山东　　王　德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6月版

编　后　记

陈毅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也是上海人民敬爱的好市长，他为我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光照史册。在十年动乱中，他却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横加迫害，以致遗愤而逝。今年是陈毅同志逝世七周年，我们搜集了陈毅同志的部份遗著，包括他早期的文艺创作，编选成册，作为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内部参考材料，并藉以寄托我们对革命先辈的哀思和缅怀。

在资料的搜求过程中，我们得到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镇江博物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本院图书馆等单位有关同志的鼎力支持和协助，尤其是陈昊苏同志，除对我们的编选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外，还将他写的《辨正》等文供我们刊用，丰富了本书的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学校的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任务中，特为本书排印，使之得以如期出书，我们谨在此一并致谢！

所辑各文，除了对其中明显的刊误作了谨慎的校正外，一概按照所据印文原文刊用，并于文末注明其出处。限于我们的水平，在编校等方面仍较粗疏，错误缺点一定不少，我们热切地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严正的批评和指正，以俾修订。

编　者　1979年9月10日。

封面
目录
正文